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总第二十期（2021年5月—2021年7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 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审：王 瑞 徐 军

编 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 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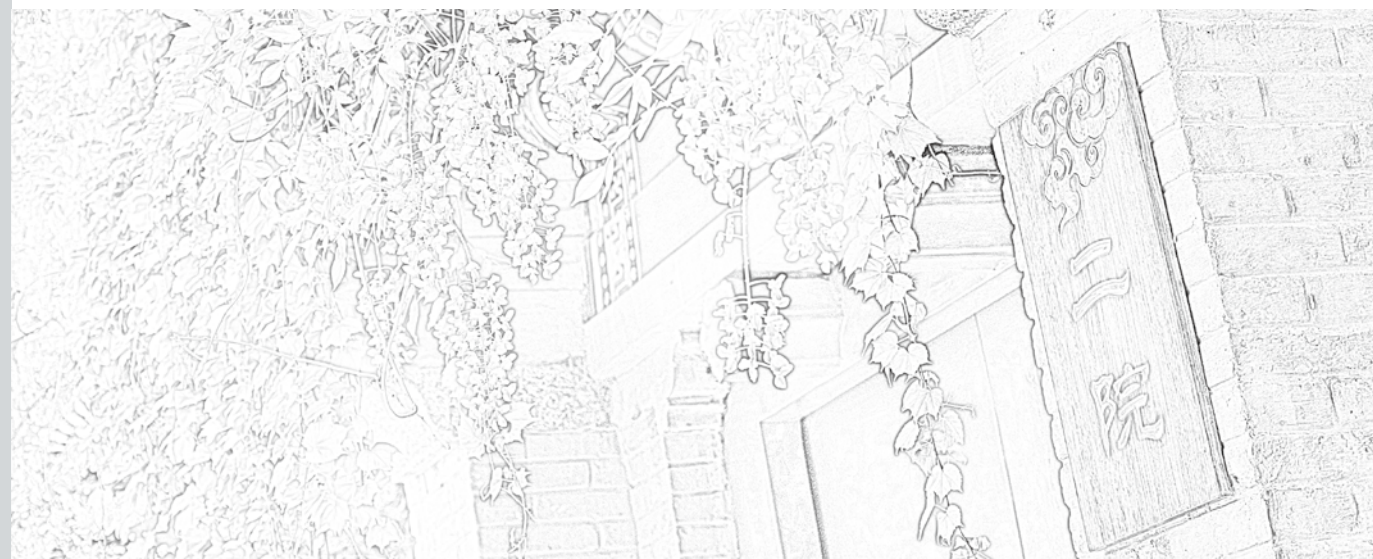
2021年第3期

总第二十期

文 | 研 | 通 | 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1年第3期 总第二十期



目录

注：目录所列数字为该系列讲座序号，其他场次请见官网。

01 文研学术

(一) 北大文研讲座	02
[200] 穆宏燕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	02
[201] 韩琦 科学在行动：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	07
[202] 张静 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	11
[203] 伊夫·夏尔·扎卡 卡尔·施米特或敌意的政治学	16
[204] 陈力卫 联系东西方的纽带：麦都思在十九世纪翻译史上的贡献	22
[205] 赵国英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	26
[206] 刘津瑜 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	30
[207] 王继辉 《贝奥武夫》与古日耳曼英雄世界	34
[208] 段晴 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	38
[209] 定宜庄 考据、口述与田野——以那清绪口述为例	43
[210] 彭小瑜 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1096-1141）论婚姻和家庭	47
[211] 马忠文 近人书信程式与文化蕴含	50
[212] 史阳 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和巫术治疗	55
[213] 任万平 龙凤呈祥——清代皇帝大婚典礼	60
[214] 白玉冬 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研究与展望	64
[215] 霍华德·威廉姆斯 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殖民主义	67
[216] 伊夫·夏尔·扎卡 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新冠疫情的政治学	70
[217] 折晓叶 工业的乡缘——适配与互融	75

(二) 未名学者讲座	84
[72] 沈一鸣 贾米在中国——一位15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	84
[73] 刘寅 查理曼与弃绝魔鬼——对加洛林改革的一项话语考察	87
[74] 赵诺 整风运动后的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	91
[75] 方诚峰 南宋道家如何“治国平天下”？	94

(三) 北大文研论坛

[137] 张侃、李里峰、胡英泽 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99
[138] 郑炳林、王丁、黄维忠、白玉冬 文书碑志与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	106
[139] 崇明 孟德斯鸠与欧洲政治传统	113
[140] 于建军 发现通天洞——通向早期人类的鲜活世界	122
[141] 潘建国 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学漫谈	127
[142] 李肖、李承森 绿洲的进退——新疆的植物、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	133
[143] 应星、孟庆延、蒋凌楠 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137
[144] 韩琦、梅谦立、李天纲 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及其反思	144
[145] 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	149
[146] 卢华、孟勇、吕彦霖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156
[147] 周黎安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164
[148] 历史书写与帝国记忆	171

(四) 邀请学者论坛

[07] 聂澹萌 尚书省与汉魏南北朝文书行政体制的演进——以刘宋太子监国仪注的释读、定性为基础的讨论	181
[08] 陈瑞翻 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佛教写本层累性管窥	183
[09] 马忠文 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	185
[10] 白玉冬 有关高昌回鹘历史的一方回鹘文墓碑——蒙古国出土乌兰浩木碑释读与研究	187
[11] 徐永明 从纸本文献到智慧化大数据	189
[12] 曹寅 陈景濂的归来：战时印度的中国城与中国逃兵	192
[13] 杜永彬 生成、传播、接受——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知与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95
[14] 吴真 中日书籍环流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	198
[15] 吴华峰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	201

(五) 文研读书

[26] 赵莉 复位与再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	203
[27] 乐黛云 和而不同，多元之美——乐黛云教授《九十年沧桑》读书会	211
[28] 马孟龙 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读书会	215
[29] 聂澹萌 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读书会	220
[30] 饭山知保 族群政治与科举社会：《另一种士人》读书会	226

[31] 李水城 匪杖不强：《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读书会	232
----------------------------------	-----

(六) 静园雅集

[28] 徐家宁 摄影术与紫禁城	237
--------------------	-----

(七) 菊生学术论坛

[18] 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	240
[19] 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	242

(八) 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

[17] 吴真 北平分店与出版大腕——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另一面	246
[18] 郭津嵩 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	250
[19] 马楠 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志》综理	253

259 文研回望

▪ 文研院举办学术期刊负责人座谈会	260
▪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在文研院举行	262
▪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新书发布会在文研院举行	263
▪ 文研院举办“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主题系列论坛	266

269 文研纪事





文研学术

（一）文研讲座

200

穆宏燕 |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



2021年5月6日下午，“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第二场、“北大文研讲座”第20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穆宏燕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主持。

讲座伊始，穆宏燕老师依据古文明发展史纠正了现今社会与学术界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出现的“推崇古希腊文化而贬低古波斯文化”的认知偏见。在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古文明中，古希腊文明崛起时间最晚，其黄金时代的文化发展高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集东地中海文明之大成。

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先知型的人创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一般认为诞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花刺子模地区。“花刺子模”（جزراوخ）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伊朗称其为“伊朗民族的摇篮”。琐罗亚斯德教的经书是《阿维斯塔》，该教信仰代表“善”的最高光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崇拜表征：一是象征天上光明的“太阳”，二是象征地上光明的“火”。由于崇拜火的宗教仪式独特于其他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又被称为“拜火教”，但穆宏燕教授认为，这一称呼并不能准确

概括琐罗亚斯德教的特征，崇拜火只是崇拜光明的一种表象。不同于一神论，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认为世界生成于代表善的光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与代表恶的黑暗魔王阿赫里曼争夺光明的过程，因此在宇宙生成学说方面该教是一种二元论。

中国境内也曾有琐罗亚斯德教传入。2013年新疆境内塔什库尔干地区考古发现了琐罗亚斯德教历史遗址，其黑白线条展现了琐罗亚斯德教对光明的崇拜：白色代表了太阳的光芒，而黑色（在这里黑色不是代表黑暗）则是代表火焰燃烧后的黑色灰烬，二者都蕴涵着强大的光明力量。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到伊朗的路线，一般认为是从里海北岸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如今的阿塞拜疆（ناجیابرندا）地区，“阿塞拜疆”一词意为“圣火升起之地”。阿塞拜疆地区由不少天然气自燃的现象，即使是在水中，若地层里面的天然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从水中冒出火来的自然现象。琐罗亚斯德教中“水中之火”的相关教义应该是把一种自然现象包装上宗教外衣的结果。

琐罗亚斯德教在古波斯米底王朝（前770-前55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年）广泛传播，当然同时也吸纳了两河流域、古埃及等地的诸多宗教元



讲座现场

素。而后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4年），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中的外来宗教元素被尽量排除，纯粹的本教信仰得到强化，并成为波斯国教，进入影响力鼎盛时期。

接下来，穆宏燕老师介绍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学说。该教经书《阿维斯塔·创世记》对世界的描述为：光明和黑暗具有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特性，其无限性体现在光明世界与黑暗世界各自都具有无边无际的广阔性；其有限性体现在光明和黑暗二者互相不能涵盖，二者之间互相隔绝。世界的形成过程也是光明与黑暗缠斗1.2万年的过程，共分为四个三千年。第一个三千年，光明主神在光明天国中创造原型世界，以“无思想、无动作、无形体”的美妙完美形态存在。对“原型世界”等抽象概念，穆宏燕老师解释道，唯物主义学说普遍认为先有具体物象然后抽象归纳出概念、理念，而宗教学说都是唯心主义学说，往往

认为先有抽象概念或理念，尔后根据理念（概念）产生具体物象。先有完美的原型世界，后衍生其具体物象。同时，黑暗魔王阿赫里曼窥见光明世界的美好，意欲侵袭光明。光明主神与黑暗魔王相约九千年的大战。

第二个三千年，光明主神和黑暗魔王都为大战作出准备。根据经书记述，光明主神先创造出六大光明辅助神，其后以无边无际的光，创造出熊熊燃烧的火，进而创造出气，气凝结形成水，水再形成土，进而组成了世界万物的四大元素：火、气、水、土。光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仿照光明天国中的原型世界，使用四大元素创造宇宙万物，包括动植物和人类。这一过程说明宇宙万物是光明的，性质是善的。另一面，黑暗魔王也创造着与光明世界相对立的形形色色黑暗魔怪。直到第三个三千年，黑暗魔王率领妖魔入侵到原本是善的宇宙万

物所存在的世界，因此第六千年至第九千年，人类尘世的属性由善变为善恶交织的，光明与黑暗展开五次大搏斗。第四个三千年，光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令琐罗亚斯德的灵体由天国降生于人类尘世，即所谓“先知出生”；琐罗亚斯德创立正教，教化众人，去恶向善。而后到了第一万二千年，一位影响犹太教、伊斯兰教什叶派深远、被认为是“救世主”的隐遁先知索鲁什降生，其引导信仰正教的正信者们步入光明天国。之后，光明主神降下大火和熔铁焚烧掉尘世中的黑暗物质，彻底驱逐人类世界中的黑暗，光明与黑暗从此重新归位，各持其所。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中的“末日审判”，此概念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思想都有深远影响。

对于“亡者灵魂审判”的思想，穆宏燕老师补充道，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认为

灵魂在死后三日内盘旋于肉体之上，家属要进行亡灵的告慰；第四天，灵魂经过鉴别桥，桥下有天狗监视亡灵。被鉴定为善者的灵魂进入光明界，恶者进入黑暗界，有的灵魂善恶参半，在琐罗亚斯德教中他们被归入“哈梅斯塔坎”即光明界和黑暗界之间的中间界限。这一概念之后在基督教中被发展为“炼狱”。

坛城是琐罗亚斯德教具有代表性的神秘宗教建筑，对西藏藏传佛教的坛城建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不同于每个城市都有的祭火坛，坛城建筑只有一个，是整个国家举行大型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所。该建筑被琐罗亚斯德教认为是光明主神创造的光明天国原型世界在人间的模型，是整个宇宙万物的象征。

讲座第三部分，穆宏燕老师针对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思想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进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示意图

行了对比和探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就吸纳了琐罗亚斯德教四大元素学说。公元前8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在西亚地区广泛传播，同时期的古希腊尚处于荷马史诗时代，其观念世界仍是神话的世界，奥林匹斯众神都具有浓厚的人格化色彩。两个世纪后，包括米利都学派在内的早期古希腊哲学学派诞生，以火、气、水等为要素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形成。这期间，琐罗亚斯德教的四大元素——火、水、气、土——创造宇宙万物的学说的传播影响促使古希腊人的目光从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挪到了人间，开始思考世界的本原和变化问题。

穆宏燕老师梳理了古希腊早期米利都、爱菲斯和爱利亚三派哲学思想中元素论的主要内容，并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元素论进行比照。米利都学派代表哲学家中，泰勒认为水是万物之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生出于四大元素，而这四大元素都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这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是一种“不义”，但是总有一种规律在矫正着这种“不义”的扩张，最终四大元素的复归于其本原“光”；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本原是气，气、火、水、风、土、石头等不同物质元素之间相互转换。爱菲斯学派代表人物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世界本原，并从火从燃烧到熄灭、从熄灭到燃烧的不停歇的运动中认识到宇宙万物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他将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某种固定的规律称为logos（逻各斯）。穆宏燕老师指出，赫拉克利特通过火的燃烧与熄灭描述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毁灭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每隔一大年（1万2千

年），世界都将在一场大火中毁灭而产生一个新的世界”的思想明显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1万2千年”对立斗争的宗教思想影响。

爱利亚学派代表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将四大元素的分离与结合的推动力归于“爱”和“恨”，前者使万物聚集，后者使万物分散。纵然宇宙万物会消散，但四大元素、爱、恨是永存不变的。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观将琐罗亚斯德教中“善”、“恶”对立斗争形成世界的概念用“爱”、“恨”概念替代。穆宏燕老师概括道，琐罗亚斯德教的四大元素说是其后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基石和源泉。

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论的也影响了古希腊辩证法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的早期哲学观点中体现出“矛盾对立统一，对立面的不断斗争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总根源，同时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这与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与黑暗相互对立，不断缠绕、斗争，黑暗入侵光明，最终光明驱逐黑暗的宗教学说理论有着紧密深远的关联。

柏拉图哲学也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天国原型世界”学说的影响。柏拉图“理念世界”的哲学概念指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人们所在的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比喻”将人们所生活的尘世比作洞穴，人所见的事物比作洞穴之中的影子。这样以映射形式存在的理念世界与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天国原型世界”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联。

最后，穆宏燕老师总结道，琐罗亚斯德教的四大元素学说，催生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其二元对立统一的学说催生了古希腊的辩证法认识论哲学，同时，光明天国原型世界的学说催生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学说。早期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并没有产生宗教哲学，而在其后的仅仅两百年间，在经历了琐罗亚斯德教思想浸润的土地上，诞生了早期的古希腊哲学。我们应当认识到古希腊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以神话的假设为满足，摈弃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创学说，而从四大元素切入，以理性思辨为指导发展自己的宇宙万物的认识，产生了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希波战争之后，古波斯阿契美尼王朝衰落，希腊迎来了黄金时代；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征服波斯，地中海东部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琐罗亚斯德宗教学说的辉煌鼎盛时期也至此暂告一段落。

交流环节，陈斯一老师就讲座内容提出三个问题：一，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宇宙历史运动的原动力来自光明还是黑暗？二，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有着元素派和存在派的对立，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学说影响了元素派的学术思想，那么对存在派的思想发展是否也存在影响呢？三，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其中“要走向洞穴之外的光明的太阳”的论断也服从柏拉图“哲学家应要做统治者”的政治哲学论断，这样的论断与古波斯政治文化中对理想的帝王的理解是否相同？

穆宏燕老师一一作出回应。首先，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虽然提到黑暗主神阿赫

里曼窥见原型世界的光明而入侵，但是由光明主神相约进行九千年的斗争，并用光明的元素创造了世界，可见宇宙发展的动力仍是光明。第二，相比于元素派，存在派是更具希腊本土色彩的早期哲学流派，与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思想关联较少。第三，相比于古希腊哲学家对琐罗亚斯德教宗教色彩的扬弃，古波斯则更多受对光明主神的崇拜影响，践行王权神圣的观念，推崇君权神授的政治制度。

讲座最后，穆宏燕老师和陈斯一老师就“古希腊神话中的灶神崇拜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元素分别与赫拉克利特之“活火”概念的学缘关系”“《伊利亚特》中不同元素的出现与元素说的关联”“琐罗亚斯德教对古希腊早期哲学产生的影响在义理分析之外的考古证据”等问题一一作答。灶神之火实际上是各个民族都会有的一种崇拜，与人的实际生存密切相关，而琐罗亚斯德教与赫拉克利特提到的火元素是在宇宙生成论领域讨论“火”元素，因此后两者思想内核一致，学缘更加相近。而“古希腊神话文学作品中的灶神崇拜”仅仅说明“火”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并不具备创世哲学思想逻辑的完整性。不同于考古、历史等学科对“证据”的要求，哲学思想的发展研究往往难觅实证的材料，关于古代宗教的发展与传播，在重视文献和考古证据之外，同时也更需要从逻辑和义理方面进行推理研究。

（撰稿：穆晨哲楠）

201

韩琦 | 科学在行动——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

2021年5月1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科学在行动——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

讲座伊始，韩琦老师介绍道，本场讲座主要谈康熙时代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将结合自己此前发表的内容分享最近的新看法。首先，韩琦老师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从最初的文本研究转向后来更大视野的语境研究，探究科学、历算发展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背景。韩琦老师介绍，本场讲座的题目借用了法国学者拉图尔的著作《科学在行动》，也受到后库恩时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要重构康熙时代科学的进程，就要分析参与科学活动的“行动者”。这包括康熙皇帝、皇子、满汉大臣、文人、历算家和传教士。韩琦老师通过构建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网络”来了解康熙皇帝如何通过学习科学来进行国家治理，进而讨论科学与皇权的问题，特别是康熙时代皇家工程（如大地测量工作和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兴起的缘由。在较长时段里关注这些工程形成的过程，首先要从学术机构史的视角了解欧洲的学术机构。当时欧洲科学机构主要包括法国皇家科学院、英国伦敦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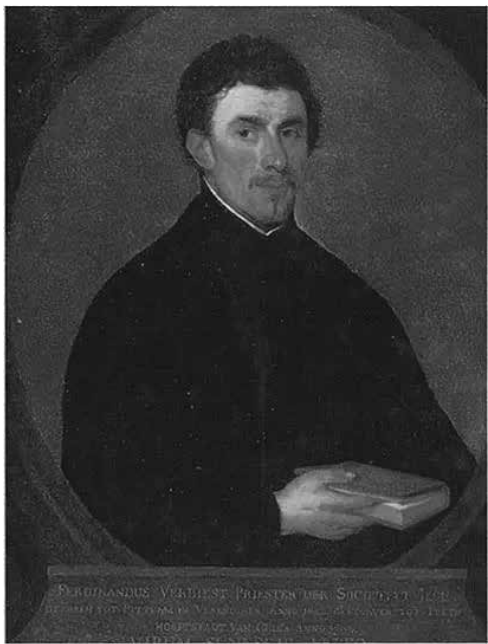
韩琦教授

学会和皇家普鲁士科学院，从它们出版的刊物中可以查阅到不少“中国消息”。康熙时代典型的案例有日影观测、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和大地测量，测绘成果《皇舆全览图》得到了李约瑟的很高评价。此次测绘的中间过程以往常被学者所忽视，韩琦老师则通过中西史料互证的方式，以期更清楚地描述大地测量事件的经过。

本次报告的主题包括康熙皇帝，在科学尤其是天文学领域有很多贡献的耶稣会以及和欧洲数学、天文学等相关的测量与制图工作。康熙皇帝在位的时代约和法国路易十四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王同期，在这一时期，法国有“格物穷理院”（皇家科

学院)，中国则有蒙养斋算学馆。前者的活动有天文观测、法兰西新图的制作和动植物考察等，与之相关的机构有巴黎天文台、皇家植物园和国王图书馆。

康熙学习西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杨光先发起的历法之争。康熙曾回忆杨光先、汤若望曾在午门外当众赌测日影，在场官员都不懂科学，康熙认为自己如果不知道原理就无法断定是非，因此要发奋学习科学原理（《庭训格言》）。康熙时代科学传播有两个阶段：一是南怀仁时代（1669-1688），二是法国耶稣会士时代（1688-1722）。1688年南怀仁去世，与法国国王数学家抵京同一年。第二阶段又可以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1713）为界，细分为两段。南怀仁时代传播的主要是文艺复兴后期的前近代科学知识；法国耶稣会士时代已有近代早期科学知识的传播。在同期的欧洲，牛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画像

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标志了近代科学的开端。从科学活动的“长时段”考察，1688年前后特别重要，中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分界点。

接下来，韩琦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解大地测量展开的情况。

一、“国王数学家”来华。“国王数学家”是路易十四派遣的科学家，有洪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张诚（J.-F. Gerbillon, 1654-1707）和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等人。他们来华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皇冠，为了国家利益；二是科学，为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三是宗教，为了在中国传播福音。三个目的背后也有和葡萄牙争夺海上霸权的保教权之争的缘故。此外，南怀仁告欧洲耶稣会士书（1678）在欧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希望有更多懂科学的传教士来华，否则中国传教事业将岌岌可危。法国皇家科学院也和“国王数学家”来华密切相关。当时皇家科学院想要推动科学发展，计划建造巴黎天文台，中国是仿效的对象之一。从科学院通信制度下的会议记录中也可以看出，“国王数学家”的工作是官方行为。1685年，这批人和一些其他教会的人士一起从法国布雷斯特港出发，经由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宁波，最终在1688年到达北京，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召见。他们觐见康熙时带来了三十箱礼物，最终白晋、张诚在京留用。

二、宫廷的历算活动。一方面，从《康熙帝传》《张诚日记》《白晋日记》等材



《坤輿全圖》

料中可以得知他们作为康熙的宫廷教师，教授数学、满文解剖学和进行《几何原本》等书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实施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计划，相关材料有洪若、白晋等人的科学观测手稿。从《白晋日记》还可知，当时宫廷数学教师有葡萄牙的徐日昇、比利时的安多和法国的白晋与张诚。宫廷数学课的相关书籍有《几何原本》《算法纂要总纲》和《算法原本》。韩琦老师指出，要理解科学与皇权的问题，需要看到清初满汉之争背景下康熙作为满族君主的身份。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的清帝国统一进程结束后，学习西学也帮助康熙作为满族君主提升了地位。随后宫廷的历算活动的重要事件包括1691年、1692年的乾清门的日影观测。康熙在正午进行晷影观测，现场进行“科学演讲”，包括音乐和数学的关系和圆周率讲解，给在场大臣造成了很大震撼。除《清圣祖实录》等官方文献之外，在场的大臣如王熙对此事也有记载。通过查阅《实录》所载其他在场大臣的文集，

韩琦老师发现在场的还有擅长数学的方正珠（方以智之孙），再通过查阅其所在的桐城县志，得知此事件在地方也有不小影响。多方材料表明，此次日影观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轰动。

三、康熙帝的测绘实践。从全球视野来看，当时法国在测绘仪器的改良下也在进行舆图测绘工作，康熙对相关书籍应有大致了解，康熙时代的大地测量或许是仿效法国的工作。回顾康熙对地理知识的好奇，他通过《御览西方要纪》（1669）和《坤輿全图》（1674）大大拓展了地理知识，又因军事、河流等治理之需，对地图绘制日益关注。1675年起，康熙系统地研习、了解几何学、三角学之后，兴趣转向实用几何学、测地学、区域地图绘制学及其他引人兴味的数学科学上，并进行实地测量、绘图等实践。1686年《大清一统志》开编的背景下，康熙下令进行地图测绘工作。而当初传教士带来的礼物中就有西洋地图，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亚洲地图的批

注中可见康熙对边界情况的关注。另外，康熙希望在《几何原本》的学习中尽快知道最为必要的几何命题，以求理解此前已有所接触的实用几何学。于是，张诚、白晋选择了巴蒂斯所译《几何原本》，因为此本相较徐光启、利玛窦的《几何原本》更简单明了、易于理解，且注重实用，末卷“问题，或实用几何学”的诸多例题也被译出，其中就有运用仪器测绘地形的办法。康熙热衷仪器和测绘，例如常常使用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所赠半圆仪进行测量，也派人到广州采购欧洲科学仪器。康熙帝终其一生钟情于测量，反映出科技知识在皇权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四、经线每度弧长标准的奠定。有了科学知识和测量的仪器后，康熙开始慢慢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活动。其中重要的人物是耶稣会科学家安多。韩琦老师谈到，比利时学者亨利·博斯曼（Henri Bosmans）的安多研究对自己影响很深，自己结合张诚、白晋日记的记载、相关中文史料和安多书信，对安多在中国的科学活动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安多生于比利时那慕尔，编有拉丁文《数学纲要》。此书旨在为初学者和将要前往中国的传教士提供必要的历算知识，有助于在中国传播福音，内容包括数理科学和地图方面的知识，被定为康熙的算术教材。安多来到中国后被召入钦天监工作，向康熙讲授算术、实用几何学和代数学知识，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作为康熙的科学顾问，安多也随康熙西巡、南巡，进行经度测量。康熙征讨噶尔丹期间，安多曾随行测验日食。此外，安多也承担许多测绘工作，包括绘制鞑靼地图、进行水

利测量等。康熙 1698 年查看查看西鞑靼地图时发现按纬度推算的距离与此前实测不符，专门向安多咨询。到了 1702 年，安多进行经线一度弧长的测量。以往的一般中国史学界的对这一事件背景情况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研究的缺环。韩琦老师指出，这一次测量实际上是中轴线的测量，即测量了从北京到河北交河的子午线。1702 年冬南巡，康熙委派皇三子胤祉实施测量，安多作为主持者，写成专题报告寄往欧洲。从这篇报告可知，康熙的测绘打算早有计划架构。1702 年 11 月，胤祉选定从顺天府霸州至河间府交河县之间进行测量。在中文史料中，只有直隶巡抚李光地记述了外国人参与了此次测量。最终，一度经线弧长被定为 200 里，这一标准的确立对后来大地测量也有影响。安多因其贡献也得到了很高礼遇，病故后立碑保存。安多不仅与康熙关系密切，也是皇三子胤祉的老师。测绘期间，安多在华曾向俄罗斯使馆索取地图但未能成功。另外，安多也有一些中国朋友，已知的有黄百家和梅文鼎。

五、康熙朝大地测量的展开。曾有法国耶稣会士认为大地测量的展开是由于他们向康熙皇帝的建言，这有自夸的成分，但韩琦老师认为，在长时间的一系列改变中，测量展开的前提是科学知识的准备、人才的培养、仪器的提供和清廷和地方财力、物力的支持，离不开康熙一直以来的关注。测绘地域除了内地之外，还涉及海南岛、西藏、东北、蒙古等地，最后成果是《皇舆全览图》。

韩琦老师指出，关于大地测量有着丰富的中文、法文等材料，自己做的工作是

通过中西文献互证，还原、重构大地测量全期过程的历史，以期弥补研究的缺环，尤其是通过将安多这一小人物在庞大工程中扮演的角色放在大的全球史背景下，以展现出互动的历史。此外，还需要了解机构史和行动的历史。在“长时段”的历史下考察，康熙也是互动中的重要角色。康熙在国家治理方面做了众多工作，尽管作为满族君主，有时有表演作秀的因素，但在整个科学的测量活动中通过科学学习、实际测量，推动了清廷的科学活动，调动中国、外国人员完成了宏大的工程。

欧阳哲生老师总结，韩琦老师系统深入介绍了康熙朝耶稣会士来华的活动，尤其是科技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

绍。1688 年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主导了西学东渐的新时代，《皇舆全览图》这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地图测绘也有赖于传教士的配合。欧阳哲生老师也从本场讲座的细节出发，指出康熙将白晋、张诚留京却没有留下水平更高的洪若、俄罗斯当时的技术远不如西欧，安多却向技术不如自己的俄罗斯人索要地图等问题也值得思考。

最后，韩琦老师与到场观众就本场讲座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邓晋武）



202

张静 | 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202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主持。本次讲座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效果有限。为什么如此？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方能使人认为值得了解？张静老师认为，上述问题的核心，是研究者能否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发



现一般性的理论。她从问题意识、解释能力、思维障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静老师指出，社会科学要让世界理解中国，首先需要树立寻求一般化知识的问题意识。对独特性的阐述常见两种进路，一种是政治进路，另一种是学术进路。政治进路从敌我思维出发，聚焦于对手或对象，目标在于掌握话语权，基本逻辑是揭露、打击和控制，释放都不承认对方的讲述具有合理性。但学术进路有所不同，它对对等的论辩思维出发，聚焦于现象或行为，目标在于认识和克服无知，因此并不妨碍辩论者之间能够互相学习。用社会学的概念看，如果说政治视角基于对象辨识的特殊主义逻辑，那么知识的视角基于事实辨识的普遍主义逻辑。因为政治视角必须要识别敌我，否则就不可能打败对手；而知识视角则可以挖掘不同事实中属于知识的成分，即便是不同观点的人，仍然可能在知识层面展开交流。



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书影

现实中，采用特殊主义逻辑展开“知识”论述的现象十分常见，中外都有，这种思维支配了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深层问题意识。比如用知识的形态隐藏政治动机，用普遍话语包装特殊事实。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提问逻辑——根据既有的标准理论本来应该如此，但现实为什么不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把学术问题转化为道路问题，比如将费孝通先生对“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的研究，转变为中外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问题，显然，问题的指向已经改变。

让知识顺畅交流的前提是动机的一致。上述问题指向的转变，反映了不同的动机在打架，但对于追求普遍性知识无感，所以会把思想斗争和知识探索相混淆，用学术政治竞争替代知识探索，虽然前者也很重要，但二者有诸多根本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意交流的效果，而不是满足于自说自话，需要追求一般性的知识。相反，如果坚持特殊主义逻辑，就必然拒斥别人经验中可发现的共性知识，这等于同时否定了，需要从自己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意识，结果，从中国经验中发现普遍性变得不可能。

知识探索是一种说理活动，政治进路和学术进路的差别，还表现在说理是否要以区域为界。在政治的说理方式中，区域是非常重要的划分，这和识别对象相吻合。而在知识进路中，知识是公共的，一般不受地缘边界限制。说理最终是否可能取得他人的重视，须看其是否包含一般性的知识、而不是仅限特定、短期或偶然的现象。这需要具有从局部的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能力，在复杂性中识别常态和原因。基于此，

才可能让不同的经验，共同参与建立人类知识的大厦，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可以作为一般化理论的证据得到彰显与关注。例如，从减贫实践中拎出一般理论答案，才可能成为其他地区应对贫困问题的依据。

所以，中国研究不只要阐述特殊经验，更要把中国所知放入世界的知识大厦中，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对解释他人的经验有用，才可能使人真正看懂中国。如果限定知识地域——你的不是我的，所以解释不了我，相当于我的不是你的，所以解释不了你——那么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就完全无法利用，他人为什么有动机了解中国呢？

讲座第二部分，张静老师认为，当研究者建立了追求一般性知识的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就成为关键。解释能力的差异，首先受到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它们和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惯性有关。

古希腊哲学主要指向普遍的知识，拷问自然的本质和属性等本体论问题，所以区分客观和主观，构造事实的客观性变得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思想中，一直对此抱有怀疑，不觉得客观和主观的绝对分别那么重要。正如安乐哲指出的，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客观与主观之间没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为事物往往是具体和相互联系的。这种思维惯性，倾向于忽略一些关键区别，比如经验与超验的区别、再生与构造的区别、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证据与意见的区别……等等，从而对事实的认识，基于有限的经验主义眼界。这种眼界重点在理解特殊主义，因为超越局部的普遍性，本质上不可想像。



张静教授

而从特殊经验中挖掘一般性原理，虽然需要以经验为基础，但不仅仅是所证明，还需要抽象和推论，抽象出一类事实的特征和原因解释，不可避免地要走出特殊的经验世界，进入揭示要素关联的分析世界。在分析世界中，抽象与推论是一种理论能力，理论解释是一项以事实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

例如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如果单从经验的角度说，现代性是从传统性当中生长出来的，二者没有那么大的本质区别，也难以划定清晰的时间边界。但是如果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就不只是经验性的而且是分析性的，它表达的是两种根本性质的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性质的差别。上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发生对社会特征——异质还是同质——的不同看法。在经验视角看来，现代性不是普遍的，这一概念瓦解了历史的延续性，所以现代性的产生是一个假问题。但在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的研究中，



中国社会学奠基者费孝通先生

视将经验和理论问题相联系，甚至主动弱化二者的联系；预设——忽略分析框架，使得叙事难以摆脱编年顺序服从解释的逻辑；逻辑——用道德解读和立场评判替代理论解释和事实归因；抽象化——停留在有限的经验现象因，而不去探索理论因；形式化——拒斥

形式简化，用现象的复杂性对抗理论构造。张静老师认为，这五大思维局限，限制了我们理论探索的能力。

目标障碍表现在，研究的目标并不指向知识的探索。从事经验研究的目的有很多，各有合理性，但不是所有目标都会自然走向理论揭示。比如，如果以彰显成就为目标，那么就会变成对成就的展示；如果以教化、改变对方的思想境界为目标，那么教育者一般拥有的居高临下态势，很难和对方共同探索未知；如果以打击对手为目标，那么就会认定对手为谬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吸收合理经验。不是所有目标都能产出知识，这些目标都不大可能走向经验和理论的联系。

预设障碍表现在，忽视分析框架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认为框架是拿来的，不是事实中总结出的。认识现象不仅依赖材料，而且和认识者运用的观念预设密切相关。观念预设表现为一系列分析框架，是从事实中构造出来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

它是一个真问题，因为真的在英国历史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别：传统的地方性人际关系瓦解，超地方的抽象行为规则出现了，这些规则的逐步扩散，可以解释英国现代社会的诞生。在这项研究中，流动造就了新型社会，生活在城市的个人与原生地家乡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传统上植根于本地关系的伦理原则在城市中难以为继，由此推动了根据行为标准、而非对象辨认的抽象社会规则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异质性转变。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英国历史，但有关现象我们在中国经验中也曾似相识，显然它具有相当的一般性，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是囿于特殊经验、排斥普遍性知识，类似的工作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发现。

讲座第三部分，张静老师指出，出现用特殊对抗一般，否定特殊可能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导致研究者缺少理论建设的动力。为什么如此？有五个方面的思维障碍值得认真反思。它们分别是：目标——轻

改变。比如一战和二战时期，没有人否认肉体上大量消灭对手是对的，但在今天的战争中，不是消灭肉体、而是破坏对手的作战能力和支持设施，才是重要目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改变了经典时代主要依据伦理原则分析社会的认知框架。总之，每一种研究背后都有分析框架，它的背后有理论预设，其实与时代有密切关联。不了解这些分析框架，或者拒斥对分析框架的使用，很难看到社会深处的东西，这些东西依赖分析框架作为工具的挖掘，不会自动从材料中跑出来。

逻辑障碍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相互误解往往并不在于观点差异，而是来自于论证逻辑的区别。比如证明和评断就属于两种不同的逻辑，证明需要展示证据，评断则不介意把意见作为证据。基于不同的逻辑，对经验现象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推论逻辑之下，需要将问题层层展开，揭示影响因素的存在，展现其他人可以复核的材料，这种论证逻辑虽然不是观点本身，但却是产生观点的方法。如果拒斥逻辑的统一，那么任何观点都无法赢得学界或者严肃学者的关注。

在不同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尤其需要找到共同的逻辑，因为思维受到语言的限定，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组织体，语言差异常常会导致关注重点不同和陈述逻辑差异。因此中文研究者应当思考，我们和其他语言学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系统性差异。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都应当反思是否习惯于评判而不是证明，是否将自己的看法作为对事实的描述，是否将道德立场作为对原理的陈述。研究者应该超越不自觉的思

维束缚，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才有增进共识的可能性。

抽象化障碍表现在，习惯停留在现象层次，而不是理论层次讨论问题。理论不是简单现象的归纳，需要抽象的演绎和分析，理论是对现象背后的原理表述，具有超越具体现象的一般性特征。仅停留于对事实发生链条的观察，并不能够产生解释理论。因为理论需要在现象的基础上抽象出更上位的概念，洞察其恒定关系，并表达为一个简化的命题。在人类认识现象的知识谱系中，靠近经验的一端是丰富、复杂和多变的，而靠近理论的一端则是简洁、重现和相对稳定的。当一个理论命题从经验现象中抽象出来，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一般的知识，接受思想市场的检验。比如马克思理论中所提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这一命题不是只解释一个经验、而是要解释一类的现象。所以如果经验无法被抽象为理论命题，那么任何经验都无法在他人的世界中产生意义。

形式化障碍的表现，是将一般性作为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化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关键变量关系的抽离和表达，好比用一种模式说明一类社会体制。形式化在大多数学科中都非常重要，数学就是一个利用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公式来表达联系的学科，即使是一些学科表面上拒斥形式化，主张研究事物的复杂性，但是他们从复杂性中提炼出的关键性特征，往往必须依赖形式化能力。知晓前人总结的形式化特征是必要起点，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都基于形式化特征，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种体制的区别，就需要将具体经验层面的差异，形式化为资本驱动、竞争强度、平等程度等形式特点。

最后，张静老师总结道，要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基于中国经验追求一般性的知识，这需要克服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及思维上的各种障碍。知识是学术集体的集体工作，如果我们拒斥他人的知识，以地缘来划定知识的边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无法进步。

提问环节，张静老师回答了“为何接受知识的普遍性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她认为，这也许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中国是一个迟发国家，现代化的刺激和挑战首先来自于外部，外来和内生出现的原则

性冲突，被看作是动摇国本的威胁。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有非常强烈地把自己经验普世化的倾向，这或许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欲望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美国学术政治的影响。但我们的问题在于，不能因为美国生产知识的偏颇，就否认一般理论可以经由任何经验发现，因为这样不仅否认了他们，同时也否认了在中国经验中发现一般性知识的可能。

（包培含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修订）



203

伊夫·夏尔·扎卡 | 卡尔·施米特或敌意的政治学

2021年5月2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3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卡尔·施米特或敌意的政治学”。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主讲，法国巴黎大学庞亮博士翻译。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

一，而“敌意”是其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扎卡教授想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施米特与纳粹到底有何种关联？就施米特个人而言，自1933年5月1日加入国社党直至纳粹终结，施米特都坚决捍卫希特勒政权。就作为法学家的施米特而言，他是第三帝国最出众的法学家之一，在理论上为1935年的种族歧视法案辩护，也持续为纳粹政权提供法权认证，

甚至到战争结束后，施米特仍然坚持为纳粹政权辩护，认为纳粹德国的战争与其他战争并无二致。因而，施米特本人或作为法学家的施米特与纳粹之间的关系是确凿无疑的，而扎卡教授所要强调的是其思想是否具有纳粹的特征。

扎卡教授指出，许多施米特的评论者试图否定其思想中的纳粹特性。例如，他们声称施米特的纳粹主义只是一种偶然；另一些则认为他的思想与纳粹毫无瓜葛；还有人认为，施米特的思想在1933年前后出现断裂；也有人认为，即便他的思想属于纳粹主义，但仍是正确的，因为它将真理从当代自由主义中解放出来。

扎卡教授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施米特思想是否与纳粹有关联这一问题，因为，一方面，基于对施米特思想在导致集中营监禁和种族灭绝过程中扮演了怎样角色的考察，他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单纯的实践主义，而是需要合法化、正当化的理由，即一种思想的支撑；另一方面，施米特的学说如今在学界盛行，我们需要弄清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反思施米特的理论、尤其是其核心概念“敌意”究竟是否可以如此不加顾忌、毫无危险地被使用。出于以上原因，扎卡教授认为必须标记出施米特思想的纳粹特征，而要想实现这种标记，就要证明施米特所建构的一些概念不仅是纳粹法权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且更成为了纳粹政权将自身建立其上的法权政治范畴，为此就必须表明1933年前后施米特的思想具有连续性，但连续性不意味着毫无变化，只代表没有强烈的断裂。只要能证明这种连续性，就可以否定施米特对纳粹的认同只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讲法，甚



伊夫·夏尔·扎卡教授

至可以确立施米特对造就纳粹思想所作出的“直接贡献”。在此背景下，施米特对法治国家批判的连续性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考察对象。

对法治国家的批判并非始于施米特学术生涯的初期，而是在他将自由国家定性为中产阶级国家之时开始的。魏玛宪法就是这种国家的典型例子，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形成的对法治国家的批判持续到纳粹时期，甚至在纳粹之后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施米特把法治国家视为无政治实质的国家与反政治的国家来批判，施米特有关真正政治国家的思想是持续的，其调整也被整合到了基本框架中。正是在政治国家，即作为力量国家的实质国家（或说整体国家与具体制度规范）的相关概念中，蕴含着确切的纳粹观念，即人民的种族同质性、领袖原则以及种族或实质敌人。在纳粹之后，对法治国家的批判通过对价值观念以及价值僭政的批判而得以延续。

为了展示施米特建构的在纳粹政权中得以成型的概念，扎卡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检讨施米特的学说。第一部分是作为国家反政治概念的法治国家。施米特发现法治国

家只是承袭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中产阶级国家中的法权组织与权力组织模式，法治国家不是政治体制或政治形式，而是国家的反政治概念。事实上，施米特并非一直反对法治国家。在 1913 年《国家价值与个体意义》的资格论文中，施米特提出真正称得上是国家的必须是法治国家。而在 1928 年的《中产阶级的法治国家》中，他却明确表示出了对魏玛共和国的敌意，同时强调：法治国家并没有定义政治形式，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宪法，只是用于控制国家及中立化其真正政治维度的装置的集合。在从法权国家到实质国家的转变中，仍有持久未变的因素，即个体的无意义。

施米特认为，有三个特征在本质上定义了法治国家：第一，它有赖于个体权利的保护；第二，它依据司法、立法与执行



《施米特文集：政治的概念》书影

的分离，而其根本面向是成为一个立法国家；第三，它定义了国家力量的严格界限，国家特权被严格而慎重地规划，且设置控制机构与法权的屏障。施米特对这样的国家设想提出了批判。

首先，中产阶级法治国家不是一种政治组织或形式，而是一种为中产阶级自由、即个体自由服务的权力组织。法治国家无法解决当代国家面临的新型政治问题，即如何将未受教育的无产阶级大众整合入政治统一体。对于这项任务而言，却只存在为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整合而设置的机制，如魏玛宪法。这种造作的意象与空洞的情感笼络了旁观者。法治国家是有别于德意志历史的舶来品，因此必须返回真正的德意志政治传统。

至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自由主义？施米特试图规定未来宪法的任务：必须将其从自由主义中解放，从而挽救民主。非自由或反自由的民主是什么？施米特首先定义了民主的目标：“政治上掌控由无产阶级的出现而造成新局面，并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体”。需要强调的是，施米特对的民主界定中有着清晰的种族含义。进而，如何将人民整合入政治统一体？施米特认为要与自由主义的做法相反。自由主义依据选举来确认人民的决定，人民被化约为个体的集合，每个人有限、零碎地行使自己的政治责任。而为了使人民真正存在，就要与个体投票相对立，人民必须集聚且显示自身。聚集在一起的人民有怎样的公共表达模式？施米特认为是“高声欢呼”，通过欢呼来赞同一个创造性的决定。他将全民表达的正当性与自由主义章程式的正当性对立起来。

施米特对“人民”的定义是同质性而非多样性的。在 1926 年《论议会制与民主的对立》中施米特明确了同质性的意涵：“所有真正的民主都有赖于以下事实：不仅相似的东西要受到相似的对待，而且必然的结果是，不相似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相似的对待”。1928 年的文本没有谈到如何产生这种同质性，而 1933 年以后的作品则逐渐开始阐释这种同质性的产生方式。施米特转向了立场上的种族内涵。因此在以往的政体中存在的歧视不是根深蒂固的异常，而是一种必然性或政治义务。民主可以排斥一部分由国家操控的人口而仍不失为民主。身体与道德上的异己代表了对同质性的威胁。对社会构成威胁的，在政治上被称为敌人，这里涉及的是“内部敌人”，这也是施米特提出的“政治上最紧要的任务”。

因此，施米特再次对法治国家展开批判。法治国家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置于同样的规范限制下。而事实上，法治国家是立法国家，自称是非人格的正义，主权法律是在法治意义上而非必然性意义上得以解释的。所有法治国家的理论家都讲着相同的话语。在批判了对立的模式后，施米特开始处理国家真正的政治模式，即基于人民同质性、指明敌人的实质国家。1933 年后，人民的同质性变成了种族的同质性，就如典型的敌人变成了种族敌人与实质敌人那样。

第二部分，扎卡教授探讨了作为整体国家与具体范畴的实质国家。政治上的实质国家首先围绕整体国家这一观念而定义。整体国家的观念形成自荣格的整体动员，其最初用法是消极的，不是指政治国家，而是指反政治国家，即自由国家向统制国家（或福利



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

国家）退化的最终阶段。而在 1932-1933 年的文本中，整体国家则具有了积极的含义，成为了国家唯一的有效概念，与此前形成区别和对比。整体国家指的是一种实质国家，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整体国家是力量国家，国家是力量最大化的政治模式；第二，力量的增长伴随对宣传工具的掌控，即控制影响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第三，整体国家通过区分敌友的能力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本性；第四，整体国家必须介入所有面向。由此，整体国家的积极和消极定义之间的差别就转化为衰弱的整体国家与强力的整体国家之间的差别。前者被党派争斗支配，而后者只承认唯一的政党。

强力的整体国家很快被施米特当作了种族国家，并构成了种族国家的框架，他在 1933 年《国家、运动、人民：政治统一体的三重组织》中发现了这一特征。在 1935 年

的《建构自由》中，人民同质性概念具体地体现为保卫德国公民的德意志血统，并构成了人民对元首政治认同的条件。在同年完成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立法以及公共规范在私法中的保留》中，施米特正当化了种族隔离的举措，其内容涉及婚姻和性关系问题，目的在于保护德意志血统，对抗种族敌人与实质敌人。

与人民的种族同质性相呼应，敌人在施米特眼中对于政治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施米特的敌人是种族敌人，扎卡教授将其称作实质敌人，它与关系的敌人这一概念相对立（譬如霍布斯的敌人概念仅仅是关系的而非实质的）。施米特指出种族的异类所做的批判是徒劳的，他们写作的书籍毫无用处，他们的思考与理解方式是另类的。而在1933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指出政治敌人不必然在道德上是恶的、在美学上是丑的，但仍然是他者、异类，而特定政治关系的可能性由此出现：不仅存在朋友，还存在着敌人。异类与敌人就是另一个种族的人。由此，施米特建构了这些与纳粹主义相汇聚的概念。

第三部分，扎卡教授探讨了法治国家与价值的僭政。在纳粹主义后，施米特没有放弃对法治国家的批判，在1959年《价值的僭政》一书中，施米特批判了与法治国家相连的价值观念。主权国家与美德的理论相连，而法治国家却试图建立在价值理论之上。施米特认为，价值的观念不可避免会导致冲突，接下来，便是一个价值系统对其他价值系统的僭政。

施米特认为，价值有其自身逻辑，而法治国家的宪法能将价值的这一理念变得

明确。价值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建构法治国家要从属于价值的逻辑？过去，价值仅存在于经济领域，经济、市场、证券交易成为价值一词所包含的一切基础。而自19世纪，价值却超出了其专有的场地，侵占了人类的一切目的和理想，在道德、法权、文化、宗教上都开始使用价值的话语，价值的观念走入了歧途。朝向价值的转化即普遍了的价值化，在价值领域的巨大拓展与转移背后，是人们尝试在价值中寻找超越19世纪虚无主义的挑战的方案。施米特引用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展示了尼采在价值话语的普遍化中所占据的位置。然而，价值观念的普遍化既没有超越虚无主义，也没有超越科学实证主义，而后者试图将其自身限制在事实的表述中。换言之，价值的观念不可能成为新的正当性的基础。这是施米特对价值逻辑的批判。

施米特定义了价值的逻辑，在这一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尝试回答：价值化的普遍化与法治国家有何关系？在表面上，这种做法可以使国家解决多元主义的问题。法治国家是多元国家，而价值化首先允许多元主义的中立化。而普遍化的价值化能够使不可通约的东西变得可以比较。而施米特指出，价值化的普遍化并不能承担法治国家赋予其的各项职能。1959年的文本旨在考察这一问题。价值远远无法带来宽容，而会造成冲突与最可怕的对抗。施米特将韦伯关于诸神之争的论题变得激进化。

价值挑起的斗争维护了敌意。民主的法治国家没有带来宽容与多样社会群体的共

存，而注定在价值的激烈争斗中毁灭。价值的体系是侵略性的，只有就攻击的角度而言才能存在。一切价值化的反面都是去价值化。因而，估价行为就具有一种潜在的侵略性，是对另一种估价行为的否定与排斥。同时，价值也是毁灭性的，无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存在的，因而以价值为名的战争是最可怕的战争。但是，施米特在此却并没有举出纳粹这一最新近的例子，而是更关注前现代战争。这几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施米特批判价值的参照对象是法治国家，在纳粹政权之后依然继续批判法治国家，评论与阐释施米特文本的人普遍认为按照施米特的讲法，法治国家可能会成为以人类为名的战争的载体。事实上，施米特价值批判的目的是阻止“人类”这一观念通过价值哲学找到其自身的道德内容，其对价值侵略性的分析根本在于不存在可以成为“人性”主题的普遍价值。施米特一直忠实于这一思想，认为人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被用于最糟糕的正义战争，其当代形式是以人类为名发动的灭绝战争，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专门载体。

总结来看，扎卡教授再现了施米特理论中的纳粹意识形态要素，试图揭示其中奠定纳粹政体的法权-政治范畴。有必要对施米特进行双重批判：第一项批判在于普遍的价值。在扎卡教授看来，存在这种价值，其普遍性在于以相同方式关乎全部人类主体，而不排斥和区分任何人，不仅提供了人性概念的道德内容，也提供其政治的与世界主义的含义。声称这些价值只是西方的价值，就是宣称有一部分人类不适合于尊严、自由或平等。然而，这些价值是价值，而非单纯的事实，需要被充分实现。这些价值是民主法治国家

的宪制基础，保障文化、宗教或其他形式的自由发展，它们并不侵犯或压迫任何人，而是需要被保卫，来反抗凭借利益、传统、权力意志、狂热崇拜强加给整个社会的霸权。只有当卑劣是可能的时候，尊严才能成为一种价值。

第二项批判在于必须澄清民主法治国家中立原则的价值，这也与扎卡教授第一次讲座的主题相呼应。必须强调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中立国家将干涉与介入限制在公共领域，而宗教信仰、哲学的取舍、生命的选择都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因此，国家的中立性绝不意味着统治的无能，如果一个国家超出了其政治实施的领域，去干涉与之无关的事情，就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成为了私立的机构。总之，人性本身特有的普遍价值的存在，与其在个体的独特性中的存在，共同成为了使我们能够思考多元主义与宽容的基础。

提问环节，扎卡教授对敌意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作出了阐释。敌意和战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敌意不足以定义政治，政治的目的在于超越敌意，而不能被敌意的概念化约为战争的模式。例如，消除国家间战争一定要以政治的方式，商谈的方式来达成。针对施米特对法治国家批判的起源问题，扎卡教授进一步强调施米特的批判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一方面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思想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相连。

（撰稿：朱睿晗）



204

陈力卫 | 联系东西方的纽带——麦都思在十九世纪翻译史上的贡献

2021年5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04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联系东西方的纽带——麦都思在十九世纪翻译史上的贡献”。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赵京华评议。

讲座伊始,王中忱老师介绍陈力卫老师是研究中日词汇概念形成与交流的著名学者,从词汇史出发,进入到概念史与思想史,而陈老师对于麦都思的关注早已有之,尤其是对于麦都思在编纂辞典过程中所体现的中西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汇这一话题,在近年的研究中不断向前推进。本次讲座中,陈力卫老师通过分析早期辞典的编辑、出版与流通,呈现出一幅19世纪前期的东西方语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图景,将其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更新鲜的发现与思考,呈现给在场的听众。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继马礼逊、米怜之后,于1817年来到马六甲,再经檳榔岛的短期滞留后,1822年到达巴达维亚并在那里居住了21年,其间他充分发挥自身的汉语、荷兰语优势编辑了六本双语词典。而《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Batavia. (1830)》(《英和和英语汇》)是其最早出版的,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英和-和英对

译辞典。陈力卫老师首先分析麦都思编纂《英和和英语汇》的目的是向日本布教,而词典编纂的大背景中,既有英国人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关注,马礼逊对于琉球的关心,亦有恒河域外传道团临时委员会向日本布教的决议,以及麦都思本人的日语学习的驱动。而这部《英和和英语汇》在构成上由献辞、序文、目录、按照意义分类排列的英和之部(156页)与按照日语伊吕波顺序排列的和英之部(188页)组成。从辞典序文中可见,麦都思利用了在日本流通的确切的辞典、书籍等作为底本来编就的这本辞典。

可是有两个问题没有交代,是谁带给麦都思这些日本书籍?其具体书目有哪些?因为这是分析该辞典特性的重要依据。针对前者已经有学者指出是日本长崎荷兰商馆馆长狄斯特(J.W. de Sturler)1827年经由巴达维亚回国时借给过麦都思一批书,而麦都思马上雇佣12名华人在数月中抄录了8种日荷、日中等双语字典及其他图书。而关于后者的具体参照书目,早有杉本つとむ指出的和兰辞书《兰语译撰》(Nieuw Verzameld Japans en hollandsch Woordenboek, 1810),但陈力卫老师重新检讨了和英之部所依底本,认为这一底本只能解释麦都思词典三分之一的出处,尚需找出其他作为底本的辞典。特别考虑到其英和之部的编辑,陈老师发现《兰语

译撰》的姐妹篇,同为中津藩主奥平昌高在江户刊行的和辞书《巴斯达特辞书》(Nieuwe-gedrukt Bastaardt Woorden-boek, 1822)亦是其重要参考之一。除此以外,陈力卫老师也提到,还有三本辞典可以作为编写这本辞典的重要参考书,即汉和字典《增续大广益会玉篇大全》(1717)、图文并茂的分类辞典《增补头书训蒙图汇大成》(1789)、和按日语伊吕波顺序排列的《增广字便倭节用集悉改大全》(1826),这些辞典的最大特征就是汉字词汇附带对译日语。麦都思可以通过汉字词汇的意思来了解日语,收集所需的语词。

那么剩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用罗马字标注日语读音,麦都思既没去过日本又没跟日本人说过话。陈力卫老师援引苏精的研究,认为麦都思在该辞典完成的前一年,即1829年还通过荷兰商馆员费瑟尔(Johan Frederik van Overmeer Fisscher)抄写到在长崎编撰的兰和辞典《道译法儿马》。这本辞典最先是由荷兰商馆长道富(Hendrik Doeff)编写的,但在他1817年返回欧洲的航海途中,不幸遭遇海难,其带回的抄本失于大海之中。后来,作为商馆员的费瑟尔在日本期间(文政三年至文政十二年,1820-1829)又重新制作了一部罗马字版的兰和辞书,1829年回国路经巴达维亚时,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花了大钱抄写,但尚未抄写完毕便中途收回,回到荷兰后将之献给国王,并因此被选为院士。至今为止,日本学者如杉本全面否定其作为《英和和英语汇》参考书使用的可能性,认为“(那是)十五册本的大部头,基本不可能拿到海外去”,因此,费瑟尔带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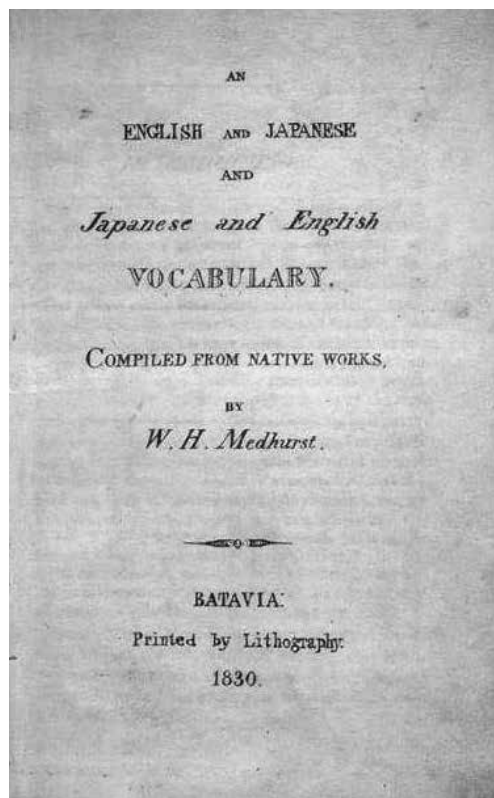


的这部辞书是如何被麦都思利用的,成为最为紧要的课题。也就是说,这部辞典不仅成为麦都思《英和和英语汇》编辑中的日语罗马字表记的直接参考,之后也成为荷兰人研究日语的直接材料。

而谈及这本《英和和英语汇》对于后世的影响,陈力卫老师认为,麦都思这本辞典出版后先是被关注日本的外国人所利用,比如东京大学仓石武四郎收藏的本子就盖有宁波教会团体的印章。出版二十多年后,才为日本人所认识,由精通汉学、兰学与法语的村上英俊将其英和之部的一部分语词(包括日语假名的罗马字对音)介绍到自己的《洋学捷径佛英训辨》(1855)中,并在两年后安政四年(1857)将整个英和之部翻刻为《英语笺一名米语笺》,

文久三年（1863）再将和英之部翻刻为《英语笺后篇》出版，为近代日本由兰学向英语转换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欧洲，陈力卫老师注意到莱登大学所藏、霍夫曼所传本子上写有西伯特“1829年7月”给奥地利植物学家的献词与霍夫曼1875年的说明，于是再次梳理西伯特、霍夫曼两人跟这本辞典的关系。陈老师指出，西伯特因欲带日本地图出国而遭软禁一年，1830年被遣返回国途中，与麦都思在巴达维亚见面并频频交流，可能是西伯特将这本刚出版的辞典带回欧洲，却在献词上故意写作1829年，以掩饰自己被拘留的窘况（本应在1829年任满回国）。而后来，这本词典归到了霍夫曼手里，他



《英和和英语汇》，麦都思编纂

在说明里认为西伯特没有认识到这本辞典的利用价值，他将麦都思辞典的英文译成荷兰文，准备编纂出新的兰和和兰词典，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等于是完成了一个轮回（从1810年的《兰语译撰》到1830年的和英之部，再到1881年的日兰辞典的出版）。

陈力卫老师总结回顾本次讲座中所解决的问题：其一，围绕着《英和和英语汇》这本辞典的编纂过程中意义分类与日音排列孰为先的问题，过去一直有争议，而根据麦都思自己信中对该辞典编辑过程的说明，可以确定为先编意义分类的英和之部，后编按照日文排列的和英之部；而其二，陈力卫老师通过列举自己最近的研究，其意义分类多依日本出版的分类辞典，特别是节用集的分类；其三，确定了该辞典所选的日文词均出自江户时代的文献，虽然文献跨度约200年，但多参照的是同时代的版本；其四，至今被认为是古语的语词，其实均有同时代辞典的具体出处。而被视作方言的语词则多出现在费瑟尔抄写的带有罗马字标音的兰和辞典里，这本辞典的祖本就是意欲用口语来对译荷兰语的；其五，因为麦都思是英国人，过去学界一直以为《英和和英语汇》的罗马字注音是反映的英语读音，而实际上基本是沿用了荷兰人的标音，虽有部分改动。

在论及汉字词的传承问题上，陈力卫老师指出麦都思早先是把汉字词当做汉语来理解的，所以在选录汉字词时，还参考到江户时代的《增补头书训蒙图汇大成》（1789）、《增广字便倭节用集悉改大全》（1826），并以此为汉字标记的根据。在

江户时代众多的辞书中，一个外国人多利用的还是按意义分类的合类节用集和图解类辞书，其中的汉字汉语都标有可以识别的片假名读音，这点是当时他为编纂这本辞书所能利用的最低条件。

陈力卫老师由此重新思考19世纪前半期的语言文化交流史，认为以马礼逊和麦都思编辑的对译辞典为开端，其后开始尝试多语种词典的编辑，其中日本方面包括吉雄权之助、佐久间象山、村上英俊等人在兰、英、和、汉四种语言对译的尝试；而欧洲方面则有西伯特、郭成章与霍夫曼的种种努力，这一部分正是陈力卫老师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王中忱老师总结本场讲座内容，认为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后期，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词语概念、知识流动在巴达维亚这一特殊的场域内相互交遇汇合，经由麦都思促成了知识再生产的一个循环。赵京华老师也认为，19世纪初到中叶的东西方语言词汇、文化的交汇与互鉴的历史背景，通过词语词典的编撰得以承袭。他认为陈力卫老师的个案研究，对于了解19世纪上半叶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非常有帮助。在马礼逊之后，东西方的（包括英、日、汉、荷兰语）双语或多语种辞典编撰，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一个逐渐发展与兴盛的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麦都思的贡献应该受到充分肯定。此外，陈老师的研究不仅考察麦都思辞典编纂本身的过程，亦深挖、寻找麦都思参照的周边的辞典文献等，可见其实证研究的功夫，必须经由专业人员来做深度考察，像麦都思这样的人物才能浮出历史表面。针对陈老师的结

论部分，赵京华老师提问麦都思的辞典编纂与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在日本的影响程度如何，麦都思编纂的辞典是否也对后来日本的辞典编纂有所影响，并提出康熙字典是否可作为麦都思编纂辞典的参考源的问题。

陈力卫老师对上述问题一一做出回应，肯定马礼逊的《英华英辞典》对于日本的影响，但认为麦都思的辞典在日本的影响并不比马礼逊逊色，因其既编过英日-日英辞典，又编过英华-华英辞典，这两种辞典都对日本的近代化与近代辞典的形成有过巨大的贡献，就其影响力来说并不亚于马礼逊。而谈及康熙字典，陈老师提到，麦都思的《华英字典》就是根据康熙字典来编的。

讨论环节，陈力卫老师针对王中忱老师提出的巴达维亚的伦敦会印刷基地的发展，以及《和英语林集成》与麦都思辞典的关联两个问题作出回应，指出麦都思自身是印刷工出身，在巴达维亚他的本领得以充分发挥，后来伦敦会的最大的印刷基地就是他所主持的巴达维亚的印刷基地。《和英语林集成》作为一本坐标性的辞典利用率很高，而麦都思辞典的利用反映在它的前言与具体词条中。对于线上听众提出的麦都思编纂福建方言辞典的过程，以及何时出现了专门性的辞典两个问题，陈力卫老师也给出了解答与说明。

（撰稿：章涵青）



205

赵国英 |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



2021年5月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5期在北京大学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本次讲座是“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作为清初“四王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鉴在初学画时遵从董其昌所提倡的以南宗理论为宗，但在中年后却广泛师古，与董其昌的画论逐渐疏离，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类型。对于王鉴与董其昌之间关系以及王鉴画风演变的剖析，有助于深入挖掘四王绘画中“作家兼士气”风格类型形成的原因，探讨绘画史与鉴藏史的互动关系。

赵国英老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主题的背景和意义。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始终与是否师古、如何师古密切相关。明代晚期，身兼画家与鉴藏家双重身份的董其昌提出了纯化文人画的“南北宗论”，提倡“崇南抑北”，对当时乃至此后数百年山水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四王画派”的产生和山水画中摹古风气的盛行。但倘若从画风发展脉络的角度审视“四王”的绘画艺术，会发现该画派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其一沿着董其昌的“纯化文人画”方向，

更注重笔墨的抽象表现，以王时敏、王原祁祖孙为代表；其二则冲破了董其昌“南北宗论”的藩篱，既重视笔墨趣味，也不忽视丘壑变化，以王鉴、王翬为代表。王鉴无疑是后一类型的重要奠基者。

王鉴的画风演变轨迹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他的作品由早中期的浑厚圆润，变为晚期的工细古雅，直到极晚年的尖秀刻画，与一般风格发展规律恰好相异。这不仅涉及到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作家兼士气”绘画风格类型在画史上的影响，还与私家藏画在画家绘画风格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绘画与鉴藏的关系有关。因此，上述主题兼具绘画史与鉴藏史研究的双重意义。

随后，赵国英老师从王鉴和董其昌二人的交往历程入手，分析了董其昌画法对王鉴的影响程度。董其昌对王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创作生涯的早期。王鉴出生于显赫的江南琅琊王氏，曾祖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与董其昌就有交游。王鉴自幼学画起，就以南宗绘画为宗，并得到过董其昌的赞赏。在上海博物馆藏的王鉴《烟峦水阁图》轴题跋中，王鉴自题称：“余初学画，即宗子久，谬为思翁赏识。中年浪迹四方，无暇晷习，故未能成。今又衰迈，不得努力，徒自悲恨耳。”他还曾将董其昌的绘画随身携带观摩，亦可看出其早年对董其昌绘画的推崇。据王翬回忆，他在

二十岁时与王鉴初次见面，王鉴“见翬所图便面小景，把玩赞叹，携之袖中。……因出董文敏所图长卷，指点诤谏，郑重而别”。这种崇敬与赞赏之情，一直延续到王鉴的中晚年阶段。例如，王鉴晚年时曾入藏董其昌《仿古画册》十二开，欣喜之余，亦作仿古画册并自题：“今春多晴日，闲窗息纷，仿古如思翁之数。”及至七十三岁，他见到董其昌生平所好画纸，还会仿董其昌笔意作画“以志皈向”。

除欣赏和收藏董其昌本人画作外，王鉴还多次观赏和临摹了董其昌的藏画，这也成为其早年建立董巨及元四家绘画概念的主要知识来源，从而深刻影响了其此后的创作路径。据王鉴本人的回忆，他曾在董其昌处观赏过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和黄公望的《浮岚远岫图》，两画“皆设青绿色，无画苑习气”；在六十五岁作《仿赵孟頫画卷》时，他再次提及此事：“余丙子年访董文敏公于云间，出所藏《鹊华秋色卷》见示，相与鉴赏，叹其用笔浑厚，设色秀润，非后人所能梦见。”王鉴还曾与董其昌一同观赏《秋山图》《溪山深秀图》等名作，互相讨论法书名画之优劣。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二人似乎并未一同讨论过董其昌的“南北宗”理论。总之，王鉴与董其昌之间只是作为有世交的晚辈对长辈的拜访与得闻绪论，而不似王时敏一般直接接受董其昌画法指点的师徒关系。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主讲

接着，赵国英老师着重阐述了王鉴在中晚年阶段对董其昌画论疏离的两大表现。其一是董其昌的“只学南宗”与王鉴的“多学古人”。董其昌将中国画史分为“南宗”和“北宗”两派，“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北宗绘画非文人画正宗，不可学习；即便是南宗亦可分为两派，其中董源、巨然一派为正宗，而李成、郭熙一派则“俱为前人蹊径所压，不能自立堂户”。由上述论断可见董其昌对画史派别清晰的褒贬态度。

王鉴最初也跟随董其昌尊崇南宗，提出“宋元大家皆从右丞正脉，故南宗独盛”等类似观点；但中年之后，他与收藏家、画商交游甚广，在学古的范围上也不再局限于南宗。他不但临习“南宗”正脉董巨与元四家绘画，还临习李郭派画家朱泽民、



清·王鉴绘《青绿山水卷》，故宫博物院藏

唐子华、姚彦卿、曹云西等人的绘画，甚至在评价北宋画家李唐与董、巨绘画时均使用了相同的表述——“妙有幽微淡远之致”。正如王鉴在晚年时题叶欣《山水》册时所说：“画不师古，终难名世。”这一时期王鉴的“师古”概念已与董其昌原意迥乎不同，师古的范围趋于宽泛。事实上，王鉴中晚年的画作更多是对北宗画家的仿作。

在对待“南北宗”的问题上，当时也有一些画家和鉴藏家与王鉴的观点相近。例如画家恽向在一件仿夏圭绘画的题跋中曾提出自己师古的看法：“南北派虽不同，而致各可取而化。故予于马夏辈亦偶变而为之。譬如南北道路俱可入长安，只是不走错路可耳。”收藏家黄崇惺也曾表示：“董尚书言画家得烟云供养之益，若实甫辈苦心刻镂，正足损人耳。……吾甚爱实甫，正以其沉厚苍郁之气，足以益人。”

其二是从“位置皴法各有门庭”到“虽有门径而元气实相通”。董其昌非常重视不同画派的皴法差异，多次提出“画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门庭，不可相通”。而王鉴则对“门庭”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例如他曾在六十三岁时所作的《仿范宽山水图》轴上题道：“与董巨论笔法，各有门庭，而元气灵通，又自有相合处。”在其七十四岁时所作的《仿范宽董源山水》轴上，他再次自题“范宽、董源皆北宋大家，故用笔相肖，范画浑厚，董画幽澹，各极其致，非南宋后所能梦见。余此图虽拟华原，而时露北苑。”从而进一步将董其昌分为两类的绘画风格合二为一。这些论断不仅是针对范宽与董、巨而言，更是他在对古画鉴赏、临摹与融会贯通、化古为我的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看法，是他个人绘画新理念的体现。

赵国英老师还基于王鉴与董其昌的家族渊源角度，阐释了上述疏离的可能原因。王鉴的曾祖王世贞与董其昌在画论上就存在不少分歧。首先，王世贞对元四家的界定与董其昌不同。他所认定的元四家为赵孟頫、吴镇、黄公望和王蒙，而倪瓒为“品之逸者也”，米芾之画则“虽有气韵，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其次，王世贞也对董其昌的文人画“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观点颇有微词。他曾直言：“大丈夫好山水便当谢去朝市，安用役役

寄此！”再次，王世贞晚年对董其昌等人所倡导的崇尚元画、贬抑宋画的倾向也怀有很大的疑问和反感。在他看来，董其昌等人主张以元人取代宋人在画史上的地位是一种偏见，“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而董其昌等人则回应道：“宋画易摹，元人难摹。”虽然王鉴在论画言论中很少提及董其昌与其家族的不同观点，但从王鉴中晚年以来对南北宗绘画兼收并蓄的实际行为来看，不能否认其中家族传统的影响。

最后，赵国英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她指出，王鉴与董其昌的总体师古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师古范围、实现方式上均有疏离。董其昌大多通过本人收藏古代大师的作品实现师古，王鉴则受限于财力，只能通过大量观赏、临摹其他收藏家的藏品实现。这也使得王鉴与鉴藏界的关系更为密切，所鉴赏到的绘画范围更为广泛，对曾过目、临摹过的作品更为珍惜，以至多年后依然难以释怀、反复临仿。这可能正是王鉴、王翬的绘画艺术风格取向与董其昌、王时敏祖孙不同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互动环节，赵国英老师就清初的仿古风潮、王鉴的绘画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她提出，仿古风潮与明末清初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王朝动乱期间，大量宫廷藏画流入民间的私人藏家手中，为仿古画派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随着清王朝的稳固，大量法书名画流入宫廷，画家们不能学习古人，只能学习自己的师辈或同龄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四王画派的式微。

刘晨老师高度肯定了本次讲座主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她指出，赵国英老师从王鉴与董其昌画论的演变历程出发，生动刻画了明清书画界与鉴藏界双向互动的过程，呈现出了多维度、整体性的历史面向。此外，赵国英老师从第一手资料中挖掘信息、重视画卷的题跋等方法也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撰稿：毕悦）



206

刘津瑜 | 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



2021年5月25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远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之一。

刘津瑜老师首先向听众介绍了讲座的大致框架。她强调，本次讲座主要关注早期罗马帝国（1世纪到2世纪末、3世纪初）的状况，所涉人群大多数为相对于元老阶层、骑士阶层、奴隶而言的“平民”，即拥有自由身份的普通人。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刘津瑜老师围绕两个问题——流动人口的经历（尤其是个体的经验），以及流入人口和接纳地区的互动——进行了重点讨论。

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刘津瑜老师以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小塞内加所写的《慰母篇》为例，介绍了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对家乡和人口流动的态度。被卡利古拉皇帝流放科西嘉岛期间，为宽慰自己的母亲，小塞内加从几个层面论证了离乡远行的益处，如提供了学习哲学的机会，令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更高层的东西”。小塞内加同时认为，很多人也出于公务、访友、求学、展示美德、出卖技能等不同原因处

在流动之中，更换居所属于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

刘津瑜老师随即对文中出现的“patria”一词进行了重点分析，指出罗马人并未放弃“家乡”的概念，但对它的态度和道德判断较为复杂。在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patria”指的是“polis”，即出身的城邦，与个人的身份与权限息息相关，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而在帝国时代，“patria”的指涉范围变得更加宽泛。刘津瑜老师认为，罗马帝国的形成对patria概念起到了解构的作用。如西塞罗所说，人可以有二个家乡——一个是罗马，一个是自己的城邦。在这一时期，patria成为一种比较流动的、不完全固定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人构建自己的身份并得到认可、由此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空间。简而言之，家乡/故土概念在帝国时代依然存在，铭文等相关史料也反映出时人对家乡的情感和牵挂，其中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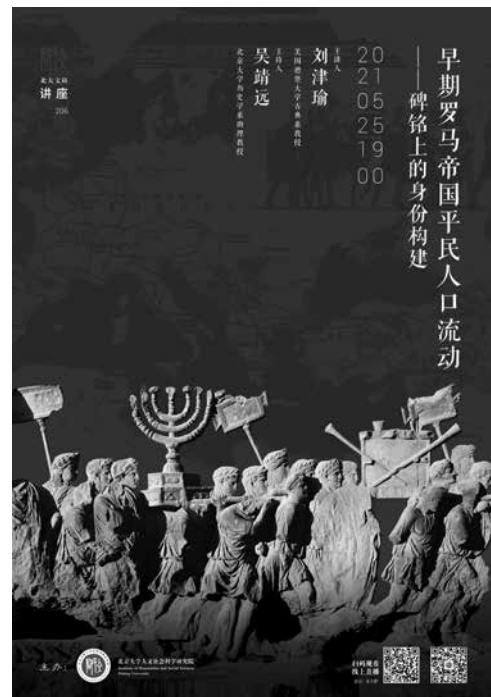
至于patria概念复杂性的另一方面，刘津瑜老师同样援引小塞内加《慰母篇》中的句子，他强调，在他的patria罗马城（其实他自己出生于西班牙，但在罗马长大），居住的外邦人比拥有公民权的罗马人还多，由此表现出“他者”的概念。从哲学层面来说，尤其是就塞内加倡导的斯托葛主义

而言，人被赋予了变动的、不安宁的精神。也正是心中“天然的不安分性”驱使着他们更换居住地，将飘荡的想法发散到已知和未知之地。这一理论对思想和人员的流动给出了正面定义和哲学包装。但刘津瑜老师指出，需要为这些现象进行辩护本身已经表明，流动并不是一种想当然的状态；家乡和流动的概念在帝国时代均表现出复杂性。

随后，刘津瑜老师将话题转向不参与哲学思考的普通人，分析他们如何讲述自己流动的经历。据她介绍，早期罗马帝国人员流动的种类比较丰富，其中包括参军、商贸、求学等系统化的流动模式，而这些人口仍与家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刘津瑜老师强调，无论是哪一种流动，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网络。

刘津瑜老师首先以士兵的薪水单、墓志铭为例证，分析留存史料的种种细节，生动展示了罗马军队制度与人员流动。根据文字可以判断薪水单上的士兵属于辅助军；使用拉丁语记录信息、刻写墓志铭，则说明军队的拉丁语化和罗马化程度相当高，反映了士兵在军队中的切身体验。对他们而言，参军可能意味着语言乃至文化的变迁，军队的地域流动也是强大的文化流动。

接下来，刘津瑜老师着重分析了达奇亚之战部分阵亡将士的名录。名录记载了约3800名士兵的姓名与家乡，他们来自帝国各个地区，包括意大利、高卢、雷提亚、西班牙、埃及等。刘津瑜老师认为，为阵亡将士刻名是帝国的官方行为，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纪念，另一方面则是用地名构建



罗马帝国的概念，说明征服战争是帝国的事业。刘津瑜老师补充道，征服达奇亚之后，帝国将大量人口迁移到当地耕种土地、建设城市，来自罗马各地的移民也加速了达奇亚的罗马化进程。

在介绍军队带来的人口流动之后，通过对以弗所出土的两篇希腊语墓志铭进行剖析，刘津瑜老师展示了另一种流动的类型——求学。两篇铭文均以韵文格式写就，或采用文化隐喻阐述了归乡主题，或说明死者本人与家庭的流动过程。刘津瑜老师提到，雅典、罗德岛、小亚细亚、罗马城都是当时求学的热门地。著名诗人奥维德就曾被父亲送到罗马学习修辞，而所谓“学习修辞”有时是为了增添个人的文化价值，有时则是为了求取升迁之路。简而言之，

以求学为目的进行的流动和对文化价值的追求联系到了一起。

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流动同样常见，且与罗马帝国的整体运作息息相关。刘津瑜老师引用了斯特拉波《地理志》（或作《地理学》）对（今）尼姆和纳博讷两座城市的对比，表明罗马世界的文化人在衡量地区繁荣程度时，会将外地人和商人的数量当作指标。她进一步援引公元1—3世纪的人口流动数据，概括两座城市流动人口来源的变化过程，证明人口流动和罗马帝国经济发展、城市消长之间存在相当的关系。

刘津瑜老师随即对罗马帝国早期人口流动的利好因素进行了总结。她认为，相对安全且便利的交通降低了陆上和海上的交通成本；罗马法对人口流动涉及的多种情况有所考量，相关规定虽然增加了一定负担，但也规避了部分风险，为公民节省了成本和精力。



罗马公民内部的等级划分示意图

相较于其他研究者，刘津瑜老师表示，她更关注人口流动在各种媒介中的呈现，特别是流动人口如何融入移入地，又在其中遭受了何种排斥。碑刻铭文作为被研究的史料，存在“发表偏差”等缺陷：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留下铭文，且这一公共媒介用于沟通和构建身份时，一般会记录值得书写的荣誉、身份的向上流动、参与的公共活动等正面内容，“不值得一书”的其余细节则容易被忽视。因此，研究者虽能从铭文中发现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却无法了解他们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难以从名字判定“本地人”或“外地人”的身份，人口流动的方向也不明晰。刘津瑜老师特别提到，“释奴”（获得自由的奴隶）对铭文的利用频率较高，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在经济世界占据上风，而可能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用公共媒介构建自己的身份。因此，对于从铭文当中得到的结论，研究者需要多加考虑和打磨。

根据高卢铭文记载的相关信息，刘津瑜老师指出，虽然人口流动的比例在数据中显得很小时，但每个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还需考虑人背后的网络——每个人的移动都离不开社会经济资源的支撑。刘津瑜老师列举了透过铭文辨识个人信息的方式，以几名衣商的墓志铭为例，简要分析了死者的个人生平、流动轨迹和社会身份。刘津瑜老师更进一步从纺织业者在高卢和意

大利的移动轨迹出发，证明罗马帝国的纺织业交易不是以羊毛为主，而是以成品为主。

对于在铭文中得以展现的行会组织，刘津瑜老师借用“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s）”一词进行概括，因为它们符合以下几项特点：此类组织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贸易促进经济福祉，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要素；离散社群是所在地的少数群体，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群体系统中的一部分。另一些组织则不用商业或职业命名，而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表明其身份。但刘津瑜老师认为，这些组织可能只是换了种方式描述自己的存在，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分成“宗教群体”和“商业群体”。

刘津瑜老师列举了来自里昂的一些案例，以说明一人同时从属于多个组织的情况。除了跨地域、跨组织的平行关系，当时还存在“恩主”与商人组织之间的纵向关系。以罗马骑士盖尤斯·森提乌斯·雷古里阿努斯为例，他本人即是属于多个行会的商人，同时也是行会的恩主，作为中间人、担保人为组织及其成员提供帮助、福利和庇护。刘津瑜老师提到，部分学者认为行会、社团可以视作非正式的信任网络和声誉机制，降低商人的交易成本。但她同时对行会的正面意义表示怀疑，认为这些网络和机制未必一直有效——商人结社行为可以产生和维持“信任”这一社会资本，也可能对群体造成伤害，导致社会资本的分裂。

讲座最后，刘津瑜老师引用了亚历山大里亚驱逐“乡下人”（基本等同于亚麻织工）的案例，以呈现某些职业头衔如何成为“他者”的标签。相关纸草文书曾提

及如何通过口音、外貌和性情、生活方式对“埃及乡下人”和“城里的/文明的(人)”进行区分。刘津瑜老师总结，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除了融入本地社会，还存在遭受排斥的一面。在铭文等古代史料当中，研究者更容易看到成功的故事，但外地人遭受的排斥依然有迹可循，对家庭、行会、恩主等社会网络的描述正反映了流动人口的抗阻策略。

通过与线上听众进行交流，刘津瑜老师就部分问题作了进一步补充。对于恩主与庇护制度之间的关系，刘津瑜老师进行了区分，指出庇护制度中的恩主和门客属于心照不宣的不对等关系，具有非正式化、甚至婉言化的特点，比如用“友谊”这样美其名曰的言词来描述这种关系；而讲座涉及的恩主关系主要是个人和群体的正式关系，在“不对等”之中存在对等的要素。在回答不同类型身份标识的重要性问题时，刘津瑜老师表示，罗马公民的身份带来的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保护，还意味着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乃至对帝国构建的积极参与。

（撰稿：陈洁樱）



207

王继辉 | 《贝奥武夫》与古日耳曼英雄世界

2021年5月2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0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贝奥武夫》与古日耳曼英雄世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王继辉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教授陈岗龙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王希斐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传统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王继辉老师从16世纪的英国图书馆讲起，并展示了16世纪30年代前后英国社会中的一系列文化乱象。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以王室尚无子嗣为由，向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申请结束其与王后凯瑟琳(Cathrine)的婚姻。但这一申请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克雷芒的拒绝，而教廷的态度引起了亨利的极大不满——这导致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廷的彻底决裂。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英格兰乃至威尔士的众多修道院和图书馆相继关闭解体，致使大量价值连城的珍贵藏书遭到丢弃与毁坏。但王继辉老师提到，这场文化浩劫对于后代文物收藏者来说却是一次空前的敛宝机遇。

接下来，王继辉老师介绍了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的收藏嗜好以及“科顿藏书



王继辉教授

阁”(Cotton Library)的来龙去脉。但在1731年，科顿藏书阁突遭大火，这突如其来的火灾致使众多稀世藏品顿时化为灰烬，其中包括古希腊语《创世纪》手抄本(Coon Genesis)、温切斯特古英语抄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以及古英语战争题材叙事诗孤本《摩尔登之战》(The Battle of Maldon)等众多珍稀书籍。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古英国留给后世的唯一史诗作品《贝奥武夫》在这场火灾中幸免于难，虽然大火也

烧焦了手抄本卷首各页的边角，但《贝奥武夫》依然保持了基本完整的状态。这部稀世珍本陈列在今天的大英图书馆之中，其藏本编号为Cotton MS Vitellius A xv。

随后，王继辉老师分别从史诗的成书背景、史诗中的古日耳曼传统以及史诗中的基督教精神等方面向我们详细讲解了这部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傲的高雅诗作。王继辉老师指出，《贝奥武夫》从口头传说到书面作品经历了一个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这部史诗的故事原型在多年传唱中已出现了显著的变异；其二则是这部史诗在成书之时已被诗人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特殊文化使命。王继辉老师首先对史诗的成书环境与背景进行了梳理。王继辉老师指出，就古英语文学中的诗歌创作而言，真正有文献支撑的古英语诗歌写作者或许只有三位，分别是奥尔德赫姆(Aldhelm)、库涅武甫(Cynewulf)以及凯德曼(Caedmon)。从这三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来看，这一时期的诗人开始从历史逐步迈向现实生活，从诗歌创作的幕后走到了诗歌呈现的前台，从以传颂古日耳曼历史的歌者一步步演进成了以宣扬基督教教义为歌唱目的的布道士，这是古日耳曼诗歌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变化趋势，如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察《贝奥武夫》这部史诗，就会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典型的文化印记也深深地刻在了这部史诗当中。

接下来，王继辉老师对这部史诗的故事梗概进行了回顾。就这部史诗的整体内容而言，《贝奥武夫》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无非是少年武士勇斗恶魔及其妖母，

年迈老王奋力屠龙的英雄壮举。粗看上去，这部洋洋数千言的史诗讲述的是古日耳曼的英雄故事，赞颂了古日耳曼的英雄世界，王继辉老师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接下来，王继辉老师提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人种学历史专著《日耳曼人》(Germania)，这本专著是后世了解欧洲古日耳曼世界的主要参考文献。王继辉老师对《贝奥武夫》中的故事细节与《日耳曼人》中提到的古日耳曼社会的重要特征进行了比较，例如在古日耳曼部落中非常注重氏族首领与其扈从之间紧密的契约关系。

在和平阶段，高贵的首领往往对追随他的武士们友善慷慨，细心地维护他们的生活起居，而一旦遇到战事，这些扈从们要绝对效忠首领，与其敌人血战到底，甚至献出生命；另外，古日耳曼部落注重家族之间的血亲联系以及相互间的保护义务，而古日耳曼社会的这一特征在《贝奥武夫》这部史诗中能够找到大量的互文性情节。例如青年英雄贝奥武夫刚刚踏上丹麦的土地，便得到丹麦国王赫罗斯迦的酒宴款待；在他初战告捷之时，赫罗斯迦又以金银珠宝相赠；等到他凯旋而归时，他的舅父耶阿特国王同样大摆宴席为其庆功，而贝奥武夫则把从丹麦带回的礼品如数交给赫伊拉克，以表示对首领的忠诚。除此之外，国王贝奥武夫为了被害的国人，不顾老迈体弱，找到恶龙与其拼死一搏，以报血仇。而当暮年的贝奥武夫大战恶龙之时，贝奥武夫的扈从们被吓得纷纷落慌而逃，他们的背弃立即遭到族人威耶拉夫的严厉斥责，并诅咒他们必将遭受报应。

这些情节都体现了古日耳曼社会首领与扈从的关系以及古日耳曼英雄世界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此外，王继辉老师还为我们解读了在《贝奥武夫》中遗留下来的日耳曼古老传统的诗意比喻，例如诗人以“鲸鱼之路”(hron-rad)暗示大海，以“海洋烈马”(mere-hengest)喻旨战船，以“征战之电”(hild-leoma)描写利剑，以“天地烛光”(woruld-candel)表述太阳等等，可以说古日耳曼社会骁勇豪放的氛围被《贝奥武夫》的诗性语言烘托得淋漓尽致。

王继辉老师指出，虽然《贝奥武夫》中古日耳曼英雄社会的文化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但这部孕育自古日耳曼英雄世界、成书于基督教教义快速传播年代的史诗必定是两种文化高度融合的作品。随后王继辉老师向我们详细解读了史诗中所蕴含的若隐若现的基督教文化印记，并解释了这些基督教元素与古日耳曼英雄传统之间的关系。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贝奥武夫》这部史诗中所蕴含的基督教元素始终是研究者讨论的焦点问题。王继辉老师提到，早在1897年，有位叫布莱克本(F. A. Blackburn)的学者，便把《贝奥武夫》中与基督教相关的词语和描写做了一次整体的梳理和分类。这位学者认为《贝奥武夫》中的基督教元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诗人直接引用圣经典故，例如鹿厅中的游吟诗人咏唱上帝创世以及将恶魔格兰岱尔认为是该隐的后裔；第二类是诗人对异教徒背弃真神，沉湎于偶像崇拜的公开指责；第三类是诗人对上帝恩典的赞颂以及对日耳曼部族船葬、火葬等非基督教陋习的鄙视之词。

在此基础上，布莱克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认为史诗故事的本源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古日耳曼民间传说，而史诗中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辞藻典故都是后来的手稿抄写者强加进去的，是异教作品之上的添加物。王继辉老师同时指出，除了这种观点，在《贝奥武夫》的批评界还有很多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例如有学者认为《贝奥武夫》在成书的过程当中变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是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反思异教英雄传统的新时代史诗，史诗中上帝对于世人命运的把控体现了对古日耳曼英雄传统的直接批判。总的来看，这一部史诗在整体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声音：一种认为史诗是对古日耳曼英雄传统的赞颂，另一种则认为史诗奉耶稣基督之名，对古日耳曼英雄传统进行了批评与反思。王继辉老师根据中世纪英国独特的文化氛围以及这一时期手抄本誊写者的写作习惯和阅读习惯，认为后者似乎更贴近作品及其所在时代的实际情况。王继辉老师谈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四义解经方法仍主导着人们的阅读与写作习惯，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局限在圣经解读的领域，对于其他的作品而言亦具有类似圣经的多层复杂思想，如果在中世纪这一独特的文化氛围下来思考《贝奥武夫》，也就不难理解众多学者对其深层内涵不断追问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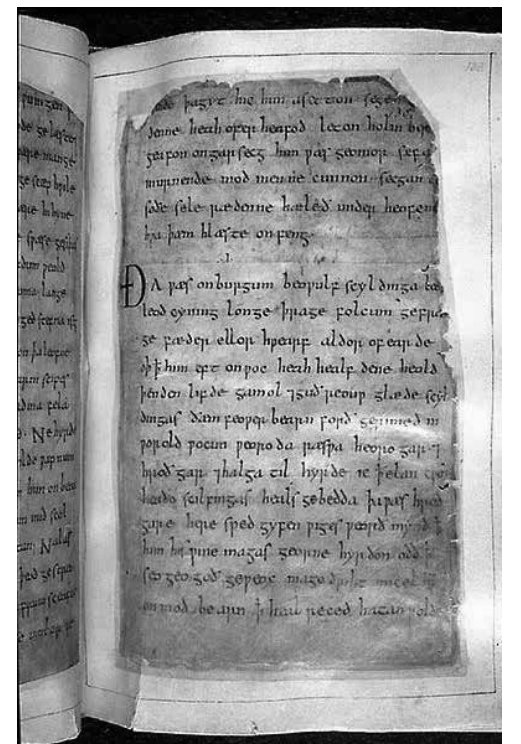
王继辉老师接下来提到，在英雄贝奥武夫身上始终弥漫着一层“命运”的阴霾，诗人仿佛总是在反反复复地提醒着读者，史诗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命运设定的结果。史诗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

展现了贝奥武夫豪迈的英雄之气，他赤手空拳将格兰岱尔的巨大臂膀生生地拧了下来；而在史诗的后半部分，贝奥武夫身上的这种英雄豪气则逐渐消逝。与恶龙交手之前，年迈的贝奥武夫刻意选择了锋利的佩剑，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精心挑选了贴身扈从，在与恶龙决战的过程中也失去了徒手决斗的骁勇，虽最终借助武器杀死了恶龙，但贝奥武夫自己也在决战中身遭重创，奄奄一息。史诗在贝奥武夫的葬礼中结束。

讲座最后，王继辉老师总结道，诗人似乎在通过这部史诗的结构安排向世人传达一个信息：不幸源自古日耳曼英雄文化传统，而要想获得平安，只能信仰把控一切的上帝。这或许也是《贝奥武夫》这部史诗在刻意描画古日耳曼英雄世界的同时又古老的故事背后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内在原因。

评议阶段，郭英剑老师表示，《贝奥武夫》这部史诗是作为经典存在的。《贝奥武夫》成为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源头和经典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出现的时间、篇幅以及创作方式等外部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则因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为深入文本内部的解读提供了依据——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叙事结构、人物类型背后的原型往往与神话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贝奥武夫》中出现的恶龙、巨人等形象以及英雄三战妖魔的母题既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神话，又能够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相应的印证，而英雄贝奥武夫作为文学想象的产物，代表着过去人类对于理想形象的美好追求，这对于后世文学中出

现的武士、骑士、国王等形象也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最后，郭英剑老师强调了在今天要阅读诸如《贝奥武夫》等经典作品的原因。从知识系统的层面来看，《贝奥武夫》不仅展示了英语的发展历史，更让读者看到了过去的历史，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雄形象。郭英剑老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能够让我们看到更为真实的历史。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作为经典的《贝奥武夫》会对人的成长、文学创作以及政治等各个层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还要阅读经典的原因。王希斐则认为，《贝奥武夫》能够让我们重新体会欧洲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明，而如果结合欧洲历史再重新解



重新装裱后的科顿藏书阁《贝奥武夫》善本，
Cotton MS Vitellius A XV, 133r.

读《贝奥武夫》这部史诗，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发现隐藏在史诗文字背后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特殊意义，以及能够让我们更感性地把英雄形象与英雄气概的真正内涵。

问答环节，王继辉老师就听众提出的《贝奥武夫》中武器的功能、英雄法则与

基督教情感、中古英语的演变等问题作出了详细回答，并同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

(撰稿：范宗朔)



208 段晴 | 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

2021年6月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文研院访问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评议。本次讲座为“敦煌学”系列讲座之一，由敦煌研究院、文研院、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讲座伊始，段晴老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大致思路。她将在本讲座中借鉴传统阐释路径，从佛教继承与演变的宏观视角，依托于阗语写本，勾勒出从于阗、吉尔吉特到敦煌的文化变迁线索。接着，她就于阗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简要介绍。

于阗语与古代语言梵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语言英语、法语等同属于印欧语系。所谓“印”，涵盖了从古至今多种语言和方言。当远古的操印欧语系的一群人，跨过了兴都库什山脉，成功进入到现在的巴基斯坦东南，定居下来。这些人群曾经说的吠陀语，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度语言。佛典语言的巴利语，以及曾经成为贵霜王朝官方语言的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后来随着人口的迁徙而跨越昆仑山脉，进入塔里木盆地，在丝路南道绿洲的鄯善王国一直沿用到公元5世纪。还有古典梵语，或者叫做纯梵语，也是从吠陀派生的。公元前5世纪时，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的语言学家波你尼把纯梵语的语法变化固定下来。新疆地区发现的梵语材料，大部分

是用所谓混合梵语写的。所谓混合，是结合了两种语言的特点。梵语的和俗语的。

所谓伊朗语，也是一笼统的概念，其下涵盖了从古至今的多种语言。伊朗语有东西之分。西支最古老的是古波斯语。东支最古老的应该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献阿维斯塔所保留下来的语言，一般就称为“阿维斯陀语”。中古伊朗语的西支主要指巴列维语。中古伊朗语的东支，有粟特语。而现存文献最多的中古伊朗语，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介绍的于阗语。

于阗人是最后的斯基泰人，即中国古书里的塞种人。而塞种人，不擅长以文字传承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和田地区出土的文书写本当中，最早看到的，并不是于阗语的东西。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胡语文书，是佉卢文的，例如著名的KI661，是一件买卖契约。其上的于阗王的称号，与6—7世纪于阗王的一致。宗教信仰方面，则有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的《法句经》。

于阗语从口语落实到文字始于六世纪中期。目前藏于和田博物馆的甃甃上载有最早的于阗语文字。甃甃的年代约为公元560年，显示了早期的于阗语的书写特征。

于阗本土传说显示，于阗贵族说于阗语，而将于阗语书写下来，最早出于民间的需要，出于王族治理社会的需要。于阗王室精通梵语，有两件书于帛的梵语契约可以证明。一件是王室的御医写的。

另二件，是在尼姑庵写的，代表了佛教僧团流行的语言。御医写的这一件，值得关注。这说明，于阗王室有精通梵语的知识阶层存在。于阗王室有学习梵语的传统。御医书写的这件买卖人口的世俗契约写于6世纪前半，而于阗王室学习梵语的传统一直维系到公元10世纪，一直至于阗王国覆灭。

话题转到敦煌藏经洞。段晴老师首先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几类于阗语文书。段晴老师指出，敦煌藏经洞中的于阗语文书未经人为破坏，写本相对完整，但没有成套的例如汉文大藏经那样的整部文献。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给王庭（于阗王室）的报告，通常书写于长纸上。第二类为医书。例如，藏经洞中出土的医书《医理精华》。由于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主要是为于阗王室服务，这些重要经典必然是从于阗本土携至敦煌。这类文书通常写于印度的书型纸（俗称“贝叶”）上。第三类为佛教类经典。第四类为于阗公主、王子的发愿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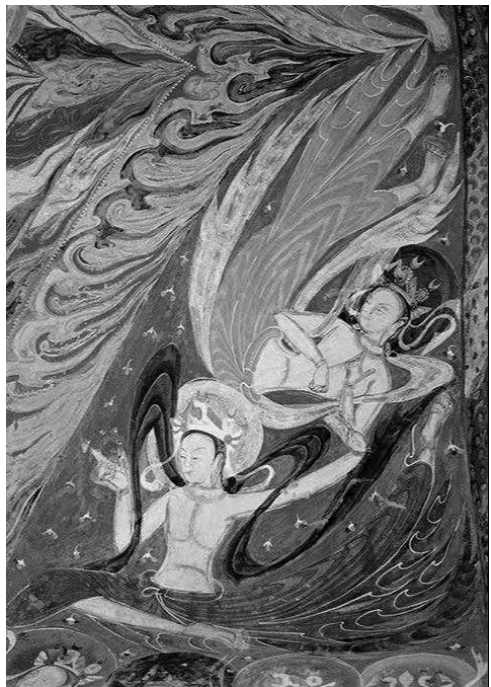


段晴教授

第五类为梵语—于阆语、于阆语—汉语混合词汇。第六类则为算命书。

接下来，段晴老师重点介绍了敦煌藏经洞中的几例经典文书。她指出，敦煌 98 窟为于阆王室祭祀之所，并设有祭坛。洞中绘有于阆国王李圣天和夫人曹氏的画像，应是在 934 年之后画上去的。从壁画上看，李圣天的眷属，除了王室成员，就是僧人。从人群的社会属性分，王室和僧团。僧团服务于王室。所以在敦煌藏经洞的于阆语文书中，可以清晰分类，一部分明显是属于王室的，一部分则是僧团所诵的。

第一类例如 P.5538，应该是已经成为于阆王的从德，向在敦煌的朝廷所写的报告。同一号下，就是梵语、于阆语练习句。段晴老师认为，这一册梵语、于阆语的词汇、语句对照，可能是玄奘撰写的。玄奘



佛背光飞天，莫高窟第 285 窟壁画，作于西魏

曾经住在于阆王城附近的说一切有部的寺庙里。他精通梵语，与当地僧人用梵语交流，所以《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大量于阆王国的传说。

接着，段晴老师介绍了从德时期的礼佛赞。她认为标号为 P.3510 的卷子不是从德太子亲笔书写，而标号 P.3513 的卷子则应是从德亲自书写并供养的写本，其中有佛名经，还有宣扬性空、般若思想的经，后者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还有《普贤菩萨行愿赞》，这是《华严经》的一部分。经文前的几句颂词，明显是从德自己撰写的。从用词可以看出，从德的梵文造诣以及学识丰厚。

《普贤菩萨行愿赞》之后，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一品，也从德太子所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曾经在于阆广泛流行，发现五部写本。但从德太子只抄录了其中的《梦见金鼓忏悔品》。总体说来，P.3513 所用纸张质量上乘，虽双面书写，却未见墨迹浸渍。

段晴老师又介绍了《文殊室利人无我最胜王经》、《佛本生赞》等内容等于阆语佛经。她认为这些文书晦涩难读，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段晴老师指出，要想深入探讨敦煌与和田地区佛教典籍写本的关联，还必须了解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地区（唐代称为“小勃律”）出土的梵文写本。1931 年，当地放牧人在一座古老的佛塔下发现了许多梵文写本。1938 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出土了更多梵文写本。已经证明，7 世纪时于阆与吉尔杰特保持有频繁的交往。有于阆人曾经生活在小勃律。有些写本是于

阆贵妇作为捐资人资助于阆人抄写的。

为进一步说明吉尔吉特与于阆地区的关联，段晴引用了德国著名学者封辛白（Oska von Hinüber）的分析结论。以流行于 7 世纪的《僧伽吒》为例，这部经同样在吉尔吉特和于阆王国大受欢迎。所有写本均由贵族和王室捐赠。

在和田地区出土的佛经残片中，段晴老师于 2001 年发现了于阆语的《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的四块残片，并将其拼补完整，此残片目前藏于新疆博物馆。而这同一部经的梵文本在吉尔吉特的写本中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被发现，而且仅存一部。如此稀少的写本，却在于阆和小勃律两地发现，可以是交往频繁的最佳例证。

段晴老师指出，于阆贵族供养抄写写本在于阆佛教的一大特征。每朝每代王子、国王的个性不同，抄写的经书也不同。于阆贵胄对于某部经典的青睐使写本经书的流传具备时代特征。《僧伽吒经》在于阆故地曾特别受欢迎，已经发现的该经的残叶多达 145 张以上，分别来自 20 多部写本。但是，在敦煌藏经洞的出土的于阆语写本中，却不见《僧伽吒》的踪影。这说明，到了公元 10 世纪，《僧伽吒》已经不是于阆王国的王公贵族所喜爱的经书，他们虽然一直将供奉写本的传统继承下来，认为通过捐资抄佛经，就是在积累功德，可以攘灾祈福。但所抄写的经书，已经不是《僧伽吒》。

敦煌藏经洞有从德太子手书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之一品。同时在和田地区，这部经残存的纸叶也算颇丰，来自至少 5 个抄本。但是，吉尔吉特所发现的梵



斯基泰人与马，该图是根据在蒙古阿尔泰山脉 Olon Kurin Gol 10 号墓的考古发现绘制的

文写本中，却不存在《金光明最胜王经》。段晴老师认为，于阆语的《金光明》应该是实叉难陀翻译的，反映了中原佛教对西域地区的回流。例如从德的《梦见金鼓忏悔品》，与义净的汉译完全可以对上。实叉难陀曾经与义净同年抵达洛阳，他们共同翻译《华严经》，期间二人共同生活于同一寺庙达四年之久。后来义净开始翻译《金光明经》等。恰恰是这部经完成汉译之后，实叉难陀提出回于阆。段晴老师认为，很可能此时，实叉难陀将翻译好的于阆语《金光明最胜王经》带回于阆，供王室使用。

此后，段晴老师将话题再转向敦煌。她指出，敦煌藏经洞的于阆语文书处于于阆语文书中最晚阶段。她着重介绍了两部重要经典。第一部为 Ch.00267 写本，产生于 1006 年后，记载了敦煌藏经洞关闭前在第 98 窟的最后一场法事。召集这场法事的，是从德的胞弟，于阆王子琮原。公

元 964 年，有于阆王子三人来到莫高窟。三王子名“琮原”。Ch.00267 文书记载：“应伟大的王子 Tc ū -syau (琮原) 的请求、邀请，我们聚集：我们坚定皈依于位于十方三世的现前天中天诸佛。”直至公元 1006 年前后将喀喇汗灭国时，于阆王朝依旧保持着原有信仰。文书 Ch.00267 正是对于阆王室信仰的说明。

第二部重要文本为长达七米的长卷 S.2471。该写本成分复杂，含有《忏悔经》等内容，由供养人亲笔与代笔组成。段晴老师展示了其中 55 行，因为这一节可以全面反映于阆王国的信仰。这 55 行，第一层以“礼敬一切四方十方，无量无边无际的天佛”开场，采取法华、华严、般若大藏经的常用说法，突出佛教的重要性。第二层介绍了于阆的各类守护神。这一类神又下分成不同的组：来自印度佛教的天神（四大天王，如 98 窟所见）和夜叉大将。天王部中有于阆八曜。于阆故地有丰富的女神信仰。城隍、宫殿等，都有女神的保护。多女神，是于阆王国信仰的特征。

以鬼王阎魔为首的这一组中出现月亮、太阳、行星、星宿，其中“月亮”使用的是于阆语词 p ū ra，说明这里的月亮，是天空可见之月，而“月曜” s ū ma，则是不可见的神灵。“太阳”一词也用于于阆语本词。而“日曜”则是坐在发光的大乘輿上的神灵。跟随“太阳”之后是行星、星宿，以及年的引领神，由此看来，这一组是发生在真实世界的自然现象，即都有成、坏的变化。

评议阶段，白玉冬老师就讲座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作为铺垫，段晴老师首先展

示了于阆地区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以及敦煌的六大类于阆语文献与印度书形。段老师认为，P3510 的发愿文并非作者亲笔书写，而 P3513 则是亲笔书后从于阆带来的长卷，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品为太子手书。之后，段老师又介绍了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写本，包括一大部分佛经——其中《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由她本人拼成，现藏于新疆博物馆。最后，段老师又介绍了敦煌藏经洞晚期文书，认为 Ch.00267 中由琮原太子之弟实施的做法是在莫高窟 98 窟完成的。白玉冬老师表示，段老师介绍的敦煌洞窟中的神祇图像，有助于我们理解于阆语中的神祇神话。

接着，荣新江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评议。他指出，敦煌藏经洞的于阆语文书破译工程存在两大困难。其一，这些文本由于阆人自己书写，与传统梵文佛典有一定差异，其民族语言特点造成破译障碍。其二，于阆文书中的于阆到开封的使臣报告缺少对应文本辅助阅读，这对史料造成判断困难。基于上述困难，段晴老师的研究将对本学科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本次讲座最后，段晴老师对于阆语文献的年代断定及与高昌回鹘等其他民族的交流等问题进行回应。

（撰稿：吴宛妮）

209

定宜庄 | 考据、口述与田野——以那清绪口述为例

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209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考据、口述与田野——以那清绪口述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评议。本场讲座是“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定宜庄老师介绍本次讲座的重点内容是质性研究方法以及自己对这种方法的体会。质性研究方法本来属于社会学领域，但对于作为史学研究者的定宜庄老师也有很大的启发：首先，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第二，重视动态的“历程”而不是结论；第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这意味着多元视角；最后，以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建立情境脉络。

接下来，定宜庄老师以那清绪访谈为出发点，通过具体的故事进行阐释。在最初做田野的一批案例中，定宜庄老师 1993 年 8 月在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进行田野工作时发现存在一支自称是拜音达里后裔的辉发那拉氏家族，在世的仅有一名年近八旬的老人那清绪。1994 年那清绪来京看望侄子，定宜庄老师与她见面完成访谈。



定宜庄研究员

在 1993 到 1994 年末的一年半时间里，那清绪给定宜庄老师写了五封长信，信中讲述了那清绪家的历史、生活的过程和那清绪的感想。从口述历史的角度，定宜庄老师做了田野、口述和地方文献三方面工作。

具体到历史，明代女真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最强盛的有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其中辉发部最后一位部落长名为拜音达里。努尔哈赤崛起并统一建州女真诸部后，发起了对海西女真四部的兼并战争，海西四部曾进行顽强抵抗，但终被努尔哈赤逐一击破，这一过程长达数十年。四部中辉发部第二个被灭亡，据清代最重要的满族官书《满文老档》记载，1607 年努尔哈赤围攻辉发城，俘获拜音达里父子并诛杀。但那清绪在信中认为，拜音达里父子被杀的结论和

辉发那拉氏家史所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那清绪结合家世祖传与多方面的考证，分析国史与家史间的矛盾，并对当地县志否决辉发那拉氏为该县原始满族住户的理由进行申辩。那清绪认为，拜音达里面对战争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隐退出走、归隐山林。

定宜庄老师指出，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这一故事。从官方文献的角度看，《满文老档》对灭辉发部的记载过于简单，《朝鲜宣祖实录》只记载辉发部大败而没有提及辉发部首领的情况，且乾隆帝东巡诗有“逾盟徒事营三窟，不战惟劳举一戎”的句子。定宜庄老师认为，官书虽存在一些疑点但不能说明问题，因此需要实地考察。从实地考察的角度看，通过两次考察，定宜庄老师发现辉发所居的呼尔奇山城极为险峻，易守难攻。拜音达里据有三重城池且拥兵过万，即使如清朝官方史书所说内失民心、外失信义，也未必会被轻易攻取。第三，从考古发掘报告的角度看，辉发城中遗存主要在明代，与历史记载相符，且辉发城并没有发现过火的痕迹，说明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城里没有发生残酷的战争。各种线索都指向一处，即拜音达里很可能确实没有与后金在辉发城发生血战，而是弃城出走。这其实还可以分析出两种可能，一是拜音达里只带了部分人众出走，在努尔哈赤攻取辉发部时城中还有人在负隅顽抗但不是对手。另一个可能是拜音达里走后，这个城池便随之荒弃，努尔哈赤得以不战而夺人之兵。定宜庄老师认为，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更多线索，也无论清史是否需要修正和改写，这都是一种引人入

胜的叙事。事实上，对任何历史事件的书写，本来都应该不止一种结论与声音。

接下来，定宜庄老师进入对那清绪口述的意义的讨论。定宜庄老师指出，口述史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的思路和进入的途径：口述正如袋子一样可以装入各种丰富有趣但“不入流”的材料。定宜庄老师尝试着把那清绪的故事装入口述史这个袋子当中，并且进而发现，在我们遇到无法归类到任何学术门类之中的、却又无比生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时，口述史大有用武之地。然后，定宜庄老师探讨了“历史学本位”的问题。口述史虽然称为“史”，实际却主要起因于人类学、社会学等专注于“当下”的学科。事实上，田野调查也是如此，这本是对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却往往不为实践者所意识和认知。首先，关于当下的口述访谈，口述与田野其实都只是进入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学科本身。解决史学问题的时候，可以同时用口述、田野和文献等多种方式，而田野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上下文(context)。虽然相对于传统的文献档案，口述可以成为另一个视角，但目前大量人力、物力投放在将口述用来做正统的、传统的题目，乃至成为口述史的主流。譬如致力于做名人传记、名人口述，这种情况在口述史方面比做田野更明显。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不一定会导致新的范式和新的史观，更惶论“颠覆”。其次，关于作为补充史料的口述史，定宜庄老师认为某些口述旨在补充一些历史真相。如果将口述历史看作是史料的一种，那么既然对所有史料都必须鉴别真伪，对于口述史料也是如此。

定宜庄老师也谈了对口述史的几点思考。目前流行的口述访谈，重点多放在被访者本人身上，了解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心态和感受，以及他受某个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和思考。很多访谈固然也会涉及他的祖先、他的出身，但往往只作为背景。作为史学家，定宜庄老师也关注人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又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史实来编故事，这样的故事反过来又对这些编故事的人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总之，定宜庄老师意在对故事如何借助历史影响到活人的生活又借助活人的解读变成了活的历史的现象进行阐述。

具体到那清绪口述，定宜庄老师从以下几个层次介绍了其意义。第一，集体传记与个人口述。集体传记关注任务群体而非个人，那清绪所述个人经历、对自己家族的独特记忆，以及为了让家族历史不至永远湮没而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满族妇女中的一个典型或者说口述史中的个案，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第二，将口述放入历史的脉络中。口述史的宗旨本是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关注的大多是大事件中的小人物。那清绪的口述则反之，其重点在于小人物背后的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样的口述所牵出的历史内容既复杂、庞大和沉重，也极为有趣和生动。那清绪口述关涉的海西四部在八旗中的地位、与建州女真的关系等都是八旗制度中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以往对于叶赫部研究较多，其它诸部尤其是辉发部较少，这有可能是一个可以深入的方向，史学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可能存在的方法与宗旨上的回归到传统史学的问题，定宜庄老师认为不必拘泥于领域与原则，重点在于解决问题、做出成效。定宜庄老师指出，将传说故事变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并不容易，将记忆变成可以引证的历史记录更有太长的路要走。第三，定宜庄老师最关注的一点是作为历史与现实之间媒介的口述史，这是口述的真正意义。那清绪的口述说明，数百年来存在没有被纳入八旗制度的一部分人，将“非旗满洲”作为对满洲形成过程特征的探讨也是将口述及民间文献材料纳入正规学术研究的一个尝试。问题不止于此，应当注意在拜音达里后裔问题经过几百年后，那清绪在这个时间特别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这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即民族识别工作重新开启后的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其中汉族改报满族的比例尤其高，那清绪便是其中一例。

最后，定宜庄老师也谈道，那清绪口述也指出了修史的要害，也即从多元的视角看，不仅要用胜利者的视角讲他们的成



辉发城石碑

功，更要用失败者的视角做历史叙事。让失败一方说话也是口述与田野最能发挥其功能之处。

刘小萌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过往主流口述研究往往集中于有权势财富的人物，但定宜庄老师的研究取向更值得提倡。定宜庄老师以那清绪口述为例，探讨了史学研究的文献考据、田野调查与口述文本间的关系。本次报告体现了口述史研究引人入胜的特点，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史学研究的方法。定宜庄老师把官方文献、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报告结合做出独立的分析。关于定宜庄老师对口述史方法论的反思，刘小萌老师认为当代口述史研究间存在很大差异，仍处于探索阶段。定宜庄老师从小人物看背后的大事件是一种新颖的方法论，口述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媒介并最终回归历史也带来重要的启迪。结合自身研究，刘小萌老师认为田野调查与口述材料能够带来新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新材料。关于辉发部未入旗与拜音达里出走的情况，刘小萌老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辉发部被努尔哈赤灭亡后作为残部逃入山林。此外，辉发部虽然相关史料较少，但也存在一些家谱材料可以结合进行补充研究。关于辉发部对清朝统治的态度，那清绪谈到“气节”，但也可以在辉发人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其他多样化的例子，而那清绪作为“在野”的家族后人，她的记述有其价值。刘小萌老师也对定宜庄老师回归史学本位的方法表示赞同。

刘志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定宜庄老师的口述与田野经验与自己的研究也有很多共鸣。关于定宜庄老师在报告中提及的

辉发山城，刘志伟老师也认为中国各地的山城、部落等需要在了解中国史与重新书写中国史的过程中加以重视。无论真伪与否，那清绪的讲述对历史学者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结构与叙述方式非常有价值，而定宜庄老师将口述与满文记录历史对照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定宜庄老师的报告为将战败者的历史作为重建中国历史的线索与思路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有助于将战败者的声音纳入历史的视野与理解中。关于历史学本位的问题，刘志伟老师认为，尽管口述历史与文字历史都不尽可信，但历史学家的人物就是在不可信中追求建立起可信的历史。相较于相对稳定的文字历史，口述历史的变动性更大，背后体现出上下文语境的问题；并且，口述历史正因其可变，反而能够体现出文字历史不能取代的特别用途。正如文字历史的版本研究，口述历史的流传与变动在史料鉴别时也值得注意。口述史料在与文字史料的互证过程中，除了有证实的作用也有证伪的作用。对于口述史料的意义，刘志伟老师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人或是史学家怎样用历史事实来表达当下诉求，也要看到对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对历史的理解等都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对小人物有足够的同情，回到民众的立场做历史研究。

(撰稿：邓晋武)

210

彭小瑜 | 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

——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1096-1141）论婚姻和家庭

2021年6月1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1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1096-1141）论婚姻和家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燎宇评议。本场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彭小瑜老师介绍说，他的谈话内容主要出自他最近在《读书》和《世界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试图说明中世纪欧洲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进展，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西方历史上因为善恶二元论及其危害引发的讨论、争论和社会动荡，其中包括一些与家庭和婚姻观念有关的个案。

彭老师谈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越来越多研究欧洲史的学者意识到，近代西方文化出现的一些变化，包括婚姻自由、将感情看作婚姻基础等等，看上去是“新现象”，其实早在11至13世纪就已经出现。这三百年是近代欧洲诞生的关键时期。此外，以前国内学界和大众熟悉的一些学者，譬如黑格尔、韦伯、李约瑟等人，往往强调近代欧洲的诞生源于西方文明的独特内在结构。而后来一些学者，譬如勒高夫等人，却认为，这一历史进步的历程是中世纪时



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期人们刻意、清晰、主动的选择和努力争取的结果，不是因为某种天然优势自然生成的。

接下来，彭小瑜老师指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批评中世纪文化的惯性，经常将中世纪看成是黑暗时代，而且这一传统长期影响中国学界。但现在已经有更多学者注意到中世纪具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马尔库塞曾经说，现代社会的一切“优雅”都出自中世纪。随后，彭小瑜老师以勒高夫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为例，介绍了学界对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研究。勒高夫认为，人文主义绝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欧洲在11-13世纪就已经清楚表现出对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重视。不同于15世纪以来的个人主义，12世纪欧洲对个

人价值的高度认可往往被放置在群体和集体的语境之中，譬如说，归属于新的宗教和社会团体往往是人们认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勒高夫在《圣路易》一书里面谈到，《创世记》第1章第26节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一观点得到了11-12世纪欧洲的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布道者的认同和传播，并由神和人之间的相似性论证了人的尊贵和尊严。勒高夫注意到，人世间生活因此得到更多的正面肯定。譬如在这个时期，笑在中世纪成为一种美德，摆脱了原来不雅观的恶名。享受美食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邪恶，法国美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获得声誉。也就是说，人世间情感和日常生活的美好在中世纪其实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肯定。

讲座第二部分，彭小瑜老师介绍了中

世纪规避和镇压了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的观点。他引用了勒高夫的一个观点，即卡塔尔派是中世纪的“恐怖主义”，中世纪欧洲对其善恶二元论极端思想的成功压制是西方文明在近代取得良性发展的前提。卡塔尔派是一种以善恶二元论为基础的异端运动。他们将社会截然分为完美和邪恶两部分，甚至贬斥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世俗生活的价值，毫不妥协地反对教会提出和试图推广的炼狱观念。

勒高夫在《炼狱的诞生》一书里面曾经谈到，卡塔尔派试图否定炼狱存在的理由恰恰证明了炼狱的社会意义：通过提供天堂和地狱之外的缓冲空间，击退了善恶二元论的极端主义——人们不需要害怕做不到完美无缺，因为在完美和邪恶之间还有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人即便生前做过坏事，仍然可以通过妻子、儿女和朋友的善功，在进入炼狱之后提早得到解脱，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即便在配偶去世以后，人们仍然希望有办法为对方做点什么，在勒高夫和很多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以男女合意、男女平等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度在11和12世纪的欧洲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为抵制否定婚姻家庭的异端运动提供了制度性支持。人们因为炼狱的存在或想象，能够积极行善，实践自己对亲人和所有人的爱情和爱意。因此在中世纪人的心目中，炼狱观念和制度代表着希望，捍卫和保留了被极端的善恶二元论所否定的人性空间。

这样来回看中世纪对异端运动的镇压，提醒人们注意到，在这种现代社会不可接受的暴力方式背后，存在着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安定，不得不压制极端主义严重社

会危害的需要。彭小瑜老师还指出，还是因为启蒙运动的传统和影响力，以往学界倾向于过高估计中世纪镇压异端运动的酷烈程度。譬如人们经常忽略的情况是，即便阿奎那在神学方法上具有巨大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创新也没有在中世纪受到主流社会的压制。又譬如说，勒高夫对商人和银行家的研究，其他学者对工商业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表明中世纪在受到教会严格规范的商业和商业伦理这些领域也有系统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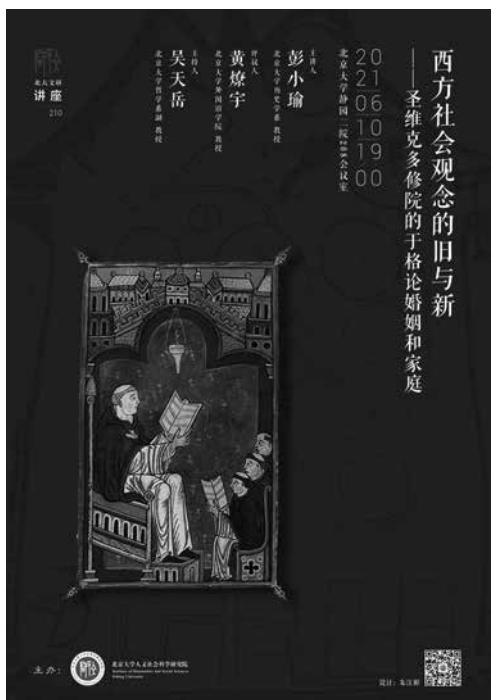
讲座第三部分，以圣维克多修院神学家于格的《论童贞玛利亚》为主要文本，借助于格的思想为个案，彭小瑜老师讨论了中世纪欧洲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于格被认为是奥古斯丁修会在中世纪的代表性人物。他批评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缔结的封建婚姻，认为婚姻应以双方自愿为基础。他并不否定肉身关系的意义，同时强调情感和心灵沟通在婚姻关系上的重要性。于格对爱情和婚姻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反击异端否定婚姻的观点，尤其是为了反击善恶二元论极端主义对肉身和人世间生活的贬低。于格对婚姻的理解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他对爱情的表述其实就是今天西方结婚誓言的基本内容。

彭小瑜老师指出，与明谷的贝尔纳相比较，于格对《旧约·雅歌》的理解更加世俗化、更加直截了当。于格明确提出，《雅歌》形象描述的爱情不局限于人和天主之间，也是对男女、夫妻之间真爱的表达。他明确借用这些诗歌的语句来赞美人世间的爱情和婚姻，认为《雅歌》的语言就是人世间的爱情语言：“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贝尔纳、于格都强调爱是纯粹的、自我的、自足的，但他们也强调爱情的利他性，认为人间情爱如果仅仅被局限于家庭之中，就是私欲和淫荡。彭老师指出，在这些修道院作者看来——虽然他们自己过着独身的生活，婚姻关系是神圣和美好的，而且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情感必须扩大为对所有的人的爱。而这一点，彭老师强调说，正是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区别于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伦理的关键之一。

彭小瑜老师谈到了于格对同性婚姻关系的讨论。在于格以及中世纪主流社会的作者看来，两性差异是婚姻的基础，因而婚姻关系不可能存在于同性别的人之间。女性的柔弱会使男性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爱护和帮助她，也会让女性倾向于接受来自男性的帮助和爱护，意即婚姻中男女的爱是互补且平等的，而非一方压迫另一方。彭老师表示，这种强调男女差异的思路虽然很难经得住女权主义的拷问，但我们若能克制住用现代价值观对古代文献进行过度解读的冲动，于格文本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本意，不一定要做延伸的理解。

于格并不将生儿育女看作是婚姻的首要存在理由：毕竟婚姻首先是夫妻肉身的结合，否则儿子又何必离开父母家去与妻子相聚呢？所以他必然在心灵上爱妻子甚于爱父母。父母是生命之源，妻子则是生命的归宿。玄妙的神意决定了没有夫妻之爱的人不会幸福。彭老师提醒说，中世纪欧洲历史文献非常丰富，学习语言，提高阅读能力很重要。阅读多了就会带给我们对西方文化具体多样的印象，当然解读会是更加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彭小瑜老师表示，男女平等和自由合意是婚姻的基础，这一观念在充满等级观念和偏见的中世纪欧洲无疑是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同时也带来了私奔等新的社会后果。于格希望婚姻是公开和有一套完备的仪式，避免私奔结合造成的婚姻关系带来复杂的法律和伦理难题，譬如因为私奔而无法证实存在的始乱终弃的婚姻。彭老师也系统论及了于格和教会法学家对骗婚问题的讨论。中世纪的神学家和教会法认为，在用他人顶替真实结婚对象的骗婚阴谋中，受骗一方并未真正表达婚姻同意，所以因为骗婚而缔结的婚姻关系是无效的。但是他们都意识到，“骗婚”的实际情况异常多样，相关的案例很难处理。譬如有些情况是出自误会了配偶的财富、品德或者容貌，也就是说，当事人希望解除婚姻关系的真正理由是因为不满意对方的财富（通常是嫌贫爱富）、品德（通常是不满意对方的某些污点）或者容貌（通常是嫌弃对方丑陋）。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法

学家的意见通常比较苛刻，认为隐瞒这些实情并不构成骗婚，夫妻应该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

在讲座最后阶段，彭小瑜老师总结道，11-13世纪欧洲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与现代价值观高度一致。这一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共同性也在文化、教育、科学的很多其他方面存在，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中世纪社会发展为近代欧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欧洲历史的这一延续性固然是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其存在并非是因为西方社会具备某种天然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刻意做出了确定的选择并为实现这些选择做出了巨大努力。

在评议环节，黄燎宇老师和吴天岳老师分别由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了问题，发表了生动和有深度的意见。彭老师也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撰稿：孔祥瑞）

211

马忠文 | 近人书信程式与文化蕴含

2021年6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1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近人书信程式与文化蕴含”。文研院邀请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主持。

随着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电子化通讯方式的普及，书信这种传统的人际交

往方式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近代史研究中，书信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史料，需要准确解读和研究。明清以来，日常书信逐渐形成与社会习俗紧密结合的固定形制，其中也折射出各种文化、礼制的因素，只是今天人们阅读时已经感到有些陌生。由于缺乏详尽的旧式书信写作规范之类的参考作品，人们很难全面了解近人书信及其涵盖的社会文化信息。为此，马忠文老师以各类旧式书信为案例，结合书信的写作程式，探微式重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人们写信的习惯，审视了书信与社会生活各层面的鲜活联系，并呼吁学界重视该领域的研究。

讲座第一部分“尺牍溯源”中，马忠文老师对书信的形式、形制变化做了简要介绍。书信，按照材质划分，最初写在竹片上的被称为“简”，写于木片上的被称为“札”或“牍”。“牍”通常为三寸宽，一尺长，“尺牍”一说由此而来。“絨”本意是丝做的绳子，通常用来捆束上下合拢的两片木札。所以“絨”也用以指信函。另有书信写于绢和帛等织物之上，故也称为“尺素”。

尺牍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尺牍与早期法书密切相关，魏晋至宋元时期流传下来如二王尺牍、苏黄尺牍、米芾尺牍、赵孟頫尺牍等众多书法作品，其内容以书信为多。也就是说，传世的法书多为尺牍。另一方面，尺牍没有“韵文”的束缚，成为了古文、散文和小品文常用的文体形式。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书信及其形制、习惯等。



马忠文研究员

讲座第二部分，马忠文老师试用“程式”一词大致概括书信撰写过程的诸多具体问题，并详细讲解了近人尺牍的基本构成，对尺牍中的基本元素分别进行了介绍。

称谓语是尺牍写作者对写作对象的称呼，分为姓名称谓语和称呼语，表示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及所拥有的身份、职业、地位等。提称谓语紧随称谓语其后，为表示尊敬，对长辈或平辈称“阁下”、“尊右”或“执事”等；对老师尊称“夫子函丈”；对女性称“妆次”等。启事语为“者”字结构，给祖父母、父母用“叩禀者”，与其他尊长用“谨启者”、“敬启者”等，与平辈常用“兹启者”、“径启者”等。此外，尺牍一般还包括主题内容、结束语、祝贺语和落款，写作完毕后还有附语部分，通常是附有两行附言以表问候和补充说明的。

近人日常尺牍中常见的书写风俗与习惯反映在以下方面。



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书信中多体现出极高的艺术修养

一，谦辞与抬头。明清日常尺牍中常出现提笔抬头，表示崇敬之意，分为单抬、双抬、三抬头，情况各有区别。由于频繁出现抬头，书信下行时常空着，当时称之为“吊脚”。

二，空抬，以及自称时的偏位小写。提到对方名字时，不抬头，而是空出两格；提到自己时，名字小一点并且偏右，表达自谦。

三，居丧的表示。写信人如果处于居丧状态时，书信落款时一定要表明，如“制”（丁忧、守制）、“期”等用语。

四，落款中称谓的多重关系的叠加。“世姻愚弟”就表达了世交、姻亲和齿序等多重因素。

五，亲笔与代笔。近人尺牍中应酬信函多为他人代笔，如新年、端午、中秋三节时官员贺节。或同僚升职祝贺时，信函中通常有不少客套话，形式较为固定，此类信多非亲笔所写，而由幕僚或计室抄拟。涉及重要机密的事才是亲笔信函。

密信，通常是亲笔所写，往往没有寄信人和收信人信息，文内写有“付丙”（五行中“丙”即火）或者“付祝”（祝融氏，

即火神），意思是接到信读后须将信件“烧掉”；写有“名心”、“两浑”，则表示彼此匿名，也是密信。

六，副启，正函后另页补写别的内容，常使用“敬再启者”、“再密稟者”等用语。副启的功能较多，或是内容重要，需要另起篇幅表示强调；或是涉及推举人才、引荐职位及其他琐屑内容，不宜放入正函中；或是信已经写完，未能及时发出，又临时加补了新内容。等等。

荣禄写给庆王奕劻的信，用笺考究，是荣禄的自用笺纸，印有太湖石图案“绉云移”笺；正文多处抬格，表示尊敬；称庆王“辅廷仁兄贤王”，“辅廷”即奕劻的字，三重关系叠加，与亲王称兄道弟，说明二人交情匪浅。信的主体内容为对庆王的问候，并落款“愚弟荣禄顿首”。此后荣禄加上了一则副启，特将家奴禀告的私事单独叙说，以表对庆王的感谢，也表明家事琐屑，不便放入正函，以示对庆王的尊重。

七，信封。在近代邮局兴起前，官员书信投递途径，包括外官托折差带信进京、托私人转带等。天津至上海的轮船路线开设后，京官信件多带至上海再分散至苏州、无锡、杭州等地。民间还有一些民信局，而钱庄因专人护送钱票，附带有捎带信函的业务。京城内的书信主要依靠仆人传递。传递情况多种多样，信封亦形态各异。

讲座第三部分，马忠文老师结合具体的书信图片，重点分析和讲解了近人日常尺牍的基本书写习惯。在那桐与鼎丞的信中，称谓语中“鼎丞”是对方的字号，“方

伯大人”是对布政使一职的敬称；“弟”抬两格，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庙堂”抬三格，表个人与朝廷相比为卑的礼制规范。

信中那桐谈及自己的母亲“家慈”时，则使用空抬方式，表对长辈的尊敬。这封信还使用了副启“敬再启者”，落款为“名心叩”，表明这是一封密信，其内容不愿为人所知。这封信典型体现了近人书信的多种习俗。

写给上级或长辈的书信，必须字迹工整，充满敬意。如吴大澂写给军机大臣阎敬铭的书信。

1899年春夏之际武卫军统帅荣禄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亲笔信则有特殊背景。当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挑衅不断，意大利又要求强租江门湾，清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为开战作准备，派遣袁世凯率领新建陆军以镇压土匪之名开行山东。这封信反映了荣禄对袁世凯的鼓励和信任，信中叙事亲切，信末“太夫人前叱名请安”一句，虽是书信中的常见客套话，也表明荣禄主动自降身份，显示出与袁世凯之间的私交和笼络之意。

清末实业家张謇的这封信中，上款写“陶帅大公祖大人钧鉴”，“陶帅大公祖大人”就是端方，“帅”显示其统领两江总督的身份，“大公祖”意指父母官，因端方任职两江总督，张謇籍贯南通，故有如此称呼。提称语“钧鉴”只有官员身份的人可以用。落款“治侍张謇”，表明自己是于陶帅治下之民，“侍”一般士指向翰林院的晚辈向前辈的称呼，这里用来表达对端方的尊敬。

讲座的第四部分，主要对名刺、投刺与借片一类习惯作了介绍。京官生活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相互拜会。“拜帖”的“帖”也叫名刺、名帖。一般由木版印刷制成，背面右下角记录有自己的家庭住址。通常拜客都备有名刺，来华外国人也入乡随俗，印有自己的名帖。

近人有一种习惯：用拜帖作为便笺来用，拜帖上写了书信内容，由仆人递送。用自己的名刺做便笺，写完内容，只需在名字下添“顿首”二字即可；使用别人的名刺做便笺，称作“借片”，需要做简单处理，或在原名帖名字右上角注一“借”或“升”字，或将原名旁边画小圈，通过这样的办法，将名帖的原本功能消除，转为笺纸来用。

讲座的第五部分“日常生活与艺术创造：尺牍审美的差异”一节中，马忠文老师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尺牍是否有艺术审美的意义，其实差异性很大。首先，家书类书信，通常不具备艺术意涵，因为当时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至于时下视为珍贵的艺术品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重视。

其次是文人尺牍，尤以翰林出身的士人之间的交往书信，有明确的艺术创作的动机，起笔用墨都有心思在其中，充满了艺术审美的意味。

还有诗笺。诗笺是文人墨客的艺术创造，往往使用最好的信笺，题以诗词，有时还要钤盖印章，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属于纯粹的艺术品。一些儒雅之士往往自制笺纸。

讲座的第六部分，马忠文老师介绍了与以往尺牍书写的训练以及常见书目以飨听众。清代蒙童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尺牍书写一直很受重视，清末最有名的尺牍选本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都是教人如何书写各类实用书信的参考书。民国时期谭正璧的《文言尺牍入门》也很有代表性，最近出版的《谦辞敬辞婉词词典》《常用数书信用语辞典》等亦可参读借鉴，

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就“传统书信写作习惯的保留与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史料筛选的原则和技巧”及“书信行文风格对思考方式的影响”等话题向马忠文老师提问，马忠文老师一一作出解答。

(撰稿：穆晨哲楠)

212

史阳 | 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和巫术治疗

2021年6月1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1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和巫术治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主讲，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金勇评议。本次讲座是“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首先，史阳老师聚焦于东方史诗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提出

了本场讲座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新冠疫情等当下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了现代医疗技术和人类生命的健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民间口头文学文本也承载着治疗疾病的社会功能，菲律宾“阿拉安芒扬人”(Alangan-Mangyan)的史诗就是一例，对它的研究和解读能够帮助我们从“史诗文明遗产”的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治疗疾病的功用，也能够帮助我们从个案角度观察民族地方性知识如何借助史诗吟唱与巫术治疗的关系而得以留存。

讲座的第一部分，史阳老师介绍了菲律宾史诗整体情况和菲律宾阿拉安人史诗活形态特征、治疗功能。菲律宾人口超过一亿、已出版的史诗已经达到一百多部，这些史诗最早多是由世界各国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发现的。在翻译和研究史诗的过程中，各国研究者也尝试为其分类，这些类别总体上离不开三种，即战争史诗、浪漫史诗和迁徙史诗。在核心内容上，菲律宾史诗讲述了具有超自然天赋的英雄经历冒险和考验时的英勇无畏，史诗中征战归来的英雄受到人们无限敬仰的同时也成为地方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在整体特征上，菲律宾史诗承载了较突出的活态样貌，史阳老师于2004-2013年在菲律宾土著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资料显示，除却已出版的史诗文本以外，更多活形态的史诗以口耳相



史阳《菲律宾民间文学》书影

传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传唱着，具有鲜明的活形态特征。本次讲座涉及的就是其中重要一例——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

随后，史阳老师结合地形图和田野调查采集的影像资料介绍了菲律宾阿拉安人的生活文化。菲律宾阿拉安人是有语言无文字的非菲律宾原住民族，世代生活在菲律宾民都洛岛最高峰哈尔空山（Halcon）周围广袤的热带丛林山地上，人口约一万。阿拉安人主要从事以刀耕火种、土地轮耕为形式的游耕农业。富有流动性的村社是他们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由干栏式建筑，即茅草、藤条、竹、木建成的“高脚屋”组成。他们神灵信仰体系、宇宙观以善灵、恶灵的“二元对立”为核心，见诸于洪水神话、始祖传说、英雄史诗等口头文学的讲述中，同时，这样的观念也借助人生仪式、生产仪式的实践得以传播和传承，以求保佑人生安全健康、促进生产经济发展、保佑村社度过危机。

为进一步帮助大家理解史诗的功能，史阳老师借助“功能学派”的理论解释了作为文学基础功能的“治疗”在阿拉安人史诗这一文类中的内涵和外延。“功能”作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特定术语，指的是各种文化事项在人类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用途，比如各个民族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就有调适和宽慰人们日常生活苦闷的心境，缓解人们遭遇挫折境遇时的忧愁心理这一功能。他认为，广义的“治疗”在阿拉安人史诗的演述语境中的功能近似于“禳灾去祸”，它不同于现代医学中狭义“治疗”的意义，是借助史诗吟唱、巫术仪式，试图排解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和危机，以求改

变事物不利的状态和人的各种遭遇。这具体表现在阿拉安人往往把身体疾病和灾祸起因都归因于恶灵作祟上。于是，在用于治疗阿拉安人史诗中，治疗的核心思想就是利用善灵的力量打败作祟的恶灵，从而让人祛病康复、让社区免受灾祸侵扰。具有与此类似功能意义的史诗还有菲律宾伊富高人史诗《呼德呼德》，该史诗借助吟唱祈求促进水稻生长和增产。

讲座的第二部分，史阳老师详细阐释了讲述善灵治病起源的阿拉安人史诗个案《伦皮恩传奇》的具体情节。这是一则叙述兄弟三人历经冒险和内讧、走向婚礼的浪漫史诗，它不仅与阿拉安人超自然巫术治疗有着密切联系，还持续在阿拉安人社会生活中以活态形式传唱至今，发挥着治疗疾病的作用。史诗的第一部分围绕三兄弟的冒险展开，讲述了大洪水后幸存的同胞兄妹生育了三子，大哥瑞姆瑞文（Remuryuwen）、二弟伦皮恩（Lumpen）、小弟里卡乔斯（Likadyos）。父母亲去世后，三兄弟得到遗产——瑞姆瑞文分到一把刀，伦皮恩分到一个手鐲和一块红布毯，里卡乔斯分到一块方巾。随后他们便在这些宝物的帮助下开始了冒险的旅程，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三位美貌的女子。其中，二哥伦皮恩通过与巨蛇的搏斗解救了第三位女子巴音布拉扬（Paimbrayan）的家人，又与巴音布拉扬的求偶者罗克罗克登（Loklokoden）比拼种田获得胜利，最终赢得了巴音布拉扬父母的青睐，成功获取了巴音布拉扬的欢欣并定了终身。

史诗的这一部分讲述与更多的史诗有

较大共性，讲述了英雄在宝物的帮助下解决难题，最终获得婚姻。史诗后半部分则围绕三兄弟的感情纠葛展开，已定终身的伦皮恩在此时又看中了巴音布拉扬的表妹比努卡三（Binukasan），这位表妹正好同他的三弟里卡乔斯定了终身，但隐瞒已婚事实的伦皮恩又企图在大哥拒绝小弟成婚的时候迷惑了比努卡三，抛弃巴音布拉扬的同时，试图再与比努卡三结婚。于是史诗展开了一番兄弟之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的叙述。最终，伦皮恩败露，比努卡三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伦皮恩回归巴音布拉扬身边，也向众人道歉，最终三兄弟化干戈为玉帛，准备举办婚礼。史诗的尾声是众人盛大婚礼的讲述。婚礼开始前，比努卡三就和巴音布拉扬一起飞到了母亲一方最年长的叔伯、姑娘的家里，那里是大地的中心（Kaguaraandiyá），在最高的山巅上，就是创世神话中的卡迪布里用泉（Katiblyon）。这些叔伯就是“巴德巴丹之灵”（山上的人）一即各种善灵的祖先，他们负责掌管各种自然资源。他们准备了野水牛、野猪、鹿等作为礼物运到了巴克拉用，人们都聚集一起参加盛大庆典。婚礼上，比努卡三和最年长的叔伯一起敲响了一个大钟，普天之下都能听得到。这时候出现了一位仙女，头戴着项圈。比努卡三和最年长的叔伯对仙女说：“这个婚礼上所有的人，如果其中有人生病了，就呼唤你，你从此来负责给人们治病。”

借助对史诗的具体情节和核心内容的梳理，史阳老师在讲座的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了阿拉安人在史诗《伦皮恩传奇》中呈现出的巫术治疗原理。首先，各类创世

神话、始祖传说、史诗开篇的洪水叙事都以建构史诗演唱、仪式举行的合法性为根本，详细说明了阿拉安人二元对立的宇宙观。他们认为，除创世神灵以外，“天上世界”和“地下世界”是对立的，天地世界由交叉路口布鲁旦（Bulután）连接，而人类则生活在两者之间的人间大地上。属于天上的善灵与来自地下的恶灵之间一旦展开斗争和对抗，就会导致人间发生各种不幸、灾祸和疾病。作为媒介的巫医“巴拉欧南（balaonan）”就有沟通人类世界与神灵世界、呼唤至高神灵、驱逐恶灵、求助善灵帮助人类度过灾难等重要任务。往往，巫医要赶在恶灵（麻冒）摄取人类灵魂阿比延（abiyan）到地下去之前将其抢回来，他会呼唤自己掌握的善灵卡姆鲁安阻拦恶灵麻冒前往洞口的路，逼迫麻冒交出人类灵魂阿比延。这个核心技能阿格巴拉欧（agbalaon）所呼唤的善灵卡姆鲁安也有“专科”式分类和各异的身份属性，具体表现在善灵的不同名字上，比如有的善灵叫“来自某山的女子”、有的则叫“来自某片森林的女子”等，这些内容也在史诗的具体篇目中有所体现。

史阳老师列举了田野调查时搜集整理的访谈实录，以印证具体实践中巫医呼唤善灵的技能在内容、方法、疗效等方面的区别。比如大多数巫医因为恶灵和善灵昼伏夜出的习惯而选择在晚上劳动结束、夜深人静、家人得以聚集后吟唱史诗，同时，巫医呼唤善灵的难度越大，史诗吟唱时间就越长。有时，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吟唱婉转悠长，巫医也因此筋疲力尽。而用于呼唤善灵的演述内容又是包含着更加广阔的



阿拉安人世代生活在菲律宾民都洛岛

民间文学素材，有的是富有逻辑的叙事情节、有的则是阿拉安人民间故事和传说的集合，这些内容多以夸奖善灵、赞颂其神迹为核心。当地人在访谈中表示，最直接的召唤善灵方式就是重复呼唤善灵的名字，但是其中加入的丰富叙事情节会使单纯的呼唤更加生动有趣，提高善灵的响应度，于是治疗疾病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史诗的具体内容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在史诗《伦皮恩传奇》中的英雄们就是最有效力的善灵之一，巫医在祈祷的一开始，要直接指名道姓地呼唤本次祈祷中所需要的善灵，唱的内容可以随便选，关键在于提及故事里的名字，使他们前来治疗。当唱到两三个小时，巫医会在精疲力竭的同时眼前一亮（善灵卡姆鲁安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散发着明亮的光芒，只有巫医可以看到），这就意味着善灵已经降临到巫医身边，

巫医马上就打住，转而向善灵汇报这次呼唤的缘由和治疗的患者、病情、病因等信息，并请求善灵赶走加害人的恶灵。

史阳老师结合田野调查的一则具体案例，在讲座的最后分享了阿拉安人班素拉仪式与史诗治愈功能的互动关系。他讲道，在一次他所调查的史诗演述活动中，巫医哲玛有了不好的梦兆，她听到一个梦兆说：如果不举行班素拉，就过不了五月。”于是当地人便举行了“加强的”班素拉仪式以根除灾祸，使得史诗的讲述达到圆满。他们认为史诗《伦皮恩传奇》在具体演述中必须是有头有尾的，否则被治愈的人和其他听众都会有生命危险，故事中断了，人的生命也会“中断”。

最后，史阳老师为本次讲座做了总结。他认为，个案涉及的菲律宾阿拉安人史诗《伦皮恩传奇》通过讲述英雄兄弟历险的

故事，在情节中处处解说着人类第一次巫术治疗的发端，直接说明了英雄成为善灵的过程和善灵们从此开始负责治疗人类疾病的起源故事。这部史诗为阿拉安人巫术治疗提供了一套可以追溯、强有力、近乎终极的合理解释，使得阿拉安人各种治疗仪式具备了明确的历史权威和合法性，于是阿拉安人巫术治疗就有了可以回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根据这个个案，我们可以发现，以口头传统（神话、史诗等）为依据，原住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灵信仰，这套精神信仰既为现实世界解释了原因，又为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进而为地方社区文化提供了神圣的权威和历史的溯源。

评议环节，赵丙祥老师结合社会学理论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的学术史，重点评议了史阳老师这则个案给我们带来的研究范式上的启示。他认为，菲律宾阿拉安人这则情节完整的活态史诗借助文本的结构和形态讲述了当地仪式、疾病治疗的地方性知识和具体实践准则，其活态的传承形式也传递了人们对“混乱”归为“整一”和“秩序”的诉求。史诗对英雄们事迹的讲述和史诗中涉及文化起源的内容均体现着这个口头文学形式对仪式、疗疾等具体生活实践的合法性规范作用，它不仅在某程度上以强制的、有理有据的方式宣告着正常秩序的必要性，更为后续的仪式、生产、生活、家庭关系、社群制度等方面带来操作规范，以口头文学的历代传承维护着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同时，史阳老师研究这则史诗所运用的社会学、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田野调查实践与一手资料

等都为我们研究史诗在特定地方的特定功能带来启发和反思，具有借鉴意义和提升空间。

金勇老师结合东南亚民间文学和泰国民间文学的典例为讲座的评议和讨论补充了更多的参考案例。他认为，东南亚各国史诗活态遗产丰富，开发空间巨大，当往往人们看到的都是流于书面记载的文献资料，是“鱼的标本”，真正来自民间的“活在水中的鱼”才能给我们更多实践意义和地方性知识上的启发。史阳老师的菲律宾史诗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非常好的提供了活态史诗的研究个案，这则个案涉及到广义上的史诗治疗功能及其在当地社群里的运用和实践，这些是以往书面史诗研究中无法观察到的，必须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呈现。同时，金勇老师结合教学实践和泰国民间文学研究经验，举出了泰国《昆昆平》史诗研究学术史个案，进一步说明了活态史诗遗产的发现给泰国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带来的具体语境上的帮助。他认为，如果当下我们对史诗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文本内容的解读和分析上，就很难进入到史诗所诞生的具体语境和地方性知识谱系里，进而也就更难触及到史诗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撰稿：乌哈娜）



213

任万平 | 龙凤呈祥——清代皇帝大婚典礼



任万平研究馆员

随后，任万平老师开始引言部分的讲述。她首先指出，中国传统礼制有“五礼”之分，分别为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帝王大婚则与登极一同位列嘉礼。在清代的十个皇帝之中，真正在紫禁城举行婚礼的是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其中，顺治帝在废后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大婚，情况比较特殊。此外，康熙帝共有四位皇后，但真正举行大婚的只有第一位孝纯仁皇后赫舍里氏。在总体程序上，中国古代传统的婚礼仪式可以分为婚前礼、成婚礼、婚后礼三个部分，清代皇帝的大婚既承袭传统，又有其特殊性。接下来，任万平老师按照婚前礼、成婚礼、婚后礼的典礼行进顺序依次讲述。

清帝大婚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婚前礼之前的选秀女制度。先进行初选，入选者由户部记名，未被选中的称“摺牌子”。“牌子”即选秀女头签，上书出身、年龄、身体状况等基本信息。落选者可以在正常年龄婚配，被户部记名的秀女则需要皇帝到达成婚年龄时参加复选，其中一位便在此时被选定为皇后。根据故宫所藏的《光绪皇帝大婚图册》，可以看到复选指立的准皇后乘坐一架八人抬轿的礼舆从神武门出宫回府，礼官手抬如意走在队伍最前。回到娘家后，已经拥有国母身份的准皇后需要接受父母跪拜，然后等待接下来的一系列大婚仪式——这是大婚典礼的前奏。

2021年6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13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龙凤呈祥——清代皇帝大婚典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任万平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主持。本场讲座为“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马忠文老师谈到，婚礼既是民间的喜庆嘉礼，也是宫廷的盛大典礼。清代皇帝的大婚既延续了中国传统婚礼的一些习惯、礼节，又与民间婚礼有所区别；同时，清朝皇帝是满洲入关的统治者，其婚礼除了吸收汉族文化，可能还保留了满族固有的特点。

此后，婚前礼才正式开始。任万平老师指出，民间一般讲的婚前六礼，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者，而清帝大婚的婚前礼则包括纳采、大征、册立、奉迎四项程序。对此，她解释道，清代皇家通过前期的选秀女制度，已经明确了女子的身份、年龄、身体状况等基本信息，故而问名和纳吉两项程序可以缩减；但为了强调与传统仪式的一脉相承性，大婚依然在形式上保留了纳采礼以及与民间纳征相对应的“大征”。此外，皇家大婚也没有用于商定婚期的“请期”，并以“奉迎”代替民间由新郎亲自迎娶新娘的“亲迎”，即由使节奉皇帝之命先行册立，再将皇后迎入皇宫。除此之外，不像汉族纳采通常要用大雁或鹅，也不像汉族皇帝以谷圭聘女，满族聘女主要使用如意。在大婚仪式中，如意可以寄托一切的吉祥祝福，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婚前礼的第一道程序是纳采礼。皇帝命大学士在太和殿前为纳采使授节，纳采使至皇后府邸，向皇后之父选读纳采制文，皇后之父跪听，其后便在府邸举行纳采宴，包括饽饽宴与酒席宴两道程序。在纳采宴中，后父居宾席，后母虽然不能与宴，但也会被赏赐宴品。纳采宴结束后，所有与宴大臣还要面朝皇宫望阙谢恩。接下来是大征礼。内务府为皇后备办黄金、白银、金茶筒、银茶筒、银盆、缎子、文马、闲马、驮甲等礼物，用龙亭盛装，陈设于太和殿丹陛上；又有给皇后父母、弟弟、从人的赐物，分别用彩亭盛装。事实上，从一品官到军民人等的彩礼数额在当时都有完善的法律建设与制度规定，不能

随意逾越。与纳采一样，大征也是对古礼形式上的模拟，这些赐物被抬至皇后府邸后，又在进妆奁时被抬回皇宫。在正式迎娶前两天，皇后的妆奁被从东华门抬入皇宫，还是以如意打头阵，随后是各种女工工具与材料（包括针黹、各色“尺头”“福履”等），象征皇后以勤劳的品质垂范天下，此外还有钟表与各类家具、陈设。妆奁以“抬”为一个单位进行计数，据档案记载，同治皇后有嫁妆六百抬，光绪皇后有嫁妆两百抬。

迎娶皇后的当日，皇帝先在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然后移步太和殿，亲自任命册立使和奉迎使，这一仪式比此前大学士任命纳采使更为庄重，卤簿仪仗齐备，并有朝臣行礼磕头。随后，奉迎皇后的凤舆从太和门启行，沿着京城的中轴线，从大清门至皇后府邸举行册立与奉迎礼。使者宣读册立皇后的制书，皇后之父跪听。从档案保存的同治、光绪时期的两份册立制文来看，这种册文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一方面赞美皇后的品德修养，一方面又对其提出恪尽职责、孝敬长辈、绵延后嗣、祭祀祖宗的要求。任万平老师提到，皇后之册文为金册，其他妃子则使用铜镀金、绢等其他材质的册文。授予皇后金册的同时，还给予金质的“皇后之宝”——金册与金印宣告皇后身份的成立。此后，皇后便要被正式迎入皇宫。

清朝仿照子夜迎娶的古礼，皇后于子时从娘家启程，按照朝阳门内方家园胡同-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中左门-后左门-乾清门的路线进宫。在此过程中，皇后也和民间女子一样，头戴红盖头，但要

用龙凤同和纹来装饰,身穿龙凤同和纹锦袍,手中还持有如意、苹果;由于皇帝并不亲迎,凤舆中还摆放着御笔的“龙”字轴,来充作皇帝的化身。在迎亲队伍最前头的是象征皇后身份的金宝与金册,册、宝先行至乾清门广场,然后被恭捧入交泰殿,奉迎的队伍便就此止步,改由太监将凤舆继续抬至乾清宫前。皇后在乾清宫前下轿,接过象征聚宝盆的金宝瓶,并跨过火盆以驱邪。此后,皇后去往未来将要居住的宫殿暂时歇息,或为储秀宫,或为钟粹宫,待当日晚上再到坤宁宫中举行成婚礼。

成婚礼又称婚成礼,在民间包括坐帐、拜堂、合卺几步程序,帝后在坤宁宫举行的成婚礼与之类似,但在坐帐前还有跨火盆与跨马鞍的礼俗,象征辟邪与平安。成婚礼以合卺礼最为关键。此时,帝、后同穿吉服,如同“情侣装”,象征两人身份同等尊贵;皇后戴凤钿、领约、朝珠,皇

帝戴吉服冠,两人在龙凤喜床前席地而坐,举行合卺宴。食物摆在龙凤同和纹样的合卺桌上,有猪乌叉、羊乌叉、子孙饽饽(乌叉是满语,意为尾骨;子孙饽饽即饺子)、以燕窝打底的各色拼盘等等。现存的许多文物,如龙凤同和纹碗、金龙凤双喜酒壶、吉祥如意款百子婴戏图大果盘、金喜字棉被、龙凤同和纹枕等等,显然都是专门为了大婚而制作的。皇家不像民间那样还要拜堂,帝、后共用合卺宴,就表明他们真正成婚了。

合卺礼之后,大婚便进入婚后礼的阶段。民间的婚后礼由庙见礼、拜舅姑礼和归宁礼组成。庙见礼即新郎带着新娘到家中祭拜祖先,人们认为只有拜过祖先,获得祖先的认可,这门亲事才算真正成立;拜舅姑礼即新妇拜见公婆;归宁礼即新妇在若干天后回门看望父母,表示与娘家的亲情纽带依然存在。在皇帝大婚中,也有

庙见礼,拜舅姑礼对应拜见皇太后的朝拜礼;此外,由于家国一体,皇家还要颁诏以晓谕天下,故又有颁诏礼,以及答谢皇后娘家的庆贺筵宴礼。首先,帝后于合卺后的第二天,在坤宁宫外间向天地神与喜神的牌位磕头,而后去往景山北麓的寿皇殿拜见祖先,此为庙见礼。任万平老师指出,庙见礼之所以选择在寿皇殿而不是太庙举行,是因为那里供奉有祖先的画像,帝后可以对着祖先的容貌行礼,从而拉近与祖先的距离。帝后穿吉服出宫,祭拜祖先时则需要换成祭服,故当时人在寿皇殿前临时搭建彩棚,以供帝后换装之用。

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中提到的民间婚后拜舅姑,就相当于皇帝婚后礼中的朝见皇太后环节。任万平老师指出,根据《礼记·昏义》记载,拜舅姑要进献枣、栗与殿脩,而满族则依然是进献吉祥之物如意来代替传统上各种具象的实物。此外,民间新妇入门第三天,按礼俗要下厨飧馈公婆。与民间相比,宫廷婚后礼的另一明显差异就是皇后无须亲自下厨作羹汤,相关事务由内务府等宫中的服务机构代劳。任万平老师还提示我们注意,帝后朝见皇太后,不再身着吉服,而是需要换上体现明显尊卑等级的朝服。皇后身着由朝褂、朝袍、朝裙三层组成的朝服,戴冬朝冠;挂三挂朝珠,中间一挂东珠朝珠,两边各一挂珊瑚朝珠。

其后,大婚进入最后一道程序——庆贺礼。皇帝着朝服,戴冬朝冠,于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受贺结束后在当时的皇城南门——天安门颁诏。所颁诏书除

了宣告皇后身份,并对其大加赞美之外,还会同时颁布多项恩赐措施,如对王公大臣的妻室进行赏赐、八旗绿营兵丁得赏钱粮、科举考试加试恩科等等,以示雨露均沾。诏书分别用满语、汉语宣读完毕后,就被礼部官员接过,置于龙盘,事后拿到礼部刊刻、刷印,分发到全国各地,以使妇孺皆知。颁诏结束后还要在太和殿举行筵宴,由皇帝宴请皇后家族中的男性成员,王公大臣陪宴,并一律实行小桌制。与宴人员的位置根据其身份的高低,依次被安排在太和殿内、太和殿屋檐下、太和殿丹陛上、太和殿丹陛下。

任万平老师还特别指出,所谓的“满汉全席”实际上并不存在——清代筵席分满席和汉席两种,皇宫内举行的宴会全是满席。满席分为六等,前三等都用于祭祀,第四等才是活人享用的最高等级宴会,大婚、过年、皇帝生日等重大节庆时举行的太和殿筵宴都是四等满席。因此,这种筵宴遵循统一的规格,饽饽、干果、鲜果皆有明确的定额,品类则根据季节有所变动。然而,这种筵宴很大程度上也是象征性的,与宴人员并不能真正大快朵颐。筵宴上还伴有庆隆舞的表演,通过回忆满族先人开疆拓土的历史功业,来教化、警示与宴的统治阶层,不要忘记祖先创业的艰辛。至此,清代皇帝的大婚仪式基本完毕。任万平老师最后谈到,民间的“闹洞房”习俗和归宁礼均被皇家取消,仅有会亲制度允许后妃的亲生父母每年进宫看望女儿一次——后妃入宫后,与娘家的亲情纽带基本被割断,此为皇家婚礼的无情之处。

(撰稿:徐铖)



《光绪皇帝大婚图册·复选指立的准皇后回府》

214

白玉冬 | 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研究与展望



白玉冬研究员

2021年6月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1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研究与展望”。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主持。本场讲座为“敦煌学”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付马老师简要介绍白玉冬老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民族史，尤其是鲁尼文、回鹘文文献所展示的操突厥语族群的民族的历史，并向听众们介绍了白老师的求学执教经历与擅长阅读的语言。白玉冬老师则讲述了自己参与的研究项目与调查，梳理了近年重点考察地域，提到曾经参与回鹘语文献题记的研读，撰写文章《呼和浩特白塔回鹘语题记铭文》《吐

鲁番雅尔湖石窟第五窟鲁尼文题记释读与研究》，并曾参与到松井太、荒川慎太郎主编的《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与森安孝夫编《从粟特到回鹘》等工作中。

随后，白玉冬老师对“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这一研究对象做出介绍，提及以敦煌、吐鲁番、北庭、呼和浩特等地的石窟与寺庙为核心，西北地区留存有一批五代宋元时期的多语种多文种题记。这些题记，按性质可分类为傍题与漫题两大类。傍题用于特定与石窟营造和重修有关的当地的政治上层人物或权力统治者的供养人像，而漫题是来自不同地域的拜访石窟或寺庙的佛教巡礼者，为纪念自身巡礼而所留。这两种题记均反映出历史上支持过石窟与寺庙的政治权力构造以及佛教徒等的信仰实态等，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的回鹘语题记，数量上仅次于汉文，所使用的文字包括鲁尼文、回鹘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等。

白玉冬老师详细梳理了河西走廊、新疆、内蒙古与叶尼塞四个区域的既往研究史。在河西走廊区域，白老师提到，伯希和（P. Pelliot）、哈密顿（J. Hamilton）、牛汝极、杨富学、爱依达尔、森安孝夫、松井太等学者均曾做过研究。具体而言，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和对于敦煌石窟的相关记录较为详实，在编号上与敦煌研究院编号有所不同，并存在蒙古文与回鹘文混淆的现象。杨富学、牛汝极

写著文章《安西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1991年），提及榆林窟现存有190余条回鹘文题记，给出了转写、译文与词注，从书法特点考述该题记为早期无疑，活用于“沙州回鹘”问题，表明沙州回鹘的斤达干前往榆林窟拜佛。而哈密顿、牛汝极的论文《榆林佛教洞窟的回鹘语题记》（1998年），对杨富学、牛汝极1991年关于第25窟题记的释读进行了补正，共20条，包含换写、转写、词注、图版、词汇索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题记研读的范本。哈密顿、牛汝极、杨富学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释读中含有中国古代“建除满”历法体系的回鹘语译音。在爱依达尔、杨富学的文章《莫高窟464窟回鹘文题记》（2012年）中，通过逐字对译，著者认为莫高窟464窟中的三段题记文字皆来自胜光法师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4卷——这一发现证明第464窟为元代回鹘窟。

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阅读有关榆林窟诸洞窟的调查记录时认为，榆林窟第39窟属于沙州回鹘，记录到洞窟前室甬道南北壁的回鹘男性、女性供养人像；其中，北壁供养人群像上段顶端紧挨比丘尼像的女性供养人像，可认为是世俗人物中占据最高地位的重要人物。而松井太、森安孝夫、茨默等人所释读的第25窟题记，或可作为通晓回鹘语、藏语的佛教徒在榆林窟、河西、东部天山地区巡礼的鲜活例证。莫高窟第148窟、第409窟均曾出现回鹘供养人形象与回鹘文傍题。而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撰的《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是目前最为权威的、值得利用的史料，其中松井太译注共283条，包括一部分蒙古语题记。书中给出题记的物理形态、转写、译文、

词注，每一条都有研究史的归纳，对于研究沙州回鹘问题、佛教徒的巡礼、回鹘佛教文献拓展延伸以及与其他语言宗教之间的对比与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论及新疆，白玉冬老师亦系统梳理了相关的学者研究，包含拉德洛夫（W. Radloff）、冯家昇、爱尔达尔（M. Erdal）、茨默（P.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吐送江·依明、李刚、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李肖、拉德洛夫、成吉思（A. Cengiz）、张铁山、威尔金斯（J. Wilkens）、拉施曼（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等。其中，森安孝夫曾研究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38、35窟等洞窟的题记，这些题记有的记录支持佛教的回鹘统治阶层之称号，有的反映书写者的摩尼教、景教、佛教信仰背景，有的是祈愿文。2010至2011年吐峪沟石窟新发现回鹘文题记，吐送江·依明和李刚两位学者曾对这些新出的题记进行解读，分别释读其中的43条和12条回鹘文题记，给出了换写、转写、译文与简单必要的词注；李刚老师根据文字



榆林窟五代第39窟回鹘供养人像

书写特点，推定这些题记的年代为元代。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和李肖两位学者对前人研究进行了归纳与介绍，题记有别于吐送江和李刚研究的题记，较为零碎，出现了蒙古语借词，大部分属于元代。

对于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的鲁尼文题记，拉德洛夫、张铁山、李刚等学者曾进行释读，对于其中鲁尼文“从右向左”还是“从左向右”释读的问题，白玉冬老师在讲座中给出了简要说明，并通过自身研究对六条题记进行解读，得出初步的结论。在他看来，这些题记文字可以视作回鹘属下的čik（鞑）人所为，并反映相关题记的作者具有摩尼教或景教或佛教信仰背景，部分印记与回鹘药罗葛家族印记主体部分相合，而雅尔湖石窟第5窟与西州回鹘关系更为密切。随后，围绕着北庭西大寺回鹘文题记，白玉冬老师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脉络，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到梅村坦于1994年解读题记并以此讨论回鹘王统世系，再至茨默2014年对前两人释读进行了改进并对回鹘王统世系进行了复原。而对于库木吐拉石窟79窟的汉、回鹘、龟兹三语傍题，白玉冬老师也结合荻原裕敏、庆昭蓉的既往研究成果，给出了解读与分析。

在内蒙古区域，白玉冬老师重点提及呼和浩特白塔（万部华严经塔）的多语种题记，在梳理主要研究的基础上，他着重提及其中的21条回鹘文题记。这些题记大多属于蒙元时期，其中一部分为草书体回鹘文，一部分书写工整，近似半楷书体。而围绕着叶尼塞区域，白玉冬老师简要介绍了自己所作的研究，提及有关的岩刻文与碑铭。在梳理研究史的同时，白老

师也详细说明了年代推断的要点。以鲁尼文为例，他指出，突厥碑文体棱角分明，而摩尼教字体有弧度。究其转变，伴随着回鹘人文化上的需求，其书写与使用的字体也相应发生变化。而对于回鹘文，若从字体上进行年代推断，楷字体（又称写经体）不好判断年代，相对不工整的半楷字体年代约为10至12世纪，常见于摩尼教文献与佛教文献，而草书体年代较晚（约在13至14世纪），主要出现在契约文书中。白老师同样分析了回鹘文字母词头与词尾字母的变化特点，为年代推断提供辅助性证据。

谈及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作为史料的价值，白玉冬老师认为，有关题记的释读与研究有助于描绘回鹘人佛教徒的巡礼路线和五台山信仰的历史，探究11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沙州回鹘”的真实由来，则展现了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在丝绸之路沿线融合的实景，有助于挖掘汉藏佛教在西北地区流传交融的真相。而这些题记的历史语言学价值，有待深入挖掘。付马老师在总结白玉冬老师讲座内容的同时，强调即便对于释读过许多次的题记，使用这些史料时，仍需保持疑心与学术上的判断力。提问讨论环节，白玉冬老师、付马老师回应听众提出的问题，围绕着敦煌何以与中原联系起来、“沙州回鹘”题记细部、题记反映出的宗教间的接收交融以及回鹘突厥语学习研究等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撰稿：章涵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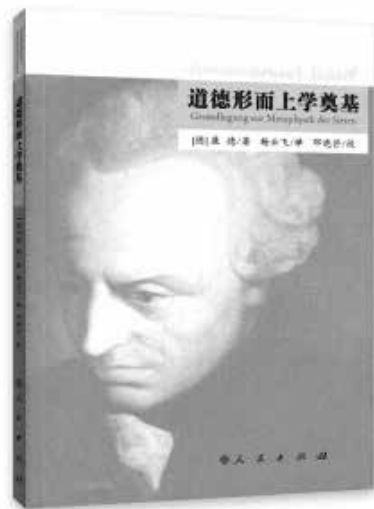
215

霍华德·威廉姆斯 | 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殖民主义

2021年6月2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15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殖民主义”。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荣誉杰出教授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方博评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威廉姆斯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基本背景。现今存在许多关于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殖民主义问题的争论，一些激进的学者将康德早期对种族差异问题的关心视为其哲学的缺陷，认为他的哲学与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出现的大背景相契合，甚至助长了种族主义，无视了欧洲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威廉姆斯教授曾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中与这一观点进行了商榷，他认为康德的理论在殖民和种族问题方面其实具有积极的价值。然而，此后由于美国的种族问题，康德所遭受的批评却仍然日益增多。威廉姆斯教授认为，尽管康德最初与18世纪其他哲学家一样，也多少持有一些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但后来他的思想的确逐渐发生了转向。

根据康德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Towards Perpetual Peace*），首先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再对非西方人持有偏见，并且强烈批评了欧洲人接触世界的方式。康德在文章中提出了新的国际法框架，以及世界性的权利（cosmopolitan right）。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书影

他认为世界性的权利应该限于普遍好客（hospitality）的条件下，也就是当欧洲人在访问其他领土时，不会被视作敌人。康德已然注意到，欧洲人在外国领土上表现出了极不公正的掠夺式行径，他没有采取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是正视了欧洲大国扩张的破坏性影响。并且，在论及中国时，他称赞了中国非凡的人口及其独特的品质。因此，康德并非单一文化论者，他非常重视各国在文化接触过程中应是平等对待彼此的原则。

继而，威廉姆斯教授转入道德形而上学的部分，系统审视康德的权利学说。在1797年发表的《道德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康德提出了财



康德画像

产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他谈到，对于新发现的土地，在未经土著居民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拥有权利居住于此？康德认为，当定居地离土著居民很远时，那么定居权利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土著居民是牧民或狩猎民族，则需要让他们了解事情的原委，通过契约得到他们的同意（consent），而不能由武力解决。而且，任何声称殖民可以使土地得到开发利用，以及使世界文明化的理由，都不能作为欧洲国家掠夺生计和残害土著的正当性借口——不公正的污点是难以洗去的，现今英国看待殖民主义历史也应当正视这一问题。

这一讨论更要害的问题在于，财产权的基础在哪里？这便涉及到康德与洛克（John Lock）等人的理论的对比。17-18世纪最为流行的是洛克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每个人通过对自然物施加劳动，就获得了自然的财产权利，这并不需要获得其他人的同意。但是，康德认为，财产权必须奠基于是人们的共同假定（common assumption）——只有人与

人之间的协议和同意，才可以支撑每个人对于财产的正当权利。不过在现实中，康德认为仅凭形而上学的共同假定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构建的法律体系和惩罚制度确认财产所有权。然而，在他所处的殖民时代，并不是每一处土地上都存在公民社会，所以必须试着将公民社会的原则带到未开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困难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要求原住民对其生活准则进行调整以达到公民社会的标准。由此会发现，洛克理论在现实中运用的复杂性会小很多，这也恰恰是欧洲殖民者普遍遵循的模式。可是，如若当初殖民者以康德的财产理论处理同土著居民的关系，那么历史将会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

威廉姆斯教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与洛克对产权建立实际过程的描述既相似又有很大区别，马克思认为所有财产权最初都通过剥削建立，进而产生拥有支配力量的国家来保证财产关系的维持，个人主义的占有剥削与资本主义扩张齐头并进。该理论一方面对殖民主义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它一定会被超越，但另一方面提示资本的扩张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价值。与洛克和马克思相比，康德理论的特点在于，他认为财产权的确立必然需要社会性的共识作为公共基础，因而从规范的角度排除了暴力使用的正当性。

最后，威廉姆斯教授带我们进入康德思想的核心——“自由”的概念。在康德看来，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这是所有人唯

一的原始权利。虽然他依旧在自然法的框架下将其称为“自然权利”，但他认为这一权利并不是神授的，而是内在于作为主动的理性存在的人类自身。这在威廉姆斯教授看来是康德政治哲学一条最为关键的原则。尽管，康德指称的仅仅是当时的男性成年公民，但是我们仍然要考虑到，他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和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理论呼应了罗尔斯（John Rawls）的现代正义理论。而且他表明人们只有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真正属于同一个政治体，这对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性别的人来说原则是一贯的。只是，威廉姆斯教授指出，康德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取得同样的进展，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18世纪哲学的关键问题上，并且捍卫学者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威廉姆斯教授总结道，康德关于殖民主义的部分论述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康德实际上反对欧洲无限制的扩张，然而各种政治思想派别的人都对他的政治哲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康德学说对于渐进改良主义具有进步意义的启示是，始终将人视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这一点应该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不过，康德有关殖民主义的理论中显现出的张力，主要来自于他支持在自然阶段创造国家，但是反对在尚无国家的领土上的外部力量侵入。也就是说，尽管为了世界性的权利，需要在未开化的地方建立公民社会，但这一步并不能由本土社会之外的力量来操控。所以，踏上其他领土的欧洲人，需要自觉地遵循尚未被当地居民所认识的法例，当地居民也要在尚未认识这些准则的

情形下，允许和平的接触和交往。在他看来，承受这一张力，要比依靠所谓“进步主义的宗教”来逃避公正问题更好。因此，康德理论中的张力也正是其力量所在，他身上有启蒙运动形成的对于家长制行为的警惕和敌意，令他成为了捍卫本土权利的思想家。

评议环节，方博老师高度称赞了威廉姆斯教授对于世界康德研究的诸多贡献。威廉姆斯教授在近期著作中更多地强调了康德作为互惠论者而非自由至上主义者的面向，并且格外重视康德哲学中有关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的讨论，本次讲座可谓是其研究脉络的进一步拓展。威廉姆斯教授的研究表明，康德文本中存在的一些偏见主要是历史性和经验性的，而并非源自其基本的哲学立场，甚至其哲学原则反而构成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基础。方博老师表示十分认可威廉姆斯教授的结论，不过仍然存在两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康德的财产理论需要以公民社会作为财产权的基础，是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构成对殖民主义的合法性的辩护？因为当时北美大陆尚不存在公民社会也即意味着尚未建立财产权制度，欧洲殖民者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取得未被原住民占有的土地，进而再去建立公民社会来合法化这些经验性的占有。第二个问题在于比较康德和马克思对于殖民主义的立场。康德在其政治哲学中完全谴责殖民扩张。而马克思从辩证的立场出发，一定程度上承认欧洲人的扩张客观带来了亚洲社会的进步。但是，康德在其历史哲学中同样表明了贸易往来和商业精神，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历史的进步，甚至战争和灾难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也可以被接受为历史进步的自然机制的一部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可以被视为历史进步的自然机制的手段？康德和马克思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是相近的？

威廉姆斯教授表明第二个问题的确十分难以回应，不过他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概念主要是19世纪由马克思所界定的，因此康德讨论的经济方式其实尚未触及到“劳资关系”等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诸多内容，而且依据康德的财产理论，同样可以建立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他并不必然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我们通过回溯会发现战争与殖民等消极事件客观上带来历

史进化的效果，但是康德并不会认为通过这些消极方式来促使历史进化是合理的。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也是同样的逻辑，康德所谓财产权的公民社会基础真正要害的意义在于，首先要承认非白人的族群拥有和白人完全一样的权利，在尊重各个种族人群权利的基础上再论财产权问题。因此其实依照康德的理论，现实中殖民的过程就会是相当缓慢且温和的。讲座尾声，威廉姆斯教授逐一回应了听众提出的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处理学术史的问题、康德理论是否与欧洲中心主义相兼容、殖民合法性是否随政体而变的问题等等。

(撰稿：王思凝)

216

伊夫·夏尔·扎卡 | 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新冠疫情的政治学

2021年6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1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新冠疫情的政治学”。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主讲，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庞亮翻译。本次活动是扎卡教授受邀在文研院发表的第三场演讲。

扎卡教授首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题与背景。自2019年末至今，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打下烙印，将全部个体生命牵涉其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与反思。除新冠疫情外，近年来另一种关涉人口生命的现象也备受瞩目，那便是伊斯兰主义的恐怖主义（此处的“伊斯兰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

的“伊斯兰”，而主要指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主要侵扰了法国，但也波及了世界其他地区。二者在性质上显然具有根本的差异：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病，虽然其源头尚不明确，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飞速扩散却无法被归结为人类的蓄谋意志；而伊斯兰主义的恐怖主义则是宗教极端主义杀戮的意识形态，它促使一些个体或群体蓄意杀害那些所谓的不忠、不洁之人。但是，二者也存在着鲜明的共同点，即通过对个体或集体生命的侵袭和威胁，将天然的生命、人类生物性的生命置于政治的关注中心。

死亡虽然常常牵涉个体，但在上述情况中，却转化为了政治性的集体事件。新冠疫情的蔓延，严重冲击了国家的卫生健康系统，也宣告了“群体免疫”的失效。疫情中的逝者大多匿名，但却并不是任何公共吊唁的个别对象。与之相对，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常常侵扰那些因宗教或习俗而被判定为不忠的个别群体。然而，这种独特性并没有遮蔽集体性，反而使其更加鲜活。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可能是相同命运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这种蓄意的、无可辩解的杀戮将集体情感推向了顶峰，政治通过死亡带来的公共危害而重新介入了生命安全与健康。

在此类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民主国家需要采取紧急状态的政治举措，通过行动、处理、控制、监控等比一般法律更宽泛的手段抗击危险，尽可能确保公民的生命安全。例如在卫生的紧急状态下，法国采取了“封城”措施，关闭非必需品店铺，并极大削弱了公民自由出行的根本自由；而在安全的紧急状态下，国家被允许实施控制措施和行政逮捕，关闭那些宣扬仇恨的礼拜场所。公众



当然可以讨论这些举措是否恰当，也可以在事后为其有效性进行辩护或质疑，还可以讨论国家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的能力和合理性。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紧急状态都是经议会投票通过的，且被要求是暂时的，因此紧急状态决非是一段时期专制的决定，这与某些人的论调大相径庭。

随后，扎卡教授开始阐述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在第一部分中，扎卡教授介绍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与应对上述两种紧急状态的措施之间的差异性。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讨论自由主义特有的治理术时，提出了“生命政治”这一精辟而意味深长的概念。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始于18世纪，以对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两种方式作用于生命。在这一体制下，权力对个体的作用与影响不再依赖“生死之权”，即君主或国



霍布斯《利维坦》

家通过惩罚、战争等形式使人死亡；恰恰相反，权力开始依赖使人生存的权力，即管理、引导、调节人群的生命。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志”中写道：“无疑，这是在历史上首次生物的面向映射在了政治中……权力不仅仅与法权的主体相关，对这些主体的终极攫取便是死亡。而权力是与活生生的存在相关，它在后者身上所攫取的必须处于生命本身这一层级，也就是要对生命负责。”在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下，管控社会的主要手段从刑法转变为经济，也即通过激励、引导、刺激人群生命的方式来繁荣经济，如福柯本人所言，“政治技术要支配身体、健康以及营养与居住的方式”，那么负

责调节、纠正、引导行为的种种规范的统治便取代了法律的法权统治，权力在本质上便变成了规范化的东西。

在福柯笔下，“生命政治”是作用于人口生命的权力，连接了对人类力量的提取与经济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人的积累与资本积累的相互配合，人群增长与生产力扩大的衔接”，因此这一概念自诞生就内在地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根据福柯的定义，“生命政治”意味着脱离国家的整体法权管控，走向了相反的体制——最小国家和对政府干预的最强限制。但是当前在讨论卫生与安全方面的“生命政治”时，人们将这一术语用在了与福柯完全不同、甚

至相反的情境和意义中。因为当前应对紧急状态的种种措施，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相背离，譬如封城的措施；与资本主义的全部逻辑相背离，譬如冒着经济瓦解的风险；与最小国家的原则相背离，譬如国家主权要重新恢复和扩张它的权力。因此在当前的语境下，必须谨慎使用“生命政治”这一概念。

在第二部分中，扎卡教授着重辨析了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两者的区别。有些人之所以长期系统地混淆二者，是因为他们试图证明，民主政府出于卫生等原因采取限制性与强制性措施，是对根本自由的侵害，意在限制个体的权力，扩张政治权力实施控制的领域。这些人将紧急状态等同于例外状态，等同于违背或终止一般法的种种措施，从而将安全与自由彻底对立起来。此类论调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为代表，这些学者大多是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当代的追随者。在阿甘本看来，法国正在迈向一个权威的“例外国家”，它以反抗模糊的敌人（如伊斯兰主义的恐怖主义）为借口，将恐惧普遍化，将自由裁量权赋予行政与治安机关，并排斥作为自由保障的司法权力。他甚至认为，紧急状态及其宪法化正在将法国置于当时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相同处境上。

阿甘本等学者对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二者的混淆，源于其对安全和自由之间关系的误读。扎卡教授指出，自由与安全并不是对立的。安全并不是一种自由，但却是所有自由的条件。如果人的安全无法保障，那么便不会存在出行、礼拜、言论、教育等任何形式的自由，因此二者决非是相互替代的。当前民主国家采取的种种措施旨在建立并

维系一种平衡的关系，即安全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是它的目的；只有当安全本身成为目的时，才可能损害自由，并且破坏安全。此外，紧急状态的宪法化决非是在质疑民主，而是为了在根本法中清晰地定义紧急状态的地位和职能，规定一些基本条件，进而更好地守卫和保障自由。这些基本条件包括：紧急状态要从属于对基本法律权力的保护；它在时间上要有必然的限制；议会与宪制机构对政治决定的监管；司法权力对其行政治安的实施进行控制；等等。简言之，紧急状态并不等同于施米特所言的例外状态，它不是一种法的终止，而是从根本上提供了民主政体防卫风险、同时不转化为独裁的可能性。

在第三部分中，扎卡教授重点讲解了施米特关于独裁和例外两个概念的解读，以彻底澄清阿甘本等学者的混淆。在《论独裁》中，施米特试图运用“独裁”概念来解释主权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认为“理性主义、技术性与执行权力这三个要素朝向独裁的汇聚，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开端”。此外，他还依据自己的“独裁”概念，考察了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主权”概念。他认为，在霍布斯那里，“国家就其自身的构成而言是种独裁，更确切的说，国家诞生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它的永恒目的是阻止这种战争，如果人们免于了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这种战争便总会再次爆发”。而由于法的基础是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决断，施米特进而指出：“从规范性的视角来看，包含在法中的决断诞生自虚无。”

问题的关键在于，施米特的上述解读是否恰当？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霍布斯著作中为数不多的有关独裁的段落。

霍布斯在《利维坦》第19章中提出，就像孩童需要监护人一样，“在大国中，主权议会遇到一切重大危机和动乱时也需要有权利保护人，也就是需要独裁者或权力保护人。这种人就是临时的君主，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将全部权力都交给他运用”。在霍布斯的理论中，独裁者的作用只是为了表明民主如何必然转变为君主制，其主权概念本质上远远不是独裁性质的，与之相反，是要消除独裁者模糊的、政治上失效的形象。至于施米特认为霍布斯持有“决定法的决断来自于虚无”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霍布斯在《利维坦》第25章中明确指出了政治建议的条件、利害关系、重要性，将其视为先于主权决断的咨询与权衡的构成要素。施米特有意忽视了霍布斯的某些根本政治理论，从而造成了对其理论的故意误读。

而“例外”则是施米特用来理解主权的另一个极端概念。在施米特看来，决定例外状态的就是主权者，而主权也正是在例外状态下彰显自己的本质。他在《政治的神学》中写道：“主权者既决定是否存在极端紧要的情况，也决定采取何种措施来终结这种情况。他在臣服于正常有效的法权秩序的同时，处于这种秩序之外。因为是由主权者来决定宪法是否应该被全部终止。”施米特还援引了“主权”的现代概念的两个发明者——霍布斯和法国史学家、法学家让·博丹的观点，试图以例外状态为“主权”概念辩护。但是后两位学者对主权的定义与施米特完全不同。例如，虽然让·博丹的确阐述了在例外情境下主权者违背市民法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形并非彰显了主权的本质，而是主权废立法律的能力，后者是一种一般性的

属性，与例外并不相连。换言之，废立法律的能力并不是终止正在生效的法权秩序，而是旨在保证这一秩序的一致性与持久性。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建立“例外”理论并将之视为一般法的终止和违背的，不是主权思想家，而是同时代的国家理由学派的思想家。后者有两个本质的特征：第一，他们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思想家；第二，因为对这些人而言，在政治之上还有宗教，故由教会解释的神法才是最高准则。施米特混同了16—17世纪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主权理论和国家理由理论，并且因此用“例外”概念来解释主权。

扎卡教授总结说，施米特反对法治状态与议会制民主，从而剥夺了由宪法、议会、法律控制的紧急状态的任何正当性，这正是阿甘本加以利用之处。阿甘本通过对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的混淆，假装保卫民主和法治的状态，但实质上是在追随施米特的步伐。

交流环节，扎卡教授对施米特对霍布斯的误读、霍布斯的“自由”概念、福柯与施米特对“规范”认识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并进一步阐述了区分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的关键意义。他指出，紧急状态是民主用来应对危险、保卫自己的手段，能够帮助民主国家将例外情况整合于一般规则中，具体表现为通过宪法、议会等将其宪法化。如果像阿甘本等学者那样将二者混同起来，那么民主将没有任何合法手段保卫自己。许多学者实质上遵循了施米特的思想观念，这一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醒。

（撰稿：毕悦）

217

折晓叶 | 工业的乡缘——适配与互融

2021年6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1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工业的乡缘——适配与互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折晓叶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评议。本次讲座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工业何以与乡村结缘？在折晓叶老师看来，乡村工业化乃经典研究问题，且学界对于工业是否应该进入乡村多有争议。聚焦这一段工业生命历程的存在和延续，对它在乡村的生存形态和行为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考查，探讨它何以在城市大工业和农业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顽强生存，有助于认识工业聚集和扩散的规律和趋势。通过观察它在长时段中蕴酿、发育、成长乃至衰落的生命史，还可以对事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对当下它所发生的影响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在这种思路下讨论问题，仍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乡村工业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家庭手工业、社队工业、乡镇企业工业、民营工



折晓叶教授

业。其中，乡镇企业时代的工业化承前启后。宏观层面看，是国运国策使然，改革开放和经济政策调整以及体制改革的宏观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微观层面看，“农工相辅”微观空间的打开则是乡镇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折晓叶老师以乡镇企业阶段作为观察乡村工业化的横切面，并以村办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客体，以微观空间的打开作为侧重，展开其对乡村工业化的探讨。

讲座伊始，折晓叶老师首先针对相关经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分析思路。一般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两面。若从城市角度看问题，是城市工业扩散成就了乡村工业化；但若从城乡互动的角度看问题，工业下乡主要不是城市工业辐射或

外扩的结果，而是乡村利用政策“请”工业进入的结果，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乡村工业对城市工业的反向拉力，发生了资源由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城乡工业分割的局面因乡镇企业的突飞猛进而被打破。这反映出改革的基本逻辑，即用新的增量财富来摆脱旧的国家计划控制，这不在于乡村工业最能接受城市工业辐射，而在于它最能利用城市改革难以推动的契机。

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引出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几个缺失。如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一个过程的两个面向，主要从城市的角度考量工业化，缺少从乡村一方看问题的视角；再如将工业化首先看作是经济变迁过程，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其效益，缺少从社会层面考虑的对其社会过程的关注；另外，将工业化看作城市工业扩散及工业下乡的过程，缺少对乡村“请工业进村”动力的考量；以及从农业“过密化”的被动视角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缺少对农民自主寻求“增长”的非农化思考。

那么，如果从乡村一方的视角来看待工业与乡村结缘，这个过程遵循着哪些制度逻辑？折晓叶老师提出以下几个层面：“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空间逻辑。“农工相辅”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早在家庭手工业时期就已存在。因经济发展和国策限制，“农工相辅”的结构空间不断缩小。乡镇企业崛起之后，工业化的制度演进为其打开了一扇窗口，但是其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村经济中一直存在一个“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空

间。回顾一部完整的乡村工业化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对于这个空间的拓展史。正因为拓展的需要，国家不得不调整经济战略政策，在工农与城乡之间重新分配利益。从此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便是打破此结构空间束缚的一次重要变革。它至少拓展出两个新的空间，用以破解“内卷”问题，其中一个即是非农化和乡村工业化，另外一个则是紧随农村工业化，允许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城市（镇）流动，从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利益最大化逻辑，即“无工不富”。工农业收益“剪刀差”所产生的比较利益，在工业得以成规模地进入农村后，才促使农民放弃农业。依靠非农化增长家庭收入，使非农工作机会的吸引力超乎寻常，农民个人和家庭更实际地考虑向非农转移。“无工不富”自然成为非农化的合理逻辑。从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苏南来看，人地矛盾无疑是将剩余劳力挤出农业的准备力量，但是几乎从工业进入乡村开始，就出现了农地抛荒与非农化同时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便剩余劳动力被挤出了，人地矛盾减弱了，也没人愿意种地了。这说明追求“增长”，实现利益最大化，才是农村工业化最大的动力机制。在有条件接触城市工业的地区，集体地或合伙合作地办厂，“请工业进村”，也就成为那一个时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首选。

反控制的逻辑，“摆脱”才好“利用”。反控制即“去制度化”，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策略。计划经济的制度性风险使得反控制的一方位于弱势，因此，农民的

“反控制”是在特定的机会结构下，采用的非对抗性的特殊互动机制和行动策略。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来自多方面的条件提供了机会结构，为改革过程留出了有弹性的制度空间，“请工业进村”就是尝试的结果；同时，精英行动者对竞争性机会的洞察和把握、村庄的乡土规则对宏观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适配所留有的余地等，共同促成了工业在乡村的落地。

持续发展逻辑与农民对利益增长的追求是类似的，有增长才能谋发展，抓住工业化的机遇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自行的工业积累才是村庄公共品提供和农业发展的可靠基础。在此逻辑之下，农民拥有应对政策进入和退出的能力。从乡村自我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意味着主张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乡村社会终究要走到自恰发展的轨道上去。从可观察的经验如本文案例那样，乡村一方的反向视角，反而有可能解除“增长即发展”的发展主义。乡村一方的视角，强调乡村社区的综合发展是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战略，凸显的将是加强乡土意识，推动乡缘建设，增进农民再合作，主张“农工相辅”、“城乡互容性”等发展议题。乡土经济的逻辑。为何“工业农作”才能挤出效益？在折晓叶老师看来，集体工业企业拥有一整套利用农业社区传统的经济机制。如企业仿照农业集体的“月分工，年结算”，平时不发放工资，在年底集中结算，如此，职工工资变成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实际是在用农作的方式来经营企业，这一逻辑在乡村工业中多有体现。



从宏观制度条件和乡村回应的双向视角，折晓叶老师提出了其研究问题。为什么在国家宏观制度变迁背景下，在某些地区相同的制度条件或环境下，工业化只在某些乡镇和村庄启动并持续了呢？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它与乡村传统力量之间如何互动融合，又如何产生出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和关系，从而推动了工业的落地和发展呢？在折晓叶老师的研究中，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微观动力机制，是其理解乡村日常工业生活逻辑的主要议题，也是一个宏观和微观要素相互适配、再建与融合的问题。

在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回应以上研究问题之前，折晓叶老师首先对其研究使用的关键概念“适配”和“乡缘”进行了解释。“适配”（adaption）概念转

型自经济学概念匹配 (match)。“匹配”是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概念,用法不一,但作为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的手段或一系列机制使用时,主要关注于即定要素资源“搜寻”“选择”和“对位”的过程,但对于社会学的解释而言,尚属于静态分析,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对于要素之间如何达成匹配以及相互适应性的互动过程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社会学也曾借助这个概念,并试图扩展到一些更普遍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加以讨论。如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对人职匹配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的研究,沈原和刘世定对社区善治中治理手段的选择与社区自然秉赋匹配的研究,刘世定关于匹配中社会互动的研究等。这类研究虽关注到社会互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在分析概念上做进一步探讨。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书影

在折晓叶老师看来,适配概念指两种要素或力量在互动中各自产生的适应性的变化,更多强调的是行动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即定要素在结构位置中的搭配,强调“促使”两种要素或力量在互动中各自产生适配性的变化,以此来解释匹配是怎样发生的。此外,适配具有双重互动性。一方面它是“所搜寻的工业既定类型与村庄原有的资源条件之间能否通过互动行为而有所变化,以便达成适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是参与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影响甚至决定适配形态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此动态过程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折晓叶老师研究的基本命题便是,“工业落地是一个与乡缘互动而达成适配,并将动态变化的乡缘规范纳入到工业生产和组织情境中的社会过程。”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适配”?应关注适配的动态过程,包括引发适配的动力事件或事项,范围、目标和适配结构变化;关注适配的社会互动结构,因为互动性是适配最为重要的特质,特别是参与适配的不同社会特质的行动者,包括组织和个人,其社会互动反映出适配的社会性条件,对适配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还应关注适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适配结构的持续时间和变动频率,反映适配结构演变的不同阶段和动态过程。

“乡缘”,是折老师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乡缘”是一组可资开发和利用的制度条件和社会互动关系,包含着三层相互关联的内容,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结

构、制度机制和互动策略的结合体。从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来看,它以乡土社会关系为其内涵,主要由具有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和业缘以及因行政沿革而赋予的政缘组成。在工业化的村庄,“亲地业政”几缘分离的程度不高,因此折晓叶老师用“乡缘”将它们概括成为一个综合性概念,这对于理解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十分关键。

从动态所谓“结缘”来看,“乡缘”指工业与乡土结成关系的原因、由来和约束性条件。作为社会互动制度机制,乡缘的内涵可作如下理解。首先,它包括“组织”的政缘,即外力植入和内部呼应的人际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再组织化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多种力量强化了村庄的政缘关系,包括工业化拓展了的村庄外部的政缘互动关系,国家放权后增强了村庄内部的政缘关系,产生了适配性的工业集体制,地方行政人事制度则造就了能够协调社区与市场、适配工业化的制度企业家,等等。其次是“拟出”的亲缘,“拟亲缘”关系是乡村工业化过程中适配性的组织资源。它将亲缘关系模式和处事方式推广、概化、带入非家族的团体或组织,即造就出“自己人”模式。拟亲缘处事方式,既保证了内合作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又满足了新的工业组织体制对扩展合作的要求,成为工业化过程中适配性的组织资源。再次是“拉出”的业缘,既有因工业而缘起的外界关系,也包括因工业而结成的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外来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关系不完全是

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建立的,而是通过老的和新建的人缘互动关系在市场上“拉”出来的。新关系打开了村庄内部“农工相辅”的业缘结构空间。业缘关系从其他关系中独立出来,是乡缘适应地方工业化与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一种适配行为。最后还有“经营”的地缘,在折晓叶老师看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概念。土地及其经济是乡村地缘关系的根基,其社会互动特征及可经营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分田人头关联在地保障、村籍制度关联利益分配,集体合作体系关联在地成员,地缘行政和意识形态关联工业体制选择等。正是这个从自然居地的生活地缘到建立制度地缘的过程表现出“地缘”的经营性,亦即乡缘适应地方工业化与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一种适配行为。

但是,对乡缘只做“社会关系”和“制度机制”的理解仍显狭隘。折晓叶老师最后着重分析了作为互动策略的乡缘。一方面,有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有亲缘不等于有人脉,后者才是工业在乡村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在地”的先赋性关系,不等于能够利用地方资源,后者才是工业落地乡村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地的非先赋性关系也可能再造出新的适配于工业落地和发展的乡缘。可见,工业进村并发展,并不是直接依靠了村落传统文化和关系,而是促使这些传统在保持其根基稳定下发生了适配性的变化。而乡缘只有在不断与新的力量相互适配中,才具有可持续性。当乡缘的内核由软性的社会关系演变成硬性的制度和规范机制时,或者说

原本特定社会关系独享的资源可以成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可使用的社会资源时，才得以与工业体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共同促进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乡缘”和“工业体制”都会产生适配性变化。“乡缘”的适配性变化表现在突破了原本独享或专用于村庄的社会性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限制，在更广范围去利用公共性更强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同时也为村庄内部资源与外部市场需求的结合打开了通道，这些也正是工业化所需要的微观社会基础。工业体制的适配性变化则体现在传统制造业的组织方式更加贴近于农耕组织传统（体制和产权）；生产制度出现多种形态，如工厂制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制与家庭发包相结合等；人力资源利用和就业方式出现了多种不同于大工业的形式；以及工业组织包容农业机构，适配了“农工相辅”的乡缘传统。

综上，乡缘与工业之间的适配性互动，具有很大的张力，并不一定越紧密越好，也不一定都产生正向的关系，当二者之间的适配平衡被打破时，乡缘就可能被悬置甚至割裂起来，由此产生出不同的适配类型。并且，乡缘与工业之间的适配是动态变化的。当工业与乡缘的适配关系紧密时，固着于乡缘关系之内的工业就易于嵌入和扎根；而当二者关系疏离时，乡缘悬浮之下的工业就易于只留根系甚至拔根；当二者关系紧密时，迁移中的工业就易于成为与乡缘互赖的适配类型，有可能在移根中重建乡缘关系；而当二者关系疏离时，扯

裂于乡缘之外的工业就更易于伤根和退出。折晓叶老师根据上述几种适配类型，展开了讲座的后半部分——对“扎根”、“留根”、“伤根”和“移根”四个不同案例的描述和分析。

“扎根”是固着于乡缘关系之下的工业“适配”类型。在主要从事电梯齿条加工生产的星村，选择工业具有深厚的乡缘基础，通过“请工业进村”这样一种小村庄与大社会的互动方式，激活社队工业残留的资金、人脉和体制，重建社会性合约，并且依靠人缘和政缘抓住加工业核心环节——从大城市拿到加工订单，利用农民易于“转为”加工工人的兼业条件等，实现了工业落地发展。在此过程中，地方政缘起到了主导作用，工业集体作为一种地缘制度和情结在星村尤为显著，不仅表现在对工业体制的选择上，而且在工业企业“离不离村”、“改不改私”和股份制改革决策过程中都有体现。乡缘在与工业适配中不断革新，从而实现了从工业优先到以工促农和家园建设的过程。折晓叶老师发现，工业之所以扎根于村庄社区，不仅其业态需要适宜于农工相辅的村落农耕文化，其工业体制还受到地方集体体制和村议互动传统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造就出工业集体制，而且集体产权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制度企业家成为勾连企业和村庄、村庄与地方社会的制度中介。乡缘在成为工业落地和发展的支持系统时，也决定着以工业收益支付村庄建设和村民福利的社区目标。正是在这种“村企一体，农工互依”不断适配的过程中，星村完成了工业在乡村的“扎根”。

“留根”是乡缘悬浮之下的工业“适配”类型。相较于星村的案例，塘村经历了工业“进村、出村和返村”的反复过程，展示出适配互动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持续利用乡缘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该案例工业进村的过程与星村大致相仿，有所不同的，一是村民对于分享企业收益有强烈需求，最初进村的制鞋企业采取了工厂制与家庭发包制结合的做法，惠及一些不能进厂的老年人和妇女劳动力。这并非制鞋业所必需的，而是一种工业体制与乡缘适配的做法。二是塘村有着区别于星村的工业集体制，“村书记兼董事长”是聘用的村内经营能人，具有“准制度企业家”的双重身份，遵循着“公司办村”即公司兼并村政的制度安排，通行村政不能干预企业经营的做法，村民参与制度名大于实。股份制改革时，在组织和制度上都有限制村集体产权的特点。

在此背景下，企业逐渐摆脱地方政府控制，也摆脱了村集体组织的束缚和村民就业负担，与内外部政缘都保持一定距离。由于村议制度的缺失，村组织和村民失去了参与体制改革的可能，乡缘在工业组织过程中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最终因改制而导致村企分离，企业不仅在产权上而且在地理位置上离村。与此相应地，工业在向高科技工业转型中也与乡缘关系发生游离，形成了产权分割，村政“出局”，工业总部撤村，政缘割裂，乡缘悬浮的局面。但企业依然用“留小厂保就业”的方式，将工业的根系留在村庄，并承诺新厂办好“不会不管村里老小”，对持续利用

乡缘留有余地。最后，随着企业逐步发展为多种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工业资本又重新返村，采用公司与村组织协商的新的互动方式，将工业资本投入生态农业和家园建设。此时虽然企业社区责任转为个私的家乡责任，但仍然体现了对乡缘的持续利用。在此过程中，悬浮的乡缘重又落地。

“伤根”，表现的是产业失败并伴随乡缘扯裂的工业“适配”类型。与星村和塘村比较，北村是当地最早的“工业先进村”，但历经三次产业转型中，却一次又一次与乡缘扯裂，最终导致村庄败落。在第一次从农业村到工业村的产业转型中，过度工业化导致北村无可耕地，“农工相辅”解体。经多次试办后主导产业选择了纺织印染业，但此产业逐渐受到政策限制，导致产业转型。在第二次产业转型中，村集体转向赚钱快的服务产业，但在此过程中产业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营生基本脱钩，产业亦在非法经营中失败；在第三次产业转型中，曾发生“并村”事件，通过兼并农业村增加“农业”成分，试图恢复“农工相辅”的结构空间。村集体提出“近期实现对农业村土地运作的设想，远期渴望成为新的粮油经销商”的高科技农业园区设想，并尝试股份制资本运作的方式。

然而实际情况是集体制组织方式与园区筹备方式发生冲突，实体经济被边缘化，村集体失去了作为产业支撑的组织能力，村民仅只成为一个期待享有非农产业收益的福利群体，村民议事制度虚设，村民失去互动参与权，新产业和村政逐渐与本土

经济和村民生活扯裂，必然导致村民与村集体和村公司渐行渐远，甚至搬离村庄，村社区几近解体，村民生活失去了乡缘固着的基础。由此，在折晓叶老师看来，从工业集体制到福利集体制的转变，即村民仅成为一个期待享有非农产业收益的福利群体；集体与公司、村民与村社区渐行渐远，共同导致了适配过程切断，乡缘失去了可持续性。因此，这种产业与乡缘扯裂的“非适配”类型说明，适配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互动过程，即使理论上与村庄自然秉赋匹配的产业，没有适配的组织运作和互动过程，甚至与乡缘的适配过程被切断，致使两相目标严重背离，也是难以落地并持续的。

“移根”工业“适配”类型，主要表现为工业流动和乡缘的重建。北村产业失败之际，另一个落脚于该村的异地人办的服装工厂，却在乡缘重建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两相对比，形成强烈反差。此服装厂的建立始于具有服装裁剪能力的打工从皖南到苏南的迁徙，并逐渐从打工发展到“抱团”办厂，最后发展成“家厂一体”的适配型加工业类型。这种劳动密集、技术单一的小企业，适合于在异地依靠乡缘抱团生存的企业和个人，其体制处处体现乡缘与工业适配的特点，比如实行“前厂后居”，劳力、流动资金、技术培训、劳资关系等都在乡缘结构中解决，接单不足时，员工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参加培训，年终结算工资，老乡带老乡进厂等。依靠这种家庭式工厂体制，他们不仅在厂内而且在异地重建了乡缘。业主不仅利用“新

市民”政策落地当地农村户口，而且帮助打工妹与当地入联姻，从家乡带领人员落地后聚集而形成“村中村”，并参与家乡商会在异地的建设，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将异地先进的工业带回家乡。由此，折晓叶老师总结出乡缘牵动的工业流动轨迹：异地打工——落后故乡工业要素（服装学校技能培训）移出——发达地区工厂集体打工——异地办厂——返乡制造业预期（将订单、技术、投资、管理带回家乡）。由此可见，乡缘是工业要素流动的一种社会互动机制，它不是封闭性的，在地的非先赋性关系也可能再造出新的适配于工业发展的乡缘。市场化条件下，当乡缘关系伴随工业要素从落后家乡向工业先进地区流动时，一旦工业与乡缘关系结合而造就出“拟家庭”式工厂体制，便可重建出新的乡缘连带关系；工业化和市场化也缩小了地区间的物理距离，乡缘将拔根而去的企业家不断拉回家乡故土，他们可能借助于体制化的乡缘组织（商会等），在条件成熟时，将工业带回家乡。工业的扩散和流动，将会寻着他们的足迹，从发达地区走向落后地区。

讲座最后，折晓叶老师重申了自己对“乡缘”和乡村工业化的认识。强调适配过程中所发生的双重互动关系，将乡缘引发的社会互动过程与工业进村的适配过程联系起来，使得工业即定类型与村庄既有的资源条件（自然的和社会性的）和生活逻辑的适配具有了动态性，也使得乡缘在适配过程中保留了可持续性。这凸现出工业进村不仅仅是一种工业经济生活“嵌

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问题，而是参与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影响甚至决定适配形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工业化正是将动态变化的乡缘规范纳入到工业生产和组织生态中的社会过程。

同时指出，乡缘对工业既有包容性，比如满足工业打破社区封闭而稳妥落地的需要，帮助工业建立适应性的体制，为工业提供利用社会资源的通道，为工农互补、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的模式等，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制性。乡缘是一种内应性的条件，如果不能被创造性的再利用，就有可能变成阻碍乡村工业化的因素，它的作用须与外部宏观力量，比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工业文明变成乡缘传统可以接受但又不致被破坏的适配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乡缘与工业之间存在互动张力。若没有张力，二者的关系就会流于形式，就没有生长与发展。若只有依存而没有距离，则可能产生紧张或冲突。当二者之间的适配平衡被打破时，二者之间相互促成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何维持其间的平衡关系，仍然是一个关系到乡村适度工业化的重要问题。而工业在乡村如何适度发展，既促使“农工相辅”经济增长又完成农民的家园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

此外，在方法层面，折晓叶老师认为本研究在横向上延伸了案例，但是对于工业化与非工业化村庄以及不同模式地区之间缺少比较；在纵向上尚缺少村办企业与镇办企业案例的比较；在历史维度上只截取了乡镇企业一个阶段进行研究，尚缺

少对乡村工业化历史的比较。因此，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虽然可以形成一些理论命题，却并不能代表乡村工业化，更不能进行整体推论。个案研究向比较研究的跨越，尚需更多有比较意义的案例进入，这将是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评议部分，杨善华老师提出折晓叶老师的研究带来的两点启示。第一，在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不被视为被动的存在，而是能动的主体，即“请工业进村”。在某种程度上，乡缘亦可被视为农村中存在的“传统”或“底蕴”。杨善华老师以走访江村的经历和观察作为类比，讲述了与折老师案例的相似之处。第二，“适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杨善华老师看来，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合适与否的过程，而是有试错的过程，其并不完全是工业自身的问题，还包括村民的观念和其行为参与适配的过程。“适配”的概念能够加深我们对此过程的理解。此外，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因素，如浙江的“小政府，大社会”和江苏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其治理模式风格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工业化进程中，乡缘与工业的适配会展现出各自的特色。由此，应在做整体推论时考虑到差异性的存在。

（撰稿：单琦）



(二) 未名学者讲座

72

沈一鸣 | 贾米在中国——一位 15 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



沈一鸣老师

2021年5月1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贾米在中国——一位15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讲师沈一鸣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宇洁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评议。

沈一鸣老师首先对贾米进行了介绍。贾米于1414年生于赫拉特附近的贾姆村,其父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在40岁左右时加入纳格什班迪耶教团,走上了神秘主义道

路。然而,贾米并非一位活跃的苏非实践者,而是将多数精力投入到了写作中。“在社会中独处(Khalvat dar Anjuman)”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准则,意为在物理上不完全隔绝与社会的交流,而是在心灵上与世俗间完全隔离。这一理论为该教团在中亚融入当时的宫廷和政治事务提供了基础,也是贾米加入教团后与当时地方统治者互动频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贾米的教阶不高,学生也不多,其在世俗社会获得的声望远大于在教团之中的声望。在波斯文学领域,贾米被称为“封印诗人”,是波斯诗歌的集大成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贾米的作品近一半为哲学散文。在哲学领域,贾米是伊本·阿拉比哲学思想的推广者和阐释者。

贾米的作品数量众多且流传很广,沈一鸣老师将其称为“畅销书作家”。贾米所著诗歌类作品有《诗集》、《七宝座》(Haft Awrang)等;散文作品有《勒瓦一合》(Lavāyih)、《阿施阿特·拉玛阿特》(Ashī'at al-Lama'āt)、《灿烂的光辉》等;教材《春园》、《法瓦伊得·迪亚依耶》(al-Favā'id al-Diyā'iyya)及传记类作品《长老传》(Nafahāt al-Uns)、《书信集》

等。贾米作品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沟通上层人士、宗教学者以及下层民众的重要作用。有三部贾米的作品可以确认流传至中国,分别是《勒瓦一合》、《阿施阿特拉玛阿特》和《法瓦伊得·迪亚依耶》。18世纪早期,《勒瓦一合》被刘智译为《真境昭微》,舍起灵则将《阿施阿特·拉玛阿特》译为《昭元秘訣》,《法瓦伊得·迪亚依耶》于2013年被张树奎译为《满俩》。

接着,沈一鸣老师向大家阐述了贾米在中国的独特性。首先,从赫拉特的中心视角来看,贾米在中国被称为“咋密尊者”“天方大贤”,而其作为诗人和苏非的身份是被遗忘的。他的原文经书被中国的穆斯林个人收藏,秘而不示人,而中文译著则被广泛传抄、印刷。从中国视角看,原文经书进入中原地区的不下百部,其中的“正典”约四十部,贾米作品占其中三部。四十部“正典”中有约十部中文译著,《真境昭微》与《昭元秘訣》便是其中的两部。此外,19世纪,刘智的

《天方性理·本经》被马复初、马联元等人先后译为阿拉伯文,并通过朝觐等方式重返伊斯兰世界。可见,贾米的作品完成了一个近似圆环状的流传过程。

有关贾米作品从中亚传至中国的过程,沈一鸣老师分析认为,应是在中国游历传教的苏非个人旅行者将贾米作

品带入了中国。从非穆斯林学者顾启元的《客座赘语》和穆斯林学者张中的《归真总义》中,得以发现这些苏非个人旅行者的行迹,而当时中国社会相对开放的氛围,也为贾米作品的传入提供了土壤。贾米的作品从中亚传入中原,经历了三重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在15世纪,经过与同时代苏非学者的竞争,贾米建立了个人声誉;第二重考验是15至18世纪,贾米的部分文本经苏非旅行者进入中国;第三重考验则从17世纪始,经中国经学派的建立和筛选,贾米的三本原文经书和两部中文译著流传至今。

沈一鸣老师对舍起灵的《昭元秘訣》和刘智的《真境昭微》这两个文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因译者的个人教育背景及事业发展方向不同,《昭元秘訣》和《真境昭微》在选词、译文术语的使用,和受众范围等方面有诸多差别。如舍起灵的《昭元秘訣》中使用了包括宋明理学、道家、佛家等中



贾米诗集《七宝座》插画

国传统哲学词汇；而刘智在《真境昭微》中使用的多为宋明理学词汇。此外，前者的读者多为略通波斯语但不精通儒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后者则被通晓儒家经典的教内外学者广泛阅读。

《昭元秘诀》和《真境昭微》中的地名、人名、经名和苏非专有名词的译法也有诸多不同。《昭元秘诀》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呈现出重音不重形的特点。相比于《昭元秘诀》，刘智在《真境昭微》中较少使用音译词，而是将专有名词以意译的方式翻译出来，这使得该文本同中国传统哲学文本颇为相似。从舍起灵和刘智译本中对 *ḥaqīqat* 一词的翻译案例，可以窥见两位译者所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舍起灵在《昭元秘诀》中主要将 *ḥaqīqat* 一词译为“真本”和“妙本”。“妙本”和“真本”两词是佛道因素在文本中的体现，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舍起灵受到了唐代重玄派《道德经》经注的影响。刘智则在《真境昭微》中将 *ḥaqīqat* 一词译为“真”与“理”，且可以从文本中诸多词语的选用推测译文与朱熹宋明理学的密切联系。

最后，沈一鸣老师对贾米的文本旅行作了简要总结。贾米的文本首先经苏非个人旅行者从中亚带入中原，后经过中国伊斯兰经学派重重筛选，在传递者、读者、新的语境等多方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多样的文本形态。不仅在中国塑造了“传奇”的贾米形象，而且与中国哲学传统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国伊斯兰哲学文本书写的“中国化”。

评议环节，王一丹老师指出，沈一鸣老师不仅就贾米的文本旅行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研究，还运用了前沿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体现出扎实的波斯语功底和优秀的学术能力。了解贾米文本如何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译介，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对波斯苏非思想的接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之间文化文明的交融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王宇洁老师补充讲道，文本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进行传递的背后隐藏着极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知识传递脉络。对于讲座中提到的贾米作品传入中国的载体，王宇洁老师从纳格什班迪耶教团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等角度对沈一鸣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印证。

(撰稿：秦寒冰)



73

刘寅 | 查理曼与弃绝魔鬼——对加洛林改革的一项话语考察



刘寅研究员

丕平之子查理曼 (Charlemagne) 经过连年征战，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建立庞大帝国，并于 800 年加冕称帝，史称查理大帝。在此之后，加洛林家族对于法兰克地区的统治一直延续了 100 多年。东法兰克 (德意志) 的加洛林王朝于 911 年中断，西法兰克 (法兰西) 的加洛林王朝于 987 年告终。在加洛林时代之前，欧洲经历了西罗马帝国的终结、罗马秩序的瓦解和诸蛮族国家的兴起。从长时段视角看，加洛林时代之后，欧洲发生了从地中海帝国的一部分变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定位变化。

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最受学者研究重视的是公元 1000 年之后的历史时段。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欧洲旧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法国大革命推翻的就是这个旧制度。而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在论述旧制度时，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旧制度的建立基于加洛林秩序的瓦解。那么问题在于，加洛林秩序是什么？以及瓦解过程中，被后世继承的内容又有哪些？刘寅老师认为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研究加洛林时代，最佳的切入点是查理曼大帝。从 768 年至 814 年，查理曼的统治时间非常长。同时，查理曼的统治时期是加洛林体制的奠基时期。

刘寅老师讲述的个案是关于查理曼研究或者加洛林研究的“教会转向”问题。近几十年的加洛林时代的研究，愈发重视

2021 年 5 月 27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3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查理曼与弃绝魔鬼——对加洛林改革的一项话语考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刘寅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隆国评议。

讲座伊始，刘寅老师从加洛林王朝 (Carolingian Dynasty) 的历史开始讲起。751 年，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之子矮子丕平 (Pippin the Short) 在罗马教宗支持下废除墨洛温王朝 (Merovingian Dynasty) 末王自立，建立加洛林王朝。

教会在加洛林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无论作为制度的教会，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教会，这成为当前加洛林时代研究最为重要的方向。这与二战后的第一批加洛林研究者有较大的不同。

刘寅老师全面论述了加洛林体制的基本状况即“教会”在其中承担的核心角色。加洛林时代的地方治理体制是双轨制。一方面，地方上的最高统治者是伯爵领，伯爵领在全国的数量大致有 300 至 400 个，这是世俗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单位。另一方面，主教区也是非常重要的行政单位，主教是地方教会的领导者，承担着征兵、司法等职责。修道院在加洛林时代是掌握财富最多的机构，承担世俗上的功能，每年都需纳贡与提供兵役，且不同等级的修道院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加洛林的神圣宫廷（*sacrum palatium*）不仅是政治中心，还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查理曼兴建的亚琛宫廷由圣玛丽教堂（南）和集会大厅（北）两大部分组成。年度集会是查理曼统治时期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一般是召开两次甚至更多，将全国政教人物聚集至一

处。年度集会遵循政教二元结构，世俗贵族与教会人员坐在两侧，进行政教事务的商讨。查理曼统治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条令（*capitularia*）。所谓条令就是一种兼具法律和行政性质的文书。从 825 年安塞吉斯编修条令集的结构安排来看的，当时的人将世俗政治与教会事务并列视为条令的两大主题。此外，查理曼时期实行钦差巡查制度，即查理曼派遣最受信任的世俗与教会重臣在帝国境内进行司法性质的巡查，完成司法纠正事务。从派出的人员结构来看，世俗官员与教会人员结对巡察。最后一方面是君权的神圣性问题，加洛林时代的王权高度神圣化，蒙受上帝的恩典。

刘寅老师随后以查理曼开启的“加洛林革新”（*Carolingian Renovatio*）及革新中的洗礼圣事环节进行重点论述。查理曼在其统治中后期，对治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宗教教育、行为规范、法律、制度与教会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开启了被称为“加洛林革新”的历史变革。在统治晚期，对基督教洗礼仪式中“弃绝魔鬼”环节的讨论相当高频地出现于洗礼释义、君主条令、书信、布道辞等不同类型的文

献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症候”。洗礼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圣事之一。洗礼仪式中有一重要环节为“弃绝”，即对魔鬼进行弃绝。《格里高利圣事书》中记载，弃绝的仪式通过三组问答形式来完成。“你弃绝撒旦吗？答：我弃绝。”“以及他的全部作为？答：我弃绝。”“以及他的全部浮华？答：我弃绝。”

公元 810 年，查理曼给统治下的所有大主教发了一封关于洗礼问题的通函，主要意图为“希望了解你和你的隶属主教是如何向上帝的司铎和托付于你的民众教授和指导洗礼圣事的”。在通函中，查理曼还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什么是弃绝？什么是魔鬼的作为和浮华？”大主教中给查理曼的回函保存至今且知晓姓名的有 5 位，另有 4 部来自当时的主教阶层的洗礼释义留存。细读查理曼与主教的通函和回函，研究其中提到的弃绝仪式的释义，可以分析出文本背后的强烈的道德色彩，即将弃绝魔鬼视为是对不符合基督教规范的道德生活的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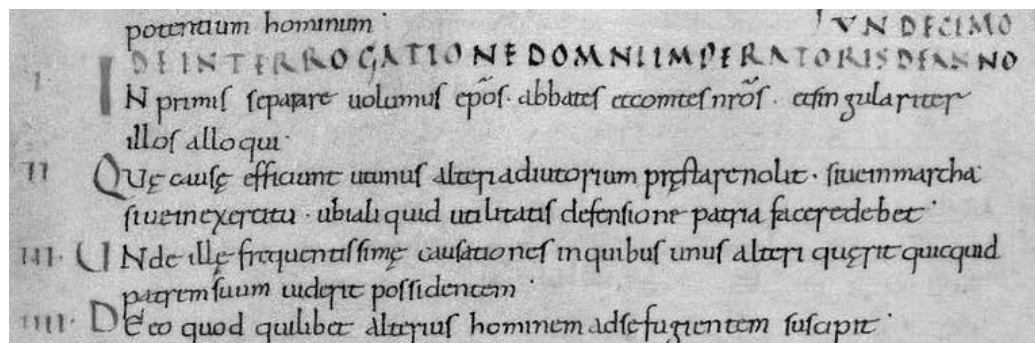
刘寅老师指出，加洛林时代的一大创新是将弃绝释义与《加拉太书》五章 19—21 节联系在一起。在 789 年颁布的《广训条令》里，查理曼以第一人称语气要求教会人士对平民基督徒进行布道，所明确布道的内容之一是对《加拉太书》五章 19—21 节中所列罪过的警醒。主教阶层在撰写洗礼释时，很自觉地使用了查理曼改革中这份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献，将道德上需要匡正的内容，结合《加拉太书》的经节进行阐释。主教洗礼释义体现了教会上层与君主之间的交流。在此之外，还

有很多当时为地方教士所用的基层洗礼释义存世，在这些洗礼释义中对弃绝礼的阐释有着与主教洗礼释义中高度一致的鲜明的道德色彩。

主教在查理曼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主教向上面对的是君主，需要对君主的提问作出回应，对洗礼作出释义；另一方面，主教向下面对的是地方教士，需要将洗礼释义在教士中进行普及和教育，这点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这在 813 年图尔教务会议决议的内容中有明显体现，“主教们应当格外重视向他们的司铎教授洗礼圣事，以及，在圣事中需要弃绝和相信什么。所弃绝的是魔鬼和他的作为。因为魔鬼的作为应当被理解为腐肉的作为，即凶杀、淫乱、通奸、醉酒和其他类似的罪过”。弃绝礼的道德解释进入了基层教士教育。

除了 810 年发布的通函，811 年，查理曼还颁布了两部条令——这些都是分析研究查理曼晚年思想的重要文本。这两部条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条令里查理曼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口吻，对教会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在查理曼看来，这些教会人员，特别是教会的高层，完全不像脱离世俗之人，而是拼命地攫取和占有大量的财产。针对这种所作所为，查理曼进行了严格的批判。这两部条令里反复提到的，也是查理曼反复思考的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教会人员可以介入世俗事物。

查理曼在条令 71 里质问了主教们两个问题，即每个基督徒在洗礼时要说什么和弃绝什么？他显然不是要主教明确地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想促使主教们检讨自己的



“森斯条令集”条令

生活作风和行为举止。从语言中可以看出，查理曼的表达非常激烈。在查理曼看来，教会人士并没有真正做到弃绝礼规定的要求。条令 72 里，查理曼再问洗礼弃绝，并表示“教会人士尤其应当对之深究，因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为平信徒做出承诺和弃绝的范例。”同时，查理曼以一种非常强的质问语气，批判教会人员对平信徒财产的巧取豪夺。查理曼认为，这些教会人士，特别是教会的主教，并没有依据抛下尘世的宣誓而行动，所谓的“抛下尘世”只是一种妄称。

关于当时参与集会的主教们的反映，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记载。但是后来有一封里昂大主教莱德拉德（Leidrad of Lyon）以弃绝礼为主题写给查理曼的书信体神学论文被保存了下来。细读莱德拉德书信的内容，我们能发现其中有支持和响应查理曼的地方。奥古斯丁（Augustine）将“贪婪”放在世间六宗罪的最后，而莱德拉德将贪婪之罪移至第二位。这与查理曼批判教会人员对财产的贪婪占有不谋而合。但更重要的是莱德拉德挑战查理曼的地方。莱德拉德对“舍弃”（renunciare）与“弃绝”（abrenunciare）两词在语义上做出了区分。莱德拉德特别强调，“舍弃合法之事，但弃绝非法之事；舍弃喜爱之物，但弃绝诱惑之物；舍弃父母，但弃绝魔鬼”。舍弃的结果是让一个人成为教士，成为上帝的士兵；而弃绝魔鬼则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莱德拉德认为舍弃与弃绝不能混为一谈。反观查理曼，则是故意不区分“舍弃”与“弃绝”，将教士抛下尘世和基督徒的弃绝一起谈论。莱德拉德认为教士对其物质资源

的占有理应合理，“神圣经书中谴责的是欲求，而非资源”。实际上，莱德拉德在为教士阶层做辩护。

但是，在莱德拉德的里昂教士学校中使用的 Paris, BNF, NAL 1740 中《申命记》经文页边和行间注中对《申命记》十七章 16-17 节的阐释表明，莱德拉德在不同的语境里，对弃绝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一方面，在回应君主之时，莱德拉德代表的是主教阶层，拒绝了查理曼对于弃绝的阐释。另一方面，面对地方的教士，莱德拉德又传递了匡正教士操行的改革意图。

此外，现存若干部成文于 9 世纪初的民众布道辞，反映了将围绕弃绝魔鬼问题的道德话语向普通基督徒传布的道德改革实践。有足够证据显示，查理曼时期的布道辞是经过系统化梳理和传布的。

刘寅老师最后总结道，围绕着洗礼弃绝礼话语，实际上可以勾勒出当时不同层次关于改革交流沟通的线索，而且不同的文献也反映了改革不同层级之间沟通的不同面向，最终实现的是改革自身的动员。同时，关于查理曼为何如此重视洗礼弃绝礼里的道德性话语，或许这与其晚年的道德转向有关。

评议阶段，李隆国老师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现实的学科研究问题，即如何运用一种话语或视角来研究欧洲史。这不仅涉及到跨文化问题，而且还关系着宗教话语和宗教史本身的研究。回到文献当中，找到文献中的话语逻辑，然后将其提炼出来，之后将文献中的关键词作为线索贯穿整个研究——这套方法值得借鉴。近半个世纪以来，教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

究面临重新融合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宗教文献的史料研读来研究政治政策值得深入探讨。第二个方面是，“弃绝魔鬼”回应的大问题是查理曼晚年的道德转向问题。通过洗礼弃绝仪式的考察，可以看到查理曼前后期的差异。查理曼在 811 年颁布个人遗嘱，捐献了个人大部分财产，甚至将王冠变卖。毫无疑问，查理曼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实际行动来垂范。从道德转向的角度来看，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或话语宣传。这背后有一套大主教的制度作为支撑。大主教是查理曼与各地区主教、

基督徒联系的中心环节，教区内的一般性司法事务先由大主教进行裁决，无法解决的难题才会递送给查理曼。不仅如此，一系列的条令也是由大主教从上往下进行传达。大主教制度是查理曼改革的制度创新。通过这一制度，查理曼改革的话语和实践得以最终运作。

（撰稿：刘建）



74

赵诺 | 整风运动后的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

2021 年 6 月 3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4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整风运动后的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赵诺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作评议。

赵诺老师表示，在他看来，历史学追问的首先是当时具体的因果逻辑。他认为延安与其他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没有明确的“收束”节点，而是采用相对模糊的处理方式，呈现出“未结而结”的状态。而在



赵诺老师

整风结束后，仍有一部分人以不同形式留在整风班继续接受甄别复查，如冀南地区的“后方干部梯队”与“干部三大队”。赵诺老师同时指出，整风运动后期所涉人群的范围已大为收缩，主导甄别复查的具体负责人也有所调整。

随后，赵诺老师以吕云、李敏等人在整风运动中的经历为例，借助当事人的日记等材料，就干部个人层面的运动机制作了简要回顾。如吕云曾在日记中提到，周围一起参与整风的学员（干部）也会互相阅读个人历史自传等有关材料，形成“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局面；而在遭到有意识的冷处理时，一般个体会陷入惶恐的状态，组织对其进行的突然谈话则顺其自然地成为转变的“台阶”。赵诺老师指出，由于人们在高度重复的运动中感到无所事

事，整风后期出现了“大厌风”与对该风气的批判，但也正是在这一甄别复查的阶段，很多人“认真学了一点东西”，并实现了心灵的突破和思想的转变。

而在介绍李敏、王某民的案例时，赵诺老师提到，组织对历史自传等材料的审查更看重其中思想的过程性的考量，使之嵌套于符合某种逻辑的历史。工作人员也抱有高度责任感，对受审查者表现出压力与爱护关怀并重的姿态，整体而言“是一个认真对待的过程”。亲历者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就特定问题撰写材料，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生存伦理”。

在介绍干部调配与个人进退的问题时，赵诺老师对北方局在整风运动期间的人事变化、处理“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问题的方式等进行了说明。他分析了56名县级干部中相关信息较完整的41人，表示其中只有13人的职级出现明显下降，大多数系平级调动。赵诺老师由此作出估计，整风运动对干部的升降沉浮并未造成大的冲击，其格局在四十年代初已经大致确定下来。党组织也对此类人事变动（如交流任职、转岗）有所考量，学校、调研室、财经系统成为干部的主要去向。赵诺老师同时指出，“整风矛头主要指向外地知识分子”的传统观点似乎不能完全成立——由于本地干部所占基数较大，相比之下，外地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并不突出。

接下来，赵诺老师将视线转向整风运动中的干部政策与内部关系。他认为这场运动总的来讲力求将团结作为主调，整风结束后进行的甄别复查工作则以“消灭伤痕”为核心。对具体的干部而言，抽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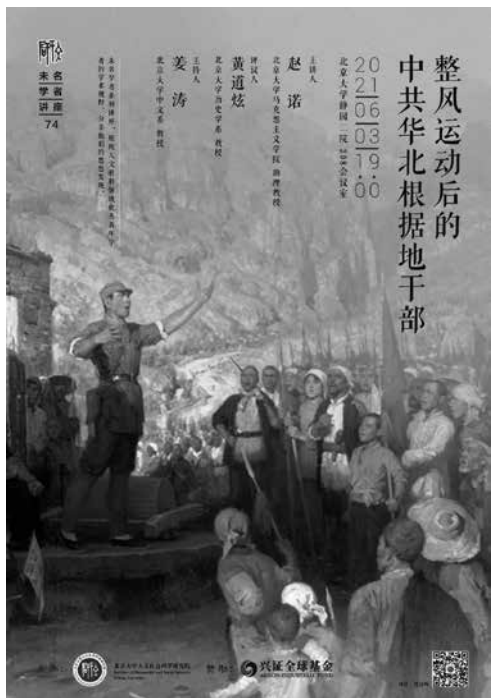
党具有高度权威，组织中的个人需要服从其基本原则。整风运动实际讨论和塑造了“抽象的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最终把个体史、团队史、群体史这一层层环节嵌套在总体史之中，再将根据地的历史嵌套在党史的叙述里。

此外，整风运动对人际关系造成的裂痕与隔阂也有一个弥合的过程。如运动期间被大量揭示的男女关系问题，其后也发生了相应的政策松动。至于如何任用、提拔曾受较大冲击的干部，如何用有意识的谈话解释和淡化问题，如何将工农和知识分子干部搭配使用并处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在组织层面有所考量的重要问题。赵诺老师简要讨论了提拔工农干部与干部政策的“再平衡”问题，并指出其中体现的传统性。

从总的结构上看，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干部的比例略有提高。赵诺老师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组织对中学生的任用，且该群体的基数可能较大。研究者不难注意到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的调整，而事实上，“老的知识分子”是整风的主导者，核心的主席团成员多数不是工农干部。赵诺老师认为，这两类干部的相互排斥未必出自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反而可能源于差异的缩小——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群众化、无产阶级化，会导致老干部“天然优势”的下行。这一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干部在党内、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有所削弱，转而向重要的老干部靠拢。赵诺老师据此认为，虽然整风运动要求破除“山头”和“圈子”，但这类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

讨论整风运动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取向时，赵诺老师表示，他认为整风运动真正将群众运动引入了党内，堪称“大鸣大放”。土改整党汲取了整风运动的教训，该时期的群众运动主要落在了基层而非党内，中上层则受到高度控制，但整风运动的制度资源和精神资源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对于“群众观念”这一问题，赵诺老师指出，整风运动之中和之后，群众对于土改的需求与中共的愿望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确实对群众极为关心，并将大量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进行工作。

赵诺老师从亲历者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一部分人力图说明整风的指导方针犯了严重错误，这体现了个体对整风的某些态度。他认为在运动结束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于过往会出现一些新的理解，也会淡忘其中的某些事实。整风同时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焦虑感与挫折感。赵诺老师认为，这个时期政治安全感的下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虽然一些当事人对整风有着敏锐、犀利、恰当的观察，但当他们将整风和个体生存状况以及命运结合到一起时，又掺杂了大量自圆其说的成分。很多时候人们的反省、悔过、排拒、放任都不过在一线之间，“革命的因果报应观”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罪人”在整风中过关，说明“思想是可以被转化的”，且负面的情绪、思想必须时时被“转化”和“超越”，而这种“转化”过程或革命的“功过相抵”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态——人们的心理往往有一个自我开释的过程，如此才能消灭“伤痕”、放下“包袱”去工作。整风之后，党内“清教徒式”的某些文化



逐渐不再被人们反复强调。

最后，赵诺老师对讲座内容作了大致总结。他指出，中共的一大优势在于使本来高扬的异态的东西回归到某种常态，理解中共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理解其制度优势。“好干部”的识别标准在整风之后开始发生总体的模糊化。此外，整风运动对实事求是的追求与虚假、谎言间存在矛盾性，虚虚实实的过程中又渗透着一种求实的冲动，二者形成了对冲；当整风收束、降调开始，求实的倾向也更多地表现了出来。赵诺老师表示，追寻“高调”是其先锋队意识的体现，而中共总是要在先锋队和群众路线之间寻找交集和平衡点。

黄道炫老师随即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他表示，整风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历史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研究者需要思考整风到底对中共干部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发动目的是什么，又改变了什么。赵诺老师认为“团结”是整风的主基调，并援引大量材料进行说明，黄道炫老师也对这一观点

表示赞成。对中低层干部以及普通干部而言，整风并非有意制造彼此的敌对局面，而是追求一种友善团结的关系。尽管如此，整风还是给许多干部带来了命运的波折。

黄道炫老师认为，应当基于两个逻辑理解中共的行动：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二是把中共放在新文化——即与世界接轨——的语境中讨论。对中共而言，不可割断的传统文化是常态化的，而外部世界往往是能够形塑它的动态的东西。黄道炫老师还提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中共的决策，后者以塑造敌人、寻找敌人的方式追求思想改造的目标。姜涛老师则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分享了自己对讲座的理解与收获，如受到延安文化影响的国统区作家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和主体状态回应历史的变动，从而与其他亲历整风的作家形成区分。

（撰稿：陈洁樱）

75

方诚峰 | 南宋道学家如何“治国平天下”？

2021年6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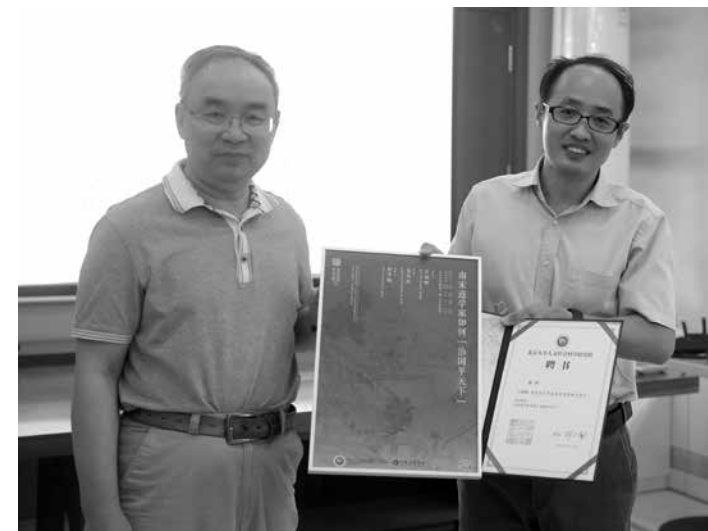
75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宋道学家如何‘治国平天下’？”。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评议。

讲座开始，方诚峰老师首先提到，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的角度讲，“道学”都是南宋历史的一个关键词，道学思想对南宋历史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是自己近些年的研究兴趣之一。这个问题早在南宋末年人就有所讨论，

如周密对道学的评价极大影响了我们对道学的认识。今天学者在研究道学和南宋历史的关系时，哲学史和观念史研究经常把道学家的经历作为思想的背景。历史学界则常把道学家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看待，但其活动与思想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人物研究试图对朱熹这样的道学家进行“多维文化”的考察，但各种维度间的联系并不具体。英语世界的学者有较多的尝试，如《经世》（*Ordering the World*）着重于南宋士人地方转向的思想史维度，但他们所描述的道学家多是教化者、善人长者，缺乏对其兵刑财政侧面的认识，这与南宋末人对道学末流的批评有一致之处。这就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道学在政治上主张什么样的逻辑？其二，在这种逻辑之下他们会采取怎样的具体的行动？

道学关于“政治”有独特的阐述。朱熹强调统治者“明明德”进而“新民”，



包伟民教授为方诚峰副教授（右）颁发聘书

最终“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之人皆能自明其德（复性），与通常所理解的统治、支配的政治世界有所不同。这一逻辑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统治者的复性，另一部分是百姓的复性。这一主张的推论之一是“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修身是其起点，由是道学常常给人一种政治伦理化的印象。推论之二是，因为“新民”意味着“推己及人”，故而又强调“己”的责任，因此道学在南宋往往以正君心为政治的根本；余英时、陈来揭示了朱熹对“皇极”的新解；实践中，君主的“敬天”也相当程度上被落实为道学的“功夫论”。

但上述只是道学政治理论的半截，统治者的“明明德”起到典范作用，下一步是如何实现“推己及人”？这主要体现在朱熹对《大学》第十章“絜矩之道”的解释中。吴长庚对此作过较完整的梳理。朱

熹认为，“絜矩之道”是实现上行下效的“政事”，“絜矩”字面意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但应该放到以“己”为中心的三方的关系中去理解。朱熹强调“絜矩”的三方关系，是因为他设想了一种“均平正方”的状态。他所认为的“平天下”并不是指天下太平，而是指“均平”的状态。而“均平”并不是平等，乃是“上下皆得行”之意，是各种人都能实践事亲、事长等伦理。进一步，朱熹认为“天下平”的最大障碍是物质问题，即朝廷的政烦赋重。由是，絜矩之道（政事）的落脚之处，实际是“财”的问题，这是民生日用最要紧的事。朱子后学完全继承了朱熹的解释，如真德秀在端平元年（1234）给亲政的理宗讲《大学》的“治国平天下”章时，也将絜矩之道的重点放在了财的问题上。总而言之，道学的政治理论确实始于“伦理”，但绝不认为统治者个人完善后上行下效就

可以自然实现。“天下平”有赖于政事，即“絜矩之道”，财利是重点，可以说与其终极理想能否实现有密切的关系。

道学的絜矩之道与传统民本思想相似又有所区别。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很难与农本思想进行区分，民本与耕战密切相关，“民”是手段，“邦”是目的。而朱熹讲絜矩之道时，认为“民”之“明明德”本身就是目的，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有别。朱熹的主张直指南宋政烦赋重的现实，那么，在南宋战时状态的军事财政中，道学家如何实践“絜矩之道”呢？下面以道学家在江南东路的减负运动为例。江南东路是拱卫行在的江防前线，也点缀着一些道学“圣迹”。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到江南东路任转运副使。上任不久，即用代纳的方式减轻了建康府江宁县城南居民的和买折钱。之后，江东九郡遭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真德秀采用检放两税、赈济赈糴的方式救灾，并向朝廷请求钱粮，得到朝廷拨下合50万石米。

真德秀还劾罢了知宁国府张忠恕。张忠恕是南宋初期名臣张浚之孙，张杓之子，张栻之侄，墓志铭为魏了翁所撰，对其不吝赞扬。真德秀却认为张忠恕侵夺民财，极意刻剥。这一弹劾是由赈灾时张忠恕与提举常平李道传的矛盾引起的，但真德秀的弹劾并不限于救灾，其所言“民有十怨”，都与赋税有关，和朱熹对唐仲友的弹劾内容多有可对照之处。朱熹、真德秀等人不是不了解张忠恕等人的行为是地方财政旧例，但认为在灾情中如此操作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弹劾不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而

是道学立场者对不能践行道学立场之人的批判，后者不一定是来自道学外部的，也是当时地方官员的日常财政实践。

李道传接手宁国府后，整顿宁国府的大斛斗、略减加耗，史料可见。南宋后期当地仍然在使用李道传的斛斗、加耗之制，但已认为李道传所设的加耗亦过高，且只有丰熟年份才能满足支用。据宝祐元年（1253）孙梦观所言，宁国府的两税苗米实际收入只在十几万和六七万石之间浮动，距离二十五万之额距离较远，而灾伤检放、倚阁放欠等是主因。

真德秀和李道传离开后，其友人与弟子陆续到江南东路任职。嘉定九年（1216）陈宓知南康军，又遭遇旱灾，也进行了苗米检放，并在种种财政压力下减免了部分商税、力胜钱等。嘉定十五年（1222），徽州休宁县减折帛钱、折布钱，当时的漕臣陈宗仁、提举常平史定之具有朱学、陆学背景，且与权相史弥远关系颇深。袁甫于嘉定十六年知徽州，绍定二年（1229）后又作为提举常平、提刑至江东，蠲减了徽州婺源县折帛等钱，并有巨额灾伤检放。绍定末、端平初，朱熹弟子刘叔文知徽州；嘉熙元年（1237），杨简弟子史弥鞏提点江东刑狱，都有蠲减、检放记录。因此，当理宗淳祐五年（1245）刘克庄到江东后，看到饶州财政困难、两税失收，认为其主因就包括了减税、检放等减负。南宋末年，马光祖四度到建康任总领、转运使和沿江制置大使，他被时人誉为“四海吏师”，常不被重视的一个身份是真德秀和袁甫的门人。作为当地的最高军政长

官，他的主要工作是江防、修造、蠲减和赈恤，其减负措施和成果在《景定建康志》中多有记录。

总的来看，真德秀等人所做的工作包括代纳、蠲阁、检放、减耗等，主要在两税的范围内。相应地，在《宋史全文》中的理宗朝部分，可以看到很多在八月朔日禁止多收斛面附加税的诏令，说明针对两税的宽减已从道学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了朝廷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这又涉及到宋朝两税征发凝固化乃至苗米大规模失收的问题。传统上常常从阶级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这里尝试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解释：两税是否已经成为道学家实践“仁政”的固定领域？两税凝固乃至失收，与南宋后期的减负运动是否互为因果？南宋在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下，没有直接增加两税，而是以和余的方式解决供军问题，并因超发楮币而陷入困境。此种选择，是否与上述两税的定位有关？

在减负与楮币和余困局之间，南宋最后的选择是“公田法”，即以限田为名，购买百姓田产为公田，以公田租解决供军困境。在可考的公田法倡议者和落实者中，有一批道学家，主要是朱子学的传人。且在落实公田法的过程中，这些人表现出了明显的酷吏色彩，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作为善人长者的道学家形象。限田本身是儒家的理想，公田法不但具有摧兼并的色彩，出发点又是解决和糴虐民的问题，故而从减负、击豪诸层面满足了道学家絜矩之道的追求。

总体而言，道学对于南宋的影响在不同层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真德秀与张忠



南宋嘉定九年制文思院标准斗
 采自《永乐大典》卷7512

怨在江东激烈争执，在朝中却立场一致乃至和解。在朝廷，“道学”的影响相当一致，即“道学君臣”的敬德一敬天。在地方，在军事财政压力下践行絜矩之道时，即使道学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不比道学与反道学的矛盾更轻。今天在认识道学对南宋历史的影响时，经常将道学分为正流与末流、实践与空疏，这多出于当时南宋批评者的议论，道学产生的实际冲击在不同的政治世界中迥然不同。

包伟民老师评议认为，报告中所列出的一大批“道学家”是否可以被视为真正的道学家还需要考虑，不同时期的道学家群体的构成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絜矩的解释可能带有道学的特点和逻辑，但儒家传统便强调仁政，故减负不一定非要在道学的思想体系中理解，且在整体地方行

政实践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出。其次，减负后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减负背后的财政运作需要特别注意，如何挪腾，如何平衡，这些信息还相当缺乏。再者，为何宋朝不采取提高两税税额的方式来增加收入？概两税是正税，而加正税在观念中是难以接受的。正税收不上来，阶级可能是原因，但不是全部，而杂税、附加税是弥补正税缺口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否是道学家，地方官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最后，不应假设朱熹的理论会自动地进入到朱熹弟子的实践中。

(撰稿：陈蓁蓁)



(三) 北大文研论坛

137

张侃、李里峰、胡英泽 | 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2021年5月6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13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胡英泽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论坛伊始，王奇生老师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主要来自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科，历史学者较少参与。最近十多年间，大批历史学者投身于中共革命研究，以致形成“新革命史”研究热。本次论坛之所以提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这一主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经验。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并非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是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强调“高度集权”和“铁的纪律”，强调无产阶级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文化、语言、性别与职业的区别，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在很长时间里，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



王奇生教授主持

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存在过教条主义问题。然而世界革命的最终落实无法脱离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故而从世界革命的视角看，各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特征。中共革命的胜利，在于最终处理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同样，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众多互不相连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内部，是否也存在地域差异，是否也存在革命的理论各地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强调“全国一盘棋”，强调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那么，各地在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有多大的自主性和地方性空间。大而言之，世界革命理论与各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在“落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地域性以及革命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今天的革命史研究仍有关切的必要。组织本次论坛，希望能推进上述问题的讨论。

论坛正式开始后，张侃老师从地域视野的意涵、具体研究例证以及地域研究的未来三方面展开精彩讲述。张侃老师回望个人求学经历，谈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自己的革命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与中共革命研究面临的问题相似，日本学者也感受到阶级分析等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明清社会的多元结构及其转型。1981年，日本学者森正夫提出“地域社会论”，认为研究者需要观察面临着共同现实课题的、处于共同社会秩序下的人们，并讨论如下问题：如何在指导者的指导下被统合起来，关注地域内的能动者、指导者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思考国家意识形态如何被指导者内化为行动原则，不同人群的互动如何影响社会秩序，秩序的构造中如何实现身份的转换等等。这一侧重文化面相的“地域”概念，包含强调空间的“区域”和侧重社会网络节点的“地方”等要素。这与厦大傅衣凌先生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提出“乡族地主”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后者重视由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乡”与“族”的社会共同体，将空间、身份，以及作为阶级

名词的“地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元构造包含在内。

张侃老师认为，上述中日学者的对话及成果，促使自己不知不觉地将“地域社会论”带入中共革命的研究中去，在不同层级的空间、网络中，关注形成社会行动人群及其指导者的思想、价值观及其结构性的行动。近年来，在受到历史人类学的进一步启发下，张侃老师通过田野调查，依据地方性材料开展了初步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一，全球范围革命的政治策略与话语体系，如何渗透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展现；二，革命的控制技术及其限度；三，地域社会中的革命情感与历史意识。

地域研究要求学者进入地域社会考察内部长期延续的结构性因素。张侃老师注意到《红色中华》曾细致报道红军处决童子兵、揭穿其迷信行为的事件。这与明清以来的地域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明清以来，闽西赣南地区人口流动较大、商品经济活动发达，民间教门活跃，内含一种反抗国家权力的基因。而红军进入后引发地方紧张，触动了这种社会潜在结构，童子军与红军的冲突即由此而起，地域社会可以为理解政治行动提供新的视角。此外，苏区时期留存了大量讨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献。“异己分子”不仅是苏区革命的政治话语，而且内含着地域社会的权力互动。“谁‘是’异己分子”常常与宗族关系、社区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如何立体分析革命概念内涵及其实践，必须回到地域社会的历史情境下展开论述。

张侃老师说，在革命展开之初，制度的设计者往往不考虑或者忽略地域社会的

具体条件的限制，但当政策落实到乡里或村庄时，技术设计的理想与技术展开的现实不免发生矛盾。他曾利用连城新泉革命纪念馆所藏的一份1929—1930年的“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分析包括布告、报告、信函、判词等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留存的文献，结果发现，显示出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执行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而经济动员和经济管理关乎财政汲取问题，也是统治技术的表征。通过分析地方博物馆中的账册或会计报表，可发现苏维埃政权获取财政资源的技术受到特定地域传统、民国通则与苏维埃模式三方面的影响，实际上，部分中共领导人也是善于运用多种来源组成的技术提高国家政权的汲取能力。由此可见，讨论革命的控制技术及其限度等问题必须进入具体的、小尺度的区域中才能完成。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各种民间文献和口述访谈，革命不仅仅表现为行动实践，同时也展现了极为复杂的社会观念，而这与地域社会的情感结构关系密切。张侃老师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从当地百姓道士手中获得一批道教科仪文书。其中一份写于1949年的文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文书与1948年采用中华民国纪年、1950年采用公元纪年的文书不同，运用了道教纪年的书写方式，文末注明为“天运三十八年”，生动地反映出一位道士面对政权更替时微妙的心理变化。张侃老师认为，百姓们往往将革命看作“命”“运”，直到今天仍是乡村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有怎

样的关系，需要研究者深入田野，在历史的共鸣中寻求答案。

对此，王奇生老师表示，厦门大学有着明清史研究和地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其革命研究即接续这一传统发展而来。张侃老师延续厦门大学的历史学统，展现出不论是世界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需要面临革命落地的问题。

李里峰老师从“反地域视野”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地域视野的含义及其内在逻辑，并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指出，中共革命的共性事实上超越了地域性的差异。李里峰老师认为，山西大学和厦门大学一向有从地域角度研究中共革命的传统，其原因在于视野上溯至明清，并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加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往往会注意到差异性。地域视野的研究，从层级来看将重心放在地方，必然会关注异质性，侧重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自主性的面相。而自己在研究中更偏重中共革命的后果和影响，偏重从政治学角度观察历史问题，因而也更着意于中共革命的共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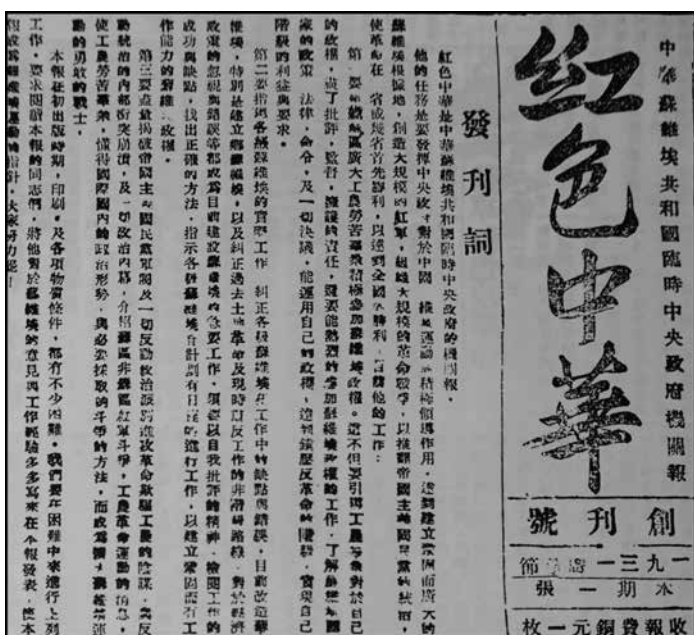
李里峰老师回顾个人研究经历，谈到博士阶段以来，自己曾广泛利用河北和山东档案馆档案、满铁调查资料与《翻身》《十里店》等材料，先后讨论过华北地区抗战时期中共的组织结构与土地改革等问题，逐渐发现华北虽然常常被视作一个地域，实际上却可能没有那么特殊。关于土地占有问题，中国各个区域的情况均明显偏离中共中央的估计。1946年，《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

占92%，地主、富农约占8%；1947年《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认定8%的地主占据了70%到80%的土地。然而，《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等资料显示，全国各个主要区域，土地集中程度均不高。此外，李里峰老师还注意到70%左右的华北农户均拥有自己的土地，说明农村社会结构中中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大多数。而在地主占有土地较多的村庄，地主也往往属于不在地主，因此村庄内部租佃关系更加微弱。基于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至少在抗战之前，农村社会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因此，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农民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将各个地区的特殊表现综合考察，可以看到革命前乡村社会的共性和中共革命的共性。

李里峰老师指出，“中共革命为何会发生，又为何能取得成功”是中共革命研究的元问题之一，很多学者都曾就此发表见解。詹隼(Chalmers Johnson)首倡“农民民族主义”模式，认为中共利用抗战时期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以塞尔登(Mark Selden)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模式，强调中共通过灵活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参与实践，唤醒了广

大农民的政治意识，释放了乡村社会中的巨大革命潜力；片冈铁哉和詹隼正好相反，认为革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化控制能力。斯考切波和陈永发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斯考切波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强调革命是发生而不是制造的，具体而言，旧制度中地主与农民之关系、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关系、国家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因素”，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陈永发在描述抗战时期华中和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时，特别强调中共动员策略的重要性，他著作的标题“making revolution”既可以理解为中共通过动员农民而“制造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经由中共动员而去“干革命”。

这些解释模式表面看来迥然不同，却都揭示出中共民众动员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



《红色中华》创刊号发刊词

要性。中共面对各地复杂情况，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策略，表现出极强的调适能力，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中共革命是一场“地方性革命”。李里峰老师同意“地方性革命”的说法，但强调地方性之上的共通性特征同样不容忽视。

从大革命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大革命时期“只打土豪、不分田地”，惟有调动民众的参与情感吸引农民参与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中共通过动员，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弱化阶级色彩；内战时期动员话语的阶级色彩重新变得明显起来。

尽管四个时期的阶段性非常显著，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的目标和手段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中共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革命、加入党组织或农民组织，争取民众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服从（行为上的）、认同（心理上的）和感激（情感上的），并从实际行动上为革命提供物力支持（主要体现为田赋和公粮）和人力支持（主要体现为参军和支前）。

为实现上述动员目标，中共采用利益满足、身份建构、情感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中共通过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农民则以提供种种支持作为回报。与此同时，从大革命直到解放战争，虽然中共处理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政策时常变动，但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标签始终没

有变。此外，与国民党诉诸道德伦理的动员手段不同，不管各个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是谁，调动民众情绪（无论是民族情感还是阶级情感）以激发其对敌人之仇恨和对中共之爱戴，一直是中共重要的动员工具。上述共性超越了地区的差异，有助于中共在因地制宜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一个个小的成就，最终凝结为大的成功。

王奇生老师认为，上述报告从地域视野和超越地域视野两个角度对中共革命展开了精彩分析。的确，相对于中国近百年来其他事件或运动而言，中共革命总体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共性。前述中共革命在民众动员之目标和手段上的共同点，也有可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胡英泽老师由反思区域概念展开讨论。胡英泽老师指出，区域是客观的存在，区域也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疫情期间，胡英泽老师阅读《资治通鉴》，深刻感受到只有在理解整体史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区域史。恩格斯曾说：“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

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讲的这段话，揭示出研究者永远需要面临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间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也反映了总体和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区域的划分。如以王朝天下结构为基础的“九州”、食盐的产销区域、施坚雅反思行政层级而提出的“市场体系”及区域划分、各级行政区划等等。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区域发展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熟悉的时局图、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图等均与此有关。中共领导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点到面的发展，恰恰就是以某个区域为基础而展开的。此外，沿海和内地之分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空间形式。

因此，区域仍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概念。区域是否存在？特定的区域形式是否重要？区域研究的假设和立足点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有待学人作进一步思考。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出，历史研究中有两种假设。其一为“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思想的工具，只要这种划分仍旧能够说明问题便为正当，而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第二“把历史划分为地理区域，也不是事实，只是一种假

设而已：在一些场合，提出欧洲史这一说法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有益的假设，但在另一些场合却会起误导作用、有害作用。”

y 学派所强调的“总体史”的意义包括三方面，不一定是各方面内容的综合，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可以是时间上短期与长期的研究。历史综合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横向叠加，而更应当是点和面的结合，如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宏观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

胡英泽老师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共党史不仅是中国史，还是亚洲史，虽然有时能力不足（指本人），但要有这个关怀。其次，中共党史是国际共运史的一部分，国际性非常强。最后，中共党史不仅要研究共产党本身，还需要研究对手方，看对手方如何看待中共。

胡英泽老师回应了李里峰老师的主张，就“共同性与特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布洛赫（Ernst Bloch）在《法国农村史》中指出：“甚至有时候，把视野放在整整一个民族的范围中还嫌不够，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全法国，我们怎么能抓住各不同地区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呢？推而广之，法国的发展运动只有放到全欧洲范围内来考察才能显出其真正意义。这种研究，既不是强迫同化，更不明确区分，也不是像玩拼照片游戏那样构建一个虚假的、传统的、模糊的总体形象，而是通过对比，在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因此，我们更需要在共同性的

基础上认识独特性。多年山西地域社会的研究经历，使胡英泽老师意识到“多村庄的比较视野”的重要性。有关中国近代的乡村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个案。如韩丁在《翻身》中谈到，在整个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同时，形成山西张庄的某些客观条件，某些内部特点及其一些具体事件的发展情况，有着其特殊性。例如，张庄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天主教集团，张庄居民中有很多外来户，因此，张庄的宗族组织不发达，而宗族在中国历史中起着很大作用。还有，张庄被日军占领和据守过。张庄的天主教堂即是西方殖民者的一个隐喻。韩丁在《深翻》中同样强调了村庄研究中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问题。

结合个人研究，胡英泽老师强调要注意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人的流动性、村庄及其内部差异性和经济结构多样性。明清以来，山西的人口跨区域流动性较强，而外来户依靠传统手段很难实现向上流动，革命的到来则给予他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许多著名的劳模和积极分子原本是村庄的外来户，这一点绝非偶然。此外，村庄内部也不是同质性的整体，不同的社区和生产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人民公社在实际运行中也没有执行“平均分配”的政策。最后，地域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多样性，往往是农林牧副渔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产业的结合。因此，单纯认为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改变了村庄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分析。如土地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果树的分配，但没有触动原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山西部分依靠煤炭资源发

展的村庄，其发展逻辑也不一定符合前述简单判断。由上述思考出发，胡英泽老师还提出“典型推广”是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不论是一地的正面榜样还是反面典型，可能会被推广到其他区域，由特殊性发展为一般性。

报告最后，胡英泽老师指出，区域史研究应该抱有整体史的关怀，重视区域社会内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国家与地方的上下关系、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横向关系等，克服区域实体化、区域边界固化的倾向。关注人的流动性，则有助于我们打破区域边界，通过比较研究，借助长时段的视野，更好地认识乡村社会。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诗古老师与会，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注意国家性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层次中推进的差异。个案是历史研究的试验田，但若展现个案力度，需要研究者努力呈现个案的放射性。论坛最后，各位学者还讨论了土地集中程度与革命烈度的关系、政治文件中数字比例的来源及信度等问题。

（撰稿：张学骞）



138

郑炳林、王丁、黄维忠、白玉冬 | 文书碑志与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



2021年5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3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文书碑志与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主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郑炳林、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和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作主题报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宝海

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本次论坛。

报告环节首先发言的是郑炳林老师，报告题目为“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及其有关问题”。郑炳林老师表示，尽管目前敦煌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学界一直没有理清汉唐时期的敦煌历史，许多方面甚至仍是空白，多年来他在教学中都不得不绕着讲。因此近年来他决定从事两汉敦煌历史研究，本次报告的就是有关敦煌设郡的部分内容。

郑炳林老师提出，敦煌郡设置的背景是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人投降汉朝，西汉武帝希望打开西域通道，加强与西域诸国交流。但就具体设置时间而言，《汉书》《史记》等记载有诸多矛盾，因此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最早为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后元年间（前88-87）。郑炳林老师认为，考虑到浑邪王投降与汉朝置敦煌郡不应太远，元鼎六年应更为可靠。此外，敦煌虽在先秦时期已有居民，但考虑到他们的生活习惯，彼时筑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敦煌城池的修建时间应当就是西汉置敦煌郡的时间。在这方面，敦煌地理文书P.2691《沙州城土境》、S.5693《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和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都记载敦煌城建于元鼎六年。

郑炳林老师提出，西汉从票侯赵破奴应当是置敦煌郡的关键人物。赵破奴在元狩二年霍去病北征匈奴一役中功绩卓著，后虽坐酎金失侯但官职仍旧，元鼎六年奉命征匈奴，此后应当一直坐镇河西。虽然还没有史料证据，但设置敦煌郡很可能就是赵破奴提议的。赵破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用近8年时间开凿了防御工事土河，并由此确定了敦煌郡的管辖范围。总的来说，在赵破奴手下，敦煌地区完成了从军事建置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他也因此被封为浞野侯。

敦煌设郡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移民实边。郑炳林老师提出，汉武帝最初并未考虑移民实边，而是接受张骞的提议将乌孙移徙到浑邪王故地，可惜这一计划因乌孙国“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制。骞不得其要领”而破产。西汉敦煌移民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代敦煌移民主要是戍守敦煌的军人，且具备地域性，比如敦煌写本P.4640《阴处士碑》记载阴氏先祖率领的军队主要为南阳新野人。敦煌置郡后的移民主体是因犯罪被贬的官员，比如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的清河张氏和巨鹿索氏、《汉书·成帝纪》记载将作大匠解万年因营昌陵工程三年不成被徙敦煌、《汉书·李寻传》记载学术之争引发狱案后一批文士被徙敦煌等。郑炳林老师认为，置郡之后的这批移民文化素养普遍较高，具有文化移民的特色，敦煌后来文化发展程度较高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二位发言的是王丁老师，他以“人名、地名与西域历史”为题介绍了自己近年来在中古时期胡名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胡名，是非汉语名字的汉文表示形式，既包括非汉语名字的汉文记音转写（即音

译），也包括义译名及胡人所起的纯汉语名。研究范围既包括粟特人名，也包括一些不是粟特人但使用粟特人名的情况。在研究方法方面，共分为辑名、辨字、审音、探源、释义和证史六个环节。王丁老师指出，人名学在国际学界是跨学科的文化史分支领域，其中跨语言的人名研究尤称难治，但对于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古代中国而言，这类人名的解读对文化交流史认知意义甚大。王丁老师表示，西域出土文书中的名籍最具典型性质，如吐鲁番《曹莫门陶等名籍》出现了41个人名，绝大多数属于伊朗语系统人名的汉字音译，到目前为止已泰半有解。再比如《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虽然这是行政文书，但可以看作广义名籍，其中记载56人，包括汉姓19人、非汉姓37人，且非汉姓的人物大多为“昭武九姓”。敦煌出土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敦煌从化乡差科簿》显示了一个以粟特人主要居民的超过两百个男性的聚落，自1965年池田温的全面研究为起始，引发了国际学界对汉文记录胡语人名的接力式的系统研究。

接下来王丁老师以“三奴”为例具体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经验。最早提出颜真卿《康公神道碑》中唐代胡人石三奴的名字释义问题的是学者恒宁（W. B. Henning），他认为“三奴”语源是中古波斯语的S ē bu χ t，意为“为三位神祇所拯救”。这种解说引起后续学者的进一步推论，比如日纽（Ph. Gignoux）就发问，S ē bu χ t是否即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为三一所救赎（la Trinité des chrétiens）”。就此而言，王丁老师赞同恒宁关于人名中的“三奴”是宗教性概念的判断，不同之处在于，王丁老师认为“三奴”的语源也有可能来自



《弟吴宗教源流》书影

佛教的“三宝奴”（梵语 *Triratna-d ā sa*），不过省去“宝”字，以适应汉语二字人名的常例。在证史方面，王丁老师表示，尽管目前知见所及隋唐五代时期胡姓人“三宝奴”名字的实例暂时阙如，但回鹘人名多见以佛、法、僧各自与“奴”字结合，如“佛奴”“法奴”“僧奴”乃至“师奴”等，这些都是“三宝奴”的分别表达形式。“三奴”作为人名，不唯为胡人人群所乐称（如敦煌文书中多次出现的曹三奴），在中古汉人当中多见（如敦煌文书中有刘三奴、宋三奴、索三奴、万三奴、张三奴）。但是，着眼于更大范围的人名形式，人们可以发现，中古胡人与汉人混居融合，在人名文化上濡染汉风，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接受了汉人的“行第名”这种接地气的起名方式，如男孩名“序数字+郎”（罗九郎，S.5747v 社人名目），女孩名“序数字+娘”（安三娘，S.542v 沙州诸寺户妻女名簿）等，“二奴”（康二奴，P.2912v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麦粟粉疏）、“三奴”、“五奴”（石件奴，唐开元二十三年因为孝道卓著受到旌表的相州汤阴县人，见册府元龟卷一三九）不过不是三郎、五郎的另一种叫法。在这一背景下，石三奴的名字便属于世俗义的行第名，与宗教意义了无瓜葛。

就“奴”字在人名中的使用，王丁老师提出，要注意存在世俗义和虔敬义两种用法，前者在中原文化中源远流长，“奴”往往已不是“奴隶”“奴才”的本来意义，而是“子”“郎”等男性称谓的代名词。后者虔敬义，则是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取名方式，在中国人名文化中大范围普及，很可能与佛教有关。

随后，王丁老师以《粟特语女仆买卖契》为例，讨论了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

这篇文书于1969年在吐鲁番出土，1989年由日本学者吉田丰首次做出解读，至今已有五个版本的日、中、法、英语译文，其中吉田丰2004年的全文英译最为重要。买主名为 *šmny y'nsy'n'xw'wt' BRY c'n kwtr*（“张 Uta 之子、沙门 Yansian”），其中 Yansian 一名起初整理者未予解释，林梅村著文推测这个名字与梵语 *Y ā nasen ā*，汉译为“乘军”。2004年吉田丰再次处理这篇粟特语重要文献，这个名字，他译为“张延相”，与同时代吐鲁番汉文文书中记载的同名僧人成功对上，语言、事实两方面到此都得到落实，可为定论。卖家名为 *Wakhušuvirt*，此前也晦暗不明，林梅村译为“六获”，但未说明理据。王丁老师认为，既然文契里写明卖主是康国人，他的名字仍应该在粟特语范围求证。*Wakhušu* 即“乌浒（水）”，所以这个名字其实不过就是“得自乌浒水（神）”的意思，参照吐鲁番文书和唐代墓志中已见音译形式，可以构拟为“握/乌度毗”“沃休鼻”。

关于文书中出现的地名 *twrkstn / Turkestan*，学界一般按字面意思直接解释为“突厥斯坦、突厥地面”“突厥人的国度”。王丁老师认为，这从语言方面看未尝不可，但着眼历史，635年前后西突厥五咄陆部落正面临与弩失毕部落的纷争，最终以伊利河为界，其东属咄陆部，其西属弩失毕部。因此639年立契之际的 *Turkestan* 应该理解为“咄陆部”。另一个地名 *cyn'nckn δ* 字面意思是“China-town”，吉田丰释为“高昌”，为此后的大多数学者信从。但是也有提议紧贴字面译为“秦城”的主张。王丁老师认为，虽然这一回译初看固然非常精彩，但目前所知的吐鲁番盆地称为“秦城”的地方都是后面跟着一个“泽”字，具体

所在、规模大小不明，可能只是一个小地名，不会以之代表高昌这一有过国家级别的地名。地名、族名的复原应充分注意历史情况。

最后，王丁老师讨论了胡语人名中的“以国为姓”问题，比如源于吐火罗国的罗姓，可能源于花刺子模王朝的花姓。有关由近年发现的《花献墓志》引起的对“花”姓的探讨，王丁老师盘点了唐五代史籍和文书中出现的花姓人物，其身份基本都是武官，可以认为这些胡族人物是在中原从事“世业”的“蕃将”。有学者据此认为花木兰也属此例，王丁老师认为，花木兰并不是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木兰辞》中主人公的名字只是“木兰”二字，并无“花”这个姓氏，花姓的情节为后人增益。中亚国家花刺子模的前身在中国史籍中早有记载，国名记作“呼似密”、“火辞弥”、“过利”、“货利习弥”、“火寻”，由“火寻”而来的姓氏“寻”，在唐代有寻相（唐刘武周部下将领，唐武德三年与尉迟敬德一起降唐）、寻威仁（见于龙门石窟西山老龙窝上方峭壁上的一处造像洞题名，时间属唐高宗时期）为证。唐代的花、寻两姓可以看作“以国为姓”的形式，这是我们以往所不知的，也从侧面提供了观察中原与这个西域国度的关系的线索。花刺子模为蒙元时代以后的译名，现在根据花姓人物的姓名，可以推测隋唐之世或许也有用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花”字译 *Khw ā razm* 的第一个音节的作法，只不过没有传播开。

黄维忠老师的报告题目是“12世纪藏文史籍对朗达玛灭佛事件的构建”。学界目前基本认为朗达玛灭佛事件是后世藏传佛学家构建的结果。黄维忠老师利用一些早期藏文史籍，尝试从文本梳理角度讨论这一事件的具体构建过程。

朗达玛是吐蕃末代赞普，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后世藏族佛教史家鞭挞的“朗达玛灭佛”事件，许多藏文史籍中的王统史、教法史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分为前宏期、黑暗期和后宏期。学界已有的研究指出，神学史观对达磨的塑造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名号的塑造，达磨普登基前的名字为“达磨 (*dar ma/དར་མ་*)”、登基后的尊号为“吾东丹 (*vu vl dum btan/བུ་བླ་དུམ་བཏན་*)”或“吾东赞 (*vu dum btsan/བུ་དུམ་བཏན་*)”、后世污蔑性的绰号如“朗达玛 (*lang*

出现的胡母思之名见于《辽史》，是札刺亦儿分族，以及景教在蒙古高原西部和高昌回鹘境内的流传三个原因，可以推测此碑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早期，约九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初期。

最后，白玉冬老师指出，作为华夏最古老的最高统治者称号，“王”在夏商西周时期就为包括北狄在内的周边族群所熟知不必怀疑。带有韵尾 η 的王之音写 ong 在上古时期传入漠北等北方边地，此看法与实情相合。匈奴称号左右屠耆王、左右谷蠡王和脱旄王等的王，即是对华夏称号王的直接借用。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人借用了汉语“王”（oo、ong），突厥汗国鲁尼文碑文出现两种“王”（oo、ong），回鹘文文献中有三种“王”（ong、oo、wang）。最早传入北方民族语中的华夏称号“王”音 ong 是《广韵》系统音。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又有西北方音的“王”传入北族，作 wo（oo）。

报告环节结束后，五位与谈人分别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荣新江老师表示，陈寅恪等前辈学者都曾指出胡名比胡姓更为关键，就此而言王丁老师的工作尤有意义。荣新江老师曾指导过一位本科生梳理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百姓人名，发现虽然都是粟特名，但其中一些人可能属于吐火罗等其他族群，因要入籍故请粟特人帮忙取名，于是粟特人把自己族群的名字嫁接到他们身上。关于朗达玛灭佛，荣老师指出，一些敦煌学研究者发现许多藏文佛典实为 10 世纪而非吐蕃时期形成，阿里地区的文献或许也有相似情况，可与敦煌文献相印证。郝春文老师提出，从方法上讲，郑炳林老师的基本研究路径是对读敦煌碑铭赞和相关传世记载，但敦

煌文书中有许多是后人追记，因此与最早文献对读时是否可能出现偏误。关于胡名研究，郝春文老师指出学界一般根据姓氏判断其人所属族群，但一些胡姓实为汉姓，比如边疆的曹姓也可能是曹操后人。

乌云毕力格老师分享了蒙元史领域的姓名研究情况，他表示虽然蒙古姓氏与族群有一定规律，但同姓可能对应多个来源，如果今人已忘记其原有蒙古语姓氏，研究者便无法复原。关于北疆碑铭中的“王”，乌云毕力格老师提出疑问，“王”字传播至北疆确有可能，但为何会出现一块碑上同时有“ong”和“wo”两种用法的情况？高峰枫老师结合自己对五世纪拉丁文本的研究指出，人名研究或许可以将时间维度纳入考量，如同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人名，若出现在该宗教的兴起期可能说明很多信息，若出现在风行期也许便无很大解读价值。党宝海老师介绍了金元时期人名中的“奴”字常见用法，并就“wo”和“ong”的鼻辅音脱落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元明清时期汉语进入蒙古语时很少见到脱落现象。

（撰稿：孔祥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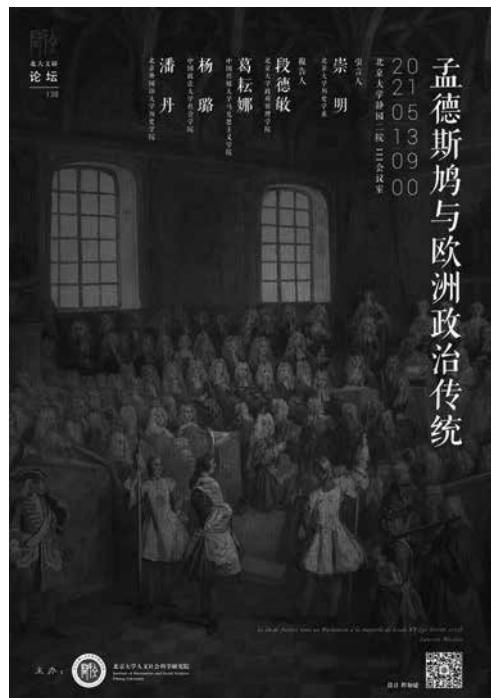
139

崇明 | 孟德斯鸠与欧洲政治传统

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 139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孟德斯鸠与欧洲政治传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作引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葛耘娜、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璐、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潘丹出席并参与讨论。

崇明老师首先就孟德斯鸠思想阐释史的几个方面展开介绍。作为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鸠被视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在西方思想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一方面，他在继承了近代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上的政体和法律进行了广泛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密切细微地观察了欧洲政治和社会的演变特别是商业社会的发展，对正在兴起的现代性展开了批判性的展望和思考。他既坚持普遍性的自然和自然法的规范意义，也注重理解人类政体、法律、社会和风尚的多样性，并且依据这两方面提倡一种审慎节制的启蒙。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英美学术界）对孟德斯鸠的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认识到，针对今天由于权力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过分膨胀而造成的社会分化和民



主危机，孟德斯鸠致力于结合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审慎启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晚清就被严复先生翻译为中文，但中国学界长期只知孟德斯鸠其名而对其思想缺乏实质研究。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关注和研究孟德斯鸠思想的青年学者，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改变了这种局面。鉴于孟德斯鸠思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他的中国论述及其著述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传播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有必要进一步在中国学术界推动孟德斯鸠研究。今

年恰逢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1721）出版三百周年，所以借助这一契机而组织论坛，邀请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孟德斯鸠的几位青年学者，以孟德斯鸠与欧洲政治传统的关系为主题，探讨孟德斯鸠对欧洲政治传统的思考以及他的思考如何促进了这一传统的转化。

崇明老师指出，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出现了大量对孟德斯鸠思想的评论和研究。其中有四种有代表性的对孟德斯鸠的阐释，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孟德斯鸠思想复杂而多元的面向：

第一种是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阐释。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是社会学的先驱，他首先从传统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来理解孟德斯鸠的原创性。涂尔干批判传统哲学没有意识到社会事物的独立

性。哲学家关心“应当”和“未来”，而涂尔干则认为社会科学应该研究社会事实，而非人的意志。孟德斯鸠认识到了政治和法律背后的种种社会事物才是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虽然孟德斯鸠强调从各民族的社会自然理解其法律的必要性，但他依然强调自然法和普遍正义的重要性。涂尔干则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孟德斯鸠坚持人性总是比社会性更神圣，因而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窠臼。

第二种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阐释。阿尔都塞认为孟德斯鸠建立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研究方式。孟德斯鸠的科学性首先体现于使学术研究独立于宗教。譬如他强调不是从神学而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理解宗教，阿尔都塞认为孟德斯鸠提出了“宗教社会学”。此外，在阿尔都塞看来，孟德斯鸠与自然法学派拉开了距离，拒绝了社会契约论，关注“事实”而非“应当”，因此孟德斯鸠是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但阿尔都塞也遇到了和涂尔干类似的困难。他注意到，孟德斯鸠反复声明自然具有一种普遍的正当性，并认为立法者应该考虑普遍的人性。在阿尔都塞看来，这表明孟德斯鸠的科学性不够彻底，因为他还是回到了追求永恒价值的“乏味”的传统当中。

第三种是阿隆（Raymond Aron）的阐释。阿隆也首先指出了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色彩。孟德斯鸠看似传统的政体划分背后具有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因为政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规模，政体的原则要求特点的社会组织方式，如民主共和国的原则是爱祖国和爱平等，因

此建立以维护平等为原则的社会组织方式；君主制以荣誉为原则，就要建立相应的以等级为原则的社会组织方式。但阿隆指出孟德斯鸠并没有陷入社会学的决定论之中，他始终坚持人类自由的正当性，强调政体是人类生活中一种主导性的多元力量。在阿隆看来，孟德斯鸠的思想结合了传统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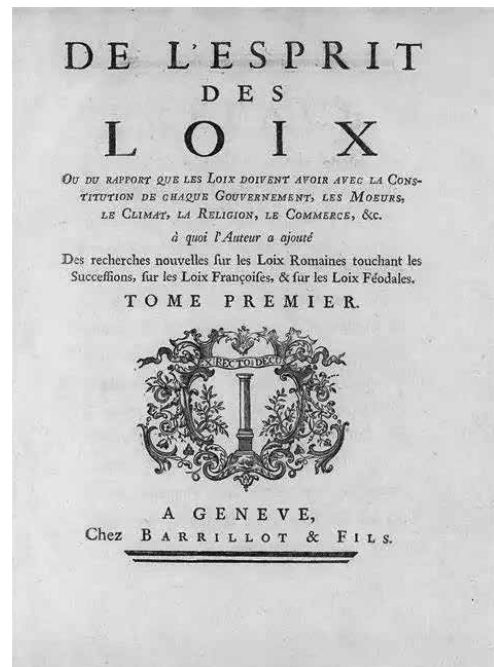
第四种是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阐释。斯特劳斯也指出了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特点。孟德斯鸠从法律的外在因素，如气候、土壤、民情来解释法，带来了从政治学向政治社会学的转变。不过，斯特劳斯指出，孟德斯鸠并未将法简单还原为社会因素，依然以政体为框架来理解和阐释法律。另一方面，孟德斯鸠的思想延续了现代自然法的传统，基本面貌仍然是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从古今之变的角度阐释孟德斯鸠，认为其将人的自我保全、自由和财富的积累作为政治的目标，致力于以现代自由取代古代德性。此外，斯特劳斯学派普遍重视孟德斯鸠对商业的论述，认为孟德斯鸠是提倡现代商业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

从这四种阐释来看，对孟德斯鸠的研究可以从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进行，而这两个角度之间则存在张力。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涂尔干和阿尔都塞主要关注孟德斯鸠对社会和历史事实的重视和分析，但孟德斯鸠对普遍自然的强调所表现出的哲学色彩让他们感到不满；阿隆则强调要同时考察孟德斯鸠思想中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两个维度，他强调孟德斯鸠通过宪政和多元社会力量维持自由的努

力，而对孟德斯鸠思想中的现代性色彩重视不够；施特劳斯学派则试图将孟德斯鸠塑造为主张建立商业共和国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但往往淡化和忽视了孟德斯鸠对君主制的详细论述，没有公正地对待孟德斯鸠思想的复杂性。通过这四种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复杂性，对它的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其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维度，需要结合欧洲政治传统和孟德斯鸠时代的历史语境来进行。

报告环节，葛耘娜老师首先聚焦于孟德斯鸠的早期作品《论欧洲统一君主国》。在孟德斯鸠所处的年代，欧洲和法国新的政治传统正在孕育和生长，孟德斯鸠忧心于法国未来的出路，其作品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断裂与未来可能的前景。从孟德斯鸠早期的“三联作”《论西班牙的财富》、《论欧洲统一君主国》、《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我们可以抓取到一些关键词：财富（Richesses），统一（Universelle）和强大（Grandeur），可见当时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论欧洲统一君主国》是孟德斯鸠第一篇专门写政治问题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统一欧洲的几种可能的模板。

孟德斯鸠首先考察了历史上最先实现统一的罗马。他曾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出，罗马的强盛出自一系列伟大的国王，而共和国的制度与共和国的首领之间共生的关系，使罗马成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然而，罗马的模板并不适用于此时的欧洲。首先，罗马式的征服在道德上已经不可能了，更加文明化的方式塑造了当前欧洲的政治生态。第二，随着战争技术和组织的变革，与古代战场相比，伤亡减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书影

战争已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三，在海洋贸易时代，致胜的关键不在于士兵，而在于财富。第四，与古代不同，如今打仗并不划算，而且久战不利，会造成大量消耗。最后，在开放的世界中，战争技艺、战争供给等方面，国家间也会互相效仿。

孟德斯鸠还分别探讨了封建、教皇、鞑靼、西班牙等可能的模式。在封建时代，查理曼曾短暂地建立起大帝国。然而，帝国很快分裂，在封建制度下，很难借助分封扩展国王的势力而获得统一。诺曼征服所反映的问题也类似，虽然在当时国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但征服的时间越久，封臣对国王的忠诚就越少。后来，教皇原本有些实现统一的有利条件，比如君主们都有被革除教籍的担忧，大君主软弱、小君主繁多而力量分散。但是，其致命的缺陷在于长期的教派斗争，内耗严重。孟德斯鸠又将目光转向作为世界征服者的鞑靼，鞑靼人残忍而坚韧，但是选错了进攻欧洲的方向，当他们取得克里米亚后便无法再北进。此时，孟德斯鸠指出了在气候地理上的规律，北方可以征服南方，但南方征服北方一定会止步。接着，孟德斯鸠又回到西班牙这一较近的例子。葛耘娜老师指出，西班牙是孟德斯鸠特别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他不仅专门写了《论西班牙的财富》，而且在《论法的精神》中也给予大量篇幅论述。查理五世几乎取得了欧洲统一，西班牙在欧洲内外构建帝国的野心也似乎成为了法国效仿的对象。然而，西班牙从美洲劫掠金银并没有获得繁荣，由于金银仅仅是财富的符号，而不是财富本身，这种征服的模式不值得效仿。

法国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君主国是否有可能呢？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要维持广大的疆域十分困难，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来防范叛乱。例如，波斯疆域广大，很容易受到攻击，军队一旦溃散就很难再集合起来。孟德斯鸠还举了中国的例子，由于大米歉收而引发的起义，起义如果没有被消灭在萌芽中，就有可能成功。其次，基于欧洲的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指出毁灭邻国而富裕自己的方案只会导致自我毁灭。而对财政危机的关注又使他注意到东方帝国和欧洲帝国的区别，他认为东方帝国的征税较为稳定，但欧洲为了扩张不断加税，予取予求，而将国家拖入深渊。

最后，葛耘娜老师总结道，这篇文章与同时期写作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都在探讨国家如何实现强盛，但与强盛(*grandeur*)相比，他似乎更加关心如何防止衰落(*décadence*)的问题。在孟德斯鸠看来，法国应该关注的不是在欧洲重建一个统一的君主国，而是避免效仿诸如罗马、西班牙这样的模板。进一步讲，在18世纪，*Grandeur*指的是什么？它不再是获得广大的土地，而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的财富不是由战争手段而进行的劫掠，而是去源源不断地获得“不动产”，这便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释的商业社会的到来。

第二位发言的是杨璐老师，报告题目为“孟德斯鸠理论中的封建法问题”。杨璐老师指出，《论法的精神》后四章(27、28、30、31章)的存在使许多评论家感到茫然不解。而从孟德斯鸠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几章具有特殊意义。阿隆和阿尔都塞

将孟德斯鸠讲封建法放在18世纪上半叶以降法国政治辩论中理解。当时的辩论可分为两派：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罗马派认为法兰克人是被邀请到高卢作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法国政体继承罗马帝国体制，是一种绝对君主制。另一派是日耳曼派，强调贵族的特权是古老的，源自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君主只不过是一种贵族首领，由贵族选举产生。第三等级是由奴隶产生的。他们贬低第三等级，希望恢复古代的封建秩序。阿隆和阿尔都塞都认为孟德斯鸠的封建法代表了他的日耳曼派的立场。杨璐老师指出，如果只是从政治论辩去理解封建法，孟德斯鸠理论的丰富性就可能被遮蔽。

第一，孟德斯鸠反复在风俗志和封建法之间进行对比，他只是借助封建法来辨析和探寻风俗及其变异所开启的制度形态及变动趋势。第二，孟德斯鸠其实在这里塑造了一种新的对“国”的理解，这是一种不同于用主权(*souverain*)来理解国家的方式。比如在第30、31章，孟德斯鸠很少使用“*État*”这个概念(只有8处)，而多数都在用“*nation*”。第三，在封建法这个问题上，孟德斯其实超越了第一章对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的简单划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潜藏在欧洲历史中的“哥特式政体”，它既不是简单的君主制，也



孟德斯鸠墓

不是简单的贵族制或民主制，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形态。而它恰恰构成了与东方专制主义政体的对比。所以，孟德斯鸠开启了某种文明比较研究，这是只读《论法》前部分是很难体会到的。抽离封建法，读者很容易把《论法》理解成一种权力制衡的配置。但是，封建法恰恰让读者看到某种自然的、有机的政治社会形态。

杨璐老师指出，孟德斯鸠在封建法的开篇就说，封建法是属人的，不是属地的。这种属人性既体现在“子女遵从父亲的法律、妻子遵从丈夫的法律，寡妇恢复氏族的法律，脱离奴籍的人遵从原主人的法律”，也体现在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没有制定全国的整齐划一的法律，而是保留了各部族的风俗和习惯，各部族按各部族的法律裁判。之所以如此，孟德斯鸠将之追溯到法兰克人的牧人的生活形态及其精神。牧人是流动的、自由不羁的。日耳曼人的封建王国最初只有附庸，没有领地。

这是一种非领土国家的政治构建方式，与自然法派通过私人财产权构建政治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杨璐老师表示，封建法里最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附庸关系（vassalage）。最初的封臣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依附关系，人和人之间是暂时的附属关系，以军事动员机制的荣誉竞争为基础。这不是土地占有或租佃关系。哥特式王权是一种有限的王权，暗含了一种日耳曼人选择首领的习惯。这种哥特式王权就内含一种无序。只要统治者过于任意，不会平衡，王国就会四分五裂。所以，虽然尚武的风俗腐化了，但最终三等级制衡结构却确立，国家由四分五裂走向秩序统一。

孟德斯鸠认为，英国政制是极为特殊的，是以自由为政治目的的。而从封建法的历史可以看出，法国本身就蕴含着欧洲国家的分而治之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就孕育着君主国可以得到的自由。就像孟德斯鸠所言，“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荣誉，却带来伟大的成就，这种幸福不亚于自由本身。”倘若剧烈地将中间的有机结构去掉，人民短时间内培养不起对法律的爱和共和国德性，君主极易直接沦为专制。

封建法不同于自然法。风俗具有自然法的普遍规范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蕴含着一个民族所看重的人的基本权利。自然是风俗的源头。气候和地理环境、种族融合和征服都会给该族群留下自然的痕迹。不是政治家的法律规定风俗，而是政治需要风俗来组建，需要风俗作为基础。最后，杨璐老师强调封建法的精义：孟德斯鸠认为哥特式君主政体是一种好的政体，因为

它的内在活力恰恰在于本身具有变成更好的政体的可能性，充满自我更新和纠正的高度灵活性和生命力。

随后，段德敏老师以“孟德斯鸠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题展开报告，探究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思想之间的关系。段德敏老师关注的问题是：马基雅维利在孟德斯鸠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事实上，孟德斯鸠受到马基雅维利影响的迹象在很早就已出现。比如《论罗马的宗教政治》就有些类似于《论李维》中对宗教的讨论，而《义务论》则带有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转折点出现在1734年左右，孟德斯鸠在欧洲的游历——特别是对英国的访问——使他对马基雅维利产生了更多认识。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在孟德斯鸠时期的法国更多是负面的，而英国共和主义者哈林顿、悉德尼等人则倾向于以更积极和正面的态度来对待其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英国的章节就受到了哈林顿等人的影响。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的相似之处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例如《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纠纷”与《论李维》中的“骚乱”是相呼应的。

《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到马基雅维利的地方有三处，其中第四卷第21章第20节“贸易如何冲破欧洲的野蛮”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当做负面的词汇。而在第一卷第6章第5节“在什么政体下元首可以当裁判官”中则将马基雅维利称为“这位伟大的人”。

关于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的起点大概是1864年莫里

斯·若利（Maurice Joly）写的小册子“The Dialogue in Hell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ntesquieu”，两人分别是邪恶与正义的代表。后来，研究者们一方面肯定了马基雅维利确实对孟德斯鸠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则认为“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别构成了二人之间最核心的分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段德敏老师考察了孟德斯鸠第一卷第6章第5节中对《论李维》第一卷第7章“在一个共和国里指控权对于保持它的自由是多么的重要”中部分内容的引用。孟德斯鸠说：“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失掉自由是因为人民没有像罗马一样集体地审判反人民的叛逆罪。佛罗伦萨设法官八人，审理叛逆罪，马基雅维利说，‘但是因为人少，所以腐化他们也用不了多少人。’我很愿意采用这位伟人的名言。但因在叛逆罪案件中，政治上的利益可以说超过了民事上的利益；因为人民当自己的讼案的裁决常常是不方便的；所以法律就应当尽量有法规保障个人的安全，以资补救。”而马基雅维利的原文则是：“在一个共和国向八位审判官指控一个有权势的人是不够的；审判官的人数必须足够多，因为少数人总是按少数人的习惯行事。”

如何理解“少数人总是按少数人的习惯行事”？一种可能指人少，孟德斯鸠的回应就是在这个维度上展开的；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少数人指贵族、大人物，这种解释可能更加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原意。段德敏老师回溯了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多数人政府与少数人政府思想之间的对比，马基雅维利认为圭恰迪尼的解释无益

于解决弗洛伦萨城邦延续多年的骚乱，而应当扩大政治参与。在这种意义上，孟德斯鸠突出“个人自由”的用意确实与马基雅维利的自由观和政治理论产生较大区别。但马基雅维利的关键其实不止于此。在《论李维》第一卷第7章中，他指出在弗洛伦萨共和国，人们不能合法地发泄自己的怒气，而在罗马则不同。马基雅维利认为应该让更为多元的力量，即平民和贵族都能以某种形式参与进政治的过程中来。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宽和政府、权力分立与制衡则同样都指向了这样一种包容性的理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包括，马基雅维利考察了土耳其和法国两个国家，提出征服土耳其很难，但保有这个国家是很容易的，法国则相反，这也对应了孟德斯鸠对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分。

总结来看，段德敏教授认为，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之间是一种明斥暗合的关系，这一讨论或对孟德斯鸠研究有所助益。

潘丹老师以“自由、宽和与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论政治宽和”为题目展开汇报。首先，潘丹老师对宽和概念的衍生进行回溯。她指出，孟德斯鸠的论述往往始于明晰的概念，但并不固守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不断赋予一个概念具体而丰富的含义。在孟德斯鸠笔下，“宽和”首先是贵族政治的承载者所当具备的一种节制的品质，这种品质促使贵族尽可能地弥合贵族与平民之间、贵族内部既已产生的差距，尽可能趋近平等；“宽和”继而呈现为民主政治下的“元老院”这一机构所蕴含的精神，即在崇尚平等的民主

社会注入某种差异性，从而避免极端政治的出现；“宽和”最终体现为“混合政府”（*gouvernement mixte*）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即其制度构建能够综合考量不同维度的权力与各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结构丰富、维度多元，但具有内在稳定性、能够保持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导致的冲突与争执提供空间。

在讨论政体原则腐化的过程中，孟德斯鸠呈现出“宽和政府/专制主义”的二分方式，构成理解其政体学说的新视角。孟德斯鸠认为，要形成一个宽和的政府，就必须联合各种权力，加以规范与调节，并使它们行动起来，就像是给一种权力添加重量，使它能够和另一种权力相抗衡；专制政体正相反，它仿佛是一目了然的，它的各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讨论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时，孟德斯鸠指出，平等的真精神是有经验感的，它作为民主政治下的品德，意味着爱祖国、爱周围的人，也自然地承认社会身份的必要差异；而极端的平等精神则抹杀了现实中的必要差异，追求一种抽象的、绝对的平等，这种极端平等和专制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孟德斯鸠对英国政制的分权制衡多有赞誉，认为这使得宽和政府的形成得以可能。在孟德斯鸠看来，分权不是简单的横向的权力分立（*separation*），而更多是强调权力分配（*distribution*），让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宪法框架内得到代表与表达。在英国政制中，就体现了一种宽和政府的可能性，在君主、贵族、平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蕴含活力、富有秩序感的动

态平衡。孟德斯鸠认为英国宽和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自由，“自由”与“宽和”由此密切关联在一起，他关于政治宽和的讨论构成了其自由政治哲学的基础。

孟德斯鸠认为，社会生活给予人反观自身本性的可能性，却也蕴含着遮蔽这一本性的危险，而“以自由为目的”的英国政制，就蕴含着对人的本性束缚最少、最能使之得以呈现的基础与原则；换言之，自由即人的本性。孟德斯鸠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呈现出自由的意涵：一方面，从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看，人有自由意志，能够感知到自己想做什么；另一方面，从具体经验的层面上看，人能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在英国宽和的政制中，人能够运用其自由意志，并拥有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形而上学层面的自由意志通过具体经验生活当中的舆论自由得以呈现与表达。舆论从而构成政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勾连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中间环节，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推理本身由此构成了自由的源泉与保障。

然而，宽和是孟德斯鸠的底色。在他看来，一切都需要有节制，包括自由与美德也需要有它的限度。英国的宽和政制在使人的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与舒展的同时，也蕴含着走向极端自由的危险。在孟德斯鸠的文本当中，意志（*volonté*）与理性（*raison*）似乎是互相对立的，意志往往与幻想、妄念关联在一起，而理性则与法、抑或规律（*loi*）关联在一起。因此，看似可以独立自由地遵循其自身意志的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由“理性”

引导的，并接受“法”的规约，明白何为“应该做”的界限，而非仅凭自身的意志肆意妄为。

这就是“人能够做应该想做的事情”所呈现的意涵，“想”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基础，“应该”则体现了法的普遍性与对应然状态的持守。但法的普遍性并不指向一种抽象且绝对的原则，而是以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人们需要运用“理性”去把握事物之间必然的联系，对这些相互冲突、彼此对立的元素进行规约与调整，促使它们达成一种以动态平衡为基础的普遍和谐，既使人的自由本性得以舒展，又引导“自由意志”的运动符合“法的精神”。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进一步对孟德斯鸠的“自然”观念作出解释。孟德斯鸠的自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即强调哲学自由、应然的状态，是一种道德的自然；另一方面，孟德斯鸠又追求在普遍性与多元性之间达到平衡，他同时强调社会的自然，即“一般精神”，是政体的本源，与当地的气候、地理、土壤相关。还有物理自然，即人的自然需求和物质环境。孟德斯鸠笔下的自然是这三个层面相统合的状态。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孟德斯鸠关于卡佩王朝的制度的论述。在孟德斯鸠看来，卡佩王朝时期封建制度逐步成熟，哥特式结构逐步稳定，在法国封建法发展历史上形成了国王-贵族-民众的三重结构。孟德斯鸠通过法国封建法和民法的历史表明，在法国历史上国王一直需要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治理国家。

此外，学者们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对罗马征服的论述展开了讨论。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亚历山大征服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促进了民族融合；他批判了西班牙和罗马的征服，认为它们制造了奴役和不幸，并认为这种征服造成了对古代商业贸易交流的破坏。罗马鄙视手工业和商业，通过征服来积累土地、人口和财富。孟德斯鸠试图说明，扩张和征服属于古代世界，在现代社会，战争已经无法使人们获得古代人从战争中感受到的个体卓越。从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思想对比的角度来看，马基雅维利关注罗马政体的内在张力成为罗马扩张的动力，但没有讨论帝国扩张的消极影响；而孟德斯鸠则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罗马扩张所导致的衰落。联系孟德斯鸠的时代背景，当时法国知识界普遍倾向于认为法国是罗马的继承者，认为法国应该效仿罗马，但孟德斯鸠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罗马不是法国人的榜样，结合了商业和自由的英国更应当引起法国人的关注。

（撰稿：朱睿晗）



140

于建军 | 发现通天洞——通向早期人类的生活世界



与会学者线上合影

2021年5月15日下午，“沙漠腹地与欧亚通衢：人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系列论坛第三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4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发现通天洞——通向早期人类的生活世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作引言。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何嘉宁参与讨论。

于建军老师首先对通天洞遗址发现和发掘的情况作了基本介绍。通天洞遗址位

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南。2014年文物普查时，张铁男研究员在这一区域发现大量青铜时代陶片，次年新疆文物考古所进一步实地调查，初步判断此处可能为青铜时代遗址，2016年正式开始主动发掘。遗址环境为“V”字形结构、花岗岩球状风化地貌。通天洞遗址一号洞，洞口呈扁平的弓形，而非花岗岩地貌发育典型的椭圆形，应是堆积厚度大、填埋洞口所致，由此可以判断堆积的大概厚度。一号洞内还有四个较小的洞穴，其中北侧的可能通向了山后。于建军老师表示，新疆地区此前一直没有发现明确的

旧石器地层，通天洞发掘的主要目标正是解决新疆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问题。为此，考古队采用了洞穴内外探方、周边调查的方法，也引入遥感、物探等科技手段，多学科联合进行发掘。

经过近五年的发掘，通天洞考古工作收获甚丰：其一，新疆首次开展洞穴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时也填补了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中期缺乏典型遗址的空白。洞中石器组合种类多样、材料多样，具有典型的莫斯特三期、勒瓦娄哇技术特点。大量动物化石遗存被发现，部分有人工切痕。初步判断，当时生活的动物有棕熊、犀牛、野驴、野山羊、小型食肉动物等，动物组合与同时期欧亚草原的基本一致，进一步的动物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植物考古则主要采用浮选法，遗址中莎草科和藜属植物较多，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环境及其变迁。值得注意的是，洞中还出现了保存较好的火塘遗迹，可见三个相互叠压的灰堆，年代约为4.5万年以前。清晰的多重用火遗迹，为探讨史前行动者的流动性、季节性和空间利用格局提供了重要证据，将是今年遗址发掘、研究工作的重点。此外，尝试在土壤中采集古DNA等研究，也是进一步突破的方向。

其二，通天洞考古发掘的一大收获还在于，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可能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叠压的文化层。于建军老师介绍了发掘的详细过程，并为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典型遗存：考古工作者最早按照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的惯例，使用5m*5m的大探方进行发掘，

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后，则改用1m*1m的小探方，利于更加全面的采集信息。在近地表的土层有早期铁器时代的铁刀出土，以下则是青铜时代遗存、少量的细石器，经过间歇层后又出现了连续三层旧石器时代的遗存。间歇层中有大量生土和岩砾，厚度最大处超过1米，发掘一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坚持向下清理后，终于发现了典型旧石器时代的土层，经王幼平老师判断，确为旧石器时代无疑。此后的发掘和记录因而改变了方法。

在洞外旷野处的发掘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近期人类活动对旷野处造成了破坏，考古队还是发现了青铜时代的石棺，出土有花纹各异、形制不同的大量陶片及各类石器。其中的陶饼、石轮和石勺可能与原始手工业和矿业有关；还可见灰坑、灶坑和柱洞，与俄罗斯在阿尔泰山北的发现类似。于建军老师推测其可能与早期祭祀活动及分食有关。二号洞外的探方中，地层发现了大量反复使用火的遗迹，对这些用火遗迹分布、着火中心点位置的进一步确定和研究，有望揭示当时居民使用火、控制火的具体情况；探方6-7层浮选出了碳化大小麦麦粒和黍粒；6-8层出土有石器和陶片，9层没有遗物，10-12层则有年代距今13000至8900年的细石器。这也是新疆第一次发现明确的、连续的细石器地层。于建军老师认为，在出土细石器的地层进一步扩大发掘，可能能够发现这一时期的陶片，进而为新疆细石器时期的判断提供更加明确的线索。7层中发现的锡青铜铜管，可能说明公元前4900-4800年左右仍有少量

的锡青铜使用。遗址中总体来看，遗址中出土的陶片、石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特征，显示出与切木尔切克文化相近的特点。结合遗址附近其他墓葬的发掘情况，于建军老师认为，阿尔泰山麓青铜时代的文化更多地继承了石器时代的技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关于遗址使用的具体年代，大量碳十四测年分析的结果显示地层年代在距今 8900 年和 5000 年之间出现了长期的中断。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一时段人类活动的中断，仍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通天洞遗址还发现了目前新疆最早的黍，国内最早的大麦、小麦，显示出其作为农作物传播交流通道的重要价值。二号洞穴外探方中碳化的黍年代与大小麦相当，也距今约 5000 年，采样、浮选的结果显示，黍在遗址所见的农作物中比例过半。其四，在通天洞遗址周边的调查也有所斩获。遗址内部没有大量的石材，经过调查，推测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原料可能来自通天洞以北的北沙窝等多个遗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在阿勒泰地区进行了石器遗存情况的全面调查，各遗址的石器特点均与通天洞出土的遗存相类似，包含莫斯特三期的典型石器。

于建军老师指出，随着近年来发掘工作的进展，我们对于通天洞遗址的认识也不断深入。首先，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通天洞遗址可能存在的季节性变化。遗址 1、2 号洞洞口均朝西，冬季西风盛行直接灌入洞内，很不适合人类冬季居住。据电法物

探和探地雷达的结果显示，遗址中洞穴对面背风向阳面的岩壁地下很可能也有堆积深厚的大型洞穴，供早期活动者冬季居住；而大块岩石包围的近似于开口朝北的“U”形羊圈，同样发现了早期陶片和石器残块，也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其次，北侧道路周边和遗址的核心区之外也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一号洞、二号洞以外，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处洞穴遗址、一处外围的岩棚遗址等。这些发现为认识通天洞遗址的内涵，构建文化序列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其五，通天洞遗址独特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文化之间的具体关联。通天洞遗址位于阿尔泰山南和塔尔巴哈台山之间较为平坦的东西向通道上，适宜早期人类居住。在史前东北亚地区的整体视野中，它又可能与阿尔泰山北俄罗斯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这一区域其他遗址之间发生着较为频繁的人口迁徙和技术交流。适宜的环境和便利的交流条件使得旧石器时代人类选择通天洞作为长期居住的家园。遗传学的研究也显示，阿尔泰及其邻近地区位于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核心区域。通天洞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也有可能为现代人扩散的新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于建军老师认为，通天洞遗址早期的文化交流与这一区域此后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交流与发展一脉相承，阿尔泰山南麓一直是文化碰撞、交融和传播的重要区域，我们需要对此作整体性的理解。进一步来看，对周边区域的研究显示，这一地



通天洞，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区黍、麦等作物的传播可能存在一条北方的线路，通天洞遗址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顺着这条线索，观察频繁发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我们也有可能追踪到史前时代“北方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演变。

于建军老师总结道，通天洞遗址是新疆第一处经过考古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激活了新疆的旧石器考古，将新疆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至四万五千年，延伸了新疆的历史轴线。这也是新疆第一次经考古发现细石器明确的连续地层。它还是新疆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发现了国内最早的大小麦，以及新疆目前最早的黍。遗址地层中连续的文化堆积，为构建新疆的史前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认识新疆史前史提供了线索。最后，于建军老师还介绍了发掘的经验、发掘过程中公众考古推广的尝试，分享了遗址发掘给当地带来的

现实效益，并提出了下一阶段发掘、研究的具体方向。

讨论环节，王幼平老师表示，通天洞遗址处在远古时代东西方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上，发掘工作确实提供了超乎意料的重要发现。世界视野下，近十年来，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发现改写了我们对现代人迁徙扩散的认识，而通天洞的发掘也对研究其在这一地区的迁徙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其次，通天洞旧石器遗存的发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意外之喜，填补了北部边疆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第三，这更是新疆地区旧石器考古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把新疆人类活动的年代上限提前到了距今 4-5 万年前。

王幼平老师还提到，通天洞遗址的保存情况较好，如果后续没有更早地层的发

现，目前挖掘的地层底部出现的用火遗迹可以视作早期人类首次进入这一地区、进行活动的记录。而旧石器时代以上地层的几次空白和间断则大致可以与已知的气候寒冷时期相对应。整体来看，通天洞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从人类进入这一地区以至青铜时代的完整剖面，有助于构建新疆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框架。与东部暖湿地区对比，它还揭示了中高纬度干旱区史前人类活动的间歇性特征——气候温暖时期人类活动活跃，而寒冷期可能有中断。

何嘉宁老师其次发言，补充说明了遗址发现的具体过程。何老师介绍，于建军老师在发掘过程中遇到疑似生土层和角砾层后，依然克服困难以下发掘，尝试发掘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体现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度的问题意识。这也为之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开拓了思路：遗址发掘不应为研究分段所局限，需要前后贯通的视野与方法。

随后，李水城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发掘中遇到疑似生土的地层应该尝试继续向下发掘，的确经常能有进一步的发现。通天洞旧石器的发现，能够为研究东、西方两套石器系统的传播与交流提供线索，对于梳理文化传播的具体线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距今 8000 年以下，通天洞遗址地层的间歇与文化的中断也应被重视。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北部的文化零星分布，遗址堆积薄、规模小，对其文化遗存的情况不宜过度高估。随着暖期到来，距今 6000 年、4000 年上下有两次大规模、自西向东的人群迁徙，对西伯利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形成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它可能也影响到了通天洞遗址的文化面貌。如于建军老师的报告中提及的锡青铜铜管和部分陶器，可能就与阿凡纳谢沃文化有关，仍有进行比较研究的潜力。李老师提示，讨论判定具体文化归属的问题，应该结合整个西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文化面貌展开研究。

李水城老师进一步谈及通天洞遗址谷物来源的问题。李老师认为粟和黍应当是由甘肃经河西走廊进入这一区域的，结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境内的考古发现，可以勾勒出一条自东向西的交流路线。于建军老师提及小麦可能由北方传入，但西西伯利亚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过明确的农业遗存。小麦自中亚沿伊犁河谷传播，而后向北传入这一地区的可能性更大，通天洞与其南侧文化之间的交流值得进一步追溯。从小小的通天洞放眼整个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能够极大加深我们对这个遗址、这一地区文化面貌的具体认识。

李肖老师最后总结道，通天洞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开启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希望于建军老师带领的团队在未来的发掘中，能够延续科学、扎实的研究态度，将通天洞的考古信息最大化的呈现出来，为研究新疆早期人类情况提供更丰富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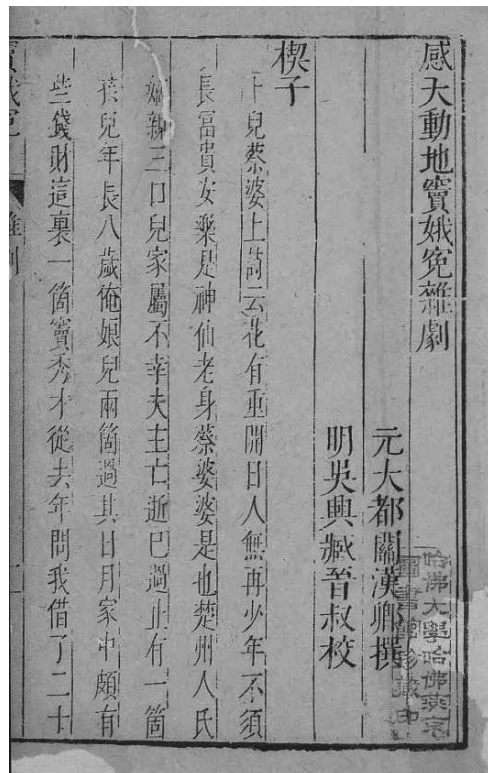
(撰稿：谢筠婷)

141

潘建国 | 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

2021 年 5 月 21 日下午，“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第六场、“北大文研论坛”第 141 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作引言，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芸，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共同主办。

论坛伊始，潘建国老师首先抛出两个问题：为何要提出所谓的俗文学文献学？如何来构建俗文学文献学？并以此引入本次论坛的主题。在他看来，传统古典文献学建立在印本书籍与经史著作两大学术基础之上，因而以一个初始定本的存在与流播过程中文本的基本稳定为默认的学术前提。这就造成它在处理敦煌吐鲁番文献，周秦汉唐时期的写本、抄本等一些不稳定或具有一定流动性的文本时，会出现一些学术上的不适应。随着近一二十年来各学科文献学研究的推进，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写本的文献学或抄本的文献学。潘建国老师指出，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用意大抵与之类似，俗文学的社会地位与自身的体制决定其文本也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俗文学基本发生于印本时代，故而这种流动性整体上是属于印本时代的流动性。以小说为例，北师大郭



《元曲选》万历时期刊本

英德老师曾提出小说领域存在“一书各本”的现象，如《水浒传》就既有容与堂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简本”，又有插增水浒本为代表的“文简事繁本”，还有明代袁无涯刊本为代表的“文繁事繁本”、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本等等。面对同一小说而各本之间情节、文字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况，传统古典文献学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潘建国老师进一步指出,《水浒传》的情况在古典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戏曲、说唱文学的流动性相比小说则更甚。戏曲是一种场上的艺术,演员与戏班主随时可能为了适应场上观众或是表演的需要,而对戏曲的文本、宾白、角色进行临时变动——这就导致在同一作品的不同梨园传抄本之间,几乎没有办法用传统意义上的校勘学来进行版本的校勘。说唱文学的流动性则更显著,甚至已经越出刻本、抄本的范围,成为一种案头与口头,或纸上与田野之间的流动。基于传统古典文献学在俗文学文献研究中的种种不适应,俗文学领域有必要根据实际的学术情况,参照古典文献学的部分概念体系、方法理论,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有一定独立性的俗文学文献学。

那么,如何构建俗文学文献学?潘建国老师提出,或许可以参照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包含的四大板块——目录、版本、校勘和典藏,来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体系。接下来,他对这一路径作逐一的简略展开。第一是俗文学的目录学。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古代各种官私目录对其著录很少或几乎空白,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发生转折。在建设俗文学目录学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几个关键问题:一是需要确立俗文学在综合目录中的著录位置;二是在编制各类专科目录时,俗文学各分支的分类、应被著录的要素、各要素所使用的术语等等,也需要达成一致。第二是俗文学的版本学。在这一面向上,俗文学与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差异较大。一方面,古典文学最看重的宋元本、名家批校本、明初大黑口本、白棉纸本等在俗文

学领域几乎没有,或存量极少;另一方面,俗文学又具有绣像本、评点本、梨园传抄本、晚清报刊连载本、明末清初析出单行本、节本与洁本、繁本与简本等独特的版本形态。因此,需要根据俗文学的特点,重新厘定版本的名目、类别,组建一套俗文学的版本术语。另外,俗文学版本的研究方法、理论,也还需要从学理上进行归纳、总结与提升。譬如运用“窜句脱文”、建立版本标记物等,就是梳理小说版本系统时较为简单有效的方法。

第三是俗文学的校勘学。潘建国老师认为,陈垣基于《元典章》所提出的校勘四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俗文学校勘。小说文本的有些“错误”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特别用意,如果根据“他校法”加以校改,不仅埋没或含混了俗文学的本来面目,而且会使其丧失服务于主题或思想表达的功能。由此,他提出现在的俗文学研究不妨学习当年陈垣的做法,在整理、校勘的同时,从大量校勘记中提炼出专门面向俗文学文本的校勘法与校勘通例。第四是俗文学的典藏学。他谈到,俗文学的典藏史较短,不足百年,但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私人收藏所占的比例,及其功能、作用较大,早期的俗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收藏家,一部俗文学的典藏史与其学术史几乎是同步同构的;二是海外典藏在俗文学领域意义重大,这种意义有时是整体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最后,潘老师总结道,出于学术的必要性,需要提出探索和建立俗文学文献学;且在他看来,可以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典藏学这四条路径、四个面向上去展开俗文学文献学的建构。

接下来,三位与谈老师围绕俗文学的“流动性”,分别立足戏曲、说唱文学、小说领域,做了或整体或个案式的阐发。

程芸老师首先从古代戏曲文献研究的角度做出补充和回应。他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流动性视野下戏曲文献学的对象和框架。他认为,孙崇涛先生《戏曲文献学》中的相关论述已经蕴含着文本流动性的核心认识,而如果作进一步的延伸,戏曲文学的流动性还包括变异性、层次性的问题,其本身还具有表演性与仪式性。因此,戏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戏曲的文学文本,即所谓的剧本,还包括大量与演出、改编、传播等各种“再生产”环节相关的文本。这些围绕在戏曲文学文本之外的“周边”文献往往更不稳定,它们频繁经历着增益、删削与改订,反映出戏曲的舞台风尚、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从而,程芸老师提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戏曲文本的流动性。一是时间维度的流动性,戏曲史上“曲无定本”的现象十分常见,几乎所有成功的戏曲文学作品都有一个被不断选择、改编、演绎的过程。二是空间维度的流动性,同一戏曲文本在不同地区,往往会被不同的声腔剧种演绎。三是戏曲形态本身的流动性,文本会在不同的表演形态中发生变异。

接着,程芸老师聚焦于元杂剧本体的流动性来做更具体的阐述。面对臧懋循的《元曲选》与元刊本、其他明刊本、钞本之间的差异,程芸老师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存真”的角度对臧懋循擅改文本的做法提出批评;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不能机械化与走上形而上学,不能将所有文本差异都一概归咎于臧懋循,并以此

来评价与贬低《元曲选》。在他看来,元杂剧的版本问题关系到对元杂剧的基本文献、演剧形态、思想倾向、风格特征、艺术成就等方面的认识;既是一个保存元杂剧真貌,即所谓“存真”的问题,也包括对其背后意义的阐释与发掘。元杂剧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作者往往门第不显、地位卑微,有些就是下层艺人,即便是一些文人创作,恐怕也不会如刊行诗文集那样,能由作者自己来把关他的“原作”,故而所谓的“原本”并不会被刻意保存下来。直到明代中叶,元明杂剧的文体体制才逐渐整饬化、规范化。此外,元杂剧首先是一种表演文学,很多文本就是以诉诸表演为直接目的,表演本身的流动性、变异性使得元杂剧在流播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同于“原本”的差异。

这种流动性也引发了程芸老师对戏曲文献研究的新思路做出一些理论化的思考。第一,在流动性观念的指引下,我们可能会更重视文本中流动、变异的细节。通过对文本采取历史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立场,强调回到文本产生、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语境,关注文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变化性、层次性,以及这些流动、变异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或可以重新检视某些戏曲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流动性的观念也能为戏曲文本的整理与校勘带来新思路。程芸老师发现,目前学者在校勘时对各版本有不同的取舍,造成校勘结果各有异同,如果能建设一种结构化、智能化的数据库,这一问题或能得到较为理想的解决。第三,流动性的观念也有助于我们从学术方法、视野等方面,与写本学、早期中国文本的生成、

域外的俗文学文本等等相关研究进行对话。总而言之，通过将流动性的观念、意识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自觉，来建构流动性视野下俗文献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对于推进俗文学研究是大有帮助的。

接下来，吴真老师以说唱文学《云门传》的个案研究为例，分享她对俗文学流动性的看法。首先，吴真老师将俗文学文献的流动性归纳为三种“无定性”，分别是作品无定类，作者无定名，文本无定本——这特别在说唱文学中得到了清楚的展现。明刻本《云门传》作为一个说唱文本，从1930年代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以来，首先面临无从归类的问题。它既不见于明清公私书目的记载，亦未见被民国以来的说唱文学编目叙录提及。它先后被不同编目者归入道家类、集部曲类传奇、小说演义等类别，但无一定位是正确的；直到马彦祥先生在自己的私人藏书目录中将其归入弹词鼓词，《云门传》才算遇到了知音。从《云门传》的归类困境引申开去，古代说唱文学研究在整体上也面临三大困境。第一，在说唱文学的体裁命名中，一部分是地域性称呼，一部分又是体裁性的全国称呼，这使得对说唱文学某一类目的编纂与体裁研究常要面临哲学上的能指与所指困境；第二，说唱文学存在记载的断裂，文本内部记载与社会史外部记载有时并不一致；第三，存世的元明说唱文学文本十分稀少，要研究清楚它的源流发展就更加困难。此外，说唱文学的独特性还表现为文本形态的现场性和口头性，如《云门传》全书注出了300多个难读字、正读字、多音字的读音，可能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或演出者在现场进行诵读。

吴真老师接着谈到，《云门传》研究的另一困难在于其作者无法定名。从中唐文人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太平广记》到《云门传》，再到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八《李道人独步云门》，《云门传》的李清故事经历了文言小说——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的演进。其中，《云门传》对于李清故事的白话说唱体改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从文本中完全找不到这位作者的踪迹。为了推测作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创作语境，吴真老师多次去到故事的发生地山东青州，从《云门传》产生的地方语境中理解文本。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她发现书中描述的许多地方社会场景都能在现实中得到还原；再结合嘉靖、万历年间云门山的全真道教复兴背景，推知《云门传》就是仙人李清信徒为了宣扬李清信仰而创作的道情说唱。一些云门



山的历史遗迹可能现在已经湮没，但借助于过去的影像与地方志记载，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云门传》的地方信仰语境。她进而提到，《云门传》的产生也与明清之际山东的说唱文学环境隐隐相关——曲阜、临淄、淄川、青州一带恰为此期说唱文学最为蓬勃发展的区域。

第三重困境是说唱文学文献的“文本无定本”。俗文学的异文本恰恰说明了俗文学文献的特定流动性，每一种写本或刊本都是对传播过程中口头演述的记录，每一种异文都是反映传播过程中地域性、社群性甚至信仰性的独特表述。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对传世经典文献“元本”、“古本”的追求，同时也不应将异文之间的差异作为“勘误”的标准，反而应该更加重视仪式场、市场演述语境、地方社会的差异给同一题材说唱文本带来的文本变异。同时，无定性的俗文学文本也可能在历史上经历一次经典化或者凝定固化的过程。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对《云门传》说唱文本的整理与改编，就是一种经典化过程，通过对文本流动性的控制，最终产生了比较固定的强势文本，甚至覆盖了原来的说唱。这一固化过程如何进行，则带来了俗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如冯梦龙大量删改《云门传》中的演出套语“留文”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方式。最后，吴真老师附带提到，冯梦龙唯一新添的东岳庙前老盲人演唱《庄子叹骷髅》情节，实为晚明时期流行于江南宝卷、小调、道情、徽州滚调、杂剧传奇等各种体裁的热点题材。这反映作家文学并不只对俗文学进行直接固化，也可能视俗文学为一个资源库、体裁库，在截取、叠加的基础上加以固化。

如果说说唱文学的文本是水的流动，那么小说文本的流动性可能就是沥青的流动。以此为引，李小龙老师开始讨论小说领域中校勘法则的应用问题。首先，他充分肯定了陈垣校勘四法的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陈垣先生从大量校勘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个校例具有极强的逻辑自洽能力与包容性，不仅是文献学、校勘学的指导性纲领，而且在小说校勘中的适用程度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仍有一小部分不合适的情况，它们虽然占比不大，却非常重要，且极易被忽略。接下来，李小龙老师依次给出小说文本中的校勘实例，来说明校勘四法的应用局限。

首先是对校法。古典小说存在“一书多本”的问题，两种本子之间如果差异非常大，我们可能只能尊重每一版本的内在逻辑，而不能简单套用对校的方式来对某一本子进行复原。本校法关注文本前后的逻辑自足，这在小说里有时也不合适。如《红楼梦》第三回提到贾母给黛玉一个名唤鹦哥的丫鬟，但此后鹦哥去向成谜，成为红学界的一桩公案。而在第二十九回黛玉身边所领的丫鬟中，除了紫鹃、雪雁，还有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春纤，程乙本便采用本校的方式，将此处春纤替换为鹦哥。李小龙老师指出，这一校法从本校上来讲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春纤在此后章节中仍有出现，并不是作者无形之中随意添加的人物，不可与鹦哥的身份问题混为一谈。根据贾母同时送珍珠给宝玉，并改名为袭人的情节，以及脂砚斋在紫鹃第一次出现时所作的批语“此乃鹦哥化名”，可知紫

鹏很可能就是改名后的鹦哥，只是曹雪芹分别作了一明一暗的处理。如果用本校法改正，文本逻辑就会发生错乱。

又如《霍小玉传》引用的李益诗句“开帘风动竹”，在李益原诗中作“开门复动竹”；《红楼梦》提到妙玉最喜范成大之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因而自称“槛外人”，而原句实际作“铁门限”——我们同样不能用他校法来加以订正，否则就可能打乱文本逻辑，抹杀作者的本意。最后是理校法，如《南柯太守传》描述淳于棼婚礼时有群女来贺，谈愷本《太平广记》作“皆侍从数千”，沈与文钞本作“数十”，《唐五代传奇集》便据以校改，但我们不能完全从现实情理进行推断，这些人事上都是蚂蚁所变，达到数千也是合理的。

在实例的基础上，李小龙老师对这种局限性予以总结说明。第一，对校法的最大逻辑是一个理想的元本的存在，校勘的最终目标或理想状态也是还原作者的元本。但小说作者未必是常态，文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我们无法评判我们的校勘最终要求哪一作者之真，这就给对校法的使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第二，本校法的逻辑前提是前后叙事的一贯性，但小说会根据人物性格或作者的虚构原则进行细小的修正。一致有一致的用意，不一致也有不一致的叙事逻辑。第三，他校法之所以不适用，是因为小说引用他书的某些资料，主要服务于作品逻辑而不完全是现实逻辑。第四，由于小说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不完全是自然逻辑的迁移，依据自然之理进行理校有时也会出问题。李小龙老师进一步指出，小说校勘存在两大类问题：一是作者问题和虚构问题，小说作者不固定，且具有虚

构的逻辑；二是被动错误与主动错误问题，小说的很多错误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建构的，改正了反而会抹杀作者的本意。

但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谨慎地使用校勘四法。他特别表示，在小说的同一版本系统中可以使用对校法；前后一贯的文本，尤其是文言小说文本的校勘可以使用本校法，但需注意前后语境的问题，分清作者逻辑和人物逻辑；在使用他校时，要注意作者意图和人物意图的冲突，关注作者引用他书资料时是否经过了个人改造；使用理校则要以人物形象的逻辑为本，而不能全凭自然逻辑。因此，校勘四法在小说中既适用又有限度，只要对其局限性加以注意，它在俗文学校勘中依然可以发挥理论指导性的意义。

最后，潘建国老师为本次论坛作结。首先，他再次重申了建立俗文学文献学的学术必要性。俗文学内部的差异虽然也很大，但相比俗文学与经史、雅文学之间的差异还是要小得多。因此，归纳出一些俗文学内部彼此都适用的通例或方法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行的。此外，俗文学文献性质上属于文学文献，不能只考虑纯文献学的概念、术语，方法、理论，也要注意俗文学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或场上性也会对相对恒定、标准化的文献学构成冲击，需要兼顾文献、文学、文体、搬演体制等几个层面的因素。最后，潘建国老师希望借本次活动，呼吁更多学界同好在俗文学文本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理的归结与提升，从而将俗文学文献学真正地建构起来。

（撰稿：徐斌）

142

李肖、李承森 | 绿洲的进退——新疆的植物、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



李肖教授（左）、李承森研究员作引言

2021年5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绿洲的进退——新疆的植物、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承森作引言，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原馆长肖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戴进业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是“沙漠腹地与欧亚通衢：人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系列论坛之一。

论坛伊始，李肖老师简要介绍了系列论坛对于中亚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关注，并分享了与李承森老师相识共事的经历。其中，共同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以及沿着克里雅河昆仑山段进行的考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有助于理解新疆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并为如今与将来在政策调整上提供建议与启示。近年来，两位学者也围绕着和田境内塔里木盆地南缘几条深入至沙漠的河流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由为人们所熟知的、发源于昆仑山区的河流向北进入沙漠后形成的绿洲遗址引出讲座的主题，李肖老师强调了绿洲对于古代历史研究，以及对于今天人类生存（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人们）的重要意义。

李承森老师以“新疆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为题作主旨发言，从植物考古的大量证据出发，介绍新疆的先民如何利用植物多样性作为生产与生活的基本资源，

以及在长时段视野下绿洲所发生的变化。新疆地处中亚腹地，四面均远离海洋，因此形成极为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干旱气候又造成准噶尔与塔里木两大盆地大部分成为沙漠和戈壁的无人区。几千年来，这一地区的人民与极端干旱的生存环境进行着殊死搏斗，充分利用高山冰川融化之水浇灌沙漠里的土地而造就了赖以生存的绿洲。从绿洲谈起，李承森老师简要介绍了绿洲分为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两类，多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关乎地区人类生存、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而对于新疆而言，绿洲至关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他详细梳理了与绿洲有关的人类活动，具体分为新疆地理格局与生态景观、中亚五国地理格局与生态景观、以及绿洲演化过程中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耦合关系三个方面。

围绕新疆的地理格局与生态景观，李承森老师指出，新疆南北方向上地形高度与纬度上的差异，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东西方向上地形延续与经度上降水连续性的差异，导致了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而在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演变的响应与影响中，人们依赖于环境，环境为人们提供各种资源，在小的范围内，人类亦会对小的环境产生影响，例如通过人的努力，将天然绿洲扩大变为人工绿洲。李承森老师在梳理新疆地理格局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新疆的生态系统与景观，认为新疆“山-盆-山”的地理格局决定了新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聚焦于绿洲，他尤其强调水是决定绿洲生存发展与消亡的关键因素，绿洲生态系统与河流、供水量紧密相连，

水量充沛，绿洲存在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河水断流或者改道，沙进人退，绿洲消亡。新疆绿洲尽管面积不是很大（七百多万公顷），但具有很高的经济社会地位，考古学界做研究获得的考古文物，与消失的古绿洲关系非常密切。进而关注到中亚五国，李承森老师指出中亚五国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地理体系，在起源上，造成新疆和中亚五国地理格局的根本原因是板块运动，启示着听众从大的时间尺度上，需考虑到研究区域中宏观背景的制约关系，并以喜马拉雅山脉景观视角为例，强调从不同角度看世界。

谈及绿洲进退，李承森老师认为绿洲是动态平衡的、演化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生活与绿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绿洲消亡后留下了许多考古遗迹与植物遗存。这些遗存中包含着许多环境信息，讲述着沙漠与绿洲更替的故事，揭示着河水水量与先民生存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而植物考古的工作，便是将这些自然的信号提炼出来。草原与绿洲是干旱地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载体，从游牧到农耕是生产力（工具与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当今草原依旧是牧区，而绿洲发展成为城市的依托地。草原与绿洲演化的核心因素是水资源，包括大气降水与冰川融水，而影响水资源主要因素为气候与人类干预。李承森老师以“耦合”（coupling）一词概括绿洲演化过程中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强调气候变化叠加人类活动影响绿洲演化，绿洲存，则人存，绿洲亡，则人散。

在梳理新疆发展要素与绿洲演化要素的基础上，李承森老师详细分享了学者们

在吐鲁番所做的大量出土植物遗存研究，揭示这些出土植物带来的、关于先民如何利用这些植物的信息。吐鲁番先民在与干旱搏斗中延续着绿洲文明，吐鲁番成为丝绸之路重镇，而新疆的干旱气候保存着大量植物遗存，如粮食、水果、艺术品、器具、宗教等。李承森老师提到，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重要连接点，也成为当今一带一路连接欧亚的主要通道，更是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研究的最佳区域。以洋海墓地为例，学者们曾在此地出土了大量的保存的植物的遗存。通过研究洋海墓地墓室里发现的葡萄枝，学者们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西域已经开始种植葡萄。而诸如小米、大麦、小麦等粮食谷物和各类果实种子，也在洋海墓地、胜金店墓地、阿斯塔纳墓地等处出土。

在艺术方面，洋海墓地中曾发现用紫草种子作为装饰物，山普拉墓地出土了用薏米果实做的手链，而洋海墓地出土的大量木材实物遗迹，揭示着绿洲中的树种，而绿洲中的树，成为当地人们制作生活器皿的木材，有些也参与到民间宗教与信仰中。谈及何以恢复彼时的生活场景与自然景观，他尤其提到应寻找植物上的证据，寻找早期人类生活时代的沉积物，包括土壤、砖瓦等，并从中寻找花粉。以洋海墓地陶片、高昌故城、吐峪沟石窟土砖与粘土砖里的花粉与对应的植物为例，李承森老师认为分析沉积物中的花粉与对应的植物信息，有助于进行古景观的重建。而通过上述植物考古和对于植物遗存的研究，他进而归纳了吐鲁番古绿洲的植被与经济，指出吐鲁番古绿洲植被中蕨类植物、裸子

植物、被子植物总计 36 科 23 属 32 种，在时间上从史前持续至宋元，古绿洲气候为温带干旱气候，吐鲁番先民利用河流与坎儿井输水到绿洲，依靠人工灌溉系统系统发展绿洲经济，在农业上种植小米、大麦、小麦与经济作物，而生活用材包括云杉、冷杉、怪柳、槭属、桑木、桦木、杨木、山矾、葫芦等。

承接李承森老师介绍的长时间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肖方老师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瞥”为题，分享了自己跟随着李承森老师、李肖老师的团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徒步考察的经历、印象与感受。以沙漠腹地风貌起谈，肖方老师认为对于沙漠的认识与理解还有很多未知，提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沙漠、唯一的暖温带沙漠，历史上沙漠的南北方向曾有很多河流，并在圆沙古城考察的具象经历，讲述自身对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感知。438.1 公里的徒步行走中，昼夜温差达 40 度，无风很难受、风大则难行，阵雨暴雨可遇、年降水小于 50 毫米，是肖方老师对于自然物候现象的感受。



洋海墓地出土的木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肖方老师同时指出，沙漠并非是寂静的，发现记录动物的活动轨迹、寻找他们遗骸、采集各类动物标本，记录采集地坐标、采集物特征是考察者们重要的工作，而依据采集的样本，进行分类物种鉴定，获取该动物习性信息，了解动物食物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便正确评价该地域环境生态演变历史与发展前景，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沿途，他们观察、记录、采集样本，记录动物骨骼、人类遗骸信息。其中，以“螺”的发现为例，他尤其提到圆沙古城中能够采集到螺，说明这个地方原来适合于人类生存，“螺”遗存的发现，将动物、沙漠与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启示着将物种的存在与发现跟环境、人类活动联系起来。肖方老师也认为，只有在“拉网式前进”、步行中，这些细小的物件与其背后的信息才能被发现、被感受。作为结尾，他欢迎更多人加入到关注环境与生命之队伍中，形成对于未知的参与与解释。

与谈环节，曾经在塔里木工作过的戴进业老师谈及地质与考古的联系，并对照过去的考古学方法，认为李承森老师研究的启发与创新在于通过孢子花粉与考古的结合，恢复古环境古生态。罗新老师强调了新疆考古的独到之处在于学者们很早以来就具有在研究中关注自身学科以外的知识、到其他学科中去学习的意识，特别是土壤知识、气候知识等自然科学知识，并使用这些方法来做自己的研究。新一代的考古学家们都走在这条路上，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形成新的学术画面与对新疆新的认识。关注到绿洲演化中自然条件与人类

努力的关系，罗新老师强调了人类努力对于绿洲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及在荒漠地带生存的早期人类已具备利用、控制水的能力与技术，延展水流途径地域引起的生命变化的限度，将水、河流变为生命的网络，变为后代所说的绿洲文化与绿洲文明。而李肖老师同样围绕着降水量增加与冰川退缩、是否有可能将沙漠地下水抽出并改造为超大绿洲、以及圆沙古城与沙漠洪水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与疑问。

针对与谈学者与听众们的问题，李承森老师逐一做出回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李承森老师再次强调“耦合”与动态平衡，认可“没有生物的地球将是另外的样子”的观点，在绿洲的语境下，也承认一定稳定河流水量供给下人类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但同时强调人类行动的大前提是水量的供应。回应生物从何而来，李承森老师认为还是地球环境为生物出现创造条件，人与自然关系上决定因素在大自然，绿洲的核心问题依然在“水”，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要取得一种和谐的生存发展。戴进业老师对此也认为，小范围内、一定有限的时间内人可以有效地改造自然，但在更大的范围内，人又是无能为力的。李肖老师对沙漠居民生活境况与流沙中的考察做出详细的经验性补充，而李肖、李承森老师也回应着听众对于沙漠中的植物类型（胡杨、红柳、怪柳、芦苇等）和对于通过陶片花粉衡量植物多样性的研究路径的疑问进一步阐释说明。

（撰稿：章涵青）

143

应星、孟庆延、蒋凌楠 | 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2021年5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孟庆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论坛伊始，黄道炫老师简要介绍了三位主讲学者的学术经历和研究兴趣。他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关注概念的落地与概念意涵的演变，写作“活的概念史”、“有生命的概念史”。具体到中共革命而言，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阶级、苏维埃等关键概念仍值得分析探究。

应星老师开门见山地强调，理解中国革命，概念是要害所在。学科的学术化程度体现在其概念化程度上，中国革命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应星老师尤为注意处理革命研究中“经”和“史”的关系。他认为学者要“两条腿走路”，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同时，关注如列宁式的政党、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概念——它们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核心。而研究诸如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中共革命的关键概念时，研究者更要注意实现



黄道炫教授主持

党的语言与学术语言两套话语体系的衔接和转换，努力发掘概念与史实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应星老师指出，中国社科学术界创造概念大体有三种方式：第一，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如近来特别流行的“内卷”一词；第二，中国学者自主创造，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即是如此；第三，从日常生活或政策术语中发现概念并加以阐释，如“单位”“拔钉子”“揭盖子”等。最后一种思路尤为应星老师欣赏。对比而言，中国革命的概念也可按“外来”和“自创”分为两种起源。“外来”概念中，既包括长时段的，从清末民初开始流行的“主义”“革命”“阶级”等概念，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苏俄传来的“民主集

中制”等概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革命经验为基础创造了很多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翻身”“诉苦”等等。

研究不同类型的概念需要不同的分析工具。中国当前的概念史研究，主要受三种西方传统的影响。第一种传统侧重从观念史角度展开讨论，以德国为代表。第二种传统则更接近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以英国为代表。第三种传统来自法国，其主要代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理路，对应星老师启发最大。应星老师指出，《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早期的作品，较大幅度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晚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虽然仍围绕“规训”这一概念展开，却与话语/非话语实践及权力机制的分析

紧密结合，可见其重点已经从知识考古学转向了权力谱系学。

应星老师认为，来自德国和英国的概念史研究传统皆是在这些国家的制度史、政治史已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作为新路径而出现的。而现阶段党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有限，因此更得注重将概念的溯源析义与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因此，从学术借鉴的角度来说，应星老师更重视法国的权力谱系学这种分析路数，更强调“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结合及其张力。

应星老师从概念史研究的含义、起源及方法等角度高屋建瓴地勾勒了概念史研究的综合图景，同时结合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展开了进一步反思。应星老师自陈，比起分析如“主义”“革命”“政党”等大的概念，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偏向“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性和中层性的概念。

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组织机制，“民主集中制”由苏俄传入中国后如何落地，又如何与更下位、更具体的概念（如红军中的“前敌委员会”）结合起来？应星老师认为，中共革命走的是军事革命道路，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方才建立红军，这是中苏革命道路最大的不同之一。中苏革命的不同现实背景，使“民主集中制如何与武装斗争和军队组织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军队而言，什么是“民主”的边界，什么是“集中”的内涵？

前敌委员会职能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军队中不断探索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南昌起义时期，“前敌委员

会”首次出现在中共党史上。此时前敌委员会采取合议制，成员多是政治领袖，主要担负军事指挥职能，无权管理所在地区党组织。同时，旧军队中以军事首长为中心的传统也对红军中对党的领导的强调有消极的影响。而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的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时，深感地方与军队分隔管理的不利，于是在革命实践中尝试打通地方和军队，逐步扩充前敌委员会的职权，使其成为既领导红四军又领导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机构，而后又进一步扩展到对江西等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上。与此同时，经过古田会议，毛泽东确定了前敌委员会在红军中的具体运作机制：“会前精密考察，会上民主讨论，会后严格督促”，其中第一、三环节均以前委书记为核心。毛泽东希望藉此保证工作决策中既有充分讨论，同时又能防止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此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上述工作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式。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本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但进入中国后，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地方党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前委书记一把手与委员合议制的关系等问题时，创造性地把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实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具象展开。

孟庆延老师从个人研究出发，首先分享了自己对概念史的理解。孟庆延老师认为，虽然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日益发展，但各视角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若不讨论行为，无法研究心灵史；若不考虑经济背景，很难深入研究政治史；若干巴巴地描述制度，不涉及文化要素，

也无法展开制度史的分析——同理，如果只从语义角度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史也不令人满意。其实，无论是何种流派的概念史，背后总蕴含着一种整体史的视野。

随后，孟庆延老师回顾了个人研究的缘起。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阶级革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20世纪初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情况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同，也与当时的苏俄社会不同。当时，支配中国的分类方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产业工人的力量很薄弱，党的领导也主要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中小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阶级这种非本土的分类方式与分化方式，是如何进入中国的革命实践的呢？

20世纪70年代起，受社会科学研究“底层转向”与基层档案开放等原因影响，革命的大众动员成为研究核心议题。求学时期，孟庆延老师曾参与“20世纪下半期中国乡村口述资料搜集计划”。当时前辈学者的研究关怀在于探索革命如何在具体的村庄中展开，村庄原有的矛盾如何进入革命场域，又如何与土改中的阶级划分叠合在一起。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阶级是共产党完成革命的大众动员时所采用的权力技术。无论是《翻身》还是《十里店》，也均以这一主题为描述重心。学术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讨论革命的“在地”过程，也就是说，更多地通过对基层史料的爬梳来展现革命的微观进程，进而理解革命政党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的历史进程。黄宗智曾经用“表达性现实”



与“客观性现实”来概括革命的大众动员。

如果说之前大部分学者的讨论更多的聚焦在“客观性现实”这个层面的话，近年来孟庆延老师转换的相关的视角，聚焦于“表达性现实”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土地革命中，干部们带着一套阶级分类标准来到地方，其任务是落实、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同时完成对新的社会结构的塑造。那么，这套被援引为标准的“表达性现实”，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产生？阶级如何从理论上的言说变为可以操作的概念？初步操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何种问题？其中有哪些关键的“担当者”在推动调适与变革？

孟庆延老师在研究中注意到，1946年土改时推广的是1933年的阶级划分标准，而过往的土改研究集中于1946年以后，探讨早期阶级划分标准仍有不少空间。例如，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并无“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阶级划分方式。而无论是陈独秀撰写《中国农村问题》（1923）还是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似乎均未受到苏联影响，更多是按照租佃方式（即“地主—自耕农—佃户”）来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结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围绕乡村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讨论，更多是一种理论分析，“阶级”概念，尚未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由此出发，孟庆延老师以“富农”为切入点，探索阶级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1926年，瞿秋白在《世界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一文中将“富农”概念翻译成中文，将“剥削劳动”作

为理解富农（大农）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在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未明确其内涵。直到1930年《富农问题》决议案出台前，“富农”更多还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概念：一方面，当时党内并未形成对富农概念的更为具体的“操作化”界定；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村社会并不能找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主”，也就是说，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具体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实际上，阶级成分的进一步操作化，本身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

详细的划分阶级需要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和比较充裕的时间，同时还需要相对稳固的政权环境，1920年代末刚刚开辟赤色割据政权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具备详细界定乡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外在条件。因此，1930年代，早期土地革命中更多执行的是“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强调“一要分、二要快”，本质上并不涉及非常细致的乡村社会阶级划分问题。

1930年6月，《富农运动》决议案出台，明确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用工人耕种；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他们既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农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而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数量最少，这就修正了瞿秋白1926年给出的定义。

孟庆延老师认为，1930年，“富农”得到明确定义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



论坛现场

来自苏联的影响。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质与任务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对革命的性质、阶段以及具体的策略路线做出了一系列相对温和的决策。然而，会议结束后，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逐渐酝酿并发展，具体策略上体现为对富农与富农经济的消灭。1929年，共产国际接连发表“二八指示”“六七指示”，将富农定义为“革命敌人”。既然富农问题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核心问题，中共中央自然有必要做出回应。其次，时任红四军前委领导的毛泽东与代表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力量的“本土干部”之间在土地政策与军事路线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土地革命中如何处理宗族公共田地的的问题，当时以李文林为代表的地方革命者，主张保留公田，同时支持当时的立三路线，这些主张上的差异，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理解

议案出台的背景——这些革命实践中的复杂状况与不同主张，呼唤着有关阶级划分的明确标准的出台。

1933年，中央苏区政权相对稳固后开展“查田运动”，毛泽东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阐明乡村社会各阶级的具体意涵，尝试通过阶级分类推动土地革命。然而，“查田运动”中依然出现了各种因为富农标准过于模糊而导致的矛盾，因此，10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更为细致的量化方式界定富农概念：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然而，农民并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按照这一逻辑计算收入，且习惯于通过换等方式共用生产资料。因此，这样一种更为细化的阶级成分划分方式，并没有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富农难以算清的问题。由于中

央苏区战事频繁，且医疗保障水平不足，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以及“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都在大量“消耗”成年男性。因此，很多原本占有少量土地，但同时失去了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很容易在上述定义下成为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富农”。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指示干部做出调整，不要以“算阶级”代替“查阶级”。因此，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其实有三重属性：经济属性（量化阶级标准）、政治属性（对革命的态度）、社会道德意涵。经济属性是正当性的表达，也是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总则，但实践中，必须与后两种属性结合。

孟老师认为，从谱系学与整体史的角度开展概念史研究，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态与伟大历史进程。实际上，很多关键概念的在中国社会中的“落地”过程，正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从学理上认识这一过程，是学术研究的使命，也是学者的时代担当。

蒋凌楠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进入概念史研究的过程，并介绍了新近完成的“苏维埃”研究。20世纪初以来，思想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学者们早先关注方法与理论，近年则不断开展具体研究。而概念史的兴起，则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概念史家曾提出，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欧洲历史发展两个高峰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此间旧的语言体系不断瓦解，新的概念蓬勃而出。

至于东亚历史的过渡时期，则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当近代社会知识转型的高潮逐渐退去，革命初兴。此后，苏俄的政治文化伴随革命涌入中国，在制度、观念、策略层面产生诸多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层面基本用语的输入在革命前已渐进尾声。因此，如何结合革命史与知识转型，自然成为需要探索的问题。概念史家科泽勒克提出，所有的分支学科之间都有关系网络和结构分层，并以语言的形式显现出来。而概念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变体，能够统摄其他史学的研究取径。蒋凌楠老师希望，未来有可能开创以口号、语法、修辞、习语、言说的假设等内容为主要议题的“革命概念史”，探索人们在日常事件中表现出的反应及其内在惯例和规则系统。这要求学者选择既有社会文化表征意义、有足以成为行动因素的概念，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概念史研究还应当注意语用学这一范式。所谓语用，即指概念的运用及其语境。研究者应注意发掘概念背后维系着的政治想象，解读概念试图排斥、遮蔽、解释的历史图景。英国思想史家斯金纳指出，追问概念的根本是为了追问意图。人们使用概念时，不只是为了辨析其意涵，还将通过驳斥、赞美、批判、嘲弄将概念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学者在从事概念史研究时，不应当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澄清学科基本概念、术语的内涵，而是要从概念的社会、政治影响出发展开思考。蒋凌楠老师曾长期关注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梳理论战中各方的不同认识，并探讨不同群体如何为各自目的争夺革命

话语权。从文献积累与理论素养方面看，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方在20年代的这场论战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其长处在于行为语言较之对手方更为丰富，他们常常跳出学理，质疑对方的外语水平或直接批判对方的立场错误。

蒋凌楠老师还介绍了自己研究“苏维埃”概念的成果与心得。民国初年，“苏维埃”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早先西方语境下，“苏维埃”概念乘西方国家反思代议制之潮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发展。然而，第二国际和苏俄对“苏维埃”的理解存在差异，并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制度设计的内涵持不同看法，这是第一层差异。

“苏维埃”传入中国后，因中苏国情不同、阐发群体不同又导致了新理解的产生。当时的政治学精英将“苏维埃”理解为代议制的新范式、西方政治的新思潮，希望从中找到走出民初政治乱局的出路。而倾向于列宁理论者，则从“苏维埃”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元素。尽管双方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出于不同的想法，均欢迎苏维埃概念的传入。

若将眼光拉长，结合具体的革命实践来看，中共最终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作为人们自发形成、推动革命的组织的观点并未被采纳。不过，为从底层发动群众，中共仍需要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蒋凌楠老师指出，农民协会在基层起着“苏维埃”的作用，而农民协会与军事武装建立起来的政权关系也有着复杂的面相。

应星老师认为，“苏维埃”概念的落地过程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起源来讲，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是中共打出苏维埃旗号的关键原因。而苏维埃制度引入后，其组织与前委产生怎样的冲突，随后苏维埃制度又如何引发党内的争议和分歧并最终走向终结，也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若能扣住关键制度，将上述实践要素引入讨论，研究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

孟庆延老师则指出，研究中共革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因此，他特别关注政党如何引入、修改、实践诸多概念，以及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模式和惯例。具体而言，“苏维埃”在中共内部的命运与早期托、斯二人的分歧有什么关系？论战中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在20、30年代中国的各种思想论战中占据什么地位、其主张与政治立场又怎样的关系？在孟庆延老师看来，概念绝不仅仅只是一种说法，因此概念史的研究除了实现语义的澄清和层次的揭示，还应当呈现概念实践过程背后政治文化的逻辑。

（撰稿：毕鸣）



144

韩琦、梅谦立、李天纲 | 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及其反思



孙承晟研究员作引言

2021年5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及其反思”。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承晟主持并作引言，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韩琦，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作主题发言，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评议。本次论坛为“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论坛之一。

本次论坛以孙承晟老师对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的总体介绍开场。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传教士来华，将宗教、哲学、科技、艺术、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接触西学，

影响堪与世界史上的几次大翻译运动相媲美。100年前，中国学术界开始“中西交通史”（即后来的“中西交流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文献发掘和研究方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明清时期中西交流史研究成为近30年来国内和国外一个活跃的学术领域，并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成果。本次论坛将对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过程中的科学与宗教、天主教中的“创造”观念、西学的延续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反思。

韩琦老师首先展开“关于明清时期欧洲科学传播史的总体思考”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欧洲科学在华传播史成为科学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何兆武先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一书曾对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作出整体、详实而深刻的评价。然而，在科学知识的传入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何兆武先生的介绍并未区分西学传播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人物的特点，韩琦老师的报告正是接续并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对于耶稣会士及其传入中国的科学，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评价。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由于宗教原因耶稣会士是十分保守的，其带到中国的科学也是比较落后的。以往认为明末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尚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并且没有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然而近十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范围、研究题材以及研究方法皆有所突破与发展，

经过对新史料的寻找和发现，“科学史”视角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得到了许多认识上的拓展。韩琦老师认为，欧洲科学在华传播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明末至康熙初期为第一阶段；康熙时代，即从南怀仁（F. Verbiest）在钦天监“治理历法”起到康熙末年，为西学传播的第二阶段，以1688年（该年南怀仁去世、法国耶稣会士抵京）为界又可分为两个小的时期；雍正、乾隆时代至马嘎尔尼（G. Macartney）来华，为西学传播的第三阶段；嘉道时期为西学传播停滞的阶段。

接下来，韩琦老师论及“近身之学”，亦即讨论传教士传入科学的学术背景。西学在华传播过程中包括三类著作。其一为介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奎纳（Aquinas）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与神学经典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教科书，如《寰宇图》《名理探》《超性学要》等。其二为实用之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地图学，以及技术、医学。由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实用之学一度受到徐光启等人的推动。此类著作包括利玛窦（Matteo Ricci）在罗马学院的教材《几何原本》，康熙时代传入的更加简单明了和注重实用的由Ignace-Gaston Pardies撰写的《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以及安多（Antoine Thomas）的《算法纂要总纲》、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泰西水法》等等。其三为科学新知，如傅圣泽（Jean-F. Fouquet）的《历法问答》，介绍了哥白尼、开普勒（J. Kepler）、笛卡尔（R. Descartes）、罗默（O. C. Römer）、哈雷（E. Halley）、卡西尼（G. D. Cassini）等人的学说，

并包含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刊物及其译著，以及戴进贤（I. Kögler）的《历象考成后编》，纳入了他的同事Grammatici根据牛顿（I. Newton）的月亮理论改编的天文表，将牛顿学说间接传入了中国宫廷。可见，欧洲手稿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已经有许多西方科学新知传入中国。

随后，韩琦老师以哥白尼学说的传播为例，阐述了西学传播中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哥白尼的学说被列为禁书，很晚才解禁。而在中国，傅圣泽的《历法问答》已介绍开普勒的部分天文学成果，进而通过蒋友仁（M. Benoist）的《坤舆全图》，“日心说”传入中国。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在介绍哥白尼学说时已完整论述“日心说”，并且他的文集中明确提及他同几位传教士的来往。韩琦老师通过安多书中的绘图，推测出黄百家很可能是通过与安多的交流从而了解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尽管哥白尼的学说在欧洲长期被列为禁书，但这却不妨碍其学说经由更加开明的法国传教士传递到中国。

由此，韩琦老师进一步讨论到西学传播与接受的关系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及时接触到近代科学，席文（Nathan Sivin）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教士未能将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韩琦老师依据欧洲一些著作手稿等证据指出，无论是《历法问答》《阿尔热巴拉新法》还是满文解剖学译著，许多科学著作都曾一度传入中国，但清廷并未推动出版。明清时期对近代科学的接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接受者的态度。

韩琦老师在总结中表明，耶稣会士的国别、宗教派别以及传播时期差异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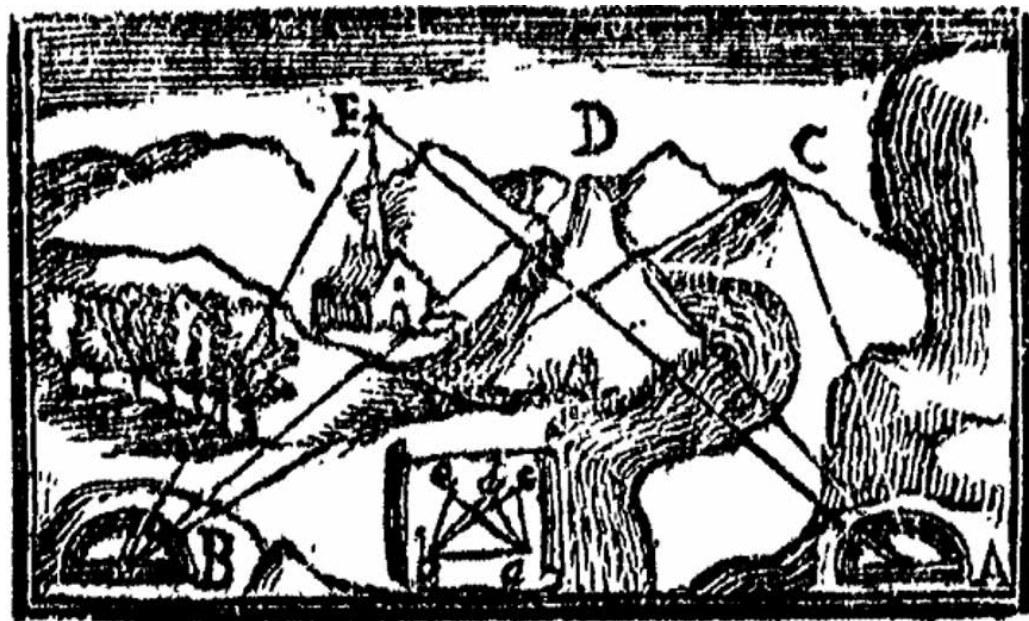
都影响到近代科学在华传播。此外还需要考虑到接受方的理解与态度，才能对“西学东渐”有更加全面合理的了解与评价。这也意味着，学者们应当对文集文献和西文档案资料展开更加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随后，梅谦立（Thierry Meynard）老师开始第二场报告，题目为“哲学意义上的创造论——晚明《寰有论》（1628年）与阿奎纳”。梅谦立老师首先从近代西方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引入。13-16世纪，经院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重构神学，肯定人可以通过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上帝。然而文艺复兴时期，蓬波纳齐（Pomponazzi）认为理性无法证明灵魂不朽，这一信念只能通过神学信仰来确立。哲学与神学的边界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中国，创造论的传播在哲学与宗教方法上，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面相，梅谦立老师将依据《寰有论》的文本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基督教的创造论中蕴含着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天渊之别，然而东方思想不同，比如儒家的“太极”或“理”与万事万物无法被截然断为两阙。耶稣会士们批评东方思想属于“唯物一元论”。面对这一攻击，1623年，许大受在《佐辟》一书中表达了对创造论的诘难。继而，传教士龙华民（N. Longobardi）撰写了《关于上帝、天神、灵魂之争的简单回复》，从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出发，谴责儒家形而上学否认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间存在的超越性，未能在物质因和形式因之外认识到包括动力因和目的因在内的超越因。这构成了创造论入华传播的一个基本背景。

柯因布拉大学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论天》进行摘要、评论、问答，形成《〈论天〉评注》一书。1628年，傅汎际（E. Furtado）和李之藻将之翻译为《寰有论》介绍到中国。但是《寰有论》的第一卷所谈及的创造论，实际上是阿奎纳在《神学大学》中的观点。第一卷第一章详细阐述了阿奎纳的“五路”（*quinque viae*），即五个上帝存在的证明，论证上帝与世界的关系。阿奎纳所设想的上帝，与其说是位于一切存在物所构成的时间链条起点上的存在者，不如说是遍在于整个世界而保证其得以在一切时间上获得存在的存在者。《寰有论》尽管改变了阿奎纳的论证次序，但作者亦明确地注意到“五路”实际不仅仅只在证实上帝的存在，其实更多地是在说明上帝对世界存在的必要性。

对阿奎纳来说，上帝和万物共享“存在”，于是《寰有论》使用“有”或“属有”来展示上帝与万物之间的共同基础。“有”的概念既能与中国思想会通，又能保证创造者与创造物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万物的“万有”，和唯一的作为上帝的“初有”，“寰有”则是对“the great being”的翻译。此外，“创造”概念初入中国时有多种翻译：在《天主实录》中被翻译为“制作”、“化生”；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提出新的译名“造”、“创造”、“造化”以及“实有”；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则以儒家术语“化成”来指称“创造”。《寰有论》中更偏好“化成”的概念，不过也使用“造”、“自造”、“化生”的词汇。这些表述之间完全可以互换，译名的多样性表明晚明传教士依然在琢磨自己的话语体系。



Pardies 《几何原本》的测绘知识

《寰有论》第一卷第二至四章的内容则主要来自阿奎纳的《争议问题集：论天主的能力》第三题《论创造》。阿奎纳的写作风格是先列“反题”，次以论证，最后逐条辩正。《寰有论》则按照中国传统调整了文本结构和叙事方式——阿奎纳的论证被提前，标为“疏”；次以各反题，标为“驳”；每条“驳文”后各附辩正之文，标为“正”。《寰有论》基于《争议问题集》，对“从虚无中创造”的问题提供了非常精细的解释，证成了天主是天地万物唯一造主，天主的创造不需要以“第一物质”（*prime matter*）或“模型因”（*exemplar cause*）为中介，创造也不依赖于任何先决条件，即“天主能以全无肇物有”。

最后，梅谦立老师总结道，《寰有论》第一卷通过汲取阿奎纳的思想，展现了精

妙的哲学意义上的创造论，更加能为中国人的理性思想所接受。而且，阿奎纳仍然是在神学范围内讨论“创造”，在华传教士则完成了“创造论”的彻底的哲学化。此外，梅谦立老师指出，至高之存在者与此世之存在者间的形而上学联系，颇似理学中“太极”与万物的联系，这或许意味着，中西之间蕴含着足以令人惊异的对话潜能。

李天纲老师继而进行第三场报告，题目是“守山阁学人群体与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为例”。李天纲老师首先指出，史学界的传统看法不无偏颇地认为：从明末清初徐光启等人接触西学至鸦片战争的两百年间，中国的西学研究乃是空白。这个观点相当程度地低估了西学在华的传播与研究的丰富性，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界定为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李天纲老师认为，鸦片战争是康熙时期“中国礼仪之争”和乾隆时期“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两个历史事件的结果，而且所谓的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启的“通商”与“传教”实际上自明末已然。事实上从明末至清末，我国的西学是存在一定延续性的。无论是“乾嘉学派”的学术延续性，还是从天主教至新教的传教士做法的延续性，相当多的史实都表明“延续性”应该成为研究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接下来，李天纲老师通过具体地介绍“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工作来阐述这一观点。道光年间，金山出现了一个“西学”知识群体。金山钱氏家族尽管仕途不顺，但家境殷实，刻书造诣很高。1835-1844年间，钱熙祚出资，率领弟弟熙泰、同邑顾观光、南汇张文虎、平湖钱熙咸、嘉兴李长龄及海宁李善兰刊刻了一套《守山阁丛书》。其中，收录了许多阅读难度极高的“西学”著作，共11种，占全书规模的十分之一，如《简平仪说》（熊三拔、徐光启）、《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圜容较义》（利玛窦、李之藻）、《远西奇器图说录最》（邓玉函、王徵）、《职方外纪》（艾儒略）、《天步真原》（穆尼阁、薛凤祚）、《晓庵新法》（王锡阐）、《数学》（江永）等。一般以为，自明末研习“利徐之学”，清初学术内卷，清中叶已经不讲西学，再次兴起则到“洋务运动”以后。但实际上，“利徐之学”在清代经过四条途径传承下来，除了几位耶稣会士、“皖派”师徒、“吴派”苏州紫阳书院与南京钟山书院之外，《守山阁丛书》表明藏书楼的刊刻、校勘和研读也是“利

徐之学”的传承途径之一。可以认为，清中叶的江南其实一直保留着西学的延续性。

进而，李天纲老师比较了《守山阁丛书》与《海山仙馆丛书》（1849）。《海山仙馆丛书》亦收录了不少西学，但只是从江南各地本子的翻刻，并没有精校，也未能形成人才群。而金山的“守山阁”学人群体则整体进入了伦敦会墨海书馆，一起写作和翻译了大量著作，如顾观光《几何原本六合六较线解》（金山刻）、李善兰与艾约瑟《重学》（1859，金山刻）等。相比于《海山仙馆丛书》，《守山阁丛书》质量明显更高。如果说《海山仙馆丛书》的产生可用“冲击-反应论”来解释，那么《守山阁丛书》及其学人群体的贡献则为中国思想史上“内在理路”的体现，是江南学者主动、自觉、对等地研读西学的延续性案例。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守山阁”知识群体的近代意义？李天纲老师指出，在清代思想发生“内卷”的时代，江南学者在“内化”的思路下继续探求新知，可谓“守先待后”。“守山阁”学人所做的工作，首先守住了家乡的自然之山——秦山，其次通过刻书著作守住了文化之山，而且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张文虎、李善兰等人走出江南，作为西学人才享誉全国——“守山阁”成就了一个知识群体，从而守住了人才之山。

在这一思路下，李天纲老师进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未来可作的论文题目，比如“从苏州到松江：清中叶以后上海地区藏书风气之兴起”，“清末‘西学书目’对‘守山阁丛书’的评价”，以及对顾观光、张文虎、

李善兰等人的研究等等。最后，李天纲老师总结道，“守山阁”所表现出的江南学人研究西学的内发性与延续性，有助于我们反思“冲击-反应论”的视角以及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问题，从延续性的角度展开更全面的理解和阐发。

论坛尾声，张西平老师对三位老师的报告展开评议与总结。张西平老师认为，韩琦老师通过欧洲手稿文本的发现，补充了前辈研究，使我们对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欧洲数学与科学传统建立起更加全面的认识与评价。梅谦立老师的报告则表明，除了科学著作，西方神学与哲学著作也是

“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部分。《寰有诠》等著述译作，使中国开始了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欧洲哲学的源头，接触到完全不同于中国哲学的新的思维。李天纲老师则纠正了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起源于1840年的看法，向我们展现了从晚明至同治中兴期间，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延续性脉络及其内在理路。三位老师的研究展示了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并在很多议题上构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键改写。

（撰稿：王思凝）

145 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

2021年5月29-30日，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暨“北大文研论坛”第145期在文研院举办。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发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共同召集，并由“京港大学联盟”提供支持。会议分设北京与香港两个会场，两地通过连线方式对话。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切入，围绕“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这一主题发表学术见解。本次论坛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之一。

晚清以来西潮涌入，新思想层出不穷，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积累极为丰硕。在学术

脉络内部的延展之外，新思想的萌生和传递，也有赖于外部的物质形态与技术手段。铅石印书、报章杂志、教材教案、电报电话、摄影相片、留声唱片等新载体的相继导入，由文字、符号、图像、声音、气味等元素构成的感觉世界焕然一新，并反过来影响到思维方式的代际更迭。围绕上述议题，共有十八场专题报告在京港两地逐一开展，报告人与评议人就物质媒介对思想转型的影响、“物质”与“情感”的互动、新媒介与新形式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伊始，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致欢迎辞，表示希望通过是次活动，加强京港人文学术界的合作，并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学术交流。其后，来自京港两地的会议召集人亦分别致开场白。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旨与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则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组织经过，并表达了对京港两地学者的感谢与期待。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东杰首先带来了题为“语言、身体和革命的‘感觉’——一些初步的思考”的报告。在正式分享报告内容之前，他提出了两个思考问题作为引入：什么让我们产生“革命”的感觉？“革命”的感觉又怎样表达出来？基于以上的问题，他尝试以语言/声音、身体/动作、感觉的串联、革命技术与工具这些媒介，来分析“革命”的感觉如何营造、为人们所表达与接受，并加以扩展的一系列动态过程。他发现上述媒介透过再现、认知、学习与训练等方式，为人们构筑出了

一套对革命的认知和情感框架，从而营造、表达、再现、传递和记忆了“革命”的感觉。在评议环节，程美宝教授建议报告除了关注物质形态和情感媒介之外，还可以从公共场所和家庭领域的分野、技术层面（如声音的强度与革命的标准）、“革命”亢奋持续的时间标准等角度来探讨。同时，她还提出了为何革命会选择用“另一个自己”来改造世界、人们应如何在全球史视野里看革命等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紧接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吴盛青作了题为“‘诗意’的逾越/愉悦——抒情传统与民国美术风景”的报告。她主要讨论当抒情遭遇摄影术时，技术化的摄影如何成为抒情媒介的问题。报告内容以现代意义上的诗意、抒情特性、审美理想等数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Intermediality”（互媒性）这一关键概念。她认为，现代摄影技术拥有这种概念的内涵和特性，包括跨媒介性、媒介间转置、媒介间互文指涉以及多媒介性，使其作为抒情媒介能与作品互相影响。同时，她亦对民国摄影家经营诗意的几种方式做了图文并茂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院季剑青研究员对这篇报告做出总结评议，他指出这项研究的背后关怀在于以诗意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抒情传统如何在现代传媒里重新转化。摄影媒介的纳入极大扩展了对抒情传统的理解，报告人对写意概念作出了新闻发，使之呈现出新的意义。他期待报告人日后对抒情传统与现代传媒之间存在的缝隙、冲撞和紧张关系，做进一步阐释。

另外，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副教授陈学然分享了“新思潮的传



京港两地学者合影

播——金文泰、赖际熙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的报告。他指出，赖际熙、区大典等晚清遗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翻天覆地之际，本已是时代的边缘人物，但他们在因缘际会下获得英国在港最高殖民地官员金文泰的赏识。他们和金文泰及在地绅商推动中文教育，成立汉文官立中学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学内容包括儒家教化、古典文学、传统经学等等，使中文教育在重英轻中的社会环境里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再者，陈学然亦提出，香港一隅的各种现代技术媒介与新的书写形式，使新思想的表达或传播似乎呈现出了异于国家层面的发展轨迹，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场报告会的首位主讲人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陈亮亮，报告题目为“梨园之声——清中晚期伶人群体的表演论述与技艺认同”。报告立足于表演本位与伶人心境，以“技艺”作为关键词，考

察了清中晚期的昆曲艺人如何透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以文字作为媒介，纪录、传承、保存、理论化其行业技艺；并讨论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技艺、行业、身份。在报告过程中，主讲人还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示了穷生行当之表演。她强调，使用“技艺”此传统术语，不仅为了突出中国戏曲表演的高度技术性，更是有意对现代西方艺术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重艺轻技”倾向进行反动，并希望响应儒家“道—技”议题之讨论。

接下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金环以“私密书写——明清时期日记手稿”为题发表报告。报告首先厘清了“私密书写”这一概念，以往人们提及此概念，随即想起个人书信与日记。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书信与日记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具有今日所称之“隐私”意味，譬如明清语境下的“私密书写”是关于“自我”

的直接表达与记录。在厘清概念后，报告人基于明清易代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背景，以私人日记及笔记为考察对象，介绍了明清时期个人视角下对战争与私人经验的记录与书写。与官书记载的宏大叙事相异，“私密书写”中所凸显的是个人对身体、情感、历史经验的自觉。最后，报告人强调，手稿本作为媒介能够为我们传递丰富的信息，因为在删削的过程中能透露出记录者是如何一步步为他的文字赋予多重意义，这在印刷本中无法体现。

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副教授李婉薇作了题为“笔墨演说·曲线启蒙——清末广东报刊如何宣传种族革命和生活新知”的报告。辛亥革命前夕，在言文不一致的语境中，广州和香港的报刊、杂志为现代中国实现知识的传播和转移提供了十分独特的例子。这次报告介绍《广告白话报》和《岭南白话杂志》两种稀见材料，说明了黄伯耀等革命派报人如何直面群众，以生活化的语言和例子，把启蒙报刊写成演说底本，通过口耳相传宣传反政府的种

族主义思想和公共卫生常识。与此同时，作为革命派报刊的代表，广东首份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则从另一路径拓展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传播空间。报告还提出，书面粤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了建立感情结构的角色。

进入第三场汇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带来了“为《殉难记》，不为殉难人——吴庆坻与《辛亥殉难记》成书考”这一报告。《辛亥殉难记》是吴庆坻（1848—1924）于清亡后搜访史料、行迹，所写成的一部有关辛亥革命中殉清官绅、兵丁的列传。中国历代均有“褒忠”传统，会撰写遗民录以确立“忠义”的核心价值。但在辛亥年，“忠义”观念遭遇到来自宪政、自由、族群等多方面的挑战与质疑。报告详细地考订、追述了《辛亥殉难记》这部遗民史书，兼及清末民初的“忠义”书写及其所指向的伦理与文化逻辑。

其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何昱作了题为“制造左翼文学范本——鲁迅编印《毁灭》、《铁流》出版史”的报告。

本次报告，何老师主要分析了新书业与作者之间权力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进入左翼文学时代，作者的政治介入姿态将政治压力施与出版新文学作品的新书业，打破了新书业与作者间以往形成的互利关系。新书业将获得利润的方法，从推动内容创新为核心，转化为应对不确定的政策风险为中心。这种变动导致新书业以作者为核心的制度受到削弱。1931年11、12月间，鲁迅托名“三闲书屋”，自行出版《毁灭》、《铁流》两本翻译小说，夺回作者对书籍文本的控制权力，并通过错杂的安排与选择正文、附录、图像等手段，加入自我对苏联普罗文学的理解，以提供中国左翼文学的范本。出版之后，三闲书屋版《毁灭》、《铁流》因内山书店销售空间有限，流通不开，最终却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翻印本而得以通行，实现了鲁迅制造左翼文学范本的初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延雨作了题为“汉字改革与晚清民国书刊封面字体的变迁”的报告。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汉字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观察晚清至民国汉字命运的变迁，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汉字改革的种种尝试，书刊杂志封面上的字体设计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报告以此为切入点，检索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逾百幅书刊杂志的封面设计，着重分析其中字体设计的视觉特征，并追溯设计师的艺术教育背景和留洋经历。在分析过后，主讲人也进一步讨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改革者如何看待传统的书法艺术、在新文化相关的书刊杂志封面字体中，哪些设计能被归类为赓续传统或独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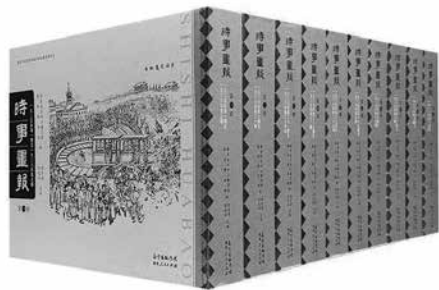
新创。由此，主讲人又延伸讨论到字体从传统到新变的转折具体发生的时期、新兴的字体设计反映变革汉字的哪些主张、甚至外来文化和艺术对汉字的视觉革新等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天会议的首份报告，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及翻译学系助理教授林毓凯所作的“胡适驻美大使时期的英文译作考证——从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电报谈起”。从1937年到1939年的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给罗斯福发了七封电报，这些电报的英文译稿皆由驻美使馆呈交给华府。主讲人在仔细审视这些英文译稿后，发现其中一封译稿在语气和行文上较前几封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该信遣词用字不但简洁有力，行文也展现了清晰明快的书写风格。由于当时正值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积极寻求美援的时期，而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更是蒋介石赖以与美方沟通的主要代表人，故不得不让人怀疑该译稿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主讲人认为，胡适的外交档案是学界过去较少研究的议题，其或许能够为胡适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视角。

在林教授分享完毕之后，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王雨带来了“‘女性的频率’：性别、广播与1940年代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这一报告。报告以播音员为研究对象，追踪1940年代中共播音风格的构成要素和衍变轨迹。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该时期大量女性播音员的实践经验，为党的播音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路径，并在后来形塑党的说话风格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认为，本身并不具备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异质元素，通过借助“女性



《时事画报》创刊版



《时事画报》精装版

的频率”，也介入到了对革命听觉文化的形塑当中。同时，这种介入往往是以扭曲、遮蔽和自我否定的方式进行的。

第五场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发表的“从语言的临界处走进两个思想时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的文体与方法”。语言和文体，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研究以斯宾塞英文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以及曾广铨、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又简称为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为基本的对象，汇集翻译史、中外近代思想经典文献的版本考证、跨文化研究、英文原典多种版本的校勘翻译、中文古籍的整理注释于一体，是一部综合性著作，深刻阐发了对跨国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叶嘉随后发表了题为“大于‘小知’——民国《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的翻译栏目”的报告。报告结合了档案文献、期刊文献的细读与数据可视化、网络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上海中华图书馆（1911-1933）三份畅销杂志《游戏杂志》《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的翻译栏目及译者群体。中华图书馆因其成立背景，杂志编辑拥有充分的编译自由，能借翻译栏目盛产“小知”，聚拢业余译者，催生知识的专门化。这三份杂志所带来的“小知”之兴，有别于一般认识中，即清末民初经翻译而产出科学、政治、哲学等主流知识的模式，亦可见西方现代性对中国人的影响已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更为广泛的民众。

本次会议的第六场汇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的“情感宣泄与思想表达：五四后学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家庭研究社为例”。主讲人表示，本报告是她家庭革命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由文、史、哲到社会科学的一个转向，学生的心态发生转变，故本报告主要研究五四以后以北大法科学生易家铨、罗敦伟为核心的一个学生社团——家庭研究社。她首先描述了易、罗二位湖南籍学生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历，指出两位阔家大少所经历的“穷少爷”生活与思想表达的关联。其次，以社团的组建、宗旨和社会活动为焦点，她讨论了《家庭研究》杂志作为的感情汇聚的功能。最后，通过杂志所呈现出的痛恨、同情、羡慕等基本情感，勾勒出了五四后学生心态的演变——而这恰是新青年转变为进步青年、革命青年的大语境。所以，她认为，情感在革命洪流的作用仍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发表了题为“如何安顿自己的‘过去’——《在酒楼上》的空间诗学与记忆书写”的报告。她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解析《在酒楼上》，发现借助“酒楼”、“废园”、“坟”、“S城”等空间意象，小说展开了极为精妙的将“过去”显现于“现在”的回忆叙事。“酒楼”是一处回忆空间，叙事者让自己的“过去”以吕纬甫的形象出现，与当下的“我”亲切晤对；而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同样事关记忆，其核心意象是对“过去”的挖掘与补偿。通过《在酒楼上》的写作，鲁迅对《呐喊》中被省略的创伤性记忆进行了“修通”，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记忆诗学，它

不仅与《野草》构成互文关系，也预示了《朝花夕拾》的登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则准备了题为“生生之道——近代返老还童术与生命观的演变”的报告。她以1920年代出现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返老还童热”为切入点，探究了近代以来人们如何认知青春和衰老，并思考有关身体、生命和人等议题。尽管很多返老还童的观念和实践与近代医学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些医学观念和实践的背后，其实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思想转向：受科学主义、进化论、社会观念等思潮影响，身处近代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何以为“人”、如何生“活”的问题。

到了会议的尾声，京、港两地的召集人分别带来两份报告为会议作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口头发表题为“晚清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的论文。他指出，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书仪”传统，与礼俗和教化关系密切。明代以降，更涌现出一批尺牍专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论文首先追溯了近代尺牍的前史，发现在日益急迫的实用诉求下，传统尺牍的“虚文”出现了分化，即明末以来尺牍专集所传递的文章趣味显得不合时宜，但系统化的程式套语却仍是社会交际的必需。继而，报告人谈到甲午战争之后教科书中尺牍课的兴起。在清末短短数年间，沪上铅石印书局掀起了一个编印尺牍类书籍的高潮，主讲人注意到这些尺牍指南书中“新内容”与“旧程式”之间的张力。款式和套语固然随时代变化，但凭借文字轻重、语气缓

急等“虚文”来表达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却是亘古不变。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则分享了“重写英雄传、演绎《新民说》：论梁启超对明治日本‘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转化”这一报告。他以梁启超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为中心，考查评传这种新文体如何经由梁启超的转化，在晚清中国落地生根，又如何承载、传播梁启超的政论与德育论。报告指出，作为梁启超书写依据的两部日文传记，具有维新史论以及修养书的特征，传布了平民主义政论与修养论。梁启超编译评传借鉴维新史论与修养书的体式，重组并转化原著思想内容，引入《新民说》中政论与德育论，并演绎、补充其论述。最后，主讲人强调，梁启超编译评传实为讨论跨国思想文化史及晚清思想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在所有汇报结束后，陆胤老师主持圆桌讨论，重申会议的主旨不仅关注物质形态，更希望进入内在情感，打通思想史和文化史。而后，京港两地学者也相继发表参会感想。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谈及自己受会议触动后所生发的问题意识：“思想和物质/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物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思想？”并将自己的思考概括为三点：其一，物质为思想提供条件和可能性；其二，物质和情感结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复原物质和思想相互塑造的场景才会更准确地捕捉历史，而将物质纳入我们的思考视野能够扩展思想版图，带来新质；其三，物质透过语言尤其是比喻等媒介进入思想史，这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线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

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则认为，会议报告涉及近代中国各式各样的情感，包括忠义、英雄崇拜、孤独、爱国革命的热情、诗意、亡国的恐惧等，不仅讨论情感的抒发，也涉及情感的克制；而如何将情感分析与不同媒介的独特性相结合，值得持续深入探讨。另外，香港城市大学林少阳教授强调，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其实语言作为一种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不仅仅如西方形而上

学传统所解释的那样，是与“物质”处于二元结构中的“观念”，因此他非常认同此次论坛的主题、形式与效果，最后，他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联合京港学者就更多问题展开平等自由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

（撰稿：王芷晨、陈颖雯）



146

卢华、孟勇、吕彦霖 |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2021年6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孟永、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黄江军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黄江军老师在开场辞中表示，情感和心灵是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率

先阐述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政治行动的先导因素，政治文化高度关联于情感、传统、记忆以及仪式，等等。梁漱溟也曾提到，人的行动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认识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到那是我的问题则是情感的事。史学界以及革命史研究中，情感、感觉、欲望等历史行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正愈发得到史家注意。人的精神活动至为复杂，前述非理性

因素能否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呢？历史行动者往往会通过理性活动，为其情感、态度做支撑或进行正当化处理。进一步的，用学术理性去解释非理性精神活动又何以可能？本场主题为政治文化，但三个报告不约而同聚焦于革命史中的情感和心态，多少体现不同学科（史学、文学、政治学）青年学人的共同关切。本次论坛的报告，呈现报告者具体讨论的议题外，对政治文化史研究亦将有方法论的提示。

孟永老师报告的主题是“中国阶级革命兴起的心态维度”。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发生、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从宏观上讲很有道理，也很形象。而从时间节点看，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直到1920年共产党早期组织才开始在中国出现。因此，学术研究中还需要阐述和分析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若干重要环节和在此过程中时人心态的演变。

孟老师认为，思想体系的吸引力是以社会心理需要为基础的。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一事对中国知识人内心的冲击是社会主义思想（包含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接受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一战使得西方文明暴露危机，而和会侵犯中国主权则有力地冲击致力

于民族救亡的中国知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不少民主主义者由此亲身体会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性。苏俄此时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对华侵略性条款。于是，一批亲社会主义的、致力于改造中国的社会团体纷纷涌现，这就为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一系的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提供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当时其他各种致力于改造中国以救亡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实践证明失败后（如工读互助团、新村实践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明显标识的马克思主义被慢慢广泛接受，成为一支重要社会思潮。

孟老师指出，思想是所以然的解释，心态则是不得不如此的反映。在中国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双重政治文化危机的大背景下，五四后众多亲社会主义团体的一大特征便是鄙视现实政治，通过纯洁个体和组织，力求在中国现实社会之外另造一个新社会。这种心态正是当时政治实况的恶油所导致的失望情绪及由此而产生的烦闷感、幻灭感所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会议合影，摄于1921年7月

致，是中国现实环境不断恶化的产物，也是救亡思潮不断激进化的自然结果。中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成立的，是此种普遍心态的组织呈现，中共对纯洁性的苛求乃是当时知识人改造中国方案的逻辑演进。中共“一大”对其他党派的排斥性态度，其实是怀着排斥中国黑暗现状的心态来改造中国的早期中共党人革命情绪的另类表达，是针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而提出的对于共产党组织纯洁性诉求的一种表现，所以“一大”弥漫着纯无产阶级运动精神，此时还不可能主动去联系中国实际。从这一心态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救亡方案之一，它提供了一条具体路径；无产阶级革命是早期中共党人的自主行为，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中共党人正是以阶级本位、组织强化的方式将纯洁性诉求纳入到对党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阶级话语的意识深处仍是民族情感的波澜，中共也正因为此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无比顽强的意志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族革命的目标。

卢华老师与谈时说，一战前后中国与世界的时势都有巨大变化，在思想和政治上表现出断裂和延续性并存的局面。断裂性一方面表现为知识青年对以往政治的反叛和对新政治、新社会的追求，大正时期的日本如此，一战期间创刊的《新青年》也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极大地加剧了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怀疑之心，而十月革命则提供了另外一条政治—社会革新的出路。从民国的内外政治看，巴黎和会上中国交涉的失败让读书人对美国威尔逊理想的期盼幻灭，部分人

不得不把眼光转向革命后的苏俄。国内围绕护法问题南北谈判的失败造成了南北政府对立的事实，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和新式青年学生对两边政治都不满，这一对上层和精英政治的失望，确实构成了对新的、彻底更新的新政治观的呼唤。延续性则体现在晚清以来的精神—政治危机加剧，稳固的权威一直无法在民国确立。思想上，中共创党之前的纯洁性诉求——道德严格主义，其思想和心灵层面的探索，晚清即已出现。民初各地的地方社团、互助组织吸收了基督教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新村运动的一些特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共在各地组织中的地域性实践和中共的创设。

黄江军老师指出，道德理想主义是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重要视角。类似倾向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亦较为强烈。史华慈从启蒙思想的系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产双重脉络中，注意到中共革命道德主义取向的渊源。从建党到革命，再到建政实践，中共百年史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基于阶级观念的纯洁性追求与基于现实情境的统战性政策之间的张力。与此相关的是，史华慈还梳理了道德主义与工程主义的两种启蒙取向，这两种取向的拉扯，实则也贯穿于中共革命历程。

卢华老师带来了主题为“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一个革命青年的感伤主义与抗争政治”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情感在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意义。传统的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理性主义色彩较重，往往忽视情感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以及政治—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因素虽然无处不在，

却不好把握。情感如何通过史料呈现，并被史家把握也是最近才开始在学界中得到关注。第三，相比较以往的革命思想史研究，大人物的思想、言说和话语实践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是由他们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文本的获取难易程度决定的，中下层的人物中情感的因素可能比抽象的理论话语影响更大。而在革命思想史的研究中，意识形态、主义和组织的重要性又让学者多侧重于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讨论革命组织的建立、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青年的塑造等。这些都限制了我们的关注情感在革命思想史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以及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重新定义，中外学者普遍关注到了情感和心灵在政治活动和政治—社会组织中的关键意义，相关概念性梳理可参照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和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对于革命青年主体能动性的关注，以及对其承接革命文化的家庭背景、人际网络和思想、心灵世界的认识，有助于加深革命史和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这一视角，对诠释20世纪中国革命中革命组织持久的自我重塑和对于新式青年的塑造，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

卢华老师的此项研究围绕革命青年许邦和（1931—1934）的经历展开。许邦和出生于富贾一方的买办商人家庭，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上海交通大学，后于193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成为该校党支部书记。他的人生经历和所思所感都详细体现在其

日记中。许邦和活动的年份正好是后五四时代国民大革命前后，民国变动不居的时代。对许邦和而言，情感、阅读和人际交往型塑造了他加入中共的心灵世界。

首先是他对自身家庭出身的反叛和抗争方式。许邦和中学时就曾参与学校的学潮和五卅运动，希望改造社会。这与父辈实业救国、做好个人本职工作的期待产生严重冲突。在日记中，他多次将家庭比作“牢狱”、“囚笼”，左翼革命文学的阅读让他接受了这一社会认知建构，并认为其自身的性格弱点，如妥协软弱、贪图享乐等，都是“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教育的产物。其二是对恋爱和社会阶级的认识。许邦和在日记中记载了三段恋爱，但因其对爱情的理想化想象、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忧惧而终了。一方面，许邦和爱上的女子均受过一定教育，对许邦和而言，她们却并无真正“独立”的思考，对世俗成功的渴望和金钱的看法正是她们不够独立的证明。另一方面，许邦和对自己爱上这样的“教育程度不够”、“未完全启蒙”或者说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女的结果又非常矛盾。日记中多次表现出民粹式同情的许邦和也无法找到情感上的出路。许邦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抱有的忏悔和反省心态在日记中加剧，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资产阶级子女，在这样变动的时代中，应该通过加入到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去，实现个人情感和道德的救赎。其三是阅读新文学的体会。许邦和酷爱托尔斯泰的《复活》，也对鲁迅、茅盾等作家撰写的左翼革命文学充满兴趣。他在交大特别组织了读书俱乐部，希望在



论坛现场

阅读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过程中，为自己强烈的救赎情感寻找革命同道和出路。他还常常光顾当时中共外围组织在上海成立的光华书局和水沫书店等各色“新书店”，阅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籍，希冀着未来能够从事这样正义的事业。不过，阅读并没有如其所愿，帮助其克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而加重了其反省心态。许邦和逐渐意识到，仅凭自身反省，恐难以克服自身阶级的弱点，因此需要通过组织来改造自身和周围社会，由“自省”实现“他省”。这一寻求组织的过程，最终通过与中共人士的接触，参与冯雪峰、王学文等人在暑期班的讲习班而加入了中共。

卢华老师总结说，许邦和的个案展现出后五四青年在国民大革命期间和之后接受教育，更极端地接受了后五四的革命文学中对于“传统”和“家庭”的批判，出现了更加普遍的烦闷心态。解纽的社会纲

常和人生伦理，以及恋爱中的不顺让他们强烈的个人自主和个人解放观念加剧了人生观的危机。他们试图从阅读和日常生活的反抗中寻求情感出路，各色革命文学和苏俄、日本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让他们模糊地产生了加入革命的心态，并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读书会、创作）等找到一个解决烦闷的友爱共同体。倘若能与同时代其他青年的日记进行比较，结合加入中共的不同代际青年的文献资料，或可揭示出这一代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普遍情感特征和机制。

吕彦霖老师与谈时表示，卢老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思想史的“框架式”研究，类似于“贴着写”的东洋思想史的呈现方法——即不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框架，而是贴合于历史人物自身的发展脉络。这种研究方法看似琐碎，却往往能从多维度烘托出了人物的立体形象及其精神

的“内面”。他指出，许邦和的事例有助于探讨作为“文学生活”的阅读将如何塑造人的好恶和情感结构的问题。例如，许邦和对劳动阶级怀有深切同情，而巴金早年也对家中的“下人”深表同情，但最终却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二人的认识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人道主义的“同情”如何向“阶级意识”转化，是值得探索的话题。与此同时，卢华老师对许邦和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的深描，呈现了“革命”与“恋爱”在不同性别青年中的深层差异，而这也是我们发掘启蒙的情感结构之复杂性的有利切入点。

黄江军老师认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代际已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经典视角。以往学人看重代际之间的差异，较少注意到代际之间存在着延续或不断叠加的政治话语基底，也相对忽视这种差异与历史记忆和书写的建构存在密切关联。许邦和的早逝，提供了一个思考未经历史叙事包装的革命者案例。许邦和的活跃时期处于国民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个特征鲜明的代际之间，并非是区别于前后两代的自成一代，而恰恰呈现较少被渲染的代际之间的政治话语基底。家庭与青年间的矛盾，往往因后者的性情与接纳的时代风气被放大，从而为家庭革命以及由家庭而入革命张本。此一问题发轫于晚清，到许邦和的年代，有更具革命色彩和更有正当性的话语作支援。卢老师提炼出“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说法，在处理许邦和对家庭是抱怨还是革命的态度时，

比较谨慎和细腻。这提示着，讨论家庭与革命的关系时，更多要因人而异，避免陷入时词的误导。

随后，吕彦霖老师以“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以姚雪垠对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为主题进行报告。他先对作者及小说的背景知识予以铺陈。《春暖花开的时候》是作家姚雪垠在青年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创作于1939年，原是作者构思的百万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抗战初期在大别山一个经历革命风雨的县城里，罗兰、黄梅、林梦云三位出身各异的进步女青年（“三典型”）在进步青年罗明、陶春冰、张克非等的教育领导下与地方反动势力斗争，最终突破了守旧家庭羁绊的故事。该小说刚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曾在短时间内连续再版，成为大后方的“畅销书”。但这本小说很快先后遭到了“胡风派”以及编辑胡绳的批判，被迫“冷藏”四十余年。

改革开放后，姚雪垠萌生了修改《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想法，并于1986、1987年两次大改。较之初版本，再版本明显改动105处，补写14万字。其主要改动包括：根据人物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对人物进行再定性；修改了小说情节中有悖历史主流叙述的部分；在小说中注入了大量的私人经验，特别是在男主角陶春冰身上加入了许多作者本人的特征和经历；等等。这些改动导致小说文本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呈现出迥异于前的审美取向和意义结构。

吕彦霖老师指出，作者采取如此的修改策略的内在动机和时机选择都值得

细致探究。虽然通常来说，“现代文学”作品进入当代，出于发表的要求，都或多或少都需要按照新的评价标准进行修改，譬如曹禹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曾按照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进行修改；但姚雪垠的修改行为显然更加耐人寻味。首先，姚雪垠修改小说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段，历史情境已经相对宽松；其次，此时作者已恢复了名誉，厕身重要作家之列；再次，此书被他本人视为青年时期的代表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且他年事已高，深信再无修改的可能。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些修改行为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主观意志。

作者究竟为什么这样修改？吕彦霖老师认为，其内在动机需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结构中予以探寻。1986年，姚雪垠介入了和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姚雪垠不满于单独强调，乃至突出文学的“主体性”，反对强行区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规律。按照他的观点，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文学无法切断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场争论使得姚雪垠在八十年代被目为“左”的卫道士。然而回顾其早期的创作经历，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反对政治过度干涉文艺创作，并呼吁给予作家相应的创作自由，与文艺体制内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展开斗争。这似乎又与其在八十年代的表现相互抵牾。

吕彦霖老师随后指出，姚雪垠的自我身份定位——“革命文化人”对于解释这一矛盾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所谓“革命

文化人”，就是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将革命视为国家民族重造的唯一前途，但又惯于按照文化的规律来处理所面对的问题，对革命怀有个体化且理想主义的认识。这种自我定位乃是一种互相贯通的二元结构，“革命意志”和“文化人底色”分居个人情感结构的两端，并始终保持一种因时代语境而主客转化的动态平衡——面对政治形态或者文艺机制日益激进化的局面，则作为副线的文化人特质可能翻转变成主线；而当历史走向另一个维度，居于其精神结构核心位置的革命意识则将被唤醒、进而重回中心，使之重新成为勇于任事的“作家兼战士”。从这个角度来说，姚雪垠对青年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似乎并不能视之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实践，而更应当视为一种因应八十年代历史情境的精神底色的恢复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证明，乃是一个“革命文化人”的“六经注我”。

在与谈中，孟永老师肯定了从修改小说这一外在表征入手分析作者晚年心态的纵深式写法，同时认为，不妨进一步透过姚雪垠对“革命文化人”定位的自我言说，走到作者背后，挖掘其如此修改小说和定位自身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并指出党史叙述中的若干提法是有讲究的，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提出一些新概念时要谨慎为之。

黄江军老师认为，吕彦霖老师抓住姚雪垠修改行为背后的两重“紧张”，即“姚刘之争”体现的姚雪垠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话语之间的紧张，姚雪垠早年观点与晚年主张之间的紧张。这两重紧张构成全

文的问题意识，并最终落脚于“革命文化人”的阐释，提供了学术写作的良好范例。报告进一步提出革命与文化人的二元结构，认为姚的表现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判断富有启发，中共以知识分子群体立党，大部分革命者都兼具文化人的身份，革命文化人是一个普遍的身份。但这个身份的特征并非固定的，如果革命与文化人是一种二元结构，那么在此二元结构中，不同人处于光谱的不同位置。丁玲是一种，萧军是一种，甚至在另一些人那里，文化人是底色，革命则是附加物。

在互动环节，三位主讲人就听众提出的“革命文化人”的具体内涵、组织左翼与精神左翼的区分、道德严格主义倾向的现实诱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并先后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想。

孟永老师认为，时人心态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应纳入思想研究的范围。思想研究旨在更好理解现代中国，不是为了寻找新视角以博人眼球。当前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仍有不少值得发掘的谜团，许多历史问题的叙述也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就为思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此外，应该摆脱既有理论框架的束缚，注意概念自身所带有的化约特性，避免自我建构的困局，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要有国际视野，并要致力于学科融合。

卢华老师提出，目前国内学界的情感史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引进、消化和吸收的阶段，具体的写作实践依然较少，本次分享的研究只是一次尚不成熟的尝

试。从方法论上讲，心灵史、情感史研究与传统的组织史研究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就是对宏大的解放政治叙事的有益补充。这既可以让历史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和立体，也可以让深描的叙事回归到历史研究之中。他对点评中提到的许邦和日记停止更新的原因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客观原因在于，许邦和入党后承担了大量组织上、宣传上的事务，个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也让他难以兼顾；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对资产阶级软弱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改造社会的关键在于付诸行动。

吕彦霖老师认为，在技术主义的时代，人文学科存续的根基可能在于人文学者们能够关注，乃至试图把握那些难以言说的微妙情感和难于赋形的思想取向，而这些研究对象无疑将向我们展示人之复杂性，以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理解自身；而包括党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正是在不断拓宽人文研究的边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他还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及点评人的建议等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当然需要立足于资料，但是我们需要“从资料开始”，而不是“到资料为止”，要从资料中挖掘研究对象“非如此不可”的内在动机甚至是潜意识；不仅要看到资料“在场”的言说，更要看到那些“知而不言”的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心态和现实意图。

“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由文研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黄江军老师在总结发言提到，三场论坛依次围绕地域视野、概念史视野和政治文化视野等不同维度展开论述，呈现出当前革命史研究的多维面向。近年来，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的不同研究范式和学术资源，激活并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空间。此外，本次论坛的三位主

讲人都是 80 后的年轻学者，呈现未来革命史研究的新鲜力量。黄江军老师对两个主办方提供交流平台表示感谢，并表示在前辈学人与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史研究的未来值得期待。

(撰稿：毕悦)



147

周黎安 |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2021年6月1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作引言，文研院访问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周黎安老师首先带来“地区增长联盟：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的主题报告。周黎安老师从研究背景开始讲起，

中国过去四十年塑造了非常独特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国政商关系的特征变得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较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主要聚焦以下三个视角：基于资源依赖而形成的庇护网络、非正式关系、特殊主义互惠；发展型地方政府下的政企合作、增长联盟；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合谋。

梳理以往的文献，周黎安老师发现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有待研究。第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政商关系之中的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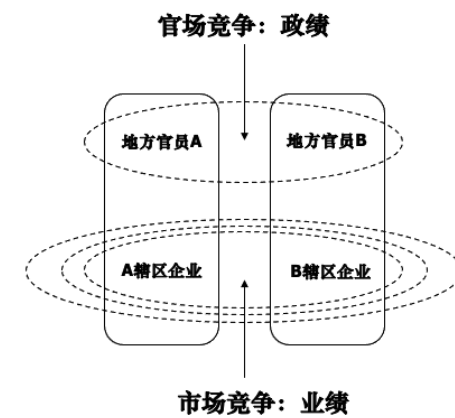
正式关系。以往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非正式的、特殊主义、关系型互惠，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制度化或正式化的互动，例如政商之间政绩 - 业绩纽带经常是明确写入双方正式的合作协议之中，政绩 - 业绩纽带是合理合法、透明的关系。所以在此过程中，怎样理解这种非正式关系与正式关系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未明晰。

第二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政商关系中的庇护关系。以往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分析经常聚焦于官员与企业之间基于不平等权力或资源依赖而产生的庇护关系。庇护关系以双方关系的封闭性和被庇护人的依赖性为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与此特征不完全一致的现象。政商双方的关系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地方官员是频繁流动的，企业也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地。从政绩 - 业绩纽带的视角看，如果一家企业失去“政绩创造力”，庇护关系难以持久，尤其在官员频繁流动的情况下；反过来，一家中小企业成长为有竞争力和品牌力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香饽饽”。所以，如何理解政商关系之中的绩效导向与庇护网络变成下一步需要解答的问题。

第三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政商关系的不同面向。当前文献从不同视角揭示出中国政商关系的不同特征，如非正式庇护关系、增长联盟、政企合谋，多重特征可能并存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因而使得每一种典型概括的适用性都存在局限。譬如一个地区中小企业与基层干部之间可能存在非正式庇护关系，但地区主政官与大企

业之间更可能存在政绩 - 业绩交换纽带，这些关系在某些场合（如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又演变成合谋关系。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政商之间的多层次关系还表现为主政官的“帮助之手”与基层官员的“掠夺之手”。如何将这些不同层次和不同面向的政商关系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使之变成一个关系统一体或“一体多面”的关系，并揭示其决定因素，变得十分重要。

最后一个有待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以上讨论的政商关系是否为中国特色。因为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关于政商关系的理想基准是统一的：基于法律、规则的保持距离型的关系。无论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亦或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们都认为，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从传统社会的特殊主义和人格化关系向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和非人格化关系转型，最终将走向规则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但中国政商关系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商关系的下述特征即使在未来也可能是常态化的：政府的定位使得政企之间



“政绩—业绩”纽带

的关系难以保持距离，而是密切互动；行政发包制之下政绩考核的常态化，即政商的政绩-业绩纽带的常态化；官员的人格化激励及政商互信的重要支撑作用。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经济发展阶段，政商之间的人格化和制度化到底是何种互动关系？

周黎安老师基于“官场+市场”的理论，试图重新梳理和分析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特征及其影响，揭示出中国政商关系“一体多面”的重要特征。周黎安老师认为，在“官场+市场”竞争互动下，以“政绩-业绩”互惠关系为纽带，因为官场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的结构差异而形成地区性多层次、多面向的政商综合体，塑造出制度化与人格化“混搭”的政商关系，形成“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官场竞争嵌入于市场竞争之中，市场竞争嵌入于官场竞争之中，“官场+市场”又嵌入于社会关系（如信任、地方关系网络）之中，由此塑造了中国多层次、多面向的政商综合体和地区增长联盟，在整体上为地区的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制度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隐含了政商关系的一条基本假设，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保持距离型关系（arm's length relationship）。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实施市场和社会监管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基于法律、契约和规则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关于政企关系的认知与设定反映了以英美国家为主的实践，产权制度、法治、公民社会等支持了保持距离型政企关系。

英美、德国、日韩的政企关系均在国家层面，但中国政商关系主要体现为地方

性（属地）关系。在这种地方性关系中，主要有两大制度原因在背后起推动作用。一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除少数中央垂直管理（如银保监会），经济和社会监管（环境、工商、质检、安全、社保）的执行主要在地方政府，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二是属地管理：地方政府与辖区非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最频繁、最密切、最重要的关系。

以经济发展绩效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塑造了“官场+市场”的独特发展模式。一是，辖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结果影响官员官场竞争的命运。二是，官场竞争驱使地方官员竞相改善辖区招商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影响辖区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命运。官场竞争嵌入在市场竞争之中，市场竞争引导和制约官场竞争，避免了官场竞争蜕变为政治作秀或权力游戏。市场竞争嵌入在官场竞争的逻辑之下，企业竞争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助力和赋能。在辖区内，地方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利益互赖和密切合作关系；辖区间又相互竞争。在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一条“政绩-业绩”互惠交换纽带，政绩依靠企业业绩，业绩依靠政府助力。

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作用下，地方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增强本地企业市场竞争力，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具体而言，即地方官员控制了企业业绩所需的关键性要素，如财政资金、项目审批、土地批租、融资支持、监管执法、税收，提供重要的协调服务，解决企业瓶颈问题；地方企业创造了地方官员关心的关键政绩。这是官员政绩与企业业绩的自

愿交换，不以等级权力或产权关系作为纽带，区别于政府与国企、乡镇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这种交换是一种双向依赖关系，即优势互补，激励相容，形成利益共同体。政绩-业绩互惠纽带设定了政企合作的最大空间和底线，即地方官员寻求与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企业结盟，避免与阻碍本地经济增长的企业结盟。

随后，周黎安老师论述了政绩-业绩纽带的三个关键特征。第一个关键特征有两重内涵，其一是属地外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官员关心的政绩指标具有鲜明的属地性，“政绩-业绩”纽带只发生在辖区内部，非属地企业不在此互惠关系中；其二是属地内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官员关注辖区加总的企业业绩，并非天然歧视中小企业，GDP和财税等政绩指标具有经济增长意义上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地方官员愿意大力度补贴大企业或战略行业，以带动上下游企业的集聚，做大综合产值。第二个关键特征为政企关系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政绩与业绩都有着强烈的绩效导向，这表现为地方官员永远欢迎和支持成功的企业、成长性好的企业、附加值高的企业，并非是“锁定”或封闭的寻租关系。地方政府对于属地企业“救急不救穷”，这区别于传统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救急也救穷），对于长期失去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地方政府将会减少甚至取消政策支持。此外，绩效导向也削弱了地方官员人事变动带来的影响，只有显著贡献区域增长的企业会持续得到继任官员的青睐。第三个关键特征为中国当今的政商关系是一种兼具制度化

和人格化双重特征的关系。制度化的一面是官员的政绩考核高度制度化，政绩与业绩的交换是可预测、可量化、可签约的正式关系，绩效导向及开放、动态的特征都体现了非人格化、非特殊主义的属性；人格化的一面为政绩-业绩交换不单纯是政府与企业两个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其底层是官员人格化激励驱动，同时需要人格化的互信和沟通作为基础和支撑。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的运行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市场交易仅仅依靠司法和契约制度是高成本的，经常依靠关系契约和社会资本。经济学家很少考虑官员与企业互动中的信任问题，其实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和潜在的投资企业之间面临典型的双向道德风险问题。在一个跨期投资决策环境下，企业家担心实物投资一旦完成，官员可以“敲竹杠”（hold-up）；官员也担心企业骗取补贴和优惠政策，或随时撤走。外部的司法和契约制度无法完全制止双向道德风险的发生。政绩与业绩的互惠交换需要以官商互信为基础。这解释了地方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一方面是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是建立互信。这种政企之间的非正式关系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在西方语境下，官员与企业家保持密切互动和信任关系一般被普遍认为是裙带主义、特惠主义或者寻租和腐败的征兆，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如果我们认为政企合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是创造价值的，那么促成政企合作的双方信任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信任有助于克服政商之间双向道德风险，促成互利合作，尤其在法治、

契约实施和市场支持性的制度缺乏的地方。

关于政商关系的制度化与人格化如何互动，周黎安老师认为，可量化和可签约的政绩-业绩纽带（即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依靠官员人格化的激励驱动，另一方面也需要人格化的信任关系支撑。制度化的政绩考核与政绩-业绩纽带也对政商的人格化关系的发展方向施加了限制和约束，即避免有损于官员政绩的合谋、寻租或庇护关系。

政企之间在许多国家的制度环境下并非是对称和平衡的，政府权力具有天然垄断性和强制性，而企业更可能处于弱势的一边。但中国依靠双重竞争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政商关系的平衡性、对称性、开放性。“官场+市场”的双重竞争机制既塑造了政绩-业绩交换互惠机制，也创

造了地方官员与企业家之间某种平衡性与对称性，使政商的相互信任得以建立。

以“政绩-业绩”纽带为基础的政商关系高度依赖于“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使得在地区间之间和地区内部不同层级官员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不同组合塑造了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政商关系。官场流动性决定了由官场竞争驱动的政绩关怀的强度，市场流动性决定了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和谈判力，而一个地区政商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受制于这双重流动性结合的程度以及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整合力度。

政商关系最成功的、最健康的地区：政绩-业绩纽带纵向渗透，从上到下（职能部门和基层官员）扮演“帮助之手”，积极服务各类企业。政商关系最失败的地区：从主要官员到基层官员扮演“掠夺之手”，庇护网络盛行，非国有企业发展艰难。介于中间状态、“官吏分流”的政商关系：主政官与大企业间政绩-业绩互惠，职能部门、基层官员与中小企业形成庇护和狭隘的私人关系。

周黎安老师认为，中国这种特色政商关系的影响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在于，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对非国有企业有效制度保障的环境下，双市场竞争模式驱动了双绩效互惠机制，地区增长联盟作为一种准制度形式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了产权保障和政策支持，政企优势互补，激励相容，为地区高速增长奠定关键性基础。政企合作有助于同时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抑制“掠夺之手”。另外地区增

长联盟所塑造的政商关系也有其潜在的问题与短板，主要表现为属地歧视性和排他性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政商关系的人格化属性虽然有助于提供激励基础和维持官商互信和充分沟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企合作的相机性和不确定性，政商合谋、寻租和腐败在一定范围内会存在。

在论述到中国特色政商关系的未来演变时，周黎安老师指出，近年来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体系逐渐调整优化，在经济发展绩效之外日益提高了环保、创新和民生的考核权重，政绩指标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变化有助于防止政商关系朝着“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的方向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寻找更高的发展质量。随着中央大规模反腐以及国家治理对于程序和规则的重视程度加强，政商关系将以“亲清”原则为最高标准，过去政商关系中的腐败、寻租、利益捕获现象将会显著减少，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周黎安老师最后总结道，中国政商关系更主要体现在地区层面上，形成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官场+市场”竞争互动塑造了“政绩-业绩”互惠纽带和多层次多面向“政商综合体”。“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是塑造上述政商关系特征的制度化基础，官场流动性的纵向差异以及市场流动性的企业差异的不同组合，使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政商关系呈现差异性及其相机性特征（区别于英美、日德国家层面相对稳定的关系特性）。随着国家日益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地区增长联盟”将走向“地区发展联盟”。

对谈环节，周飞舟老师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评述。首先，周老师认为周黎安的本项研究是对之前“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实质性推进，从之前关注人事的研究角度转换到政商关系上来，有力地反驳了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些挑战。例如研究揭示出地方的业绩与政绩对于官员晋升的重要意义。第二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混搭”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具有较强理论解释力。对中国四十多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解释，学界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地方竞争，但是对于地方如何竞争，学界的共识性并不强，有些学者倾向认为地方政府是“掠夺之手”，而也有些学者倾向认为地方政府是“帮助之手”，这两者都没有看到中国地方竞争与政商关系的特色之处。政商关系中的“混搭”概念不仅是一个经验概括，而且还具有理论潜力。制度化和人格化的混搭，不仅可以解释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的生长原因，而且也能解释未能健康发展地区的生长桎梏，是一种机制性的解释。

第三点是，政商关系中的家长制心态需要着重注意。前面论述到的地方政府对企业“救急不救穷”、属地内的保护与属地外的歧视等原则，这在中国各个地方显而易见，体现了本位主义的原则。其实这背后有一种家长制心态的弥漫，不仅弥漫于政商关系中，而且还鲜明的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普通老百姓之中。最后一点是，政商关系的对称性问题特别重要。“官吏分流”指的是，在官僚体系中，晋升的是“官”，“吏”是不流动的。对企业而言，与地方的主政官搞



好关系就能便利很多事情。具体到政商关系，有的企业出现了危机，地方政府会积极主动地去解救；而有的企业出现了问题，地方政府表现得则不那么积极。当然总体来说是以政绩为主，关系为辅，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再考虑到政府内部情况，就会相对复杂一些。在涉及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时，人格化的关系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对于地方官员而言，该企业家“靠不靠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是否给予援手。这种“靠不靠谱”并非单纯指的是企业的技术指标和财政状况，更多则体现在社会情感意义的层面上。所以对于地方官员和企业家来说，双方心中对“靠谱”的界定需要深入探讨，这种人格化的“混搭”在未来将变成何种样态也需要深入思考。

随后，张静老师进行评述。张静老师指出，周黎安老师本项研究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概括出中国政商关系某些制度性的，但同时又是独特的内容。社会学和经济学对正式结构/制度和非正式结构/制度都非常重视，往往从这两个角度去讨论社会现象。正式结构一般是制度化的结构性质，然后非正式结构一般则是指人格化的内容。对多数学者而言，制度化与人格化这对概念是相对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张力和矛盾的。大多数坚持制度主义的学者会认为制度化的发展会取代人格化的内容，非正式化存在的必要性会降低，在此意义上，制度化与人格化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周黎安老师基于中国现实，试图观察政商关系中哪些是制度化或人格化的存在，哪些又同时包含两者，并不是将其放在一种冲突、对立的视角下去研究。此外，

关于前面论述的地区增长联盟，也符合中国地方实际发展状况。在政府与企业相互依赖之时，两者会形成一种联盟，当然这种平衡的关系中会有动态的调整。当政府发现自身稍处弱势之时，这时政府会做调整，来保持自身的强势地位。

张静老师进而提出两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是现实情境中可以看到，小微企业往往会寻求政府的庇护，因为在企业发展中会有很多的制度限制，这需要小微企业熟悉发展规则，游走于各种规则之间。小企业为了获得发展，往往会积极与政府建立联系，听取政府官员的建议，合理规避发展障碍。这种看似是非常个人化、非正式化的解决方式，但多数人都按照这种规则去做，这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则，变成了制度化的解决方式。第二个问题是，政商之间依赖关系的平衡发展。于政府而言，如果其一直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而非别的目标，那么与大企业的依赖程度是较深的。但是政府的目标如果在一定期间换成了其他目标，如扶贫或者绿化，那么与原有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考量。如果原企业愿意帮助政府一起做扶贫或绿化工作，那么政商之间的持续性关系还会延续，否则将会重新进行审视现有的依赖关系。

针对张静老师的问题，周黎安老师回应道，随着政绩考核指标的多元化发展，政绩与业绩之间的交换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润，政府还会要求企业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促使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做出贡献。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个人权利意识较强；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主

要由政府及官员推动实行。这里而言的“业绩”是广义的，政商之间的交换会随着政绩考核的变化而增减，企业的定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依然可以被量化到政商的正式合同里，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总体而言，政绩-业绩的纽带是政商交换的核心。

提问环节，周黎安老师围绕官员继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政绩评价标准多元化对未来政商关系的影响、地区增长联盟下的政商关系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周黎安老师补充道，中国政商关系中制度化和

人格化的混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持续，其中人格化的内容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制度化、规则化取代，而且在科层体制中上层政府倾向于用制度化和正式化方式，底层政府则倾向于非正式化方式。西方国家强调政府与企业应该保持距离，这点对中国国情并不适用，仅仅让政府聚焦公共服务值得警惕。

(撰稿：刘建)



148 历史书写与帝国记忆

2021年6月25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书写与帝国记忆”。《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周奇主持，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陈莹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恣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董雨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评议。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

上半场

关凯老师带来第一场讲座，主题为“帝国是谁的？——历史记忆的产权归属”。关凯老师讲座对话的对象是“新清史”。新清史之前提出过一个问题：清朝究竟是鞑靼帝国，还是传统中华王朝？实际上，这个问题将传统历史研究问题放在了产权视角之下。将清朝视为鞑靼帝国，或是传统中华王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史观——一种史观是华夏中心观，另一种则是非华夏中心观。今天，我们用非华夏中心观去观察中国前现代历史之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两种史观/体系如何融合的问题。学界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两种体系之间的交互性。对这两种体系交互性认知较深的，当属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的贡献在于，他用一种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的边疆区域，对传统儒家为中心的文明体系有了新的反思。所以，两种不同看历史的视角，涉及到的本质问题是文明的中心观。

当学者在讨论文明之时，更多是将文明放在宗教的层次中进行分析。但在世界各地文明演进过程中，宗教的属性是非历史的。如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而言，欧洲的空间在教堂中，时间在贵族上，宗教本身是非历史的，《圣经》并无时间表。但是宗教的非历史特性在地方会发生转变，往往与宗教社会实践的政治性相勾连。所以，大量的历史记忆是关于教徒和传统地域人群的关系。历史记忆的深处是情感，关乎到人们的身份认同。任何政权都必须有特定的文明基础，无论是前现代还是现代的基础，这构

成了政权的文明底色。一旦失去特定的文明基础，政权的价值坐标将会面临混乱状态。具体而言，政权需要一整套文明叙事，通过体系的文明叙事，构建起稳定的政治秩序。

关凯老师认为，今天所有建立的对于政治正当性、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都与现代性产生以后的民族国家体制有关。学界对于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帝国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梳理清楚，而是滑向了某种帝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张力无法处理，给知识界造成了分裂和忧郁的后果。而对于政权而言，需要构建一种共同体，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亦或是文化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建构基于共同的历史经历，旨在说明有着共同的精神基础和历史记忆。这在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有着详细的阐释。在这种主观建构的过程里，国家对历史叙事极为依赖。

关凯老师最后强调，用“产权归属”来分析历史记忆，是具有能动性的视角，这种能动性所包含的是利益，谁拥有记忆的产权，决定了谁能最终受益。除此之外，历史观的道德性也需要被学者重新发现，这可以使我们在历史叙事里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坐标，从而稳定人心，收拾目前不断复杂化、碎片化、分裂化的格局。这也会使今天的历史研究能够成为某种意义上够提供一些稳定价值坐标的学科，而非沦落到单纯的社会理论阐释。

王旭老师与学生夏曼琳带来第二场报告，题目为“当代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的莫卧儿帝国兴衰——以阿克巴和奥朗则布为例”。从莫卧儿帝国到巴基斯坦，经历了英国殖民时期，意味着穆斯林统治的

断裂。伊斯兰帝国和穆斯林民族国家显然是不同的政治实体，从历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莫卧儿帝国对于巴基斯坦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本项研究的问题是莫卧儿帝国书写如何服务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民族国家建构？

研究选取阿克巴和奥朗则布作为研究对象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阿克巴和奥朗则布是不同视角、不同时期莫卧儿帝国历史建构的重心，而且一般因其宗教政策上的差异，作为对照组获得截然相反的评价。另一方面，现行的教科书将阿克巴和奥朗则布视作莫卧儿帝国稳定时期的开端和末尾，是莫卧儿帝国君主的代表人物。研究选取的历史教科书是《巴基斯坦研究》教材（*Pakistan Study*）和《历史》教材。《巴基斯坦研究》教材注重意识形态的塑造，目的是通过历史加强学生对巴基斯坦国家的认同，其中涉及对巴基斯坦建国前部分历史事件的评述，以及1947年后完整的国家历史。《历史》教材侧重公元前2500年至1947年前巴基斯坦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完整历史。在巴基斯坦教科书中，从伊斯兰帝国兴衰而非印度历史兴衰看待莫卧儿帝国的历史方位，莫卧儿帝国没有被视为穆斯林统治印度的“黄金时代”，而是中东伊斯兰帝国向巴基斯坦演变的中间阶段。

在巴基斯坦教科书中，形容阿克巴为雏形初定、多宗教的庞大帝国的君主，承认其对帝国扩张与巩固的功劳，将其政策、措施归因为巩固帝国在印统治和扩大君主权力的需要。教科书对阿克巴的评价有褒有贬，未提及长远的不利影响，且从多元帝国君主统治的角度给印穆共处的历史作出解释。从“穆斯林统治”角度而言，对

阿克巴“印度教化/本土化”问题持负面看法，认为在阿克巴统治时期的相关政策，使得穆斯林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并导致了穆斯林帝国统治的危机。

在正统性问题上，阿克巴和奥朗则布是作为唯一对照组出现。实际上，巴基斯坦历史教科书更倾向于将奥朗则布塑造为一个正统穆斯林领袖，而非管理庞大帝国的君主。历史教科书中，非常赞赏奥朗则布遵循伊斯兰教正统的个人品德和恢复模范伊斯兰社会的政策举措，而且，认为奥朗则布作为一个“实际的穆斯林统治者”恢复国家正统、负责完成公务，起到了延缓穆斯林帝国瓦解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教科书对阿克巴和奥朗则布的评价标准在于是否维护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即“正统”（orthodox）与“不正统”（unorthodox）之分。

研究最后，主讲人总结道，帝国历史记忆服务于当代民族国家建构，莫卧儿帝国的历史书写首先通过将莫卧儿帝国放置于中东到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帝国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政权法统传承谱系上，强调伊斯兰政权法统的存续关系，也借此赋予巴基斯坦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其次，在此基础上，以“是否维护其法统”为标准评价莫卧儿君主，形成阿克巴和奥朗则布评价的对照和倒置，揭示穆斯林国家兴衰的规律，强调巴基斯坦伊斯兰意识形态践行的必要性；最后，通过阿克巴和奥朗则布的书写实际解决了巴基斯坦穆斯林民族国家建构的两大问题——解答如何印穆之分和印度穆斯林内部的不相分。

张忞煜老师的发言题目为“莫卧儿帝国史书写与印度‘左’‘右’史学之争——以印度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为例”。

张恣煜老师的报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左翼史学视野下的奥朗则布。1963年，国家整合委员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mmittee）建议组建历史教科书委员会，组织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参与编写的史学家有塔帕尔（Romila Thapar）、夏尔马（Ram Sharan Sharma）、萨蒂什·钱德拉（Satish Chandra）、比潘·钱德拉（Bipan Chandra）和德夫（Arjun Dev）。塔帕尔编写的教科书《中世纪印度》从后期君王的个人能力、经济和军备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帝国为何在18世纪由盛转衰；钱德拉的《中世纪印度》同样注重用非宗教因素来解释奥朗则布为何采取歧视性宗教政策。这种观点与独立后兴起的“阿里格尔学派”（Aligarh School）相似。可以看出，独立后第一套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莫卧儿帝国和奥朗则布的叙述实际上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受阿里格尔学派的莫卧儿史研究影响颇多。

第二部分为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化。第一套国家教培委教科书问世之时，适逢英迪拉·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中央日益左倾，与地方的右翼势力矛盾升级之时。在这种背景下，信奉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与国大党中央政府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国家教培委教材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公开反对。随着国家教培委教科书的问世和围绕相关问题的争论的政治化，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书写也增加了央地关系和政党矛盾。在中央，国大党支持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写、推广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在地方，民族主义者在地方政治精英支持下编写各自教科书。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史观影响对方的历史书写。

第三部分为右翼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以马宗达（Ramesh Chandra Majumdar）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并不排斥穆斯林王朝，而另一种更加关注印度教徒王朝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则成为了印度教右翼历史观的基础。除了思想基础，印度教右翼还搭建了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为右翼史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右翼组织依托其组织网络长期开展右翼史观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使得右翼积累了必要的知识和人力资源，使得印度人民党执政以后能很快地推出第二套国家教培委教科书，从而实现了对“左翼历史教科书”的一次颠覆。

第四部分为两大党格局下的历史教科书拉锯战。1998年，以印度教右翼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为骨干的印度人民党在中央执政。印度进入了一个国大党和印人党交替执政的两大党格局，国大党和印人党也分别成为了左翼和右翼史学的政治后台。之后的十年间，国家教培委先后在印人党和国大党执政期间推出了两套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成为了两党拉锯战的新战场。印度人民党政府推出了一套新版、更加符合右翼民族主义史观的国家教培委教科书，即第二套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2004年，国大党执政后着手替换了印人党主政时期编写的教科书，于是便有了第三套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一直使用至今。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张恣煜老师认为，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受到了三股不同的史学思潮影响，历史教科书的生产也是由史学家、政客共同参与完成的。央地关系和政党矛盾两个外部因素和史学思潮一样参与了教科书编写。无论是第二套还是第三套教科书，实际上都没有跳出马

宗达式的民族主义史学和阿里格尔学派的模式，已经明显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发展。铭文史料、地方语言史料、全球史的视角等新的元素并没有被吸纳入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缺陷入了“左”与“右”意识形态争论中，削弱了传递新知的功能。

进入评议环节，陈侃理老师指出，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十分有意义，巴基斯坦和印度遇到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对于反思中国史也很有启发。后发的国家重构自身历史时，一方承认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认识到帝国的沉重遗产和现实存在的“类帝国”形态，两方面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如何使两者相融洽，以及如何在未来的历史变化中找到新的价值坐标，是新兴类帝国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关凯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寻找历史叙事的道德性。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性具体内涵是什么，由谁来决定？此外，对于历史的国民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和联系和区别也值得重视。

田耕老师指出，张恣煜老师的研究充满了社会学的色彩，一方面，印度的央地关系与政党结构推动了历史书写，两大党积极参与到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历史教科书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领地。反过来，被不同政党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会直接形塑国民教育，影响国民的史观。简言之，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是特定形式的历史书写。对于国史或通史教材的编撰，会遇到同样的结构问题：既要具有某种史观精神，体现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正确，又要反映国史研究的前沿问题（也就是需要历史学学术的支撑）。除了历史教科书，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特殊

性是什么？田耕老师认为，在张老师研究的案例中，民族国家的历史教育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漫长的帝国历史对其现在形态的影响。对帝国过去的认识，会显著影响到现在的历史书写。从帝制时代到民族国家的诞生，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间观，经历过这种剧烈转型，才会明晰这种转型的独特意义。另外，在民族国家化的今天，如何看待制度的过去与载体，如何评价帝制时代的君主及其推行的政策，都与如何认识过去的帝制有关。

下半场

论坛第二场，陈莹雪老师首先发言，题目为“地理课本中的马其顿与希腊人的国土认同（1878-1913）”。陈莹雪老师指出，1877至1878年，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最终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条约中提出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所谓的大保加利亚国就是要囊括马其顿绝大多数的领土，这项要求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不满。同年夏天，召开的柏林会议，签订了《柏林条约》，基本推翻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对于马其顿地区的划分安排。实际上在柏林会议之后，马其顿这个地方仍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之后，临近国家围绕马其顿领土展开争夺，于1912至1913年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最终分配结果是希腊占有马其顿地区大部分的领土。

希腊建国之初，相比雅典，马其顿是一个“他者的世界”，但这种对马其顿的排斥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大概在19世纪中叶就发生了逆转，转变的关键是因

其实可以看出，普京政府意将俄罗斯帝国历史、苏联历史和当代俄罗斯联邦历史串联起来。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之中，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和俄罗斯历史协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历史协会的研究人员认为，“俄国大革命”是俄罗斯历史上根本性的转折，这个过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但直到今天，这次转折仍未能得到统一评价。另外，这一时期内，俄罗斯历史的很多问题仍未被研究发掘，或者说已经得到发掘但未得到客观认识。舒宾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研究人员，其主编的《俄国大革命的10个问题》对俄国大革命进行了阶段分期的介绍，所回答的十个重要且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为之后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奠定了框架，也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合法性的质疑。

咎涛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的奥斯曼帝国——以 Tarih III 为中心”。历史教科书具有综合性的功能，它通过地图、文本、图像等形式表达立场，展现和塑造历史观。Tarih III 是凯末尔时代官方主导编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第三卷，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使用到4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官方历史教育，很重要的关切，就是关注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主权”，以及处理领土大规模缩小的现代共和国与庞大的历史帝国的关系。

咎涛老师指出，以往学界关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官方历史教育的研究有两位重要的代表性学者。第一位学者是 Bü ra Ersanlı，仅就其关于共和国早期的奥斯曼帝

国史书写的研究来说，就有如下特点：综合性强，几乎是关注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研究的史学史，未集中讨论官方史学；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观点，但论述较为单薄；未对 Tarih III 等重要文献进行文本和结构分析，仅有粗略的概括，很多地方有较多遗漏。第二位是日本学者永田雄三教授，国内和国际学界对他了解很少，他的一篇日文论文更多地是关注种族主义和史前部分，对涉及奥斯曼历史的部分所提甚少；他关注了土耳其人反对西方史观的一面；此外，永田教授的研究还突出了“图兰主义”与日本的历史联系。

咎涛老师回顾了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土耳其官方历史教科书编纂的过程。在编写正式历史教材之前，首先被编写出的是指导教材书写的史纲，不过，因为错漏较多，未广泛发行。Tarih III，作为历史教材，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该教材中有明显的“土耳其化”色彩，所谓土耳其化，就是将奥斯曼帝国放在漫长的“突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第二，具有鲜明的比较视野和世界史眼光，一方面讨论奥斯曼帝国的起源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史进行平行的比较（今天土耳其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仍然有此特点）。

第三，教材特别突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并将衰落的起点追溯到苏雷曼大帝后期，也就是16世纪后期，这就非常之早，谈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其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与同时期的欧洲历史发展相比，奥斯曼帝国是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衰落论后被刘易斯所代表现代化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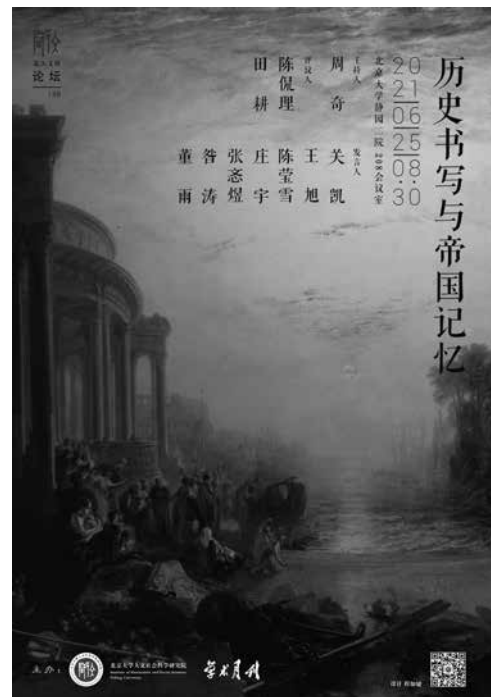
式的研究发扬，不过，如今已经被主流学界放弃）。

第四，对伊斯兰有矛盾心态，因为土耳其共和国是新的世俗国家，而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政权，历史书写一方面难以否认奥斯曼帝国的伟大之处，但另一方面还需要将历史“土耳其化”，这其中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特性就显得很难处理，不过，Tarih III 也有使二者融合倾向。

第五，特别强调为共和国的现实与实践服务，比如，在讨论哈里发制度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强调，哈里发称号被奥斯曼人使用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实质价值，一战期间对哈里发的利用，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种写法，实际上是为1924年凯末尔党人废除哈里发制度进行辩护。

董雨老师的发言主题为“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对苏联时代的认知——以《鲁赫纳玛》为例”。董雨老师首先指出，近代以来土库曼斯坦的帝国记忆是一种作为被统治者的记忆。不同于通过光荣的历史记忆来凝聚民族的路径，土库曼斯坦是通过痛苦或耻辱的记忆来加强民族认同的。

作为政治概念的“土库曼斯坦”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之后才出现的。苏联时期，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土库曼族是它的主体民族，也是共和国的命名民族。土库曼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共的帮助指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国家建设工作，包括民族识别划界、扫盲、统一文字、无神论教育，还有新建大型基础设施，比如土库曼大运河（未果）、卡拉库姆大运河。可以说，苏联对土库曼斯坦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



时代不仅是现代土库曼斯坦国家边界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土库曼民族建构的重要历史时期。

土库曼斯坦对苏联时代的认知，可以被视为中亚五国对待这段历史的一个代表。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的著作讲话访谈成为考察该国官方对诸多问题态度的最重要依据。尼亚佐夫总统耗时5年创作的《鲁赫纳玛》是本研究的切入点，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尼亚佐夫总统的历史观、外交思想，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设计和民族建构的主张。《鲁赫纳玛》将土库曼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民族领袖和民族象征，但苏联时期则被单独摘出，未并入上述任何阶段。此外，这一时期既没有对应的精神领袖，也没有对应的民族象征，几乎成为土库曼历史上绝对黑

暗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苏联时代在土库曼历史上的基本定位。

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发生了严重倒退。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少土库曼人怀念苏联时代的稳定生活，他们认为苏联时代更好，独立只带来了贫穷。这些看法自然威胁到了独立国家的合法性。《鲁赫纳玛》对这种思潮做出了回应，反复强调苏联时期对土库曼斯坦带来的伤害与侵犯。除了公开批判以外，土库曼斯坦官方在淡化和否定苏联时代方面，还有一些非常隐蔽的做法，比如借盖新总统府的契机，将苏联时期土库曼卓越领袖的雕像拆掉。虽然土库曼斯坦官方对于苏联整体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卫国战争，土库曼斯坦的态度则比较正面。

董雨老师最后总结道，出于维护国家独立的合法性和重新建构族史、国史的需要，土库曼斯坦对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淡化处理苏联时代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而对于发生在苏联时代，但又能抬高土库曼民族重要性、提高民族自豪感的历史事件，如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则在保留纪念象征的基础上，越过作为当时政权单位的苏联，将土库曼民族与世界人民直接建立联系，目的仍是淡化苏联的正面形象，强化土库曼斯坦独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评议环节，田耕老师主要围绕新建政权对革命的处理进行评述。对于新修国史，各位报告者均指出将革命带来的变化放到历史延续中来，而非断裂地处理这一特点。上述提到的“俄罗斯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淡化革命内部的分析，将“二月革命”

与“十月革命”统称为“俄罗斯革命”，这与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些相似。如果将革命作为整体性研究，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对于“国族性”的意义以及革命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连续性延伸而非断裂性发展。土耳其革命实际上也是长历史变革的最后一步，即“土耳其性”的上升。所谓的民族革命和国族革命，实则是内在于帝制时代长期历史的一步，并非在政变的那一时刻才发生，而是长期内部特性的不断变化，这对于认识帝国非常重要。

陈侃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从上述报告中看，旧式帝国瓦解之后建立的现代国家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旧帝国的统治民族以自身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土耳其；二是旧帝国中人口占多数的非统治民族建立的国家，比如印度；三是旧帝国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比如希腊、土库曼斯坦。以上三类国家对旧帝国的态度以及对帝国记忆的历史书写，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书写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并且注意寻找非典型的中间形态，这样工作将很有价值。

(撰稿：刘建)

（四）邀访学者论坛

07

聂激萌 | 尚书省与汉魏南北朝文书行政体制的演进

——以刘宋太子监国仪注的释读、定性为基础的讨论



聂激萌老师

2021年5月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激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尚书省与汉魏南北朝文书行政体制的演进”。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翹、杜永彬、黄晓春、马里扬、马忠文、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聂激萌老师在论坛伊始即指出，杜佑《通典》批评隋唐官制六尚书与寺监并立，“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其说影响很大。近代学者严耕望，始以《唐六典》对官制

的记载为主要依据，辨析唐前期尚书与寺监的不同职能、地位，指出“尚书六部为上级机关，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关，掌事务”。这篇文章对于后来唐代三省六部制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自不待言，但它在辨明唐代尚书与寺监关系的同时，对于魏晋南北朝制度的印象依然沿袭《通典》，如文中评论唐代行政制度是将南北朝之旧贯“釐变革通，加以系统化，于是旧官不废，而体系精神焕然一新，‘化臭腐为神奇’，此之谓矣。”这种负面评价也对魏晋南北朝制度研究影响很大。

夹在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图景首先是政治、制度的衰乱，而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南方地区的开发等则更多获得史家的积极评价。这种局面是魏晋南北朝制度史研究缺乏原生性观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出土资料，尤其是出土文书是拉动制度史研究进展的重要动力，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书相比汉唐数量较少、发现较晚。这样，汉代或唐代的制度史研究已经提出了关键议题，形成了研究范式，后起的魏晋南北朝制度研究容易受到影响。

但严耕望描述的唐初制度之精致整齐，显然不会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我们再反思汉魏以来所谓“叠床架屋”或“重复混淆”的制度，倘若果真如此，为何会历经数百年至唐代方得厘正呢？即便这种混乱确实存在，也应该是某种发展的副作用，此期制度史研究更应当回答这个发展的正面缘由是什么。“重复”主要指尚书机构在三公与九卿之间的兴起。尚书是由皇帝侧近逐渐走向外廷的，但尚书在汉唐间的发展不仅仅是君臣权力争夺，或各机构之间权力侵夺的问题。“尚”是主掌，“书”即文书，尚书是最早出现的专门处置文书的部门，其职能发展也一直紧密围绕文书。文书行政是一个庞大精细的文字处理体系，需要各种技术性保障：如文书处理的环节、层次的增加，文书档案收藏、整理、调阅水平的提高，故事典章编纂的发展等，而汉唐间尚书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文书行政体系发展的一个重点。



居延汉简元康五年诏书颁下文书及附件

在上述问题意识下，对汉唐间与尚书相关的文书与政务还可作深入考察。《唐六典》注引《汉官仪》云“尚书令主赞奏事”，祝总斌解释“赞”即“唱读”，《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的场景，也是尚书令在殿上读群臣请求废黜皇帝的奏。这个过程落实在文书程式上，是汉代批复型诏书在奏文之后的“制曰”和“某年月日尚书令某奏某官”。曹魏以后，现场进读奏章改由中书负责，这或许是由于东汉中后期长期由太后主政，士人不能入内奏事。不过曹魏以后的文书程式并没有随中书、尚书职能的替换而改书“中书令奏某官”，“奏”依然是尚书使用的字眼，它指向的实际工作则是在尚书机构内单独展开的一套复杂的政务处理流程。尚书官员会对上奏内容进行审核、讨论，提供处理意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事务性质的不同引导后续政务处理分层。整体观察汉代与魏晋以后文书体系的关系，尽管《独断》所载的汉代王言分类体系到魏晋以后发生明显改变，但《独断》诏书三品分类的政务分层逻辑在南朝元嘉太子监国有司仪注所见的文书体系中变得更加明显，说明了汉魏以来行政体制演进的总体方向。另外，从纵向上把握汉唐间与尚书相关的文书变迁，也为进一步解读南朝元嘉太子监国有司仪注提供了基础。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谈论了典章制度与实际运作的错位，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理论认识，尤其是中国相对于西方官僚制的差异，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发展的关系等话题。

(撰稿：聂激萌)

08

陈瑞翻 | 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佛教写本层累性管窥

2021年5月18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助理教授陈瑞翻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佛教写本层累性管窥”。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旻、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出席并参与讨论。

此次报告基于陈瑞翻老师与德国慕尼黑大学潘涛老师合作研究的成果。论文新刊于2020年度的《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这一研究课题的起因是两位老师2017年底在柏林目验德藏吐火罗语残卷时的偶然发现。

开宗明义，陈瑞翻老师首先定义了标题中的关键词“层累性”。这一概念脱胎自顾颉刚先生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但在本次报告中使用的语境有所不同。随后，他简要介绍了丝路北道出土的多语种佛教写本的历史地理背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的佛教写本大多书写于棕榈叶、桦树皮等材料之上。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用纸书写佛典成为了一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陈瑞翻老师（左）颁发聘书

种新的时尚。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纸成为西域诸语言佛教文献主要的书写材料，并连带产生了汉文佛经写卷“二次利用”这一有趣的现象。

所谓“二次利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在汉文佛经写卷的背面书写胡语文书。这一现象于敦煌、吐鲁番地区屡见不鲜，构成了丝路写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换言之，汉文佛经写卷于二次利用之后变身为“层累的”写本，因而成为源自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多个文本所共享的载体。对这类写本而言，分析其所承载的不同文本层次的历史信息，无疑是解读其蕴含的宗教、历史、文化信息的不二法门。陈瑞翻老师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层累写本所载的多个文本皆大白于天下，不存在只见其

一、不见其余的现象。然而，在本次报告中所讨论的却是难得一见的例外。换言之，在这些特殊的层累写本制作的过程中，所载文本的其中之一被隐藏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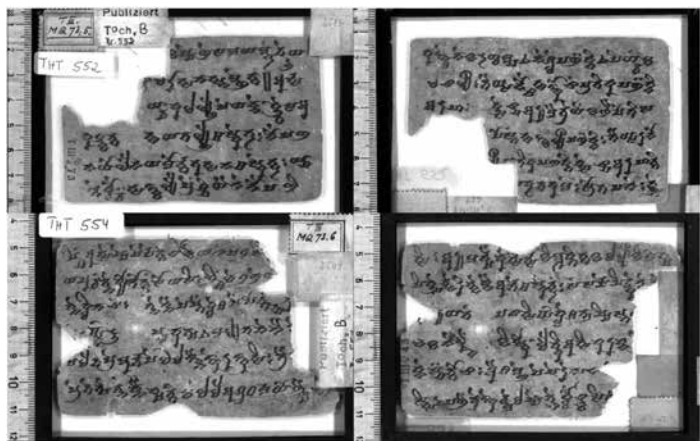
构成这一例外的是出土于龟兹克孜尔石窟几枚吐火罗语 B 残片，于 20 世纪初由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掠去，现存柏林。乍看之下，它们与普通的吐火罗语 B 残片并无二致。在对着灯光仔细勘验之后，不难发现，这几枚残片是由两张写有汉字的纸片相向粘贴而成，故所有的汉字都藏在了吐火罗语残叶的中间，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重见天日。在调阅原件的有限时间内，两位老师用特殊方法完成了这一“不可能的任务”，辨识出了每枚残片内部所隐藏的大部分汉字。凭借这些汉字，他们很快将这些隐藏的汉文佛经比定为《宝梁经》（即《大宝积经·宝梁聚会》）《维摩诘经》（支谦本）以及《无垢施菩萨分别辩经》（即《大宝积经·无垢施菩萨应辩会》）。此外，陈瑞翻老师指出，这些汉字所分布的位置，

又为重构二次利用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此我们可以大致知道，这些汉文佛经写卷是如何被剪裁、粘贴，并最终成为梵英样式而用来书写吐火罗语。

最后，陈瑞翻老师从“前世”与“今生”两个层面归纳了这些层累写本的“简历”。这些被二次利用的汉文写卷，从字体上看，大约抄写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前半，是这几部佛经现存最古老的文证之一。而二次利用后所抄的吐火罗语 B 文本，却比汉文面晚上至少两个世纪。其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引人遐想。无论真相为何，凭借这份残缺不全的“简历”，我们可以管窥蠡测从南北朝到隋唐这一重要时段西域佛教史与书籍史的一些有趣的面向。而这一偶然发现，就像著名的阿基米得羊皮纸重写本（the Archimedes palimpsest）一样，使得我们对古代写本的物质性、流变性以及仪礼功能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这一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随后，学者们就西域的汉化佛寺、汉文佛经来源、佛教写本形制及其多种功能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撰稿：陈瑞翻）



龟兹克孜尔石窟吐火罗语 B 残片，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

09

马忠文 | 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

2021 年 5 月 20 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陈瑞翻、杜永彬、黄晓春、李肖、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马忠文老师表示，近些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学界开始对善耆、端方、升允、锡良、荣禄、奕劻、载津等满蒙权贵的思想、作为有所关注，并涌现出一批新成果。这些旗籍重臣中，甲午至庚子时期最为活跃、对朝局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荣禄（1836-1903）。从甲午到庚子，荣禄主导编练新军，统带武卫五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气势煊赫，权倾一时，一度改变了咸丰军兴以来湘淮系汉族督抚势力膨胀出现的“外重内轻”格局，甚至短时间内还出现满洲贵族专权的势头。荣禄与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事变等政治事件都有无法割舍的关系，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关键人物。

有关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剖析。



马忠文研究员

第一，荣禄的崛起，始于同治初年投身神机营、密结醇亲王奕譞之际。虽然隶属正白旗满洲，祖父辈均战死疆场，立有军功，但荣禄于咸丰初年入仕之时，只是一位八旗难荫子弟，地位并不高。因军机大臣文祥的提携关照，同治初年他才有机会投身神机营的创办活动，得以结缘于主持营务的醇王奕譞。这是荣禄仕途上最关键的一步。

荣禄与奕譞年龄相近，二人彼此相投，荣禄屡次受命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土匪，才获得“知兵”的盛誉。因为投靠醇王，使他与醇王奕譞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开始出现嫌隙，积怨渐深，到庚子前后醇王之子端王载漪势力加强时便有了显现；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

端之间的隔阂。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宗室中奕詝和奕譞两支暗中较量的间接反映（核心是入继大统问题），直到庚子后载漪受黜、荣禄在临死前将女儿嫁给醇王载沣，他与宗室的政治关系才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荣禄一生都以谙熟西法练兵为期许，并引以为骄傲，袁世凯小站新军、武卫军的创立，都是他大力推动的结果，而这些都源于起初神机营的练兵情结。

第二，甲午战争改变了荣禄的政治境遇。荣禄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长期服务于宫廷事务，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中间虽一度受到冷遇，再度复出后，或任京旗都统，或外出为驻防将军，仍然侧重旗籍事务。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这场战争导致恭王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使甲申易枢以来的朝局发生重大改变。荣禄再任步军统领，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分享了军机大臣才有的权力。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甲午战争后期，因为和战争议，汉族大臣间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吴大澂、文廷式等官员在战后，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

督办军务处是荣禄重新获得权势所凭借的重要机构。荣禄通过督办处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系、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

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只是，他的梦想在庚子之乱中完全落空了。

第三，奴才秉性与庚子之败。在清廷甲午后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中，荣禄推行的编练新军，也是重要举措之一。他反对康、梁涉及官制的激进改革，坚持维护“祖制”，深得慈禧信任。政变后又维护过一些改革成果（如京师大学堂），庇护新政官员，并积极调和两宫，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当时也得不少人赞誉。然而，在庚子事件中，荣禄身居要职，



晚清军事家、政治家荣禄

权高位重，却明哲保身，始终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在庚子五月初主张“剿办”拳民、保护铁路，力图控制局面，但慑于载漪等权贵的淫威，处处委曲求全，显得首鼠两端，这是他在庚子义和团时期的基本处境。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初奉命保护使馆，却处处留着与洋人议和的余地。京城沦陷前，荣禄曾设法开启与公使馆的和议，但未能成功。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刚毅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后，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董福祥等人，直接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开始并结束的。

两宫回銮后，为了缓和对外人对武卫军围攻使馆造成的影响，荣禄加强了与外国

使节的联络。他虽然主持朝政，却病情日重，时常请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他主持的军机处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不断遭到朝野批评。等到他病逝后，时论对其功过评价甚多。与清廷的褒扬不同，南方舆论对其多持批评讥讽，这与当时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荣禄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告倾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袁世凯——这位在荣禄庇护下力量得以发展膨胀起来的一代枭雄，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荣禄的后半生便是清王朝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撰稿：马忠文）

10 白玉冬 | 有关高昌回鹘历史的一方回鹘文墓碑 ——蒙古国出土乌兰浩木碑释读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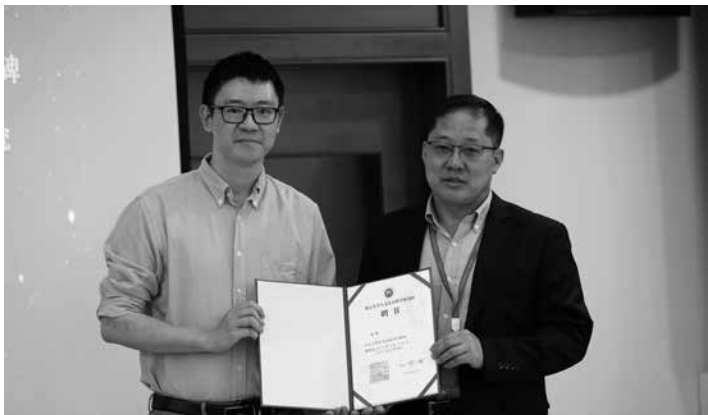
2021年5月2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

作主题报告，题目是“有关高昌回鹘历史的一方回鹘文墓碑——蒙古国出土乌兰浩木碑释读与研究”。第十期邀访学者曹寅、陈瑞翻、黄晓春、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

孙承晟、吴真、吴华锋、徐永明、余畅、赵明昊，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白玉冬老师首先从回鹘的历史谈起。漠北时期的回鹘汗国（744-840）出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与唐朝之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回鹘人西迁到东部天山地区后，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起高昌回鹘王国，又称西州回鹘王国（约9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高昌回鹘，地控天山南北，地处丝路要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源自中亚粟特文的回鹘文得到广泛使用，初期盛行漠北时期的国教摩尼教，自10世纪以后佛教渐次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基督教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景教）亦有流传。

报告第一部分有关乌兰浩木碑文译注。乌兰浩木碑文于1955年发现于蒙古西部乌布苏（Uvs）省图尔根（Türgen）苏木哈儿乌苏（Khar-Uus）地方，现藏乌兰固木市内的乌布苏省博物馆。白玉冬老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2019年的实地考察结果，给出了碑文的最新译注。碑文大意是：“我的成人名字是末斯特勤（Bars Tegin）。在我17岁时，我向布尔津地区（Bulčuluq）进军了，我获取了一千匹马。在我即将19岁时，于伽高昌王（Ögä Qočo-oo）向达鞑（Tatar）进军了，那时我出兵了。第20日，我穿越过去了（即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为白玉冬教授（右）颁发聘书

抵达了达鞑之地）。我大量掠夺着马匹，在老巢土拉（Tuγla）河畔发现全体敌人，并俘获很多。在我21岁时，我们向胡母思（Qumuz）部进军了。朝着（敌人的）老巢行进时，把神圣的身体向棕枝王、人之大德 Yuwargiz（奉献了）。”乌兰浩木碑文是方墓碑，碑主人是在出征漠北的游牧部族，即蒙元时期札刺亦儿部分族 Qumus（也即《辽史》记录的胡母思部）。谢尔巴克（A. M. Scerbak）所释读的 Türgäš（突骑施）实际上是 tükäl（完全，全部）。

报告第二部分有关考证碑文的创建年代。由于墓碑主人出征的 Qumuz 可以视作《辽史》记录的漠北游牧民胡母思部，且碑文内容与景教相关，这反映乌兰浩木碑文年代不太可能属于回鹘西迁之前的8世纪后半叶。另一方面，乌兰浩木碑文字体接近于哈密顿（J. Hamilton）解读的敦煌出土10世纪回鹘语文书之字体。Ögä Qočo-oo（于伽高昌王）的重点是在 Qočo-oo（高昌王）上。称号 Qočo-oo 似乎是唐朝建制在高昌地区尚有影响之时。就碑主人曾经

追随高昌王出兵攻打漠北土拉河一带的达鞑人而言，此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于契丹辽朝在土拉河流域设置西北路招讨司并开始驻军的1004年之后。另外，墓主人信仰的景教和碑文中所言大德或主教可能均与高昌回鹘景教存在某种关联。鉴于碑文出土于12-13世纪的乃蛮部故居地，且乃蛮人曾经使用回鹘文，并信仰景教，碑主人可能出自乃蛮部。综上，该碑文年代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早期，约9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期。

第三部分有关史事钩沉。记录高昌回鹘历史的xj 222-0661.9回鹘文书记录有高昌回鹘在9世纪后半叶与漠北游牧民九姓达

鞑之间的对抗关系。乌兰浩木碑主人追随于伽高昌王征讨土拉河畔的达鞑人，21岁时出征胡母思部，这些材料无疑与上述回鹘文书的记录遥相呼应。而有关对布尔津（Bolčuluq）地方的攻击，可能是针对黠戛斯余部或咽蔑的战争。

最后，与会学者就回鹘的历史文化、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民族语文献的使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撰稿：白玉冬）

11

徐永明 | 从纸本文献到智慧化大数据

2021年5月2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作主题报告，题目是“从纸本文献到智慧化数据”。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翹、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畅、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

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献的载体由纸到硅的变化，宣告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数字化时代，人们面对诸多问题，如：阅读的文獻有哪些形态？每一种形态有哪些特点？当前古籍数字化的状况如何？海内外有哪些与中国文史研究有关的数据平台？今后的古籍数字化会走向怎样的发展路径？数字化时代的

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本次报告，徐永明老师从纸本文献、数字化文献、结构化数据和智慧化数据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享了他个人的思考和观点。

一、纸质文献

徐永明老师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文献的形态，正经历着由纸本文献向数字化、数据库化的方向发展，进而出现向智慧化大数据方向迈进的趋势。从汉代出现纸质材料到今天，纸质文献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留存到今天的古籍，据《中国古籍总目》记录在册的有177107种，包括经部15144种、史部66502种、子部38298种、集部54889种、丛部2274种。如果每种以3个不同的版本平均计算，则有50多万部实体古籍。但《中国古籍总目》并不是现存最完整的古籍联合目录，国家正在实施的“全国古籍普查

工程”，应该是一次较为彻底的现存古籍普查，里面发现了不少《中国古籍总目》未曾著录的古籍。若加上海外公私机构收藏的古籍，估计中国现存的古籍的种数会在20万种以上，有60多万部不同版本的实体古籍。

以纸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术，已形成了优良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即便在数字化时代，这些优良的治学传统，都应该被继承和发扬下去。

二、古籍的数字化

数字化的文献，包括影像（image）和文本（fulltext）两种。徐永明老师估计目前已经完成扫描古籍大约8-10万种，其中从影像转化为可检索文本的约有4-5万种，占全部古籍的较少部分，可以说，古籍扫描与文本化工作还任重道远。徐永明老师

引用国家图书馆张志清馆长的观点，古籍影像数字化如果全部完成，大约需要60亿的投入。至于从影像转成文本，由于近年智能OCR技术的出现，这一进程将大大加快。“书同文”的i-慧眼、阿里达摩院“汉典重光古籍数字化平台”所使用的OCR，使得古籍版刻体字识别的准确率都达到了90%以上。因此，一旦智能的OCR技术普及推广，影像的文本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目前可全文检索的数据库包括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古籍一万多种）、鼎秀（收录古籍两万多种）等。但这些数据库后台缺少完整的知识体系支撑，还不属于智慧化数据；其与纸质文献的区别主要在于可进行全文检索、定位查询及易于存储等特点。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会使用Emeditor、Ftplist、everything-1.2.0.323b、Listary等软件，将大大提高检索效率。

三、结构化数据

徐永明老师介绍和展示了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以Excel、access、mysql、sqlsever等文件形式为载体，具有数字化古籍所不具备的计量统计、定位查询、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等功能。徐永明老师以结构化数据的重要代表——哈佛大学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作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例，对其网页版、单机版分别作了展示。CBDB是基于实体模型建立起的相互关联的数据库，目前收录信息有40多万人。其基本数据可用于群体统计分析，如展示古代人物卒年分布等；存为Gephi、Pajek

格式可以将社会网络关系可视化呈现，直观反映人物交游范围、关系亲疏、影响力大小等；存为GIS可以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呈现，以及地理空间分析，如唐代精英与北宋进士籍贯对比可以呈现精英分布格局的变迁，宋代进士籍贯与人口分布对比可以呈现不同地区精英率的差异等。其他结构化数据案例还包括哈佛大学与复旦大学史地所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及哈佛大学世界学术地图发布平台（Worldmap）等。国内结构化数据案例包括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AMAP）等。AMAP目前囊括了1200多张地图与400多万条数据，涉及到以人文为主的诸多领域，内容包括作者、行迹、书目（含提要）、篇名、职官、人口等。

四、智慧化数据

智慧化数据是数字化古籍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利用知识图谱理念结合大数据技术进行建设，克服了结构化数据碎片化的缺点，具备大数据分析、智慧搜索、智能推荐、人机交互、决策支持等功能。接下来，徐永明老师介绍了知识图谱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包括1945-1985年的“知识数据化”与1986年至今的“数据知识化”两个阶段。荷兰莱顿大学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Markus）将机器标引与人工编辑相结合、文本与后台数据建立关系，为阅读提供知识体系支撑，可导出标引数据进行计量统计。此外，台湾大学DocuSky数位人文研究学术平台能够提供一些数据标引工具并可发布标引好的数据；搜韵诗词平台将诗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为徐永明教授（左）颁发聘书

歌中的词语关联到后台辞典，为文学爱好者的阅读带来便利；北大“宋元学案”系统对专书做了标引，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统计分析，都是智慧化数据建设的宝贵实践。

徐永明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代文学智慧大数据平台建设”，与图数据公司展开合作，借鉴知识图谱理念，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将明代的文学文献和研究成果图谱化、智能化，打造一个集浏览、查询、研究、欣赏于一体，融审美阅读、知识学习、场景体验于一炉的智慧大数据平台。其数据包括供读者阅读的图像文本基础数据与后台结构化数据两类，数据处理需经过“文献-OCR识别-机器标点-人工校对-机器标引-人工标引-前台发布”的流程，涉及到智能OCR、自动标点、分词、众包、相似度比对、空间

分析、可视化呈现等诸多大数据技术，是以知识图谱为核心的智慧文学素材库建设。徐永明老师还介绍了平台的逻辑结构、处理流程、素材分类、模块切分、平台接口等，强调建设过程应由机器完成85%的工作，人工完成最后15%，以加快古籍数据整理进度。徐永明老师指出，现代人文学者在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素养之外还应该具有算法能力，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学术问题，提高研究效率。

最后，与会学者就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前景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徐永明)



12

曹寅 | 陈景濂的归来：战时印度的中国城与中国逃兵

2021年6月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作主

题报告，题目为“陈景濂的归来：战时印度的中国城与中国逃兵”。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陈瑞翹、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

徐永明、余曷、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945年8月24日，一名叫作陈景濂的中国公民在印度加尔各答被捕。警方逮捕陈景濂的理由是他违反了英属印度1939年外国人法案第七条的规定——没有合法证件逗留印度。实际上，陈景濂身上确实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文件。他声称自己是合法进入印度的，其护照由中华民国驻印度孟买领事馆颁发，护照号是658/2134/7132。他进一步辩解称自己的护照是在加尔各答的一家医院治病时丢失的。加尔各答警方没有相信陈景濂的辩词，仍然将他关押了起来。1945年10月23日，加尔各答警方收到了一封发源于印度阿萨姆警局的电报，称一位叫做陈景濂的中国公民，手持一本号码为658/2134/7132的护照从阿萨姆邦地区（Dibrugarh）请求出境。由于阿萨姆警方获悉加尔各答方面已经逮捕了之前在全印度通缉的陈景濂，因此他们没有对面前的这位陈景濂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让他离开了印度。



曹寅副教授

那么到底谁是陈景濂？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姓名相同，护照号码也相同的人？为什么英属印度政府会在全国通缉他？在加尔各答被捕的陈景濂和在阿萨姆出境的陈景濂之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曹寅老师通过还原这位名叫陈景濂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在印度逃亡的经历，尝试展现普通人在国家机器的夹击之下所展现出的“不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国家建构政策与英印政府的地缘政治焦虑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误解和张力。这些误解和张力更近一步影响到了印度独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中印关系。

曹寅老师通过挖掘新德里国家档案馆、伦敦英国外交部、台北“国史馆”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重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的唐人街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游荡在这些唐人街的中国逃兵的经历。曹寅老师发现，当时驻扎在印度进行整训的中国远征军的成分极为复杂，其中亦有数量众多的投机者。这些人借助各种手段来到印度后便脱离远征军，一些人希望以印度为跳板偷渡至美国，另一些则进入印度各大城市开设赌场、组织黑社会、从事走私贸易。曹寅老师以陈景濂在印度的行踪为线索，展现了这些远征军逃兵是如何通过贿赂军官以及购买假护照/身份证明/病假条洗白身份，从而逗留在印度的。

接下来，曹寅老师进一步将视野放大，将话题转向19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计划和英印政府的地缘政治焦虑。他认为1943年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致力于打造一个“文明”“正义”“负责任”



明代文学智慧大数据平台示意图

的大国形象。为了塑造这个形象，国民政府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足够的力量来规训和管理中国公民。然而遍布在印度各大城市的远征军逃兵却严重抵消了国民政府的形象建设。基于此原因，国民政府指示其驻印度的外交机构和远征军指挥部在印度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在印度游荡的远征军逃兵以及国民政府的干预被英印政府当作是一个严重的安全挑战。英印政府逐渐相信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管理这些逃兵的机会来削弱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将中国的势力延伸至南亚次大陆。

中印两国政府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试图逮捕并遣返这些逃兵，然而逃兵们往往能够利用政府间的相互不信任、政策漏洞、漂白/虚构身份逃之夭夭。曹寅老师通过对陈景濂及其冒名顶替者身份的辨析，尝试呈现国家权力机器的“外强中干”以及普通人“不被统治的艺术”。最后，曹寅

老师解释了英印政府所组织的对于中国逃兵的系统监控和调查是如何以档案的形式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的。而同时被印度政府继承的还有英印时期的地缘政治焦虑。这两点结合在一起（而非单纯的两国边界冲突）使得印度政府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对中国抱持着戒心。

（撰稿：曹寅）

13

杜永彬 | 生成、传播、接受——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知与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2021年6月8日，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杜永彬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生成、传播、接受——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知与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陈瑞翻、黄晓春、李肖、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杜永彬老师即指出，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西藏），与藏族的本土宗教本教经过斗争和融合，形成藏传佛教。20世纪中叶，藏传佛教传播到南亚并从南亚传播到西方，藏传佛教由地区性宗教演变成世界性宗教，成为一种国际“显教”。藏传佛教的西渐与西方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但是中国学术界还缺少原创性的深入研究。鉴此，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藏传佛教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为主题，以英文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为依据，参考相关研究成果，从生成、传播、接受三个视角探讨藏传佛教的西渐与影响（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知与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一、“发现”与生成——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考察、研究和认知

第一部分有关西方对于藏传佛教的知识和形象的“发现”与生成。西方“寻找”与“发现”西藏、藏族和藏传佛教的方式和途径：赴西藏和涉藏地区考察；阅读关于西藏和藏族的文本、文献和论著。西方人“发现”藏传佛教的历程：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殖民主义官员“寻找”子虚乌有的“乌托邦”、神秘的“香巴拉”、想象的“香格里拉”和真实的“佛法”。

西方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表述和认知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俯视、贬低和丑化藏传佛教。在1959年前的殖民主义和工业化时代，受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影响，到过西藏的西方人的观察、记录和描述，把西藏视为未开化地区和“异域”以及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的“真空”，欧洲传教



杜永彬研究员

士为了在西藏传播基督教（天主教），不仅肆意贬低西藏、藏族、藏传佛教和活佛喇嘛，而且还同活佛喇嘛在西藏展开竞争，“围猎”藏人，争夺信徒，抢占地盘。瓦德尔出版《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其神秘崇拜、象征主义和神话及其与印度佛教的关系》，认为喇嘛教是一种堕落的宗教。荣赫鹏出版《印度与西藏》，贬低西藏、藏族和藏传佛教。

第二、仰视和神化藏传佛教。进入“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西方人反思现代性，寻找精神的价值，受布拉瓦兹基的“通神论”、“新时代运动”和“东方主义”的影响，西方人观察和认识藏传佛教，从俯视转向仰视，把藏传佛教“香格里拉化”、着魅和复魅，试图从“他者”那里寻找心灵慰藉，制造出“香格里拉的神话”。大卫·妮尔称其进入西藏经历了“三重旅行”：进入禁地之旅、陌生的宗教之旅、最深邃的神秘之旅。俄罗斯探险家和画家尼古拉罗列赫描绘神秘的“香巴拉”。英国作家詹

姆斯·希尔顿（出版《消失的地平线》，制造出“香格里拉”（Shangri-La）。英国人洛桑然巴冒充藏族喇嘛，神化藏传佛教，其真实身份是管道工哈斯金。美国著名藏传佛学家罗伯特瑟曼出版《内心的革命——生命、自由与追求真实的幸福》，认为“内心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内心的现代性”。西藏进行的是“内心的现代性 - 现代化”或“精神的现代性”，西藏从事的是“内心征服”；西方从事的是“外在的现代性 - 现代化”，西方追求的是“外部征服”。喇嘛是探索和研究心灵的“宇航员”，是“精神实业家”。西方人制造出“虚构的西藏”“虚拟的西藏”“想象的西藏”“梦幻世界西藏”。澳大利亚藏学家彼得·毕晓普的《权力的梦幻——藏传佛教与西方的想象》、美国藏学家唐纳德·洛培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马丁·布劳恩的《梦幻世界西藏》、夏伟的《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等著作，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神化、虚拟和想象藏传佛教的历程和缘由。

第三、平视、研究和实化藏传佛教。1990年代以来，西藏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藏传佛教走下神坛，西方人意识到其对藏传佛教的贬低、神化、想象和“占领”，都是对藏传佛教的误读，于是对藏传佛教进行反思和祛魅（disenchantment），并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出版《印度 -- 西藏》，从历史和考古的视角对藏传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国著名藏学家金·史密斯出版《在藏文典籍中遨游 -- 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和文献》，对藏传佛教典籍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著名藏传佛学家杰弗瑞·霍普金斯出版了多部

关于藏传佛教经典的译者和专著，并从事藏传佛教教学，培养了一批藏传佛学专家。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和卡普斯坦编辑出版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是实地调查和研究当代中国藏传佛教的代表作。

二、“移植”与西渐——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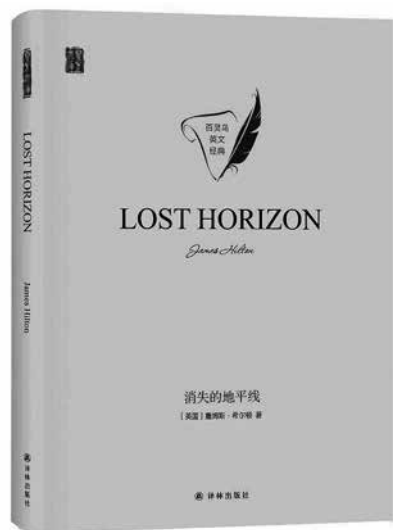
接下来，杜永彬老师谈及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藏传佛教从中国西藏和涉藏地区经过“倒流”、“移植”和“拷贝”传播到南亚（印度、尼泊尔、不丹），再“中转”传播到欧美。藏传佛教西渐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寺庙和传法中心。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都在南亚和欧美建立了寺庙和传法中心。第二、招收弟子和吸引信徒。曲嘉仲巴活佛被称为“上帝的花花公子”，他把在西方讲学藏传佛教称为“生活的舞蹈”，他以“疯狂的智慧”讲经传法，在欧美的土地上播下了藏传佛教的种子。第三、传承学修制度和翻译经典。传承传统的闻思修和讲辩著。格鲁派延续“甘丹赤巴”传承，已传承至第104任“甘丹赤巴”。伊文思·温兹和喇嘛达瓦桑珠英译出版《西藏度亡经》出版了10多种译本。第四、“移植”和创新传承体系：延续活佛转世系统，法王传承和创新，认定“洋活佛”，出版法本和传记。藏传佛教西渐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格鲁派内部的“多杰修丹”护法神问题、噶举派内部不同活佛转世系统之间的矛盾、“家族活佛”和“双胞胎”问题、活佛转世和法王传承问题、假冒伪劣僧人

和活佛喇嘛堕落问题、学经制度和寺庙管理与寺院经济问题、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关系问题等。

三、皈依与“生根”——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接受和信仰

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接受和信仰表现为：第一，认同与皈依藏传佛教。受戒、剃度、出家，成为“洋喇嘛”和“洋尼姑”。第二、想象、误读与“占领”藏传佛教。西方人想象西藏和藏传佛教，制造出“喜马拉雅乌托邦”和“香格里拉神话”。好莱坞与佛陀“联姻”，制作了多部以西藏为题材的影片。还有一些犹太人对佛教情有独钟，自称为犹佛（Jew-Bus）。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找到了“家”的感觉。一些西方人把藏传佛教视为“金刚乘”，成为与“小乘”和“大乘”并列的“第三乘”；一些西方人认为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是和平的，实际上曾发生战争、毒害达赖喇嘛、谋害摄政热振活佛、实施挖眼等酷刑；一些西方人利用藏传佛教追名逐利，做“喇嘛生意”。德国女学者伊芙穆伦出版的《美国占领藏传佛教——西藏人及其在纽约市的美国东道主》，揭示藏传佛教被美国“占领”，与美国的藏人无关，一些美国人还把藏传佛教作为“自助”的工具。

第三、反思与批判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认知。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藏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藏学与藏传佛教研究论著的出版，一些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观察和认识从仰视转向平视，反思其西藏观，认为无论是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贬低和丑化，还是美化、神化、想象，都是一种误读，沦



詹姆斯·希尔顿著《消失的地平线》书影

为“香格里拉的囚徒”，开始平视和正读西藏和藏传佛教，试图正视真实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走出“囚徒”困境。一些被藏族活佛“开悟”的西方弟子逐渐“醒悟”，开始揭露一些活佛借指导修炼佛法的名义从事违背佛法的活动，宁玛派索嘉活佛的女弟子2019年出版的《性与暴力——索嘉活佛的沉浮》，就揭露了索嘉活佛与女弟子的性丑闻，这在从前都习以为常，弟子们误认为是进行密宗修炼的“双修”。

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经历了移植、适应、变化、创新与接受。藏传佛教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是由作为传播者的藏族活佛喇嘛和作为接受者的西方人共同完成的。

借用宗教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作为藏传佛教的生产者、供给者和出售者的藏族活佛喇嘛（供给侧），提供具有很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产品—商品—法器法物，与作为藏传佛教的接受者、消费者和购买者的西方僧尼和信徒（需求侧）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藏传佛教的西渐，既导致了藏传佛教的西化，也促成了西方的藏传佛教化。

（撰稿：杜永彬）



14 吴真 | 中日书籍环流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

2021年6月1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真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日书籍环流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杜永彬、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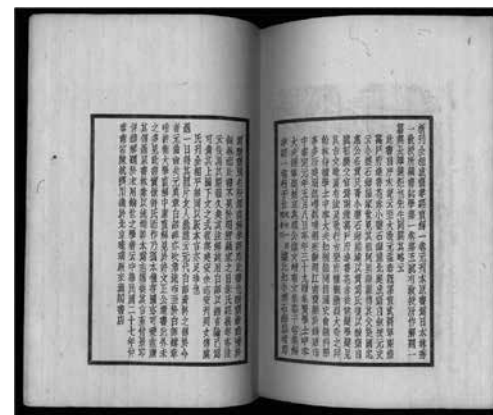


吴真教授

激萌、孙承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对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俗文学文献的搜集存藏与系统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新发展。本次报告首先回顾了发源于日本的“俗文学”“敦煌俗文学”学术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如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歌谣运动”合流，从而成为“新材料与新问题”迭出的新领域。吴真老师着重分析京都学派中国学的创始人狩野直喜在1910-1928年之间纵横亚欧，追踪俗文学新出文献，以文学史的观念和文献实证方法发见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价值，并在京都组建一支戏曲俗文学的研究团队。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指出：“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除了书院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赞助之外，考据学者还需要一个由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交流网络，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吴真老师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经史和诗文研究，俗文学文献在古代并无公私藏书专门分类的文献积累。因此，俗文学学科在20世纪的兴起，首先是俗文学文献的发现与刊布，令潜藏于各地的秘笈得以进入公共学术领域，成为研究对象。在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俗文学书籍交流网络之中，旧书店身兼发现者、出版者、发售者三种角色，而学者又深度参与到出版、研究以及归入公家典藏的书籍流通过程；再加上1910年之后中日之间频繁的学术交流与书籍贸易往



1938年3月，来薰阁书店影印出版贯云石《孝经直解》

来，从而令俗文学的研究文献和学术研究呈现出“东亚环流”的历史景观。

东京文求堂书店从1910年开始着意搜罗中国俗文学文献，运至日本出售。董康1912年赴东瀛访书，斥巨资买下文求堂所售《杂剧十段锦》，后以诵芬室名义影印刊行。差不多同时期，罗振玉从文求堂购入一批黄丕烈旧藏杂剧，1914年，在狩野直喜的主持下，京都帝国大学将这批杂剧覆刻印行，名为《覆元槩古今杂剧三十种》。此后，盐谷温影印日藏《元刊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娇红记》等，长泽规矩也影印《橘浦记》等，日本学者对日藏中国俗文学古籍之发现与出版刊布，极大推动了俗文学研究，以至于1929年余嘉锡在敦促江南图书馆影印《古名家杂剧》时感叹，“若能提前付印，公之于世，则刊行中国古曲，不能专美于东邻，尤吾人之所渴望也”。

从1928年开始，为了集资金刊布古籍文献，中国学者组成了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北平古佚小说刊行社、戏曲文献流

通会等同人组织，影印排印刊行了《清平山堂话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金瓶梅词话》《雨窗欹枕集》等新见古籍，奠定了俗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俗文学研究者与盐谷温、青木正儿、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日本学者的互通有无，与文求堂、文友堂、文奎堂、来薰阁等中日旧书店的相助互利，都体现了俗文学学科在 20 世纪学术环境之下的“东亚学术共同体”新特色。

1933 年，久佚于中土的元代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孤本在日本被发现。由于狩野直喜一直倡导从白话文体入手探讨元杂剧兴起之原因，提出“元代统治者不尊学术文艺，故不能深通中国古文学，甚至在诏勅碑文之类的官方文书中杂以俗语文体，于是俗文学兴起”。在这一学术理念的观照之下，宇内孤本《孝经直解》被京都“元曲研究会”被视作了解元代社会风俗的语料库，也被视为解开“元杂剧兴起”这一学术难题的钥匙。《孝经直解》影印件从日本回传中国，1938 年由北平来薰阁书店影印出版，并且由吉川幸次郎捉刀写跋。

来薰阁的店主陈济川，也是 20 世纪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推手，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曾断言：“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的古书店从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人，而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

来薰阁刊布的《孝经直解》成为之后六十年海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元史及汉儿言语研究的重要文献。

追溯《孝经直解》在“远渡日本→旧书店出售→私人收藏→学者推动→书店影印出版→学术领域的公共研究资料”的环流历程，可以清楚望见中日两国的书店和学者在文献发现与书籍环流方面的互动与博弈。《孝经直解》的重新发现与影印刊行，体现了现代学术史的两大时代特征：一是中日学术界的联动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二是俗文学文献的发现刊布与中日古旧书业的推动。

最后，吴真老师强调，她目前的工作是让书籍和书店成为 20 世纪俗文学学术史的主角，致力于发掘三百多种《文求堂书目》《文奎堂书目》《来薰阁书目》等书店待售书目、各藏书机构购书记录、学者日记与来往信件等书籍文献的历史信息，通过讲述一本本书籍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流转经历，更为立体地呈现 20 世纪由“书籍环流”所推动的俗文学知识谱系之建构以及全球学术共同体之形成。

这一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随后，学者们就白话文运动、中日学术文化的环流与隐流、书籍史与物质文化史、中日学者的合作与竞争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撰稿：吴真）

15

吴华峰 |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

2021 年 6 月 22 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吴华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翻、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淑萌、孙承晟、吴真、徐永明、余晔、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吴华峰老师介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背景情况。1927 年 5 月 9 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由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首途，踏上西北考察的漫漫征程。这支由中、外平等合作的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备受世人瞩目，也成为世界科学探查史上的一次创举。考查团除了要克服自然条件带来的种种挑战，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一路所遇纷繁人事往往也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期间，考查团与当地各类官员有着密切的交集，他们对待考查团的态度千差万别，这在考查团团员笔下及相关文献材料中多有记载。

西北科学考查团初至新疆之际，正逢杨增新（1864—1928）主政，他对科学考查团的态度经历了由怀疑到接受的转变过程。在最初得知考查团将在新疆设立气象测候所的消息时，杨增新就曾向北洋政府



吴华峰副教授

去电要求阻止考查团入疆，但彼时考查团已经出发，阻止不及。随后杨增新因考查团队伍过于庞大，且有谣传是冯玉祥派遣攻打新疆的军队而紧张不安，调遣军队在哈密一带布防。在考查团突破重重阻挠进入新疆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杨增新对考查团有了深入的了解，意识到并不会给他的政权带来威胁，加之考查团员们与杨增新的私人往来逐渐博得了好感，杨增新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除了最终不允许考查团在哈密地区设立气象站、禁止外方团员的航线开辟计划外，他对考查团的活动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考查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即曾感慨：“杨增新除了开头以外，对于本团的工作，总算没有限制，并且很帮助。”

1928年7月7日，新疆政坛发生了著名的“七七事变”，杨增新在省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会后的宴会上被刺杀，随后金树仁（1879—1941）出任临时主席，考查团在新疆的活动又迎来的新的挑战。金树仁对西北科学考查团至始至终都采取敌视与排斥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演进阶段。在他刚开始当政时，地方政局还处于动荡之中，考查团外方团员不慎由塔城地区运送武器入疆，出于稳固自身地位的考虑，金树仁立刻对西北考查团的活动全面禁止，要求分散在全疆各地的考查团团员限期离开新疆。1929年1月，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利用回京处理考察团延期事宜的机会，至南京上访蒋介石等人，希望南京政府出面协调金树仁与考查团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举动激起了金树仁更大的不满，他对考查团单方面的敌视态度，也升级为以之为代表的地方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考查团的工作反而受到更多的阻碍。直到1930年底，新疆政局逐渐恶化，金树仁与南京政府的博弈渐趋缓和，他对考查团才不再过多关注。

除了与新疆省政府最高官员的接触，考查团还要应对其他各类大小军官、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地方基层官员等。军官的代表人物如尧乐博斯（1889—1971），他曾在1928年初在哈密接待过考查团，在觉察到省政府对考查团敌意渐消后，他对考查团的态度也比较友好。此人在新疆近代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下不断摇摆以求得生存，解放后逃至台北。他与考查团之间的往来，也可备新疆近代史的一段掌故。政府官员的代表人物为樊耀南（1879—1928），他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考查团至新

疆时，其任交涉署长、军务厅长。樊耀南对考查团事业较为支持，也博得了考查团的认同。在“七七事变”中，樊耀南作为主谋事后被金树仁处决。考查团成员内部对于这件事也持有两种看法，徐旭生认为这次事件为樊耀南所为，斯文·赫定出于个人情感，认为樊耀南与此事无关，是金树仁主导了事变，两种观点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考查团成员的著述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新疆近代地方基层官员的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疆职官志》一书所阙载，可补史料之不足。这些地方官员有的作为省政府耳目，随时报告考查团的行踪，有的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与考查团成员私下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员群像，无疑于考查团科学考察的主业之外，给后人展现出了诸多近代新疆官场与社会生态的真实风貌。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查团面对的不仅仅是科学考察，他们所面对的各种人事关系，也人为增加了科学考察的难度。特别是与新疆地方官员往来周旋，也反衬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就得之不易。此外，考查团在新疆期间无意中成为近代新疆史上许多大小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可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作为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史的有机组成，边疆地区的政局始终与全国的政治形势紧密关联。而考查团成员与新疆各级官员的接触，已然也从宏观角度勾勒出彼时边疆官场、社会的实录，其价值甚至不亚于西北科学考查本身，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研究科学考查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撰稿：吴华峰）

（五）文研读书

26

赵莉 | 复位与再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



赵莉研究员

2021年5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复位与再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来自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新疆龟兹研究院、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高校及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并参与研讨。

上半场

会议伊始，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致辞中讲到，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是聚集了学界这一领域一流的学者，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版发布《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克孜尔石窟不仅是西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最重要的是克孜尔石窟是一种地标式的存在，具有物理式地标和宗教式地标的双重意涵，在研究者心目中更是具有精神性地标的意义。赵莉老师和各位同事多年坚持在一线工作和研究属实不易，克服了诸多困难，二十多年来对流失海外克孜尔壁画进行寻找和追踪，取得了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值得学界研究者学习。

新疆龟兹研究院党委书记王一龙在致辞中指出，新疆石窟寺是全中国石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一体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见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呈现了中国学界在龟兹石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也更充分地反映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丝



赵莉《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书影及内页图

绸之路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融合的文明交汇之地。这套书也是继《龟兹石窟题记》出版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将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接下来，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首先分享了二十多年调查研究流失海外龟兹石窟壁画的心路历程，尤其指出龟兹石窟研究与北大考古的历史渊源。1979年宿白先生带领四名研究生到克孜尔石窟，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完成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目前我们在做的《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二卷），是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的；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是在北大之前基础工作上的继续推进；而《龟兹石窟题记》也是北大荣新江教授带领龟兹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起努力研究的成果。所以，今天《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研讨会在北大文研院召开是最合适的选择。《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学术界期待已久，从立项到出版的这五年的过程中，复原的图片由二百多幅

增加到四百多幅，体量翻了一番，排版工作改动了数次。《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不是单我个人或龟兹研究院的功劳，而是诸多单位和老师，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等及出版社，以及国外的相关研究机构，大家合力完成的一项事业。这套书仅仅是流失海外新疆石窟寺壁画调查研究的开始，后面还会继续做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石窟以及吐鲁番等石窟寺的壁画复原研究工作。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指出，上个世纪初，新疆石窟遭到外国人的劫掠，国人异常痛心。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龟兹石窟研究当中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尤其近二十多年来，在霍旭初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以赵莉研究员为主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课题团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足迹不仅踏遍了克孜尔，也遍及海内外相关收藏龟兹石窟壁画的场所。赵莉团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工作，在艺术考古上开启了新篇章，它的成就和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龟兹学研究领域，也为艺术考古

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流散海外文物的回归，一直是近百年来我国学者乃至广大民众关切和热议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文化和涉及国际关系众多复杂的原因，多年来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高清复制技术的进步，为文物回归原地开辟了新的途径，也带来了新的希望。例如克孜尔石窟的流失壁画，目前赵莉团队所做的复原研究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能够照此按原样高仿壁画，复制洞窟，那些流失在各国各处的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回归的日程表。结合广泛的考古调查，运用艺术和数字化的技术，来复原流散文物原生态的工作，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建国主要从石窟数字化研究工作进行讲述。刘建国老师近些年在做石窟的三维重建工作，通过专业技术可以让石窟寺进行虚拟展示，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石窟数字化工作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即使五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一部分的石窟和壁画不复存在，但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现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观察石窟的原始样态。其实赵莉老师的工作也是如此，她为壁画复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一方面是到克孜尔石窟里观察，另一方面则是到各个国家的公立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去寻找流失壁画，然后把调查得来的零散文字及图片资料放回她的原位，使其他人了解克孜尔石窟当时的样貌，以及它应该是什么样貌。像克孜尔石窟8号窟的很多壁画，赵莉老师通过努力已经找到，石窟数字化工作就是通过后期的制作加工，把赵莉老

师找到的壁画添加在模型上，后来的人通过石窟数字化的模型，能真实地感受到壁画的真实面貌。此外，早期国外探险队揭取壁画时，壁画边缘被破坏的部分，也在努力地进行数字化复原当中。无论是通过数字化展示或者三维打印的方式，都希望通过至少完整地复原几个石窟的整体面貌，充分展示中国古代的佛教文化及传统文化。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富学指出，他去过多处克孜尔石窟，每每感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破坏的严重性，壁画大量流失海外。今天经过赵莉老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弥补，为洞窟数字化与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环境类似，条件十分艰苦，相对而言，敦煌的条件已经改善许多，克孜尔石窟的条件尽管也有所改善，但是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赵莉老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克孜尔石窟，孜孜不倦地追寻流失海外的石窟壁画，令人十分敬佩。今天看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成果正式发布，可以说是龟兹石窟研究取得的重大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与敬佩。希望其他石窟后续也能进行复原，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赵莉团队再接再厉，也需要吐鲁番同事的努力。石窟壁画复原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此项工作需要与国外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像上海书画出版社这样有远见的出版单位大力支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认为，现在是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时代，需要在这时推出一些石窟考古有分量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研究成

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达到了这样的需求和应急性。流失在海外的文物,通过高科技数字技术可以使其复位,再现洞窟曾经的真容。做石窟寺研究实际上离不开空间,现场感最为重要,倘若没有现场感的话,很多问题都是空想。研究者需要了解壁画在洞窟里具体的位置,因为只有知道具体位置,再结合资料内容,才会明晰画家在此位置绘画的原因,才能将壁画与整个洞窟其他内容进行关联。壁画在洞窟中的具体位置,对理解洞窟功能、壁画中体现的佛教思想等都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实际意义无可替代。所以从石窟寺考古而言,《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作。石窟考古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可以通过超细读带来新的历史认知。因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不仅是石窟寺佛教的壁画、佛教当时的艺术品,而且更是一幅历史作品,是一件曾经在丝绸之路因思想文化交流而带给画家启示后产生的作品。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楠的发言主题是“图像和图像复原的力量”。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工匠艺术创造的辉煌历史,但同时也是一部“伤心史”。如果说大自然对石窟壁画的侵蚀较为可惜,那么人为的破坏更让人痛心。以赵莉老师为首的研究团队从1998年开始进行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努力,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壁画被破坏的伤痛。文本历史和图像历史虽然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异,但是图像和文本都可以提供一

些特定的历史信息。从这一点而言,文本历史研究的特点和图像历史研究完全相通。对图像研究者来说,一幅非常完整的图像要从内容、时代、风格乃至材质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分析,尽可能解读更多的历史信息,复原人类既往的全貌。一幅完整图像的解读都要如此艰巨,何况面对的是众多残缺的图像,要付出的努力远超出常人,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经历了千年风霜和人为揭取的双重破坏。从已经复原壁画的情况来看,为目前的学术研究 with 学术争议带来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研究古代龟兹人服饰、生活、信仰、习俗等方面带来了珍贵图像史料,譬如复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里增添了较多龟兹供养人的影像。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首先肯定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赵莉团队的辛勤付出,随后指出了克孜尔石窟本身的重要性。在近代中国“伤心史”中,新疆遭受的人为破坏最为严重,近五百平米的壁画被人夺走。新疆壁画的丢失或者被人揭盗,这是整个中国的伤痛。现在新疆的学者来一点一滴地寻找这些碎片,找寻流失海外的文物,治疗的是整个中国的伤痛。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由赵莉完成,刚刚大家已经赞扬了赵莉老师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此项研究大概也只有赵莉老师能够完成,因为她清楚了解克孜尔洞窟的具体情形,明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具体位置,这是她亲自在克孜尔辛勤工作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结果。在如此艰辛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新疆的学者完成了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伟大工作。当前面临文物与考古研究的新时代,国家政府

非常重视文物研究与考古发现,恰好《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出版发布,学界应该以此为契机,做好更大范围的宣传与介绍,因为这是新疆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新疆文物的流失,不仅是关乎文物本身回归,也不仅是关于资料的复原研究,更多的是涉及到近代以来的民族伤痛,是近代以来“伤心史”的问题。随着类似研究工作的不断完成,“伤心史”定会渐渐结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指出,壁画复原回归的意义特别重大。新疆文物的数量非常繁多,通过多年与新疆博物馆的交流,发现当地研究者对新疆文物的“家底”了解不清,不知道文物的具体数量和样态。虽然没有参与赵莉老师的调查研究工作,但是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关注。赵莉老师的直接贡献之一就是探析了龟兹文物的数量与样态,而且是一次较为彻底的调查。文物如果离开了发生地,实际上等于剥离了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而言,壁画的复原回归就是让这些流失海外龟兹壁画

又找回了自己的历史,这对于龟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早些年的研究工作一直在“开疆扩土”,研究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前几年重点完成了新疆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释读与研究。但近几年开始反思对于龟兹和吐鲁番地区研究的忽视,团队中的学者没有一位真正关注龟兹和吐鲁番。于是痛定思痛,下一步的工作决定重点关注龟兹。因为龟兹石窟及其龟兹壁画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果能够真正解读好龟兹石窟及龟兹壁画,不仅能够理解中原文化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究出世界文明发展起源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罗世平老师将克孜尔石窟的状况概括为“千年的毁坏,百年的流失,三十年的回归”。罗世平老师指出,壁画复原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复原所呈现出来的是克孜尔石窟一百年的状况,那么一千年之前石窟壁画的样态应该是今后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即要考虑到观者和画者角度的不同。石窟的艺术绘画是由画家



读书会现场

创作而来，最原始的视觉规定性是由画家进行规定，而非今天的观者和学者进行规定。提供的美术史思路是要回到画家规定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一直到今天，学者也没有完全理清克孜尔石窟原始壁画的样貌，及其壁画规律性分布的来源。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最早形成克孜尔石窟壁画规律性分布定有一个起点，有最初尝试的过程，但这个尝试过程在克孜尔石窟找寻不到。或许这种规范的源头不在克孜尔，而在别处。这为下一步其他地方洞窟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克孜尔不仅仅是只关乎到克孜尔本身的问题，还可能关乎整个中亚及丝绸之路。在这种大范围内进行克孜尔位置的思考，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定位。所以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工作意义非凡，可以从中看到成熟期克孜尔的样态和龟兹壁画的变化。而至于克孜尔石窟最初面貌的位置，还需要下一步的找寻。

下半场

会议下半场，赵莉老师带来主题“流失海外的国宝调查——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发言。赵莉老师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去克孜尔石窟工作，被直接分配到在霍旭初先生负责的文化研究室，从那时起，就在霍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关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赵莉老师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考察热潮中，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这些探险队在探

险考察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都从克孜尔石窟掠取了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西方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本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研究所领导支持下，由霍旭初研究员组织业务人员启动了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然后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十分慎重地确定被剥离的数量。之后，我们又多次奔赴收藏龟兹石窟文物的相关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获取资料。经过充分掌握流失文物和国外研究资料后，将国外收藏壁画与现存洞窟对照、缀合、对接、复原。这是一项细致而繁复的劳作，也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实践。

我们通过在逐个洞窟调查、测量得出的结论是，克孜尔石窟被揭取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大部分是德国探险队所为，也

包括日本和俄罗斯探险队揭取的数量。目前，克孜尔石窟流失海外的壁画，最大收藏地是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其次是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日本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英国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堪萨斯等地都有零星收藏。截至目前，我们调查所获的海外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近500幅。通过在逐个洞窟核实、测量、考证，将大部分流失海外的壁画归到了洞窟原位。

由于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复杂，时间已逾百年，除了上述收藏情况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不排除辗转到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可能。

赵莉老师指出，各个国家博物馆现场调查工作结束之后，后续的工作就是考证被揭取壁画的原始位置，这项工作漫长且艰难。因为被揭取的壁画部分并不是规则图形，而且在揭取的过程中边缘还有壁画脱落，边缘更加残缺不全，很难分辨是人为切割痕迹还是自然脱落痕迹，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研究资料、看图。有的洞窟中的佛像已经消失不见，壁画也不复存在，复原难度非常大，这时需要参考过去的黑白老照片，还要参考一些线描图。像德国探险队当时拍得老照片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不是每个洞窟、每幅壁画探险队都拍过照片。复原工作会面临反复的调整，直至调整到壁画原始的状态。

赵莉老师最后总结壁画复原工作的两个层面。一是将流失壁画复原至母体石窟原位的复原和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恢复壁画的原貌，纠正记录错误的位置，落实

探险队漏记石窟及其原位。二是壁画真实内涵与“表达”本质的“复原”，流失壁画回归原位，壁画内容辨析显真，为深入研究龟兹佛教思想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对赵莉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荣新江老师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首先可以让后人想象耶婆瑟鸡寺的原貌。耶婆瑟鸡寺是原来克孜尔的名字，史传中有此记载，我们通过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找到了龟兹的原名，这是当时的一大发现。实际上耶婆瑟鸡寺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克孜尔千佛洞不仅是当时龟兹第一大寺，而且也是整个西域第一大寺。西域有两大佛教国家，分别是北道信奉小乘佛教的龟兹、南道信奉大乘佛教的于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这两个国家的财力更大。因为佛教是寄生的产物，必须有大量的财力才能够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庙宇。同时克孜尔石窟也是壁画最多、雕像最多的洞窟，我们必须通过人文的想象力来举一反三，进行合理的想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在佛教史的框架下进行思考，因为克孜尔石窟到了唐朝之后基本不再开凿。赵莉老师的工作实际上是克服了大量的困难，因为流失海外的壁画分藏在各个国家、各个博物馆，还有私人收藏的部分，再加上二战人为的一次重新组合，使得调查工作难度加倍。无论从美术史研究来讲，亦或是从研究龟兹历史文化来说，复原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完整性的问题。从研究来讲，将这些文物放回原处，会有整体场景的感觉，石窟整体的环境和色彩才会完整

的呈现出来。

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对赵莉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李崇峰老师指出，作为早期佛教徒供养和僧人参观之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也可以看作是同时期砖木结构或者泥巴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石窟是中国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龟兹石窟与高昌、敦煌、云冈、龙门、响堂山和天龙山石窟等，遭到了外国探险家和国内不法商人大规模的盗窃和破坏，致使许多洞窟中的精美造像和壁画惨遭劫掠并流失世界各地。其中以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邯郸的响堂山石窟和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被盗最为严重。赵莉老师的这部著作应该是中国人对流散海外石窟文物进行系统复原的第一部，它的出版既可以为龟兹地区佛教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也为整个龟兹佛教艺术与文化系统研究搭建了一座很好的平台，对探讨龟兹石窟的分期排年、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等具有直接的意义。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总结道，通过这次研讨，在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的知识背景下，对赵莉老师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部著作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解析。赵莉老师这部著作，是多年心血付出之下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将来的研究肯定会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会对克孜尔石窟本身研究及龟兹整体研究往前推进。但这本著作仍然是目前材料最全、涉面最广、考证最精细、图像最齐全、呈现最精美的一部克孜尔壁画复原研究。作

为美术出版社自身而言，希望跟上学术的脚步，找寻自身的学术定位，更加关注有学术含量的著作，真正做到学科的引领和品味的提升，做好出版社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赵莉老师与在场听众围绕石窟的数字化工作、文物的海内外合作、吐鲁番其他石窟后续壁画复原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一一解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撰稿：刘建)

27

乐黛云 | 和而不同，多元之美——乐黛云教授《九十年沧桑》读书会

2021年5月9日下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系列读书会第五场、“文研读书”第27期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和而不同，多元之美——乐黛云教授《九十年沧桑》读书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

读书会围绕乐黛云教授新近出版的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展开。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也作为以文学研究为终身事业的北大人，乐黛云老师在书中细致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又遭遇一系列坎坷曲折，最终回到教学岗位的历史际遇。五十多岁的她，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了重新开始，潜心于读书与教书，从而用比较文学的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并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2021年，是乐黛云老师的九十华诞之年，也是又一个历史时刻，让我们同乐黛云老师一起反思追问：如何坚持并实践“和而不同”？又如何珍存并捍卫“多元之美”？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与会并致辞。首先，王博教授以汤一介先生学生的身份，



乐黛云先生在读书会现场

向令人亲近且敬重的乐黛云老师送上了母亲节的祝福，又从《九十年沧桑》读者的角度，颂诗读书，知人论世，分享了对乐黛云老师为人与学术的认识。乐黛云老师历经了人生的穷达、起落、悲欢离合，但始终不改其乐，因其真诚与执著，无论是对民族、国家，还是亲人、学生，乃至下放时同吃同住的老夫妻，都始终怀有感情。乐黛云老师曾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总结为五个字，“命、运、德、知、行”。正是心灵的豁达与宽阔，让她能够在知限中开拓，在比较中发现，不仅开辟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更是将自身乐观、执著、豁达的精神汇聚为真诚、坚定、开放的声音，有所坚持，与时俱进，值得我们后辈景仰学习。

随后，读书会引言人乐黛云教授发言，一再强调真实与感情的重要。乐黛云老师坦言，《九十年沧桑》一书，她已经尽心

尽力去写，不说假话和傻话，尽量说真话，可是也没有都说，所以终究不能满意。如今她已经九十岁了，准备用十年时间，来写作另一本书，记录真实自我的负面生活与思想，不愿让我们的后人打开书本，就只看到一些并不完全真实的好话。人不可以辜负历史，在写作中，要追求真实，也要动自己的感情。即使面对那些曾经非常痛苦、耻辱、冤屈的真实感受，也应尽心尽力去写好。乐黛云老师也鼓励与会的每一位学者多讲心里话。

接下来，各位与会学者先后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从乐黛云老师中学阶段的阅读史讲起，以追根溯源的方式分析了乐黛云老师接触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过程。乐黛云老师初中时就已经读到《德伯家的苔丝》《三剑客》《简爱》



乐黛云《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书影

等书，高中时进一步接触到美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阅读霍桑与海明威，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纪德。这一读书轨迹，与茅盾所论述的太平洋战争前后，中国对世界文学译介的进一步丰富与多元，是吻合且同步的。因此，乐黛云老师的个人回忆，不只是一个贵州学子的读书史，更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思想解放、文学开放的新潮流如何从北京等中心地区，传播扩散至贵州这样较为边远的地区。而它所带来的多元文化，无论是西方的古典与现代还是中国的新文化，都改变了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生命体验，甚至人生选择。

乐黛云老师从贵州出发，求学于北京，又求索于世界，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文化的发展也从来都是复杂、曲折、丰富且痛苦的。

北京大学中文教授洪子诚从个人角度回顾了乐黛云老师与自己人生经历的重叠与差异。比如，乐黛云老师在《九十年沧桑》中深情回忆的同窗好友朱家玉老师，正是洪老师1956年入校学习时“人民口头传播”课（后改为“民间文学”课）的授课老师。乐黛云老师在文中记述的小拱桥下的大青石，曾经坐着她和朱家玉老师，冬天换冰鞋，夏天讲心事，如今已难以寻觅。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朱家玉老师留校后居住的体斋，在后来的某个时期，也曾是洪子诚老师的住处，打开窗，便可以看到同一片未名湖。而乐黛云老师不同于别人的重要经验，是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1995年出版的另一部自传《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中，意气风发的乐黛云老师激扬辩论，与今年出版的这一本《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对读，可以感受到乐黛云老师已平静起来。对回忆的重新

组织是一种创造，而历经种种坎坷与磨难后复归平静，则是令人钦佩的一种境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慧林在阅读《九十年沧桑》后，总结了乐黛云老师人生的五种经验，第一，是难以重复的人生经验；第二，是耐人寻味的人性经验；第三，是不能被遗忘的历史经验；第四，是激发问题的思想经验；第五，是启发学术对话的文化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与时代有关，也与家世及个人处境有关。乐黛云老师在真实记录惊心动魄的特殊年代的同时，也保留了很多温情的细节。比如在怀念汤用彤老先生的文章中，乐黛云老师写到1954年批判胡适的会上，汤老先生没有发言；1958年乐黛云老师被划为极右派，要求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最不愿意求人的汤老先生找到当时的副校长江隆基，为儿子刚刚满月的乐黛云老师申请了八个月的哺乳假；1964年汤老先生病重，在医院与乐黛云老师聊天时，特别叮嘱她两个字：“沉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回应了乐黛云老师关于负面生涯的写作计划，发现可以从“乐黛云老师每一次骂我”的角度来重述乐黛云老师对自己的知遇、提携、再造之恩。乐黛云老师的“骂”，带有比较所当年那样一种现在想来不可复现的氛围中，特定的亲情与共同的认知。乐黛云老师是大时代的女儿，她一直身处时代的重音与主旋，但绝不是因为追赶时代才抵达了那样一个位置，而是因为她最大的生命的真诚、理想的真诚、学识的真诚，使她自然成为推动时代、建构时代的人。也正是因为她的真诚，她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和时代的和谐之处，因为她不能无保

留地认同时代所规定、时代所勾勒的那样一种主旋。现在我们反思八十年代，反思正在从当下文化记忆中脱落的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的意义，而乐黛云老师以一己之力指点、开辟、护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事实，与她作为五四精神高度自觉的传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体认且间离的反省精神，都与今天形成了有趣的对话，也再次成为我们需要去追随和回应的命题与挑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从中法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回忆了自己与乐黛云先生之间的相识与交往。2001年，董强教授回北大任教的这一年，正是乐先生的荣休之年。但乐先生一直继续着推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发展的工作，比如主编《跨文化对话》杂志，组织翻译法国学者文章，积极促进中法学界交流。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工作中，使人逐渐了解到乐先生与众不同的价值，她的国际眼光与开放精神，如今也依旧罕见。乐先生在中外文化之间，前瞻后顾，左顾右盼，在每一个个案上时时持守自己的原则，但也包容各种声音，形成全面的视野，是非常难得的学者。相信在乐先生的影响下，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延续这样一种星火，让我们对人文、对北大，依旧可以乐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对比了乐黛云先生《九十年沧桑》与汤一介老师《在非有非无之间》这两本传记的不同，乐先生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使她经历漫长岁月与环境变化，一方面“得之有命”，一方面又“舍则失之”，仿佛竹、松、柏，贯四时而长青，不改柯易叶，即使是将另一部负面生涯写到最后，也依旧会是那个饱满的自我。相比《在非有非无之间》，

乐先生的自传是没有遗憾的，也是将感性与理性的反思贯穿始终的，但其中的“承担”与“平淡”，也可以看到汤老先生一家儒道互补的门风与学风对乐黛云老师的影响。能够在平淡、冲和、朴素，且看似不发力的文字中，把道理说好，是非常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从散文创作的角度评价乐黛云老师《九十年沧桑》一书。乐黛云老师的回忆性散文，呈现了她始终努力奋进的人生观，以及在百年风云变幻中，北大人所特有的“追求自由的精魂”。乐黛云老师散文的艺术魅力，在于她豪放的气度、高古的格调，也在于她面对真实自我、他人与时代的能力，用其不寻常的笔力承担起了不寻常的时代与人生，苦心经营，作意好奇，却又陡然而来，飘然而去。与汤一介先生的学者之文不同，乐黛云老师的散文中充盈着才士之风。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戎女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讲起。1996年至1999年，作为乐黛云老师的年轻博士生，陈教授最初并不能完全理解和进入乐黛云老师的精神世界，在不断努力缩小差距的过程中，也是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才真正理解了自己的老师，理解她何以有如此广泛的治学兴趣、恢弘的研究气象，以及她可爱的性格、敏锐的思考、宽容的心境。在学生们看来，横渠四句，乐黛云老师亦可当之。乐黛云老师是对未知领域永远保持好奇的“资深青年”，也是创建学科、提携后进的坦荡君子，而作为卓有成就的女性学者，乐黛云老师一直强调学术事业是要靠自己坚持的。汤先生为乐黛云老师

80岁生日而创作的诗歌，正是乐黛云老师一生情状的写照：“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讲述了书外乐黛云老师的一句回答、一个遗憾，以及一个“失败”。在去年9月的系庆采访中，乐黛云老师曾淡淡地回答，最初创建北大比较所时，并没有什么自觉意识，后来也没有。作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乐黛云老师带动复兴大陆比较文学，并不是为了学科而去发展学科，是以问题定位，从而引领了时代精神。但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乐黛云老师也展现了她的自觉与勇敢，比如在1987年开设了课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另外，创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本来就有意“模仿”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只是，时代留给乐黛云老师的窗口期太短暂了，不可不谓遗憾。“君子而时中”，“逝者如斯夫”，作为新青年文化的人格象征，乐黛云老师晚年始终有着一种未完成感。但任何人，若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此即为真学问也。八十年的学者虽不可企及，我们三代师生，亦是有三生之约，所以将乐黛云老师的心愿讲出来，并努力给她一个交代。

读书会最后，与会学者及全体师生为乐黛云教授共同庆祝九十华诞。

(撰稿：熊丽萌)

28

马孟龙 | 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读书会

2021年5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2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读书会”。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李大海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高智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读书会围绕马孟龙老师的《西汉侯国地理》一书展开。西汉分封体制存在鲜明的地域特征。学界对诸侯王国地理分布多有关注，然而对于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除了武帝以后的王子侯国，其他时段、其他性质的侯国，以往认知并不清晰。《西汉侯国地理》对西汉封置800余侯国地理方位进行梳理，设置七个标准年，逐一复原七个年代的侯国地理分布状况，全面展现西汉不同时期侯国地理部分特征及演变过程。全书不仅从宏观上探讨了西汉侯国地理分格局的整体演进，还在微观上关注某些特殊性质侯国的分布特征，以及侯国集中迁徙的现象。



马孟龙副教授

读书会伊始，马孟龙老师简要介绍了侯国地理研究模式的演进情况。侯国地理研究可划分为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及政治地理三个阶段。沿革地理阶段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代表，关注侯国置废年代及侯国地理定位，集大成于台湾学者王恢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为了与沿革地理阶段的研究旨趣“划清界限”，马孟龙老师将侯国沿革和方位的考订放置于《西汉侯国地理》“附表”部分。政区地理阶段以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为代表，主要关注王子侯国地理分布特征。马孟龙老师指出，王子侯国主要产生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对西汉初年功臣、外戚恩泽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探求，是他写作博士论文《西汉侯国地理》的初衷。这部分内容反映在《西汉侯国地理》的中编和

下编。在《西汉侯国地理》下编部分篇章，马孟龙老师尝试将侯国地理研究提升到政治地理阶段，着重讨论了汉武帝“广关”与扩大“京畿”对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影响。

马孟龙老师指出，中国历代王朝政区设置存在等级结构差异。某些区域在王朝政治中地位特殊，国家会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保障这些区域的政治地位，并依赖这些区域控制其他地区。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学界很难关注到王朝区域等级差异。而“侯国”犹如一份“试剂”，有助观察西汉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这正是本书的用力之处，即从侯国地理分布观察西汉政治地理结构及演变过程。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马孟龙老师以高帝十二年、武帝元光五年、武帝太初元年、成帝元延三年四个时期为例，具体说明侯国地理与政治地理结构的紧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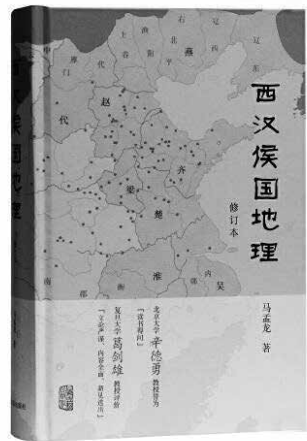
高帝十二年，刘邦剿灭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对天下政治格局进行统一规划。通过侯国地理分布可以看到，关西地区没有侯国，暗示这一区域在国家地理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在关东地区汉郡中，河南郡没有侯国，表明河南郡同样地位特殊。在关东同姓诸侯王国地区，与蛮夷相接的“边郡”没有侯国，说明关东地区存在“内外有别”的地域差异。这表明西汉初年存在由内而外“内史-郡-王国”三层政治地理结构。“郡”又可由内而外划分为“关西郡-关东郡”两个层级。关东郡中，河南郡因为汉初短暂做过“京畿”在整个西汉时期具有一种“准京畿”的特征。这种由内而外层层环绕，内外有别的地理结构，某种程度是对《尚书·禹贡》“五服”

圈层结构的构拟。该政治地理结构以皇帝为核心，将与皇帝的地理远近做为区域等级划分的标准。

马孟龙老师特别指出，秦至西汉初年国家地理结构有很大延续性。秦统一后，将其疆域分为旧地与新地。关于“新地”具体所指，目前学界存在重大分歧。而从高帝十二年的地理结构来看，刘邦似乎有放弃“新地”交予诸侯王管理的想法。因此高帝十二年的王国地区，可能就是秦朝的“新地”，即秦庄襄王三年以后置郡，皆属于“新地”范畴。

在武帝继位之初的元光五年，国家地理结构仍带有高帝时代特征。内史由关西地区汉郡环绕，关东地区汉郡又在外围，关东汉郡中的河南郡依然没有侯国。稍有不同的是，随着王国属郡收归汉朝，关东地区出现汉郡与王国交错的局面。而王国中没有侯国，说明王国虽然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特殊的政治地理地位。

元鼎、元封年间，汉武帝试图建立与秦制不同的汉家制度，由此对西汉王朝政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书影

治地理格局进行重大调整。太初元年，随着边疆大量新郡设置，“边郡”地位大大突出，将“内郡”、王国环绕。原关西地区汉郡都转变为边郡，汉武帝通过“广关”，把太行山以西的郡改为新“关西郡”。新“关西郡”境内的侯国被迁徙到太行山以东。关东的河内郡没有侯国，暗示河内郡具有了与河南郡相近的“准京畿”特征。太初元年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呈现出边郡环绕内郡、王国，内郡、王国环绕关西郡，关西郡屏蔽三辅的新格局。总体而言，其格局呈现出“京畿-郡国-边郡”的三级圈层结构。

元延三年的政治地理区划延续了太初元年的特征与格局。结合以上四个时期的政治地理情况，马孟龙老师认为西汉地理结构存在高帝体系与武帝体系，二者都较为稳定：高帝体系一直延续至武帝初年，而武帝太初年间形成的武帝体系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此外，马孟龙老师特别指出，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先生认为《汉书·地理志》排列在会稽郡之后的长江以南诸郡皆为边郡。而马孟龙老师认为，由于西汉时期边郡不分封侯国，而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豫章等郡置有侯国，显然在西汉观念中不属于边郡，由此认为《汉书·地理志》排列在汉中郡以后的郡才属于边郡。

接下来，孙闻博老师以“秦统一政治军事史新探——以南郡、东郡设置为例”为主题进行延伸讨论。他首先提出秦灭六国，成就帝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前人谈及秦统一战争的军事进程时，表述较为简略。这主要受限于文献记载本身的缺乏。

对于这一问题，孙闻博老师认为可从郡制推行的角度，解读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孙老师认为，秦与六国战争的推进，存在东、南两个方向。秦国郡制推广，多与这两个方向的军事行动有关。早期秦与楚交往较为和睦。但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在东南地区展开积极经营，对楚国用兵。秦惠文王通过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控制汉水上游，设置汉中郡，反映秦国对汉水上游的重点经营。在此基础上，秦继续沿汉水往南推进。秦昭襄王凭借鄢郢之战，夺取楚国核心区，设立南郡。孙闻博老师特别指出，南郡在秦郡体系中地位特殊，直到秦灭楚国前，一直是秦国稳定的南疆。“南郡”一名暗示秦国规划的国家南疆就在长江中游地区。

与此类似，“东郡”名称也体现了秦国向东经营的战略。在秦王嬴政亲政前，秦在东向主要有两大举措：一是“东收周室”设置三川郡，第二是设置东郡。三川郡与东郡联系紧密，与东方齐国相接壤。战国末期，齐国在各国战争中的态度近似于中立。而东郡所承担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东向领土伸展，隔断南北合纵之势。“东郡”一名似乎暗示战国末期秦国似有将东郡视为国家东疆的意图。

接着，孙闻博老师就东郡在西汉早期的重要作用进行介绍。西汉建立初期，刘邦曾分封燕、韩、赵、楚、淮南、梁、长沙等异姓诸侯，所封地域基本对应秦统一战争发起前的六国疆土。刘邦自领二十四郡之地中，除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所拥郡县外，还有临淄、济北、胶东、琅邪。汉以东郡与上述齐地四郡相连，形成汉郡

的东向伸展，从而隔断了东方异姓诸侯王国可能的南北合纵。文帝即位之初，齐国成为汉廷在东方的主要威胁。东郡仍对齐系王国起到监控作用。景帝初年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迫于东郡的压力，齐系王国中的齐国、济北国没有参与叛乱，大大削弱了关东叛乱王国合纵的地理形势，为汉廷迅速平定叛乱奠定基础。

高智敏老师对两位老师的发言进行评论。他认为马孟龙老师的研究更加关注结构性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关注到表象的政治地理区块变化，还透过这种变化，结合不同时段的政治形势，梳理出西汉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特征，并将地域控制政策与统治者考量纳入讨论的范围之中。这种结构化的学术研究思想对他启发很大。而孙闻博老师则以秦灭六国的线性军事发展史为线索，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地叙述南郡与东郡在秦统一政治军事史中的重要作用，将地理与政治史相结合，对两郡的军事战略地位进行详细说明，见解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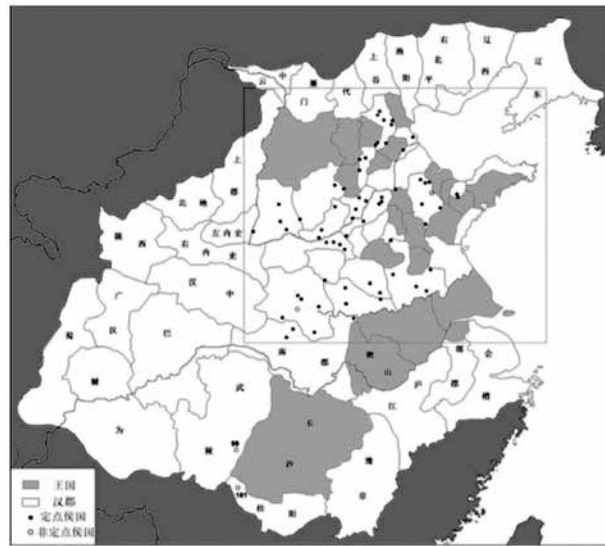
郑威老师指出，西汉侯国制度实际上可以溯源至战国变法时期。如楚国吴起变法后实行军功制，原来的士大夫改称为君，冲击了原有封建制度。郑威老师对《西汉侯国地理》进行三方面点评。第一，此书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不仅辨析原始史料，还特别重视与考古遗址对应。第二，注重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归纳，就其演变过程形成规律性意见。第三，将侯国地理放置在宏大政治背景中，对京畿、关西、关东不同区域的侯国分布特征进行解析。整本书从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形成三维立体图像，推进了学科发展。

接着，郑威老师还就本书内容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书中提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汉廷明确存在的政策还是在实施过程中默契的不成文规则？第二，对于西汉初年长沙国境内的侯国，是否还需要考虑偶然性因素？第三，可以从政治史角度进一步分析秦始皇对空间的认知。第四，战国秦汉的领土建构存在不确定性，与后代王朝对比鲜明，其中发展历程需要进一步思考。

曾磊老师围绕本书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他认为此书在前人基础上有重大突破，这不仅与其详尽的史料论证有关，还在于其大胆假设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其次，通过考古实地调查，增进结论可信性，丰富了读者对内容的认知。他还提出，未来政治地理研究可以在两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拓展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及时分享研究成果，方便其他学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研究。

李晓杰老师补充介绍了历史地理三种研究模式——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他指出，沿革地理主要处理政区建置的纵向（历时）变化以及政区建置的横向（共时）变化。政区地理则注重研究政区辖境的纵向（历时）变化及政区辖境的横向（共时）分布。从政权形态划分，断代政区地理可分为两大类：统一王朝时期的政区地理与割据时期的政区地理。两类研究各有侧重。最后，政治地理是一个较为规律性、总结性的表述，除具体政区地理研究对象外，还应关注政治中心的发展情况。

李晓杰老师紧接着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地理研究情况进行介绍。他指出，



武帝元光五年侯国分布图

商鞅变法之将小乡集合为大县，郡则多设立在诸侯国的边地上。郡县之间慢慢出现统辖关系。战国时期诸侯国政治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着重探讨七国置郡的政治空间格局，概述其布局、变迁，这是讨论该时期政治地理研究的史实基础。其二，探讨政治核心地带诸县与处于政治边缘地带诸县的各自运作特点，将考察点深入到县级行政区域的详细变化过程，突出各王国县制之间的差异。其三，以战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谋略“合纵连横”为切入点，全面剖析该现象前后的各国政治地理变迁，厘清其疆域变动的轨迹，揭示政治军事谋略与政治地理格局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李晓杰老师还指出，西汉政区设置与变化则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汉初异姓王的分封。第二是同姓诸侯王国的设立。第三是文帝时的“众建诸侯”到武帝时颁布“推恩令”。

胡恒老师高度评价马孟龙老师的研究，认为这一著作体现出很强的文本细读能力。明清历史研究对史料分析尚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而秦汉历史则对有限文本“精耕细作”，这值得明清史学者借鉴。其次，马孟龙老师的著作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从众多个案推导出规律性的特征。再次，马孟龙老师在回顾相关学术史时，能够重视清代考据成果。最后，图表和考证文字都清晰可读，充分考虑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能力。

接着，胡恒老师就书本内容提出三点意见。首先，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时间较长，在不同史料系统中如何择取一个标准。其次，不同材料对同一对象的指称也需要甄别。再者，需要将具体概念放置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定位。最后，他就政治地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观点分享。他认为未来政治地理研究需要与社会科学、历史学相结合，并最终上升到政治思想体系的认识，形成虚实结合的研究特点。

最后，李大海老师就本次读书会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马孟龙老师的报告紧扣西汉侯国地理的研究主题，而孙闻博老师就南郡与东郡的阐述也深化了讨论空间。郑威老师对西汉政区地理采用逆推的研究方法，从政区沿革、组成要素以及政治原因这三个层次解释侯国变化过程。李晓杰老师则强调选取中间的一个时段，采用逆推、顺推相结合的方式，打通战国到秦汉

的政区变化，并进行全景式回顾。胡恒老师的发言则从清史的角度比较秦汉史研究特点，与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构成了良好的对话关系，并提出许多思考。最后，李大海老师还放眼未来学科发展，认为研究政治地理时应兼顾特殊性的同时进行贯通式的研究方法，既灵活又全面地总结历史规律。

本次讲座涉及历史贯穿战国秦汉乃至明清史研究，诸位学者围绕西汉侯国政治地理中的新地与旧地、京畿与边郡、关西与关东等几个核心问题进行阐述。同时，学者们对政治地理研究思路各抒己见，展望了史学研究背景下政治地理的未来图景。

(撰稿：吴宛妮)

29

聂激萌 | 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

2021年6月5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文研院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激萌作引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顾江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冲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聂激萌老师的新著《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展开。活动伊始，聂激萌老师简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思路与基本内容。她首先谈到，本书的选题主要缘起于她长期参与的二十四史修订



聂激萌老师

工作。相比之前的点校本更关注异文的正误，致力于提供一个通畅、正确的文本，此次修订本各史在校勘中进一步关注文本的形成过程，关心每条材料背后的史源，以及史书作者对史源材料所做的调整与改动。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本源流问题往往缺乏直接性的证据，本书常常采取“文献法医学”的方法“曲线救国”，即通过解剖某一文本本身，来追究其形成过程。在她看来，史书一定是史家将不同材料拼接组合而形成的叙述，拼接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性、矛盾性终归是有迹可循的。从而，如果我们对当时文献的总体规律，以及那些经常被作为史源的文本的体例特征有基本的把握，就可以根据史书的结构脉络，把文本拆分成不同的单元，然后分别思考每个单元可能来自什么样的原始材料。

但是，通过“文献法医学”的方法对史源的判断往往只是大体上的定性判断，只有在合适的问题意识下才能有效。从博士论文开始，再到南京大学的实践教学，聂激萌老师逐渐明确了将文献形成与修史制度运作联系起来的问题意识。在此思路下，本书总体上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以纪传史的不同板块为单位讨论官修史体制如何将政务文书与史书对接，提供史源的保障，下半部分以不同王朝史为单位讨论史书被反复编纂的历程。但她也表示，由于选题比较困难，本书最终只能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而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与刺激也是她的理想。一来，她希望强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研究有时不得不实事求是地保持模糊感，过于具体的结论有时反而不可靠。二来，本书也尝试对正史在文献中的地位做出回应，一旦开始解

构、分析正史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就已经把它拉下了神坛。三是作为本书的延续，想要开拓从文书收藏、档案整理到官方编纂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文书行政的重要一面是对文本进行处理，因此文献学的视角有可能对文书行政这一传统制度史课题有所补充。

聂激萌老师的介绍过后，叶炜老师补充道，本书相当不同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对相关问题思考的独到与深入离不开聂激萌老师在《晋书》修订、《十六国春秋》校补等研究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同时，本书也是“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接下来，与会学者围绕本书各抒己见。陈爽老师首先发言。作为“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他高度肯定了聂激萌老师所做出的贡献，指出这一项目从立项到结项，也见证了她的成长过程。在他看来，本书有着深厚的文献学根基，而聂激萌老师在博士毕业后能够顶着压力，沉下心来、精心锤炼，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系统性、条理性非常强的著作，也可谓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此外，本书具有强烈的历史学意识，并且不乏眼光独到之处，比如第四章对碑志和列传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十分巧妙的切入点。

除了闪光点，陈爽老师也谈到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结构安排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过渡稍显突兀。一方面，“列国传”的史源较为特殊，它往往取决于当时整体的外交格局与政治军事形势，沿袭前代正史的情况比较常见；另一方面，书中缺乏集中探讨帝纪的章节，起居注的

性质以及它与纪传体形成的关系尚待讨论。最后，陈爽老师表示，近年来青年学者所做的历史书写、史源学、官修史书编纂等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考据研究，而是包含了明确的历史学意识，体现了新一辈魏晋南北朝史学人的一种风气。他们不再只在老先生的旧题目、旧思路中拾遗补缺，而完完全全地提出了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命题，为中古史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范式与取径。

徐冲老师致力于历史书写研究，但由于关心的问题很不相同，他在读本书时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并得到了很大的刺激与收获。在他看来，本书所提出的最有冲击性的一个概念就是“官修史体制”，或者说“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在此概念下，本书明显可以分为官修史体制如何保障纪传史取材，东晋、十六国、南朝、北魏的修史过程两部分，恰好与刘知幾《史通》外篇中的《史官建置》与《古今正史》两篇形成呼应。此外，聂激萌老师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对传统中古史学史的思路及学科定位构成冲击。长期以来，史学史把官修与私撰当作一组二元对立的观念，来构建从魏晋到隋唐的史学发展历程，相伴而生的还有魏晋南朝个性解放、私撰发达、分权分化的经典图景。而聂激萌老师对此发起正面挑战，所提出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概念不仅从制度史的角度消解了官修与私撰这一经典命题的相关认识，而且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文学史、哲学史等其他层面的认识带来了思路上的更新。

但是，本书前后两部分对这一概念的贯彻程度明显不同，前半部分的“史官建置”

着力于探讨官修史体制的运作，后半部分则又相对接近于传统史学史的思路，对联动机制、文书行政传统的回应不够强烈。制度性的因素在建构历史中的“常”以外，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历史中的“变”，可能需要进一步回答。徐冲老师也指出，本书非常克制地将话题局限于史学内部，但如果将视野从狭义的史学扩展到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务，就会发现政务其实只是王朝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讨论时，或需要引入其他更为丰富的要素。

胡鸿老师称聂激萌老师的研究为“历史书写研究的技术流”，重点分析了本书在学术史源流中的特殊位置。首先，他回顾了近代以来二十四史的地位几经起落的过程。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始，正史不再享有与六经并齐的权威地位，甚至一度矫枉过正，直到20世纪中叶，正史才又重新获得史学研究中最重要材料之一的地位。这一时期，研究者虽然抛弃了微言大义式的经学式读史方法，但对二十四史依然以信从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把正史当作一个中立的资料库来使用。真正对正史的纪实性构成冲击的是21世纪才蔚然成风的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研究。或通过比较关联文献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异同，来使正史的记载相对化；或通过排比类似对象的叙述模式、议论模式的义例，来寻找史料背后的叙事策略，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古史研究法门。但有时，正史记载相对性的讨论也会非常轻率地跳跃到对叙述策略和撰述意图的解释。在他看来，这一弊端的解药在于充分认识正史存在着漫长的文本生成链条，即所谓史源学方法的复活。

然而，理想中的史源追溯受限于史料的残缺性，往往只能追到半途，聂激萌老师的研究则在这种困境下走出了新路。胡鸿老师指出，聂激萌老师所强调的史书生成过程不止是在撰述之史、纂修之史的范围内陈陈相因，而且具有更为靠前的源头——原始行政文书，即所谓记注之史。从而，本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通过提出“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厘清了从官方档案变成史书的细致运作过程，尤其是史学撰述如何要求政务运作为其服务的反向联动。从微言大义式的书写分析过渡到对资料来源和性质的技术分析，是本书的明显特色。这也启发了胡鸿老师对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的根本区别产生新的认识——历史书写必须以为实际行政需要而制作的实用性文书为最前端的文本。他进而指出，史学的精髓是关注过程，而本书同时关注了正史体例的演进过程与每部正史的生成过程，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最后，胡鸿老师也对未来的史料研究将要解答的问题做出了展望，即在史书编纂的技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史家能动性并存的前提下，来回答史家如何在重重技术限制之下，编织出一个发挥意识形态装置作用的正史的问题。

接下来，线上的苗润博老师沿着胡鸿老师的发言就有关文本、史料的学术方法展开讨论。他首先指出，在史书形成的链条中，除了政务文书这种前端文本以外，还有一种前端文本是私家撰述，虽然后者会被官修体制改造，但通过一定方法可以进行还原。私家撰述有作者，因此苗润博老师强调我们对文本的处理不能真的像“法



聂激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书影

医学”一样只是处理已故的东西，还要去与前端文本的作者进行对话。我们采用技术性的文本分析路径，其实是要还原前端文本创作者的历史语境，我们是参与到历史创作过程之中的。因此，对制度规范性与个人能动性的分析也是有先后的。文本作为文献本身，牵涉到具体的历史情景，只有将制约这一文本产生的脉络与制度环境，以及其进入史学编纂的流程与路径梳理清楚，首先建立一个文本内部与制度制约的分析框架，才能区分出文本形成过程中哪些是能动的，哪些是受限的。此外，苗润博老师表示，分析文本源流一般包括两个角度，一是具体的文本比对、体例特征，二是整体的文献源流。他强调，宏观、长时段的文献演变脉络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生成过程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将个别的碎片还原为一个更大的图景的前提。这一脉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牵涉到一个

具体的历史情境，从而在文本研究中生发出历史学的意义。

接着，李霖老师在线上发言。他结合自己对《史记》列传排列次序的研究与思考，与聂澹萌老师的观点进行对话。对于《史记》部分篇章的排列次序比较混乱的现象，一些前人如赵翼认为《史记》最后部分的列传可能是随写随编，并没有什么深意，但逯耀东先生则将列传分别对应《今上本纪》小序中提到的“外攘夷狄”和“内修法度”，提供了另一种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又如平津侯公孙弘与主父偃两人官职不匹配，却被置于同一列传当中，很可能是因为元朔二年设朔方郡一事把两人联结在了一起。在逯耀东先生的基础上，李霖老师进一步展开思考，认为南越、东越、朝鲜同为内诸侯，故而被排在一起，《西南夷列传》与《司马相如列传》相邻排列则是因为司马相如就是通西南夷的使者。

从而，李霖老师表示聂澹萌老师在书中所持的观点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即《史记》列传的总编排，一是按照时间顺序，一是以事件为主题。比如《史记》没有像《汉书》那样，把《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放在一起，而是在中间穿插了《儒林列传》、《大宛列传》等等，就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围绕对法的讨论而展开，都可以归入同一主题之下。此外，李霖老师基于对《史记》与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的了解，提出文献的形式往往是要为内容服务；就史学而言，史书所采用的体裁要为撰述者的个人意图、个人主张服务。虽然官修和私修的史家都极大地受限于史源，但《史记》仍然是一部有思想主张的作品，官修史书是否真的如本书所说的那样，在史源和一系列运作

机制的影响下，论述者的个人意图被极其淡化，可能也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其后，顾江龙老师对书中比较关注的地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提到，给他最大冲击的也是书中所贯穿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这一分析框架，尤其是政务运作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他的理解下，这一机制实际已经超出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对官僚体制的运作、帝国统治方式等的研究都能形成补充与启发。他由此联想到南朝后期杂传衰落、编年体复兴的现象，认为可能是政务-修撰联动机制的逐步建立消解、吞噬了史学撰述的个性化与自由化，这就相比前人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也更为具体的解释。比如《宋书》的《孝义传》大部分都是“一事一行”，呈现了典型的文书风格，显然改编自官方的旌表类文书。他进而指出，魏晋南北朝的皇权振兴是相对的，官修史机制对史书个性化、自由化的消解和吞噬并不是凭借王朝的权威，而可能是在日常化、规范化的文书行政流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

此外，书中所归纳的君王臣僚列传与赐谥、丧葬事务的联动机制也引起了顾江龙老师的注意。但本书在强调行状在史源中的重要地位以外，对起居注以及东汉到魏晋的行状探讨不够。从《东观汉记》的记载来看，东汉早期就已经产生了与列传修撰有紧密关系的行状或类似文件。比如《先贤行状》可能就是在魏明帝时期《旌表状》的基础上，经史官加工而形成；后来又出现《海内先贤传》，似乎说明当时的行状不仅是传的基础，甚至可能就是传的一种别称。另外，除了朝廷以赐谥为目

的征收行状，家人弟子也会自发纂辑言行形成别传，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讨。

最后，顾江龙老师谈到，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其实都比较取巧，但聂澹萌老师的著作从正面入手，整体上非常厚实。

从事史料批判研究的孙正军老师此次也来到会议现场。对他而言，本书最大的触动，一是充分厘清了唐以前官修史体制的运作细节，二是揭示了唐以前与个人关联比较密切的纪传体史书背后也有官修史体制的支撑，甚至其主体内容就来自政务文书；三是启发学人今后在考察每一个史书文本的形成时，都应该将体制、机制考虑在内。孙正军老师也指出，本书存在的主要不足是前、后两部分之间有些割裂感，有关帝纪、志书的讨论还需要充实，来更好地体现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另外，文本分析主要侧重史源学与史著两个层面，但无论是从哪个视角出发，都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论述得更周全一些。比如事实上也有相当多的史源不是来自文书档案，史书里的大量官员并不在赐谥的范围内，这些都需要纳入讨论。

接下来，郭津嵩老师联系自己对正史《天文志》编纂的研究，分享了读书的感悟与思考。学界已经发现，过去我们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拥有的世界上最悠久的天象记录传统，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实际的观测，而可能是计算或根据经验推演所得。但是，聂澹萌老师的著作告诉我们，这些天象记录仍然存在制度设计的基础，这种悠久的天象记录传统恰恰是被官僚体

制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知识的历史、天象记录的历史或许为虚，其背后的形式与制度逻辑则是真实的。文献背后的制度基础，逐渐演化为一种长期延续的习惯性实践，甚至比王朝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连续、稳定的性质。然后，郭津嵩老师回到史学史的范畴，以西方教会史为例，指出聂澹萌老师的研究在中西史学传统的比较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志远老师对胡鸿老师描述的历史书写学派兴衰史很有感触，并进一步谈到这一过程中视角转向的问题。在他看来，对史书撰述者意图的关注，或对史书内部书写格套、编撰的制度性框架等的关注，近似经学中争论是否所有文本都贯彻着圣人的意图。史学研究相对容易打破这种神圣性，承认史书撰述者的意图不会灌注在文本的每一个细节中，文本有不同层次。我们现在对佛经的文本研究也是如此，一旦将文本区分出不同层次，就取消了它经的地位，它也变成了史学。因此，陈志远老师也在考虑史学文本中多个声部角力的问题。他指出，史学除了告诉后人曾经发生过什么的朴素需求，也存在撰述者能动性与材料惰性并存的问题。宗教史学也是一样，在国家控制力放松的时期，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可能参与其中。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撰述者意图的精明之处，也应该重视那些混乱、昏聩、失败之处的价值。

随后，叶炜老师也简要分享了自己的读后感。他表示，本书所谈论的制度对史书呈现面貌的影响开辟了一块新的史学史研究领域，很有价值与启发。但是，如果把修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本书所

探讨的机制似乎还不够完整。比如墓志中许多身世、地位达到入传标准的人事实上都没有入传，那么人物入传背后存在什么样的机制？此外，史官履历由谁提供、履历的具体形式、通过制度呈现的底色到底有何特点等更细致的问题可能也还有深入的空间。

研讨会最后，罗新老师作总结发言。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支配与抵抗艺术》中提出了“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这一对新概念，并重点关注如何发掘所谓从属群体、从属个人的潜隐剧本问题。罗新老师以此来对史书进行解读，认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书绝大部分都是公开剧本，公开剧本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何寻找潜隐剧本才是今天的研

究者最重要的工作。徐冲、孙正军、苗润博、聂激萌等学者将过去对史料、史书的认识变成了兼具理论与实践，又各有侧重的学术潮流，很大意义上就是通过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套公开剧本来寻觅背后的隐藏剧本。这一工作很有意思，但也特别艰难，不仅需要观念上、认识上的提高，也需要付出大量技术上、细节上的努力，有时恰恰是细节能够为我们揭开过去想象不到的历史面貌。最后，罗新老师高度肯定了聂激萌老师的研究，并热切地期待着将来更重要的成果的出现。

（撰稿：徐铖）



30

饭山知保 | 族群政治与科举社会：《另一种士人》研讨会

2021年6月19日下午，“文研读书”第30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族群政治与科举社会——《另一种士人》研讨会”。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饭山知保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党宝海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正贞、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方诚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助理教授苗润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锦萍参与讨论。

读书会围绕饭山知保教授的《另一种士人》一书展开讨论。饭山知保教授主要从事10到17世纪中国北方社会史研究，他出版的专著《另一种士人》考察了金元



与会学者线上合影

时代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界的整体范围与环境。在宋金元三朝政权的更迭背景下，华北士人群体的仕途变得格外坎坷。一直抱有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要在新的新式下调整心态，重设目标、融入社会。而另一方面，为了稳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以维持政权，异族统治者也面临着将儒生招为己用的艰巨任务。只要统治者没有放弃科举晋升之路，知识分子总会通过科举依附于朝廷，社会也会因此会趋于稳定。本书考察了这个时期华北的科举情况，对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即在南方士人层在形成社会领导层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饭山知保教授首先对本书所使用的地理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书中所提的“北方”

更严谨来说应该是山西。之所以使用了北方的概念，是在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将其作为南方的对照对象，并非根据北方的社会现实来严密定义这一地理概念。而如果将北方社会的历史放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北方社会最重要的对照对象应该是伊朗社会而非南方社会。饭山知保教授提出需要根据北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本身来进行北方的研究。

杜正贞老师从华北社会史研究的视角首先指出，饭山知保教授此书的研究意义在于填补了历史学研究对华北社会历史、特别是12到13世纪历史的认知空白，其重要特点即书中所强调的从唐末五代以来非汉族群和政权对华北社会的影响和统治。它揭示了从北宋到金时期，华北社会领导层的转变和延续性。而问题在于，科举制

度的长足发展、华北社会主导层的转变给社会层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科举带来了社会构造的变化。饭山知保教授注意到了女真人社会结构变化，而汉人社区在女真人进入后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女真儒士几乎从未参与进当地既有的普通人的士人层中，华北地区的社会构造也没有因为女真儒士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杜正贞老师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是目前金史研究的共识。

从金元之间的变化来看，转折在于元代科举制度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现象，包括出仕途径的多样化和地方精英对蒙元上级权力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金代士人家族的没落，金代与蒙元的士人层之间存在明显断层。针对这一结论，杜正贞老师指出，士人层的连续性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士人家族层面的连续性，二是地方社会层面的连续性，后者可能是更根本的层面。

最后是关于地域的问题。饭山知保教授对北方的研究以南方为参照系，而杜正贞老师指出，我们对南方社会的认识并不是完备的，对于江南社会之外的认识仍然较为有限；同时，现有研究也使得多方社会区域史的比较成为可能。例如，饭山知保教授指出地方精英的活动在蒙元时期并非独立，而是与存在对上层权力和精英的依附关系。而在南方，这种依附其实也是存在的。即便是在明清时代也不存在与上级权力相独立的精英层。至于科举究竟如何形塑地方社会？当家庭中的几代人在乡村中扮演领导层时，哪些权力是由科举所

带来的？比如书中提到了在金代有一些有势力的“科举家庭”，但其实这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没有参加科举。总之，不能将南方形成的社会结构视为中国本部历史上的必然形态，这种认知是源于对非士人、非科举社会了解的有限性。

王锦萍老师从族群政治和科举社会的角度探讨了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引发的新议题和学术贡献。从研究背景来看，饭山知保教授的目标是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理解和定位蒙古的统治，为此他将科举的讨论放在了三个相关因素的动态考察中，即国家、制度、人，是一项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范本，与“日常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饭山知保教授首先为族群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创见。过去学界对北方民族政权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统治上层、皇族贵族，而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则关注到了普通女真人的一般社会情况，其背后有一个具体的语境。从金代到蒙元，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是女真儒士都在独立自主地寻求更有效益的出仕途径。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观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即对非中上层统治精英的个人和家族来说，家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首要的，而要实现家族地位的提升，出仕是最优乃至唯一的选择，为了给家族子弟寻找最优的出仕途径，个人和家族在国家制度、政策变化面前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适应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在蒙元时期尤其明显，普通家族努力适应并利用蒙元政权所设置的多元化出仕路径，建立人脉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族群的壁垒变得模糊，这是蒙元族群政治的重要特色。

第二个独到创见是将金元时期的华北士人群体与更广义的地方精英，与南宋士人群体作比较，特别是关注南北方士人群体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的来源本质与形成机制。对于南宋士人来说，儒学素养决定了其应举能力。江南士人的特权和地位是个体的科举能力。相比之下，金代士人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待遇，虽然科举素养也能影响精英地位，但是参加科举本身不会带来权力，只有国家才能赋予其精英地位。蒙元时代，在特殊的户籍制度框架下，蒙古政权赋予了一批参加选士的人以免除赋役的特权，从而给予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这时候的制度框架从科举制度转化为了户籍制度。而参考南宋士人的特权来源的本质和形成机制，这也为进行南北方比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方诚峰老师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通过阅读此书对金代科举的重新认识。首先，饭山知保教授强调华北科举的渗透是在金代完成的，并作出了数据上的梳理。原本在宋代，河东地区的科举制较为落后，并且衰落程度不断加深；而对比饭山知保教授所提供的数据，可以明显考察到金代科举对于落后地区的渗透进展。第二，饭山知保教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尤其是对于宋金鼎革之际的考察是更有吸引力的。饭山知保教授更强调“为得汉室”而建立统治的需要。金代比北宋时期更重视科举，可以说是北方科举的黄金时代，例如耶律楚材与戊戌之试，这与宋代科举的定位不太一样，它是北方征服者迅速建立统治时进行的人才选拔，这种政治性因素的差别

可能是比南北方竞争更加有效的解释。第三，饭山知保教授所强调的是“另一种士人”，即北方作为另一种道路的异质性，而这反而提供了理解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性与凝固性的可能角度。女真的统治不是代理了东北的特色，而是利用科举等制度来加强统治，使科举在河东地区变得非常重要，南北社会的趋同性可能比北宋时期更强。在历史早期，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内部差异要更大，而不同王朝所采用的历史制度的差异，则主要是组合轻重不同，而非道路的不同，1990年《中国地方精英和支配模式》中对地方精英的讨论是一个例子。

同时，方诚峰老师还提出了本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士人是否有特权和优待，方诚峰老师指出，“假儒衣冠”是一个常见的对士大夫的代称，而从宋代法律来看士人几乎没有什么特权。此外，书中一方面提到华北从来没有出现过南方这样优待士人的状况，又说蒙元时期没有出现过金代那样优待。对于金代是否存在特权的问题存在一些前后矛盾之处，对于士人的特殊性问题还需再作斟酌。第二个问题是，在将“地方精英”这一概念应用于宋史研究时，其实已经附着了一些先定的内涵，即一种与国家相疏离的意象。饭山知保教授认为另一种士人的内涵是“处于更为强硬中原政府控制之下”，而唐宋变革论中则提到了宋代的士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依附性。这也体现了两种不同学术路径在书中的交融，一种是以内藤和宫崎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路数，另一种是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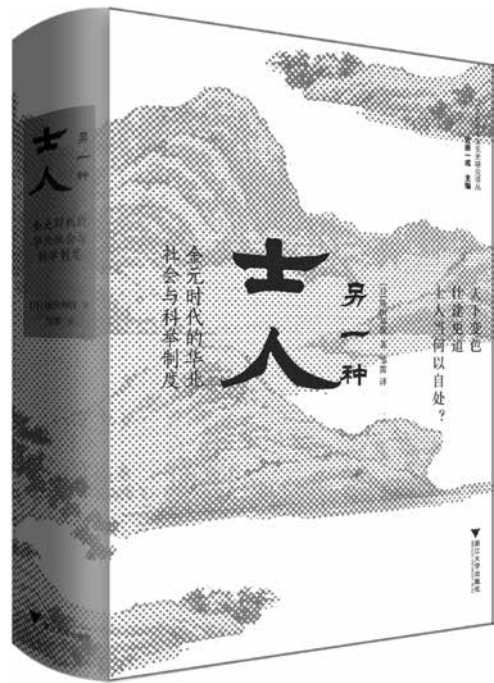
语世界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最后，方诚峰老师还建议如果本书能够列出完善的参考书目，将会给学界带来更大助力。

苗润博老师从金史研究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从学术脉络中观察，在10-13世纪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中，北方研究要弱于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否牵动整体的历史图景。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就是从区域社会史出发，提出了对整体史具有牵动性的议题，他提出要走出南北对比，在南北关系中，从东汉到唐前期的700年历史其实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研究。而从安史之乱到明朝中期，南北关系再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冲，但这在既往研究中往往没有得到体现。因此，饭山知保教授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

第二，饭山知保教授在叙述中并不是在讨论较为宏大的文化融合层面的儒化和汉化现象，而是更多将其作为一种实用主义考虑和现实主义的策略。例如，女真儒士进入科举的举动，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之中，华北社会的结构也没有因为女真儒士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苗润博老师认为金朝对汉地的渗透是未完成的，表现为华北地区的社会构造很难说因为女真的出现而产生显著改变。同时，金代统治策略的内外之别非常明显，大河以北为其腹地，大河以南为其边陲。北宋疆域进入金朝之后，本来应该出现科举兴盛的地方，由于人口基数不足，没法和河东地区进行对比，这构成了金代科举在河东地区

渗透的背景。第三，从材料上看，目前研究界对金代碑刻的整理最令人堪忧，饭山知保教授对金元石刻的整理是需要我们致敬和学习的。

讨论环节，饭山知保教授回应了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问题。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希望在未来加强对南宋与金元地方士人之间在特权问题上关系的研究。关于儒学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饭山知保教授提到了井黑忍对金元时期山西水利的研究，其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其书中所探讨的人群，饭山知保教授表示其作品主要关注那些想要出仕的人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地方社会中各岗位在帮助家族获取资源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则较少涉及。关于女真士人没有融入汉人士人的根据，主要来源



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书影

是金元时代有关地方士人的墓志铭中很少涉及到女真人，从碑刻材料来看难以想象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刘未老师从对石刻史料的运用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感想。在饭山知保教授的书中，《定襄金石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集，其中全面收录了金元时期的碑刻。但是，饭山知保教授在运用史料的时候已经警醒地注意到，山西的案例可能与河北、山东等地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定襄金石考》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地方家族与另外一些华北家族相比，其实际活动和控制范围是较小的。因此，即便所得资料非常系统详尽，但其在探讨地方社会这一具体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或许仍然需要回归其本身的田野环境。

王锦萍老师针对如何用地方史料沟通宏大历史问题，以及如何充分使用碑刻资料、而非仅将其作为文本材料的问题作出了回应。王锦萍老师认为可以从地方史料、特别是史料相对丰富的个案研究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问题，将自下而上探讨社会组织方式在不同区域中所呈现的模式与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政策制度演变所带来的社会层面影响相勾连。关于如何使用碑刻资料，王锦萍老师此前讨论了在华北研究过去二十年利用碑刻进行讨论的现状和前景。与纯文本材料不同，碑刻还具备物质性与视觉性，是一种公共的纪念物。未来，我们对碑刻的理解还需要与考古和艺术史学界进行更多的交流。

观众互动环节，饭山知保教授针对如何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具体的区域文

化史进行了补充。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可以按照南方的研究成果进行北方社会研究，但还要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需要找到北方的特色。例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关于水利机构变迁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杜正贞老师进一步指出，研究方法其实没有南北之分，虽然南方与北方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和留下的资料类型存在差别，但就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而言，我们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例如我们在追溯石碑原本所处的环境、空间、人群时，其实就是在追溯这种史料的生产过程及其生命周期。我们需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更新对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认识。

（撰稿：朱睿涵）



31

李水城 | 匪杖不强：《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研读会



李水城教授作引言

2021年7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会”第3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匪杖不强：《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研读会”。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罗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出席并参与讨论。

作为《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一书的作者，李水城老师首先介绍了本书的缘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河西走廊地区

考古时，曾经发现数件权杖头。1999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在人类学博物馆的西亚展厅见到了乌尔出土的白色权杖头。二者时空远隔，形制却惊人的相似。从此，李水城老师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此类材料，积二十年之功，最终写成了这本《权杖源流考》。

论坛开始，李水城老师按时序梳理了目前国内出土的权杖实物。李老师指出，目前可确定时间的最早的权杖头应该属于距今4500年的半山文化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德森（J. G. Anderson）曾经在半山文化墓葬中发现过一件权杖头。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肃火烧沟墓地出土了一批类似器物。从陆续发表的材料看，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材质有青铜、玉石等。近年在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也时有权杖头发现，其中又以齐家文化最为突出，年代则集中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继续向下追溯，陕西宝鸡地区出土了西周早期的权杖头，河南洛阳也有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的疑似权杖头器物出土。李老师特别提到，最近的二里头考古中发现了两件象牙制（一说骨制）权杖，长度超过四十厘米。由此可见，到了夏商周三代时期，权杖已经传入了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

接下来，李水城老师介绍了权杖这一器物的起源、扩散与传播过程。距今九千

至一万一千年的前陶器时期，权杖最早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并被作为随葬品使用。在这一地区，权杖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2500年左右，多拉克（Dorak）遗址的高等级夫妻合葬墓中，墓主手执金银包裹杖柄、制作精美的权杖。在近东的黎凡特地区，最早的权杖头也可以追溯到前陶器时期。1961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佩萨·巴尔-阿东（Pessah Bar-Adon）在死海西岸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中发现了一处铜石并用时期的文物窖藏，数量惊人，包含近400件铜杖头和铜节杖。从青铜时代晚期这一区域出土的雕像和石碑可见，权杖既作为武器使用，也是身份和权力的标志。除此之外，权杖也很早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地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两河流域还有大量带有雕刻、文字的权杖头出土，宫殿浮雕上也多有国王手执权杖的形象表达。

李水城老师认为，权杖是西亚地区率先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特质，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向周边扩散。距今6000年前，西亚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世界体系格局初现，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资源的争夺使得不同地区的民族冲突加剧，大范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互成为一种新常态，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权杖这一文化特质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距今9000年左右，近东地区的农业文明开始传入东南欧，逐步向欧洲腹地扩散，权杖也就随着这一进程进入欧洲。另一方面，在新石器时代，黎凡特地区的物质与技术对埃及影响深刻，权杖也由近东传入埃及。

球形权杖头很可能来自近东，而埃及也发展出了梭形、薄片状等本土特有的权杖头形态。权杖在埃及被长期广泛使用。前王朝时期，纳尔迈的纪念物中已经出现了法老手执权杖、击打敌人的图像；新王国著名的图坦卡蒙墓中也有近乎真人大小、手执鎏金权杖的雕像出土。

权杖同时也向东传播，由伊朗出发，影响了中亚南部地区。重要人物的墓葬中往往有制作精细的权杖出土，土库曼斯坦的戈努尔墓地和哈萨克斯坦著名的伊塞克巨冢（Issyk Kurgan）中都可见作为随葬品的权杖。经由中亚，权杖继续一路向东，传入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区，最后进入中原地区。李水城老师展示了新疆和甘肃地区出土的大量权杖头。从这些权杖的形态来看，它们与西亚、中亚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很可能是由外部传入。就功能而言，这些器物可能既作为礼器使用，也是一种实用的兵器。李水城老师指出，小河墓地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玉石权杖头，以及火烧沟墓地310号墓中唯一的随葬四羊首铜权杖头，很有可能是标示墓主人权力的器物。

李水城老师还认为，中原地区的权杖虽然出土不多，但往往出现在高等级的重要墓葬中，如妇好墓中就有权杖头出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等级大墓将权杖这一外来的文化特质与本土传统的青铜礼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钺相结合，用以标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一组物品共同组成权力的象征，显然具有强化象征语境的功能。中西文化的结合不仅出现在器物组合上，权杖形态也受到了本土物质文化的影响，甚

至与中原传统相结合，出现了“权杖头戈”；还有一些权杖头则将外来器形与本土装饰相结合。

纵观权杖传播、流变的时空历程，李水城老师强调：权杖作为近东地区先民首创的文化特质，自西而东，从安纳托利亚最终传入中国，并被夏、商、周三代的社会高层所接纳，在权力政治的语境下，这一文化特质的传播与大麦、小麦、山羊、绵羊、牛、马等生活资料的引入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新课题。

随后，李水城老师也简要讨论了权杖在历史时期东西文明中的不同归宿。权杖自产生以后，长期作为工具和兵器使用。直到青铜时代以前，权杖在西方一直作为主要的格斗兵器使用。虽然在铁器时代有所削弱，但此项功能在西方延续到了中世纪以后，15-16世纪随着火器出现而衰亡。权杖的另一功能则是权力的象征，在西亚，这个功能出现在新时期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大大发展。这一功能在西方延续至今，权杖在重要的仪式场合依然起到权力、身份象征的作用。与此相比，外来的权杖在中国语境中的象征功能较弱，使用范围较窄，三代主要采用斧钺作为王权的标志。

李水城老师最后总结道：见微知著，透过对中国各地考古所见权杖的梳理，从中不难捕捉到从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致脉络、时间、程度及其变化。特别是当此类器物传入中原内地以后，曾经对三代上层社会产生的一定程度影响。但这毕竟是短暂的。少量进入中原王朝的权杖或许因“水土不服”，

与华夏固有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最终，中原王朝并未接纳这一外来的文化特质。到了战国时期，作为权力象征物的权杖便彻底消失了。但作为兵器和仪仗的角色一直都有子遗。在所谓“骨朵”“金瓜”，以至现在的民间宗教形象中，我们依然能够捕捉到权杖留下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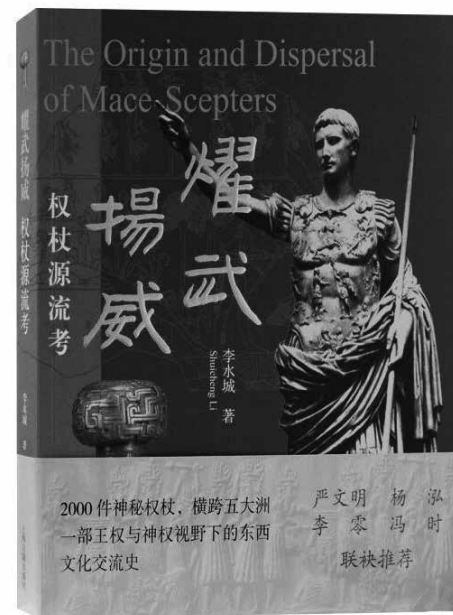
讨论环节，颜海英老师首先发言。她以埃及学的材料对李水城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几点补充：埃及学中权杖（mace）专指圆头有孔的一类器形，埃及语中称之为“hedj”，原意为“闪光的”，它的象征意义则与荷鲁斯神话有关。这种权杖在埃及为国王所专用，在埃及国王的丧葬经文中与生死过渡相关。国王高举权杖、抓打敌人，则是埃及图像语言中的经典表达。这也揭示出权杖作为“国王的武器”的特殊功能，由此衍生出“秩序战胜混乱”的象征含义。颜海英老师还指出，埃及出土的权杖实物不足百件，而且大多集中于早期，但其图像却非常丰富，出现在神庙塔门、贵族墓和纪念性物品等各种载体上，这既是对国王功绩的现实表述，也有着超越性的神话内涵。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权杖及其图像与埃及统一王权的出现相始终，与其他象征符号一起构成了宣誓胜利、划定疆界之仪式的一部分。颜海英老师认为，通过实物与词源的结合，探究权杖在埃及的起源，以及它与神话、宗教的互动关系，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李水城老师对不同文化间权杖及其象征意义流变的思考，更为不同文明的研究者打开了跨文化研究的窗口。

贾妍老师的研究领域为亚述艺术，她梳理了两河流域图像传统中权杖的使用。权杖在两河传统中一直作为武器使用，也逐渐成为象征王权的器物。苏美尔时期的“鹫碑”上最早就有战神宁吉尔苏（Ningirsu）手执权杖的图像，阿卡德时期则开始出现王持权杖的形象，到了新亚述时期，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的“乌莱河之战”浮雕中也出现了士兵“锤杀”敌人的场景。贾妍老师特别提出，在阿卡德语中，带圆头的权杖与手持的长杆是神赐给国王两类不同的权力象征。前者是凶猛的武器，用以惩戒敌人，而后者即所谓的“牧杖”，一般与正义相关，用在对内事务中，起规训作用。从艺术史的视角进入，权杖头的形式和材质也值得关注。尤其在亚述帝国时期，青金石所制的权杖头既代表了神的赐予，又与它的异邦产地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九服来朝”的帝国气象。

罗丰老师盛赞李水城老师本书颇具启发性，且收集材料周期之长、范围之广令人感到敬佩。罗丰老师认为应当区分权杖跨文化传播中的两个不同问题：一是权杖如何从武器变为身份权力的象征，二是作为武器的权杖在世界范围内如何传播。前者可能与埃及、两河文明有关，又进入了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图像传统；后者的传播则很可能要归功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人。作为武器的权杖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发源一路向东传播，一直到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多有发现。而在内地发现的权杖头，也可能与这种北方草原的游牧传统有关。

王子今老师也认为本书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与处理不同材料的能力都极具借鉴意义。他提出，不同权杖具体的持握姿势、部位和象征意义，作为象征物的权杖与实用器之间的关系，都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王子今老师还认为，与美洲、大洋洲的相似器物相参照，亚欧大陆不同地区所发现的权杖是否为单一起源，或许也可以继续讨论。从文字材料来看，中国古代的“杖”更多指老人使用的手杖，其象征意义可能与权力、地位并不完全一致。

沈睿文老师评价此书视野开阔、“勇气可畏”，而写作方式与传统的类型学研究也有所差异，更加亲切可读。沈睿文老师也提出作为权力象征和实用工具、武器的两类器物之间的区别，例如，交战中使用的权杖，其象征性的意义可能就有所收



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书影

缩。如果将两者进一步的区分开，作为武器的权杖可以更好地被置于游牧传统中研究，与两河的“牧杖”和后期出现的“骨朵”之间或许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

唐晓峰老师则表示，李水城老师的研究所展现的世界视野，无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体现。涉及外国考古的系统性专著问世，赓续了夏鼐先生以来的学脉传统，更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其次，唐晓峰老师也指出，李水城老师在书中旗帜鲜明地主张传播论的观点。在学术理论层面，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我们设定了文明之间具有发掘潜力的大问题，与一般的动植物不同，权杖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物质的扩散，更伴随着象征意义的转移。如书中所说，从时空序列和外观形态上看，权杖的确有传播的可能性。但传播的内在机制如何，其具体形态是贵重礼品还是技术转移？再有，权杖在中国的命运也引人深思。它的制作技术并不特殊，制作也并不困难，但史前人类却没有留下类似的遗存。中国本土的礼制极度复杂，但其中似乎也没有足以与西方传统中的权杖对观的权力象征物。

最后发言的李零老师也感叹本书细节丰富、眼界宽广。李水城老师的研究既“亲力亲为”，也“冷眼旁观”，利用考古学家的长处，而又跨出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精领域。李零老师指出，西方学界主流目前避谈“传播论”，但在大地域、跨文化的研究中，探讨不同文明有如河流溯源，几乎不可能不涉及这种理论。多元还是同源，仍然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此外，权杖的命名和分类也值得讨论。考古学界一般

称之为“棍棒头”，如果仅从形态上定义，不同功能的物品可能被放入同一范围内。李零老师认为，权杖更应该从功能角度分类。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中的权力象征物——斧钺，更多也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它在权力授受过程中的象征意义可能不如印玺、衣冠。李水城老师注重权杖作为权力象征的面向，在进一步研究中也应该更加突出这一特殊功能。李零老师还提出，旗帜等物品可能也有类似的功能流变。从权杖开始，本书打开了一扇窗户，引发了各种思考、研究的可能。

（撰稿：谢筠婷）



（六）静园雅集

28

徐家宁 | 摄影术与紫禁城



2021年6月1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摄影术与紫禁城”。历史影像工作者徐家宁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主持。

讲座伊始，韩策老师简要介绍了徐家宁老师作为历史影像研究学者，在中国近代历史影像研究方面造诣很高，梳理了徐老师的著述译作，并回顾与徐老师相识的经历。韩策老师进而指出，晚清以来新的照片录像与影像资料，已经受到学术界与公众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在他看来，影像研究对于历史研究的帮助在于直观获得“历史感”，认为徐家宁老师能够娴熟地将影像资料与文献结合起来，并且在学术界内外都有沟通，兼顾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

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群，紫禁城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节点几乎都会成为摄影关注的焦点。徐家宁老师以“摄影术与紫禁城”为题，梳理摄影术向北京、向紫禁城传播的脉络与节点。徐老师首先指出，中国摄影史研究中大致包含两条路径，其一是摄影技术发展的路径，其二是摄影传播的路径。两条路径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区间内完整地分隔出来，大多数时间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同时，两条路径都可以包



历史影像工作者徐家宁

含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中国摄影史的发展和中国的近代史紧密相关，研究上的每一步推进都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相关影响，绕不开传统的历史研究。

马可·波罗的文字为世界带来了对中国的想象，而直到乾隆十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画家通过画笔才向欧洲展示了比较具象的紫禁城形象，但其中仍有很多想象的偏离史实的成分。摄影术最基础的应用，是对于现实的精准反映。1839年法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开银版照相法，标志着摄影术的诞生。而1844年摄影术第一次来到中国，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ene Itier）带着相机跟随使团来到中国，在澳门与广州拍摄了许多银版

照片，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还是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使团无法去到北京，也就不可能拍摄紫禁城的照片。随后，技术上更为简单、成本更低、曝光时间更短的新方法：湿版蛋白法逐渐得到应用，使得拍照变得相对便捷，亦有底片可以洗印，影像可以复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亦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大事件，摄影术终于来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随着战争来到紫禁城面前。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是拍摄数量最多的、也是第一个拍摄紫禁城的摄影师。紫禁城的形象第一次被记录在底片上，工作在紫禁城里的人也开始接触摄影。对此徐家宁老师着重提及了恭亲王奕訢与醇郡王（后来的醇亲王）



奕訢，指出奕訢在留京善后、与联军谈判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摄影术，而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或曾在1860至1864年间在北京为当时的醇郡王奕訢拍摄过照片。

1870年代至1890年代，是摄影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更加进步，进入北京、会拍照的外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徐家宁老师具体指出，1870年代北京迎来了重要的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他在北京生活了接近20年，曾从南、东、北三面远远地拍摄紫禁城。而同时代的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亦在北京拍摄了很多照片。1880年代的华人摄影师梁时泰，作为摄影术传入中国后逐渐追赶上来的佼佼者，是为醇亲王奕訢拍摄最多照片的摄影师。回到影像，徐家宁老师举出恭亲王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三张照片，其中反映出不同的人生状态与面貌。醇亲王在大阅海军后留下的照片，也具有可进一步分析的意义。而从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1898年拍摄的前门大街细部中，可以窥见北京在1900年以前的现代化程度。

进入二十世纪，柯达公司的快相技术再次引发摄影术的爆发式发展。而1900年，伴随着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军率先攻进北京城、直扑皇城。随军摄影师奥基夫拍摄了一些纪实性质的照片，从留下的照片中，也仍能看到美军炮击午门时留下的痕迹。1901年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来到北京，受托考察紫禁城建筑，成为第一个全面拍摄紫禁城内部的摄影师，拍摄使用干版技术，照片中能够看到大殿最远端的墙角。奥基夫利用美军把守紫禁

城南大门的便利，有幸成为第一个进入到紫禁城内部拍照的摄影师，而他的镜头为人们展示了紫禁城内部最原始的样貌。

1902年两宫回銮后，清廷对于外国人与外国事物的态度发生变化。慈禧回京途中在前门瓮城里的观音庙和关帝庙烧香时，曾向城墙上围观的外国人挥手，1903年至1904年还曾让勋龄给她拍了几十张照片，标志着摄影术终于被清帝国最高权力所接受。而摄影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摄影对于中国的皇室来说成为很正常的事务。1910年代照相机日趋小型化，溥仪退居后宫，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开始玩摄影。留存的照片影像，反映了溥仪、婉容、文绣三个人的关系与他们的生活。1924年小朝廷在冯玉祥的逼迫下从紫禁城离开，北京大学的陈万里用照相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自此紫禁城内再无皇帝，而摄影术给了后人一个见证回看这一历史瞬间的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南迁，故宫、故宫文物、故宫人都开始了动荡的岁月。而当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摄影术再次见证了紫禁城的高光时刻，见证了太和殿前举行的华北日军受降仪式。

韩策老师总结徐家宁老师的分享，认为徐老师所分析的从摄影术进入中国，直至1945年太和殿日军受降仪式，是一个很完整的百年近代历史。徐家宁老师也提到，中国宫廷与摄影这一西方技艺之间的屏障，是在长达五六十年漫长的岁月里逐渐被打破的。这一过程中，摄影术在距离帝国中心极远的南方口岸城市与朝廷官员发生最初的接触，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王宫大臣在照相机前留下个人影像，再至身处权力核心的太后、皇帝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纳入镜头。这一以今天的理解来说必然发

生的走向开放的过程，在关于紫禁城、关于皇室的照片中都有清晰的反映，不同时期留存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研究的众多侧面，也有着可拓展讨论的空间。

提问互动环节，徐家宁老师在技术层面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晚清的照片着色技术通常为人工水彩上色，提及华人摄影师梁时泰很擅长给照片上色，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并未给慈禧太后拍过照，但很大可能参与了照片的放大与上色的过程。而由法国驻昆明公使方苏雅（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的“电影”与照片谈起，徐家宁老师补充介绍了汤姆逊、赖阿芳、梁时泰等人的照片源头与存世情况，并就照片版权、照相馆照片署名、收藏照片的利用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围绕摄影术文化层面的传播，徐家宁老师指出比托为中国的许多城市留下了第一张照片，回到英国后迅速产生很大反响，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中国作为“异域”的猎奇，而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产生的图像变多后，摄影师照片在西方的作用转型为服务于特定的功用，照片的价值也在不同时期发生着转换，应用于不同的渠道。讨论到清廷对于摄影的态度，徐家宁老师补充提及清廷有对洋务与新事物进行过影像记录，如醇亲王奕訢与李鸿章大阅海军、汉阳铁厂、京张铁路等，而根据德龄、容龄、勋龄的记录与回忆，慈禧太后于1903年开始拍摄照片，对于摄影的态度也相对开明、乐于参与。此外，徐老师也就宫廷照片里为何鲜有光绪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会后，徐家宁老师、韩策老师与在场学者就讲座中部分照片的细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撰稿：章涵青）

（七）菊生学术论坛

18

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

2021年5月22日至23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开幕环节，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

究员贺照田致开幕辞。韩笑首先代表北大文研院感谢贺照田和何浩为筹备工作坊所做的诸多工作，并表示很高兴文研院能与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这样一个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体多次合作，汇聚如此多优秀的学者在文研院共同讨论青年话题，同时也对商务印书馆为学术工作坊提供资助表示感谢。

贺照田老师介绍了此次论坛举办的来龙去脉。大约从2017年前后，他开始大量购买日本、韩国、欧美各国以及台湾地区有关青年问题的书籍。2018年，他第一



活动现场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次参加跨学科的东亚区域青年问题讨论。2018年下半年在文研院访问期间，不同学科的朋友都向他提及应该推动对青年问题的讨论。在此情况下，他检视自己和读书会的研究和积累，发现读书会以及很多密切合作的朋友们所做的研究都和“青年”特别有关。从191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中后期，都有人对不同阶段的青年问题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虽然青年问题最重要的落脚点是在现实，但历史部分也对理解青年问题有所帮助，所以读书会及其朋友们可以在这方面与大家分享。今年年初，韩笑老师提出希望以读书会为主体在北大开课，考虑到课程分散不如集中起来效果好，便改为会议形式。这就是此次会议的由来。

贺照田老师指出，青年问题最迫切的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认识，但读书会恰恰没有对90年代以后的青年问题下过功夫，这样一种特别的不足尤其反映在这次会议的名字上。他认为最理想的命名应该是圆桌会议的标题，即“作为历史课题也作为

现实课题的‘青年’”，但因为读书会知识积累的不足，遂改为“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因此，特别在圆桌会议加上“现实”，一方面意在补充读书会知识积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在此一学习场合提醒读书会——虽然目前能力不足，但是应该用一定的精力来理解现实，以便使历史研究和现实思考之间更加正相关。最后，贺照田感谢各位学者特别抽出宝贵时间参加会议，也感谢朋友们对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的关心和支持。本次论坛，因发言人所涉部分内容尚未发表，故仅保留开幕致辞环节。

（撰稿：刘玉静、梁苑茵、程玉婷、张晓帅）



19

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



2021年6月19日至20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德堡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第一场的主题为“从印度到中国”，三位报告人都从梵·藏·汉文本对勘为基础，

探讨了印度佛教的知识、实践对汉地佛教的影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卢鹭以“印度医学在汉译佛经中的初登场”为题作首场报告。文章介绍了安世高译《道地经·五种成败章》在古印度医学文献中的梵文平行文本，并将其与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等汉文平行文本对校，为其中的疑难、讹误字词作了考释，展现了古译期汉译佛典反映的中印文化交流现象。

南开大学哲学院宗教学教研室讲师赵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般若经》常啼求法故事之创作动机及其对中国中古佛教的影响”。赵文老师认为，《小品般若经》的主体部分虽创作于《般舟三昧经》之前，后者的念佛修行与极乐净土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般若经》中的常啼菩萨故事的创作。受其影响，中古时期汉地发展出了独特的金泥写经传统。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李灿的报告内容为“禽兽之网，何处遁逃——试论律藏、寺院与教团史研究的动物视角”，扬弃了原有的研究中关于佛教怎样看待与想象动物的视角，转而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发掘动物如何迫使秉持“怀善而生”观念的佛教团体做出改变，从而影响教团中的规定和僧侣的日常生活——包括寺院选址、寺院构件和佛教器物制作等内容。

论坛第二场围绕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寺院遗迹的结构功能和联结网络展开，主题

是“西域佛寺”。文研院邀请学者、海德堡大学佛教学助理教授陈瑞翮的报告题为“一叶知秋——试论于阗佛寺的双层体系”。报告首先梳理了有关于阗著名佛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并将这些记录中的佛寺归类为“名刹”，其特点是多由王族建于王畿之内，拥有圣地记忆和特定保护神或瑞像；与此相对，距离都城较远、由信众供养的无建寺传说，无特定保护神/瑞像的佛寺，则属于“乡寺”。以丹丹乌里克、托普鲁克墩和卡达里克三处的考古资料为例，陈老师认为名刹和相关圣物处所的错位，很可能是“名刹—乡寺”双层体系的体现，二者权力有别、功能互补，共同在于阗佛教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立栋的报告题目为“考古重建丁谷窟寺：吐峪沟石窟新近发掘与研究进展”。报告分五个方面介绍了2010年以来社科院考古所对吐峪沟石窟八次全面发掘的成果。首先，夏立栋老师以斩山崖面为线索，尝试还原石窟寺院的营造次第。其次，他参照宿白先生“凉州模式”说，提出“高昌样式”说，认为丁谷窟寺呈现出融合河西、龟兹等多地区理念但又极具独特性的“高昌样式”。接下来，夏老师分别介绍了新出文书所见丁谷窟寺摩尼教团的情况以及西区回鹘佛教遗址在功能分区等问题。最后则介绍多语种的出土文书，特别是首次发现的寺院运行文书，这为探索中古时期丁谷窟寺运作体系和僧众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的报告也围绕丁谷寺展开，题为“出土文献与

回鹘时代的丁谷寺”，指出回鹘时代因实现了对不同族群的深度整合而成为西域历史上决定性时段。接下来，付马老师对考古发现的回鹘文书进行了翻译解读，重点关注了一部记录三十余人结夏安居之事的题记，指出这一僧人群体的成员也见于吐峪沟周边发现的材料。

会议第三场主题为“佛教与汉藏地域社会”，报告所涉及的地域包括敦煌、川北和黑水城等汉藏交界地带。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武绍卫的报告题目为“地域社会中的识字僧：唐代佛教僧团识字率变动及其影响与意义”。报告利用敦煌文献中僧众签名单、抄经录、转经录等，推测了识字僧占全寺僧人的比例。武绍卫老师指出，归义军时期僧人识字率的降低，造成敦煌僧团由唯识宗主导的义学讨论转向禅宗、净土，也客观上拉大了僧人的贫富差距。同时，识字僧的数量以及识字僧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上升，僧人逐渐走出寺院，提升了地域社会的文化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筱老师的报告题为“营建‘巴蜀石窟’：川北地区唐初佛教摩崖造像与地域社会”。她质疑了将川北石窟视作北朝中心区样式地方化的“中心-边缘理论”解释的有效性，提出结合空间、造像、题记等内容综合考察石窟遗址的生成过程，结合历史文献与实物阐释其发生情景。杨老师认为，7世纪川北地区佛教造像系统是南朝造像艺术传统与北方石窟建筑形式的结合。此外义邑的组织形式，四川工匠的造像技艺，北方官员参与支持，隋末大量北方僧人入蜀，佛

教与道教之间的张力等原因都对此地造像系统的形成有所影响。

清华大学侯浩然老师的报告题为“黑水城文献中所见的替身仪轨：兼谈藏传密教文本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价值”。报告首先梳理了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替身”现象并阐述其宗教学原理，继而利用多语言校勘的方法，从黑水城文献所存仪轨本身出发，讨论其如何传入西夏，又因而如何做与如何执行的问题。他认为，替身仪轨是理解西夏及黑水城民间社会的重要材料，其中涉及身体控制、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等复杂的现实问题，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其生活社区中存在的不良情况与暴力的应对方式，所以不应忽视。

论坛第四场的主题为“中原汉地的佛教”，围绕汉语佛教文献展开细致的解读。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曹凌的报告题为“关于敦煌遗书中的论衡资料”，集中分析敦煌遗书中的三件写本，内容分别反映了教内辩论的教学场景、佛道论衡中的道教答辞、中宗至玄宗朝宫廷和贵族在场的佛道论衡等生动的历史画面。曹凌认为，这些珍贵的藏外文献能够弥补或修正传世文献所造成的偏颇印象，对认识唐代三教关系的演变和相关文学体裁的发展均有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张旭的报告题目为“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宋代写本藏经考辨”。张旭老师在报告中

介绍了开宝藏刊雕以后，以《金粟山藏经》代表的若干宋代写本藏经。张旭指出，宋代写本藏经的题记中，往往标记开始写造的时间。千字文帙号则与《开元录·入藏录》的帙号系统较为接近；目录编排上，将《续开元录》中的入藏佛典置于宋代新译经典之前，呈现出与刊本藏经不同的特点，而较多继承了唐代中原写经的规制。

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作最后一场主题报告，题目为“道宣的绝笔——解读《律相感通传》”。陈志远老师首先梳理《律相感通传》日本和朝鲜刊本系统，并从《可洪音义》和《法苑珠林》的引用推测了该书在唐宋之际的文本变化。陈志远指出，这部作品是道宣晚年的一个新发想，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天人对话的文体形式，对汉地散在的圣迹做了

新的阐释，并将阿育王舍利塔推早到迦叶佛圣迹——这代表了他对唐初一系列政教关系重大调整的回应。这些知识在道宣身后，也为西明寺僧和玄奘译场成员所分享。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前来旁听的高校师生围绕佛寺建置、仪轨研究、文本对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以佛寺为场域的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文明交界面上佛教存在的生动样本，这一历史情景本身自然对跨学科合作研究提出了要求，也提醒学者在心态上勿以学科自限，而应积极关注其他领域的研究进展。

（撰稿：陈志远）



论坛现场



（八）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

17

吴真 | 北平分店与出版大腕——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另一面



活动现场

2021年5月31日下午，“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系列讲座第17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北平分店与出版大腕——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另一面”。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史睿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求堂是日本近代以来著名的汉籍书店，从1898年到1954年的半个多世纪中，

一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吴真老师首先介绍了文求堂创建发展的始末，其经营活动横跨了日本江户末期、明治时期、昭和时期以及战败以后的四个不同时代。1861年创立之初，文求堂主营和、汉、洋各类书籍，初代经营者为田中治兵卫。1900年，文求堂迁址东京，成为当时东京第一家专营汉籍和中国书画的专业书店。

学界对文求堂的种种观察，建立在两份关键文献的基础之上：一是田中氏的三子田中壮吉编辑出版的《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书，

收录了多篇回忆文章；其次是文物出版社所出《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从这些文献出发，以往学者关注的重点自然在于与文求堂相关的人事交往。吴真老师指出，书志学和书籍史的视角同样重要。从书籍史角度切入，文求堂书店如同汉籍流通中的“水库”，其上游是众多私人藏家，文求堂从各处收集流散汉籍，重新编目、包装，再销售给下游的藏书机构和私人藏家。与此相关的主要文献是2011年出版的《文求堂书目》，其中包含了刘玉才老师和高田时雄老师从海内外访求整理的49种文求堂书目。除此之外，“人”的维度也不可或缺。田中庆太郎与其子田中乾郎堪称两代经商奇才，在时代的转折点中敏锐察觉商机，不断转变经营的重点。

梳理研究思路后，吴真老师介绍了文求堂的汉籍输入、经营概况。1900年之前的“京都时代”，文求堂以制版印刷作为经营重点。1898年，田中庆太郎从京都前往东京外国语学校“清语科”（教授清末的官话，即北京话），两年后顺利毕业，又跟随老师河井荃庐前往上海拜见吴昌硕，1901年，又来到北京购买汉籍，通过邮政小包、船运等方式运回日本出售。1901年的《文求堂唐刻书目》中提到本店设在京都、支店则在东京，并且列出为顾客到中国寻书的服务。

1909年，田中庆太郎在北京东单开设了办事处，隔月定期向日本寄送汉籍旧书。三年间，田中携妻子一直旅居北京，又适逢辛亥，趁机购入满清贵族散出书籍，斩获前所未有。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文求堂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汉籍书店，1923年关中大地

震，本乡附近建筑全部被毁，文求堂也未能幸免。田中庆太郎因此决定建设防震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这在当时的日本书店中堪称罕见。震后文求堂也开始转变经营重点，开始大量输入学术新书，迎合日本汉学界转型的风潮。1943年，田中庆太郎因身体原因退出经营，乾郎回到日本成为店主。1951、1953年，庆太郎与乾郎相继因肺癌去世，次年三月文求堂被迫闭店。

第二部分，吴真老师着重介绍了文求堂第三代店主田中乾郎的人生道路。田中乾郎1910年出生在北京东单，在庆太郎所育三子中居长。吴真老师指出，庆太郎次子田中震二与郭沫若有师生之缘，更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对于乾郎的研究相比较为薄弱。日本文献中有关乾郎的资料其实相当丰富。学者往往以为乾郎接手文求堂是震二早逝之下的无奈之选，但这并不符合日本人对长子继承制的传统认知。实际上，田中乾郎一开始就是庆太郎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少年即加入太平洋画会，进入画界核心，又跟随河井荃庐学习篆刻，此外还时时跟随文求堂来往的学人积累版本学知识，俨然是庆太郎的翻版。他在艺术、古籍方面的造诣颇高，颇有“中国贵公子”的风度。

1937年，田中乾郎经父亲安排前往中国熟悉汉籍事业，次年又携妻到北京进修商业事务，在鲍家街开设北平办事处。吴真老师考证认为，文求堂所处的街区当时环境优美、与琉璃厂亦相距不远，正合于少主人熟悉北平的文化氛围。田中乾郎发回日本的系列通信中有对北平闲适生活的描述，也有关于文昌会馆古书拍卖的详细

记载。由此切入，田中乾郎的经历也为我们研究沦陷区文人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第三部分，吴真老师聚焦文求堂的出版经营活动。自1900年迁址东京之后，文求堂总共出版了365种书籍，其中“支那语”（即“中国语”）书籍占了64%。这种经营取向也与田中庆太郎的生涯轨迹同步。庆太郎在东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他的导师金国璞、平岩道知正写作了《谈论新篇》一书，由文求堂买下版权并发行。文求堂迎合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学习南京官话转向重视北京官话的发展趋势。这本改定版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也就成为日本国内风行半世纪的畅销书。

日俄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日本“大陆侵略政策”殖民统治的目标，日本国内兴起了学习北京官话的热潮。文求堂的出版事业也与此关系密切，比如它获得《官话急就篇》的独家经销权，垄断版权、发行权，29年间再版了126次，获益无数。据反町茂雄回忆，七七事变以后，田中庆太郎就将经营活动全面转向出版，这与中国学界对于文求堂主营汉籍买卖的一般认识有显著不同。吴真老师指出，从出版数据中看，不仅文求堂自己的出版活动以中国语书籍为主，1939年日本本土的大部分中国语言书也全由文求堂出版。在文求堂的最后十年，古书业、出版业都受到国家战时管制政策的打击，但文求堂仍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获得了许多国家机构出版计划的资助。

战争中，文求堂也遭受了一定损失。1945年，田中父子的藏书被东京市立日比

谷图书馆紧急收购，幸运地躲过了东京大轰炸中的图书劫难，文求堂的钢筋水泥建筑也得以幸存。战后日本经济凋敝，旧书事业难以为继，中国语类出版物的市场也大大缩减，盛行半世纪的传奇书店就此走向落幕。第二、三代店主田中庆太郎、乾郎相继去世，文求堂的经营后继无人，库存于1954年清仓卖出。于清仓目录中，我们仍能一窥文求堂存书之丰。在此之后，文求堂藏书陆续流入市场、国家机构和图书馆公藏，图书拍卖市场上至今也往往可见田中家族的珍藏。

吴真老师总结道，文求堂是研究近百年中日书籍史与学术史绕不开的庞大身影。文求堂书店本身及它三代经营者的坎坷经历则映照东亚社会半个世纪的巨大动荡，尤其是老一辈店主庆太郎的命运，正与甲午战后日本侵略大陆的步伐共享着相同的轨迹。

讨论环节，潘建国老师提出，吴真老师的报告为我们展现了文求堂发展史上的丰富面向，特别是提出了以往学界关注不多的中国语教材编纂、出版和研究问题。此外，吴真老师善于寻找不同学术面向中的交集点。从仁井田陞的一张邮政收据出发，报告追踪了文求堂的北平经营史，又发掘出田中乾郎的生命史，可谓精彩十足。

潘建国老师还提到，从他自身的专业中国小说研究出发，文求堂也在明清白话小说善本流入日本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求堂书目》中就有不少小说、戏曲版本的记录。这对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学史界早期的研究取向可能颇有影响。再有，从庆太郎的藏书来看，他对古

书价值的判定颇有心得，并不盲从行业传统的价值标准。潘建国老师以明代的《三国志演义》一书为例指出，田中庆太郎虽然不是专业研究者，却在直觉上对俗文学出版情况有着敏锐的判断。

陈言老师接下来发言，认为文求堂的研究既是吴真老师个人学术兴趣的延续，又处在北平文化历史发展、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脉络中，内涵丰富、研究前景广阔。陈言老师同时也指出，文求堂在北京建立的出张所属于办事处性质，可能不宜冠以

“分店”之名。在1940年代北京书业目录列举的书店目录中也没有文求堂的记录。此外，她还就文求堂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合作编修《续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39年出版《周作人随笔抄》等具体细节提出了商榷和补充。

陆胤老师则谈道，田中庆太郎的学术眼光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经济利益，恰恰是赶上了中日学术潮流的时间差，能够在方志、边疆史地和小说戏曲等新兴领域有所斩获。吴真老师的研究也破除了既往研究中的不少陈见，揭示了文求堂新的面相。最让陆胤老师感到惊讶的一点则是，文求堂在其鼎盛时期能与东京大学并立，号称“文求大学”，相当于在体制内的学术标准之外另立门户。这种以书店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构建，也展示了近代以后学术权柄的变化，体现了新的学术风尚。

结合自己的研究，陆胤老师进一步阐发了文求堂官话教科书出版背后的社会情境。近代日本将汉语官话是为与国策密切相关的“特殊外语”。将文求堂的出版事业置于日本的汉语教学脉络中，明治时期的日本官话教材强调从日常语言中了解现实中国，超越了传统通过诗文展现的古代中国。而文求堂战争期间的转变则引导我们思考书店与国家政策间的关系，似乎也可以从“被统治的艺术”这一视角进行探讨。陆胤老师建议，把文求堂的书业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进行对照，可以进一步发掘其理论潜力。

（撰稿：谢筠婷）



田中庆太郎



《文求堂书目》内页图

18

郭津嵩 | 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



郭津嵩老师主讲

书较为复杂，约于汉代形成。随后，郭津嵩老师提及最近重版的两本重要著作，一本为钱宝琮先生点校的《算经十书》，另一本是郭书春先生的《九章算术译注》。本次讲座所讲是对以郭书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关于《九章算术》流传史的某些看法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他数十年校勘、整理工作的致敬。

郭津嵩老师指出，关于《九章算术》的流传，过往研究皆存在一个基本假设：《九章算术》的本文与三国时刘徽、唐代李淳风的注解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如郭书春先生所言：“传本《九章算术》集《九章算术》本文、曹魏刘徽注、唐初李淳风等注释三种内容于一体”。另一位长年研究《九章算术》、曾与郭书春先生合作译注《九章算术》法文版的学者林力娜（Karine Chemla）将这种“整体”论从一种立足于校勘的观点推向了一种历史的表述，强调本文和旧注不仅在文本形式上组合在一起，在历史语境中也拥有意义上的连贯性。她认为此一整体的形成是被塑造的结果，塑造的主体通常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力量。

在这个前提之下，过往研究认为，《九章算术》在宋代的流传虽可被划分为北宋官本-鲍瀚之刻本、贾宪《细草》-荣棨刻本-杨辉《详解》两条路径，但它们属于同一系统，不但文字内容较为接近，而且都完

2021年6月8日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第1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孙承晟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郭津嵩老师首先提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九章算术》的流传中文本与实践传统的多样性。《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算学的核心典籍，共九个章节，是一本由二百四十六道题构成的习题集，成

整地保存了刘徽和李淳风的旧注。郭津嵩老师提出，这个观点其实与当时刊刻者本人的表述不相符合。郭津嵩老师发现，南宋最主要的刊刻者之一鲍瀚之曾在序中坦言，当时《九章算术》的“民间之本”并没有刘徽和李淳风的注，带有刘、李注文的本版本反而是不常见的版本。且鲍瀚之在序中提及“细草”与“黄帝九章”等词的用法，很可能与荣棨、贾宪这条流传线索的特征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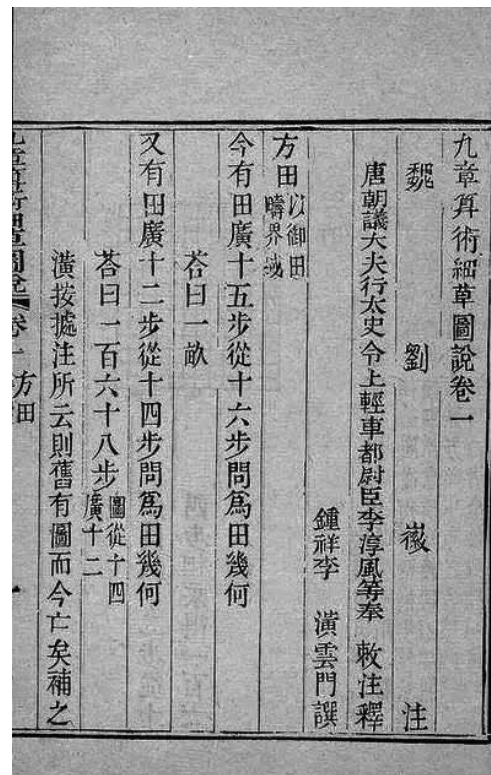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过往研究皆认定两种流传路径中的《九章算术》都是原文与注释为一体的呢？郭津嵩老师认为，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是否可靠。随后郭津嵩老师通过对史料的具体辨析，论证杨辉《详解》残本并非该书原貌。

首先，卷首出现了刘徽、荣棨、鲍瀚之、杨辉四人之序，不符合南宋书籍惯例，且刘徽和鲍瀚之认为“九章”的用法源自《周礼》，而荣棨和杨辉则认为源自黄帝，两种定位相去甚远，故几篇序言不应同现一处。随后，郭津嵩老师提出《详解》中近半题目的形态，均为前面是正文及旧注，即“问、答——术（附刘、李注）”，后面又出现“解题——术（附贾、杨注）——草/细草——比类”的另一种结构。此处郭津嵩老师提出的疑问是：为何会出现两段术文，即为何解题方法要说两次？通过比对可以发现，许多算题下的两段术文内容大体重复，注文也并非叠加而是替代的关系，术文出现两次并无必要。残本中出现了用“古术”标记贾宪《细草》术文的情况，但对大量带有刘、李注的术文不加

区别，也很不合理。由此，郭津嵩老师推断，带有刘、李注文的术并非杨辉原书所有。

郭津嵩老师还推测，杨辉撰写《详解》时用宋人习惯的表述方式替换了《九章》旧本可能源自汉代的表述方式，《详解》所附《纂类》中的题目才是杨辉撰写时的面貌。后人在重编《详解》时，先将题目部分删除，再取《九章算术》其他版本的题目和带有刘、李注的术文置于杨辉解题部分之前。这一点可以从重编者偶然忽略未尽留下的线索探知。题目与解题部分直接相连才应是杨辉《详解》的原有结构。

综上，郭津嵩老师认为杨辉《详解》的原貌并不带有刘、李旧注。相应的，过去主要用来校勘刘、李注的“杨辉本”并



《九章算术》，清道光刻本

非一个独立版本，而可能与《永乐大典》所引《九章算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结论将对前人建立的《九章算术》版本系统产生较大冲击，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本-鲍刻本和贾宪-荣槩-杨辉这两条线索并非同一个系统里的两个分支，而是在文本上、观念上、功能上都有所区别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传统。

鲍瀚之所言的“民间之本”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即从贾宪到杨辉等人的传本，它们不仅在鲍瀚之所处时代，而且在整个流传系统中都有较大的影响。相较鲍刻本的有限流传，“民间之本”在知识传播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民间之本”对《九章算术》的认识也不同于官本和鲍刻本。虽然民间之本与官刻之本存在殊异，郭津嵩老师发现，两种流传传统之间有互相引用的证据，这说明，两种传统之间在当时存在交流。

最后，郭津嵩老师对以上内容作出总结。对两个传统的讨论可以反映出南宋书籍与知识的一些特征。由于北宋时期更为符合国家推动知识发展的传统叙事模式，以往的科学史、思想史会更多着墨于北宋。实际上，民间编辑者和刊刻者发挥的作用在南宋各类书籍中均有迹可循，我们会发现有更为多样的传统在发展。士大夫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努力和互动共同促进了知识的发展，知识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其社会边界可以跨越的时期，南宋刚好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之。

孙承晟老师随后发表看法。孙承晟老师对郭津嵩老师的发现作出肯定，将其视为破除历史谜案的“文献法医”，从《九

章算术》纷繁复杂的文献中追寻关键线索与矛盾之处，厘清了《九章算术》作为重要文献的流传轨迹，对版本学、文献学而言都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孙承晟老师用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的《问题集》作出类比，该书流传至阿拉伯及欧洲的版本中皆略去了亚里士多德对问题的详细论证，只给出标准答案，提供某种确定的知识而非辩证的思维。孙老师认为，此种书籍的流传史与《九章算术》流传史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霖老师就《九章算术》的流传进行了基础知识的补充，如以《周髀算经》为例谈到书籍流传时由抄本向刻本演进的历史过程，对郭书春先生认为李籍是晚唐人士的判断表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进一步讨论了鲍瀚之刻本与其参照底本之间的关系，并在杨辉传本与荣槩传本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于郭津嵩老师观点的可能性。

最后，史睿老师对本次讲座作出总结。史老师认为，过往的校勘学主要围绕早年间经史子集，核心文献群之外的农学、算学等往往不在传统校勘学的视野之内。相较于样式完整的传本，我们所面对的现存诸残卷，其特殊之处在于保存了一些书籍体例传承的样态，我们得已从中窥探书籍样貌的中间形态，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线索，才会有进一步的探索和追问。在这个方向上，郭津嵩老师提出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

(撰稿：单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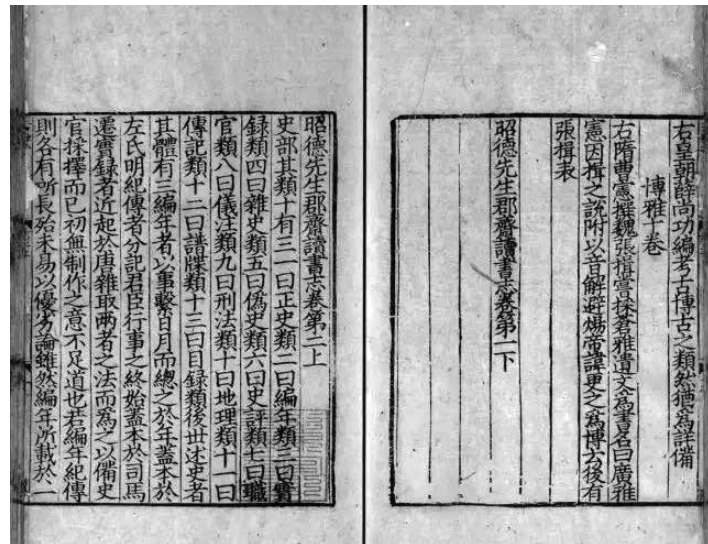
19

马楠 | 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

——《读书附志》综理

2021年6月20日下午，“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1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志》综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马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天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成晴、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马楠老师概述了《读书附志》的基本情况。《附志》是袁本《郡斋读书志》的组成部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卷本约在绍兴二十一年完成，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交付给杜鹏举，后刊成于蜀中；修订本即姚应绩二十卷本的主体内容在绍兴三十二年也已基本定型。四卷本之后晁氏匆匆推出二十卷本的动因很有可能是井度的离世：四卷本基本体现的是井度赠书的面貌，而二十卷本加入了大量晁氏本人的藏书和晁氏家族的著述与刻本。约一个世纪后的淳祐九年，知袁州黎安朝重刻四卷本，并附赵希弁《读书附志》，据黎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朝跋文，《附志》成书与记录的下限在淳祐九年冬至。同年五月，知衢州游钧重刻二十卷本，即所谓衢本。次年，赵希弁得到衢本，摘其溢出四卷本及《附志》者，录成《读书后志》，并附袁衢二本考异，由黎安朝续刻于袁州，这四部分共同组成了所谓袁本。也就是说，袁本包括淳祐九年（《前志》四卷、《附志》一卷）、淳祐十年（《后志》二卷、二本考异）刊刻的两部分，《读书附志》属于前者，在内容上则独立于《郡斋读书志》之外，反映的是赵希弁个人的藏书情况。

马楠老师认为，《读书附志》此前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主要原因可能是

难以建立参照对象。南宋四家藏书目录本就各具特点：《郡斋读书志》反映的是高宗时期四川地区图书流传、收聚的情况；尤袤《遂初堂书目》与《中兴馆阁书目》关系密切，多载秘书珍本；陈振孙未曾任职秘省，《直斋书录解题》虽然大量参考了《中兴目》，却可以视作两浙、福建、江西地区社会坊间图书生产、流传相对普遍的样本。至于《读书附志》，产生时段虽与《直斋》接近，但所载书籍却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赵希弁的学术视野、认识水平与陈振孙也有较大差距。以往的目录学研究过分集中于分类体系的讨论，也很难为《读书附志》的研究带来突破。马楠认为，对于特定的书目，只有对其著录的每种书籍展开具体分析，明确所指向的时空信息，在此基础上充分体会编纂者的实际学术能力，才能总结归纳该书目的基本特征。

马楠老师指出，《读书附志》多处记载说明赵希弁生父师问、赵希弁本人与袁州长官存在密切交往，姻亲张耕任官、归所也去袁州不远。如赵师问所序《太上感应篇》，史弥恣作跋称“余尝守袁，喜袁人之乐于趋善”，认为是赵师问感化之功，史弥恣跋后又有“程公许、汤中继书之”，程公许淳祐三年至四年知袁州，汤中嘉熙元年为宜春县主簿，当时知州为刘克庄。姻亲张耕文集有赵师问、程公许两序，张耕曾知醴陵县，终临江军别驾，皆去袁州不远。而赵希弁本人与閤皂山道士杨至质应有往来，閤皂山在临江军，同样与袁州相邻。

袁州治宜春，另辖万载、分宜、萍

乡三县。《读书附志》所载方志，有嘉定十三年知州滕强恕所修《宜春志》，嘉熙初郭正已《续志》，又有万载县志《龙江志》、分宜县志《钤冈志》、萍乡县志《萍实志》及《续志》。宜春城南有孚惠庙、仰山，在范成大、刘克庄诗文中均有反映，庆元、嘉定年间，潘侃两次编纂相关诗文集，而赵希弁曾加以续编。这些迹象都指向一点，即赵希弁家以宗室疏属久已定居袁州。

马楠老师继而分析，赵希弁题衔为“漕贡进士”，与地方长官颇有交往，本人也参与了袁州地方文献的编纂工作，因此其社会地位和学术层次，恐非滕强恕、陈振孙等知州之比，而应归入潘侃这一层级。此前关于《读书附志》的讨论多认为赵希弁有许多书籍校勘、年谱补订、史籍增补的工作，体现出很强的学术能力。事实上，这些学术工作恰恰反映了赵希弁在图书编校流程中的位置。周必大、周纶父子在吉州组织的《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周益文忠公集》编纂，正是由多名乡贡进士、免解进士具体完成的校正、补辑、年谱整理工作。比附今天的学术项目，知州等官员可以说是组织者或资助来源，而漕贡进士、乡贡进士、免解进士则是实际的执行者。

陈振孙在嘉定末年知建昌军南城县，理宗宝庆三年前后为兴化军通判，而绍定元年赵师问方为衡山令，二人约为同辈，赵希弁则晚陈振孙一辈，恐怕也是《附志》较《直斋》学术视野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陈振孙至晚于淳祐十年致仕，《附志》则于淳祐九年年末成书，二目所载书籍以宁宗、理宗时期刻本最为集中，也就是主要

反映了嘉泰二年庆元党禁结束后半个世纪左右图书生产和流传的情况。这一时期道学及道学家著述语录大量刊行，在《附志》得到了尤为明显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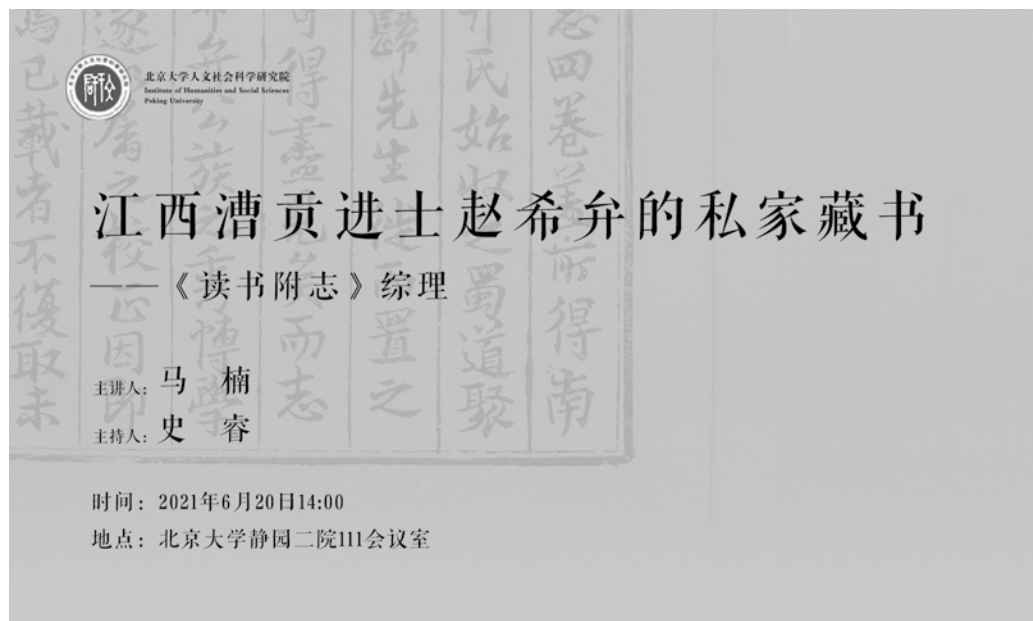
基于这样的思路，马楠老师进入对《读书附志》特点的讨论。首先，《附志》著录书籍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馆阁藏书、《直斋书录解题》所反映的全国性的、两浙路为中心的图书情况明显有别。《附志》所载袁州乡贤、历任官长的著述、刊本，虽有官长携至袁州、刊刻于袁州、编修于袁州等情况，与赵师问、希弁父子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其书难以一一分别，但大量著录袁州相关书籍依然是《附志》的突出特点。袁州之外，《附志》中也忠实反映了江西、湖南地区的著述与刻本情况，毗邻袁州的临江军、吉州、湖南潭州，与临江军相邻的隆兴府、抚州尤其集中。

其次，《读书附志》多记近事，多载近时刊本著述，许多书籍与《附志》完成的时间即淳祐九年冬至已经非常接近。如程公许《沧洲先生尘缶编》刊刻于淳祐元年中秋；程公说《春秋分记》、李壁《雁湖先生诗集》皆程公许知袁州时所刻，在淳祐三年至四年；《东坡先生别集》《续别集》为淳祐四年吉州所刻；徐夙《北门集》、李方子《朱文公年谱》皆卢壮父刻于瑞州，在淳祐四年至六年；祝穆《事文类聚》成于淳祐六年腊月等等。《附志》著录中最晚的当是《朱子语类大全》“四录二类”之“饶后录”，此书蔡杭序末署淳祐九年中秋，而在同年冬至以前，此书已从饶州流传至袁州，并为《附志》收录了。

最后，马楠老师讨论了《读书附志》

的功能。《读书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是补《宋史艺文志》之阙。《宋史艺文志》以《中兴国史艺文志》为蓝本，《中兴志》则以《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为基础。《中兴馆阁续书目》止于嘉定十三年，《中兴志》止于嘉定十七年，《宋史》著录部分理宗、度宗时著述刊本失载，《附志》与《直斋》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备这一缺失。当然二目也存在明显区别，嘉定十一年莆田郑寅知吉州，嘉定末年陈振孙宰南城，宝庆三年前后任兴化军通判、结识郑寅，是陈氏获取、著录江西书籍的两种重要途径，陈氏以为江西风水、形法、阴阳五行之学盛行，“往往人能道之”，也与南城麻姑山一带特殊地理环境相关。至于理宗时袁州及邻近州军书籍的记述，陈目当然不如《附志》详备。总之，《附志》应当视作特定时空背景中书籍史的一个截面，这才是该目的独特价值。

史睿老师指出，马楠在研究南宋书目时，兼重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两种因素，陈目与赵目虽然时代接近，但却展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如果说《直斋书录解题》反映的是以两浙为中心、全国范围内的书籍生产、流传情况，那么《读书附志》则提供了以袁州为中心、涉及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局部地区的历史断面。对《附志》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南宋后期江西地区知识群体的分布与交往、知识生产、书籍刊刻等情况，还可以通过对比《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理解以临安作为中心，国家搜集各地书籍时书目著录系统信息吸收的标准。以方志为例，进入国家著录系统的多是重要州志，县志和偏远州志



的记载较少。因而仅通过现今存世的方志理解南宋社会和文化分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通过《附志》等书目和方志中的人物、家族信息，从迁徙、交游、阶层升降等角度综合分析，可能会对地方社会文化史有更深切的了解。

李成晴老师认为，既往研究往往希望从书目中提炼作者的学术思想，而马楠老师采取了书籍史的方法，从特定时空的剖面步入现实，进行详细的解析。马楠将赵希弁《读书附志》作为宁宗、理宗时江西地区图书生产和流传的样本，指出了《附志》的特殊性。《附志》的著录中有专门的语录门类，能够反映南宋朱子学的兴盛。李成晴老师认为，赵希弁身份依然有讨论空间。赵希弁署衔“江西漕贡进士”之下有“秘书省校勘书籍”字样，在公的层面，校勘书籍的身份使其有意识地承续刘向、曾巩

一脉叙录的史学眼光；在私的层面，作为私人藏书家，在对藏书进行整理著录时也有意识地加入家族元素，希望通过《附志》将家族的基本情况流传后世。在地理方面，赵希弁藏书具有袁州地方特色，也会在解题时着重提出乡邦文献的特点。基于家族意识，赵希弁在解题时也会将自己的多种著作信息加入解题中，俾附托以传名。在解题标准方面，赵希弁常引用朱熹的判断进行论证，体现出赵希弁主张的朱子学特点。总而言之，赵希弁会将自身几个方面的特点融汇入书目的提要中，我们可以基于此进行更多的探讨。

董岑仕老师认为，报告通过详细的例证描述出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视野和书籍收藏的大致轮廓，以地域特征和记述时段厘清了《附志》著录书籍的线索，但还有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一方面，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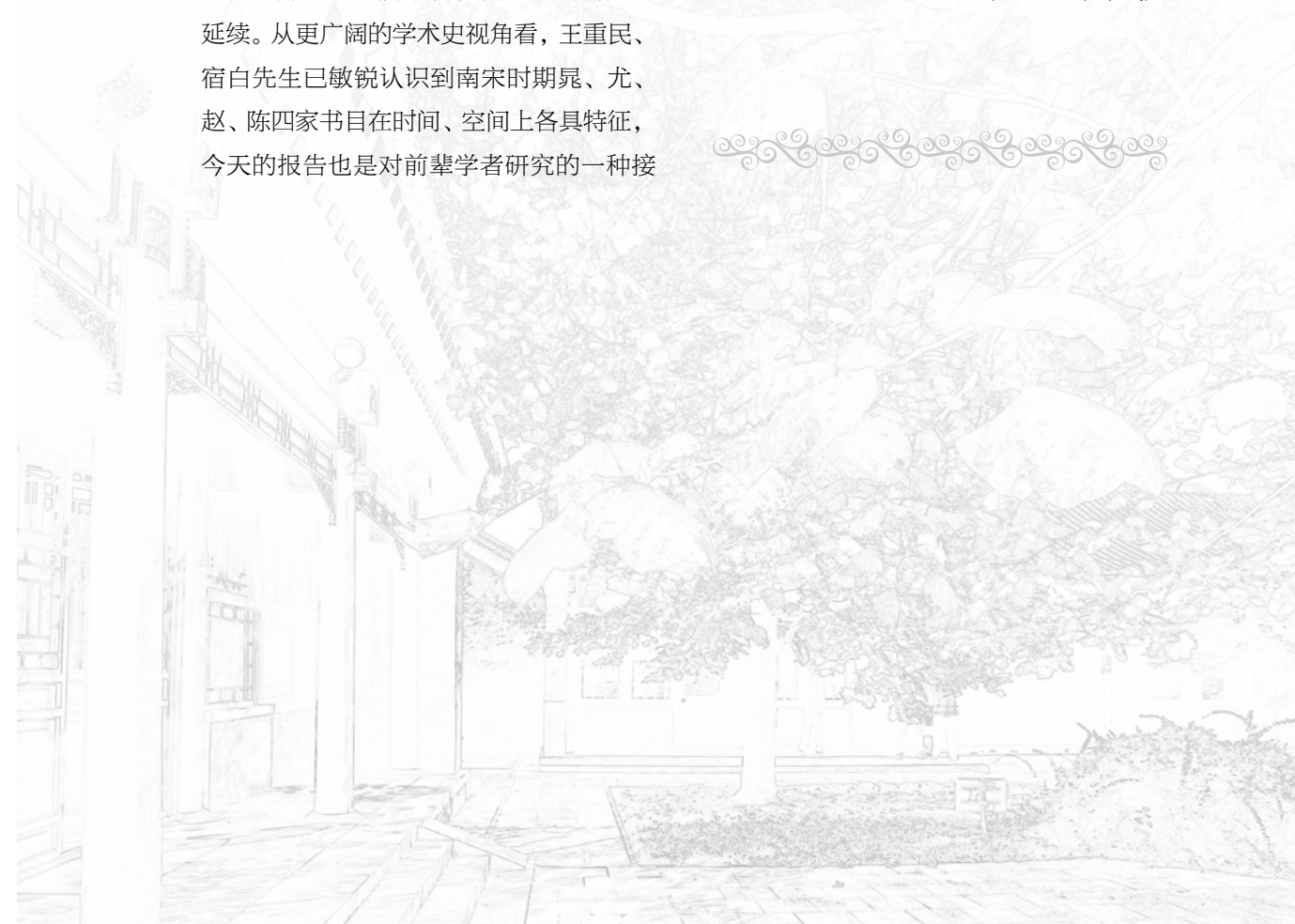
西地区的概念较为宽泛，既可指今天的江西，也涵盖南宋时江南西路及江南东路南康军、饶州、信州等地，将江西地区作为讨论对象需要说明缘由、明确界定。其次，由于书籍和人、事、地均有关涉，相关讨论涵盖面向较广，一些刻本在目前的文献证据上存在缺环。譬如，即使论证若干人物有江西任官经历，也并不说明其论著一定与江西有关，需要区分主次，讨论哪些书籍有实在的文献证据可确认在江西刊刻，哪些书籍存在实物线索证明其确与江西地区的有关，可以根据时代先后再进行划分，细化地厘清关系、论清先后与始末。

王天然老师认为，报告聚焦于赵希弁《附志》，揭示了赵目的独特价值，这是马楠老师近年来唐宋官私目录系列研究的延续。从更广阔的学术史视角看，王重民、宿白先生已敏锐认识到南宋时期晁、尤、赵、陈四家书目在时间、空间上各具特征，今天的报告也是对前辈学者研究的一种接

续与深入。此外，王老师还提示：第一，袁本《后志》二卷之末列出三十三种书，是姚应绩二十卷本与赵希弁《附志》共有的部分。第二，《附志》并非赵希弁家藏书的全貌，赵氏藏书有与杜鹏举四卷本重合部分。在聚焦赵目作为宁宗、理宗时期书籍生产样本的同时，与晁志重叠的部分，也应在思考范围之内。赵希弁《后志序》述及赵家三世所藏，这一时间线索可以继续挖掘。第三，刚才董老师也提到，在讨论江西地区书籍生产特点时，需要注意对江西本加以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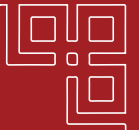
马楠老师与各位到场老师也就本场讲座相关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 邓晋武)





文研回望



文研院举办学术期刊负责人座谈会

202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回信《文史哲》编辑部，信中写道：“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为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回信精神，加强高校与学术期刊的合作，推动学术发展，5月13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举办学术期刊负责人座谈会，邀请《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路育松、《近代史研究》主编葛夫平、《史学月刊》主编苗书梅、《文史》责任编辑鲁明、中华书局学术著作中心编辑孟庆媛等学术期刊负责人，与北大学者座谈，共议推动学术建设、引领学术发展、带动理论创新等问题，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校长助理孙庆伟，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李伯重教授、王立新教授、陈侃理副教授、苗润博助理教授、韩策助理教授等参加座谈会。

邓小南老师首先对各位期刊负责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在致辞中谈到，学术期刊在学界具有“掌文脉、主文衡”、引领学术风尚的重要作用，文研院举办本次座谈，一方面请各位老师分享对当前学术发展方向的认识和观察，另一方面文研院也想借此时机向各位老师报告近年来的工作，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并深化与学术期刊的合作。

随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老师向各位期刊负责人介绍了文研院的学术工作开展情况。渠敬东老师指出，文研院以“文明：中华与世界”为核心议题，长期关注学术领域基础和前沿议题，所做的工作即是在这些重要议题的引领下，通过引入跨学科的视角、讨论，推进学术的发展。渠老师说道：“任何一个学科的前沿和基础都是跨学科研究，所有的学术突破都不是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内激发出来的”。好的学术期刊应该能够把握最为重要的学术议题，引领学术方向。

《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高度认可文研院所推进的各种学术活动，并表示学术期刊应该具有社会担当，也要尽努力突破学术发展困境，展现学术研究的独特性。路育松老师介绍了《历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并表示很多选题都与文研院关注的学术议题高度契合。《近代史研究》主编葛夫平老师谈到，学术期刊承担着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培养和支持优秀学者、推动学科发展的使命。引领学术方向，净化学术生态应该成为学术期刊努力的目标。其后，苗书梅老师和鲁明老师分别介绍了《史学月刊》和《文史》的情况，并表示在以后应该加强沟通，共同促进学术发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在座谈中讲到，学术期刊不仅引领方向，而



与会人员合影

且也造就学者，应该引导学术议题和发表对重大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历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指出，学术期刊要引领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如碎片化、中国话语等展开讨论，并为这些讨论提供适当的发表空间，形成示范作用。王立新教授表示，学术期刊的选题与导向对年轻学者具有重要影响，期待着学术期刊能营造良好的发表环境，扶持青年学者的成长。随后，与会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青年教师咎涛、陈侃理、苗润博也从各自的研究、投稿经历出发与诸期刊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最后，王博副校长充分肯定了文研院近五年来的工作。文研院作为北京大学搭建的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起到了凝聚学者的作用。王博副校长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术期刊要坚持学术导向，对学术负责、对历

史负责。促进知识积累、引领学术进步应该是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准。

通过此次座谈，文研院增进了对学术期刊的了解，希望可以更多的发挥学术平台的汇聚作用，与学术期刊建立合作互动，凝聚多方学术精华，推动学术资源共享，更好的服务学术、服务学者、服务国家战略。

（本文于2021年5月1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王瑞）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在文研院举行



自2020年秋季学期，文研院发起“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聚集多学科研究者探讨“近代”，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象、方法，探寻近代中国研究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真实联系，同时尝试与古典研究对话。此前举办的五场活动中，文研院邀请多学科学者在思想、制度、文章三个论域中进行密集、多维度的讨论，希望借此机会，引导重思百年来古今中西之变的内涵，从而通向一种更为开放而整全的“近代中国研究”。

2021年5月29-30日，本系列论坛第

六场暨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发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共同召集，并由“京港大学联盟”提供支持。会议分设北京与香港两个会场，两地通过连线方式对话。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切入，围绕“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这一主题发表学术见解。

晚清以来西潮涌入，新思想层出不穷，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积累极为丰硕。在学术脉络内部的延展之外，新思想的萌生和传递，也有赖于外部的物质形态与技术手段。铅石印书、报章杂志、教材教案、电报电话、摄影相片、留声唱片等新载体的相继导入，由文字、符号、图像、声音、气味等元素构成的感觉世界焕然一新，并反过来影响到思维方式的代际更迭。本次活动，十八场专题报告在京港两地逐次开展。与会学者围绕物质媒介对思想转型的影响、“物质”与“情感”的互动、新媒体与新形式的限度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论坛开始前，香港方面召集人崔文东

表示：“京港两地青年学人对思想文化史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期待本次会议能够加强两地学术交流，在平等对话中共同成长。”北京方面召集人陆胤则指出：“会议主旨不仅关注物质形态，也更加希望能够打通思想史和文化史，进入内在情感的挖掘，内外兼修，共同培育更具深度的近代研究。”密集讨论之后，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将自己受到的启发概括为三点：“一、物质为思想提供条件和可能性；二、复原物质和思想相互塑造的场景，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历史脉络、扩展思想版图；三、物质透过语言尤其是比喻等媒介进入思想史，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线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任程美宝教授则总结道：“会议报告涉及近代中国各式各样的情感，

包括忠义、英雄崇拜、孤独、爱国革命的热情、诗意、亡国的恐惧等，不仅讨论情感的抒发，也涉及情感的克制；而如何将情感分析与不同媒介的独特性相结合，值得持续深入探讨。”

疫情的到来，使得京、港学术交流一度中断。文研院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将继续举办跨地域、跨学科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加强京、港学界的交流与互动。

（本文于2021年6月2日登于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新书发布会在文研院举行

2021年5月24日，由商务印书馆和文研院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汝信、晏智杰、艾四林、仰海峰、渠敬东等出席并座谈，共同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主持。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创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来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以下简称“译丛”)。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套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来源的经典译丛,包括反映黑格尔、费希特、康德等人学说的德国古典哲学经典12种,展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学说的空想社会主义经典20种,体现配第、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学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13种,具有系统性、权威性、便利性等特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绕不开的一套书。

发布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介绍,“译丛”具有系统性、专业性、便利性三大特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必备经典。一是系统性,“译丛”分“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三套书,系统收录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经典著作。二是专业性,体现为选目经典、版本经典,选目方面,从召开专家论证会研讨书目,反复求证,到请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审订,最终确定入选书目;版本方面,均为名家译本或经多年反复修订而成的经典译本。三是便

利性,有助于读者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时作为案头参考;同时在阅读这些著作时,通过查检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相关评论,正确理解书中的思想观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晏智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简要清晰的梳理。他谈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批判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根据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决定了它的周期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客观必然性。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艾四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年轻人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经典原著是绕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历史唯物主义很形象地标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独创性、开创性的贡



新书发布会现场

献。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思想史的储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仰海峰表示,“译丛”三套书的出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整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伟大学者如何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在阅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应尽可能关注它背后的历史、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中人的观念转变,在这个层面上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怎样去面对他当时的世界,从而在思想的沟通中去把握一个时代思想的原形。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渠敬东简要梳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最终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他认为,马克思的视野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使社会

主义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马克思是以总体视角将社会主义关照整体的眼光和视域拓展开来,从而才能充分利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资源。所以三大来源就像三足鼎立的稳定的学科架构,缺一不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套“译丛”也让我们重新回归到马克思最深切的基础上来。

正如汝信先生在“译丛”序中所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和吸收,为批判继承历史思想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阅读这套经典著作时,应该向革命导师学习,批判性地吸收其中的思想观点,正确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

(本文于2021年6月2日登于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王瑞)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书影

文研院举办“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主题系列论坛



论坛现场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02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4 日，文研院与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通过聚焦中共革命研究相关议题，进一步深入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论坛共分三场，从地域、概念史、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对中共革命的特殊性、中共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关联、中共革命研究的方法论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与会学者中既有党史研究资深学者，也有学术新锐，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西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

关于中共革命的研究，海内外学术界已持续进行数十年，进而形成一些典范表述与经典研究。近二十余年，受史料开放和多重学术资源的刺激，这一研究呈现新的气象。以中共革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革命史”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在此背景下，以往中共革命史的诸多论述得到重新检视，一些新领域也被逐步开辟出来。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中青年学人，也越来越多地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共革命史。

5 月 6 日晚，系列首场论坛在北京大学

静园二院举行，主题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论坛伊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指出，“之所以提出这一主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经验。”以地域的视角观察中共革命研究，可见其呈现出地域社会参与革命时独特经历与情感体验，揭示出中共协调政策目标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灵活主动。

系列论坛第二场于 5 月 25 日举行，主题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在主持发言中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关注概念的落地与概念意涵的演变，具体到中共革命而言，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阶级、苏维埃等关键概念仍值得分析探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应星教授同样强调，“理解中国革命，概念是要害所在。”论坛中，诸位学者努力探索不同概念之引入、改变与实践过程背后的共同逻辑。

6 月 4 日，系列论坛第三场“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在文研院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江军认为：“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历史活动，就要聚焦情感、心理、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并用理性框架加以解读。”三位主讲人分别从共产革命的兴起、革命青年与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等角度，阐述了非理性因素对中共革命发展进程产生的深刻影响。

回望伟大征程，传承百年荣光。文研院将继续依托跨学科学术交流平台，汇聚多学科学者，关切中共革命研究，以新视野与新方法，深入认知中共革命，并从中提取足供其他学科讨论的学术资源。

（本文于 2021 年 6 月 7 日登于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5.2-7.11
2021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栏目，陆续推送 20 篇由李景汉、陈翰笙、陈达撰写的文章。

04

2021-05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激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尚书省与汉魏南北朝文书行政体制的演进”。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翮、杜永彬、黄晓春、马里扬、马忠文、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6

2021-05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映虹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就法语文学研究进行交流。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余旸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作主题交流发言。余旸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研究现当代诗歌——诗歌与现实的紧张遭遇”，张昭军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翮、杜永彬、黄晓春、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8

2021-05

“北大文研论坛”第 137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胡英泽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0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古希腊早期哲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穆宏燕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北大文研论坛”第 138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文书碑志与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主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郑炳林、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王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和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作主题报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宝海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本次论坛。

09

2021-05

第十次“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就专题史项目选题展开讨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陈苏镇，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读书”第 26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复位与再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来自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新疆龟兹研究院、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高校及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并参与研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系列研读会第五场、“北大文研读书”第 27 期在李兆基人文苑 1 号楼 1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和而不同，多元之美——乐黛云教授《九十年沧桑》研读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

13

2021-05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研究员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商议双方合作事宜。

文研院举办学术期刊座谈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介绍学术工作情况，学术期刊负责人与北大教师代表座谈交流。与会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孙庆伟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李伯重教授、王立新教授、咎涛副教授、陈侃理副教授、韩策助理教授、苗润博助理教授，《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近代史研究》主编葛夫平、《史学月刊》主编苗书梅、《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路育松、《文史》责任编辑鲁明、中华书局学术著作中心编辑孟庆媛。

“袖珍经典”栏目第八期推送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的文章“古画鉴定学中的时代风格与标型”。

文研院第十期访问学者交流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承晟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明昊作主题交流发言。孙承晟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研究明清中西科学交流史？”，赵明昊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第十期访问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翹、杜永彬、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吴真、徐永明、余旸、张昭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 139 期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孟德斯鸠与欧洲政治传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作引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葛耘娜、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璐、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潘丹出席并参与讨论。

14

2021-05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1 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科学在行动——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

15

2021-05

“北大文研论坛”第 140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发现通天洞——通向早期人类的生活世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作引言。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何嘉宁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沙漠腹地与欧亚通衢：人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系列论坛之一。

18

2021-05

文研院第十期访问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助理教授陈瑞翹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佛教写本层累性管窥”。第十期访问学者白玉冬、曹寅、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2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讲，文研院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主持。本次讲座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 72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贾米在中国——一位 15 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讲师沈一鸣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宇洁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评议。

20

2021-05

文研院第十期访问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第十期访问学者曹寅、陈瑞翹、杜永彬、黄晓春、李肖、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3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卡尔·施米特或敌意的政治学”。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主讲，法国巴黎大学庞亮博士翻译。

21

2021-05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4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联系东西方的纽带——麦都思在 19 世纪翻译史上的贡献”。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赵京华评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 205 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本次讲座是“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北大文研读书”第2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研读会”。文研院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李大海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高智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141期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作引言，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程芸，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共同主办。本次论坛为“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之一。

“菊生学术论坛”第1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历史课题与思想课题的‘青年’”。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新书发布会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汝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晏智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与会。

“北大文研论坛”第142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绿洲的进退：新疆的植物、环境与早期人类活动”。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承森作引言，北京动物园科普馆原馆长肖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戴进业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是“沙漠腹地与欧亚通衢：人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系列论坛之一。

25

2021-05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作主题报告，题目是“有关高昌回鹘历史的一方回鹘文墓碑——蒙古国出土乌兰浩木碑释读与研究”。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陈瑞翹、黄晓春、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锋、徐永明、余畅、赵明昊，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论坛”第143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北大文研讲座”第20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早期罗马帝国平民人口流动——碑铭上的身份构建”。美国德堡大学古典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吴靖远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之一。

“线上雅集”栏目推送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的文章《王铎在卫辉》。

“北大文研讲座”第207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贝奥武夫》与古日耳曼英雄世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王继辉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教授陈岗龙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王翥斐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传统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26

2021-05

27

2021-05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一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作主题报告，题目是“从纸本文献到智慧化数据”。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翹、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畅、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史睿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3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查理曼与弃绝魔鬼——对加洛林改革的一项

22-23

2021-05

24

2021-05

话语考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刘寅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隆国评议。

28

2021-05

“北大文研论坛”第144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明清时期西学在华传播及其反思”。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承晟主持并作引言，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韩琦，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作主题发言，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评议。本次论坛为“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论坛之一。

29-30

2021-05

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暨“北大文研论坛”第145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办，主题为“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发起，并由“京港大学联盟”提供支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本次论坛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之一。

31

2021-05

“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17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北平分店与出版大腕——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另一面”。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史睿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并参与讨论。

01

2021-06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陈景濂的归来：战时印度的中国城与中国逃兵”。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陈瑞翹、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20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评议。

02

2021-06

本次讲座为“敦煌学”系列讲座之一，由敦煌研究院、文研院、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北大文研讲座”第209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考据、口述与田野——以那清绪口述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评议。本场讲座是“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03

2021-06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里扬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激萌作主题交流发言。马里扬交流题目为“中国文学的兴寄传统：我为什么研究唐宋诗词？”，聂激萌交流题目为“我为什么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官修史体制？”。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翹、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4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整风运动后的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赵诺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作评议。

04

2021-06

“北大文研论坛”第146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孟永、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黄江军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一行应邀前往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座谈，并参观“庙堂典范：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

05

2021-06

“北大文研读书”第29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文研院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激萌作引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顾江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正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冲出席并参与讨论。

07

2021-06

哔哩哔哩政策研究院院长谷雨及团队成员来访文研院，商议合作事宜。

08

2021-06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杜永彬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生成、传播、接受——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知与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陈瑞翹、黄晓春、李肖、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1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发现‘民间之本’——《九章算术》流传史新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史睿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孙承晟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出席并参与讨论。

09

2021-06

“线上雅集”栏目推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黄小峰的文章《拯救郑思肖——一位南宋“遗民”的绘画与个人生活》

10

2021-06

“北大文研讲座”第210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西方社会观念的旧与新——圣维克多修院的于格论婚姻和家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燎宇评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主持。本场讲座为“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11

2021-06

文研院线上平台增设“长路”栏目，收录建院五年来各界友人与文研院的故事及对未来的展望。栏目首期推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的文章《我与文研院》。

“北大文研讲座”第211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近人书信程式与文化蕴含”。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主持。

15

2021-06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真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日书籍环流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第十期邀请学者曹寅、杜永彬、聂激萌、孙承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5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宋道家如何‘治国平天下’？”。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评议。

16

2021-06

“北大文研论坛”第147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作引言，文研院邀请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出席并参与讨论。

17

2021-06

“北大文研讲座”第212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和巫术治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主讲，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金勇评议。本次讲座是“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18

2021-06

“北大文研讲座”第213期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龙凤呈祥——清代皇帝大婚典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任万平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主持。本场讲座为“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之一。

“静园雅集”第二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摄影术与紫禁城”。历史影像工作者徐家宁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主持。

19-20
2021-06

“菊生学术论坛”第 19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德堡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19
2021-06

“北大文研读书”第 30 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族群政治与科举社会——《另一种士人》研读会”。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饭山知保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正贞、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方诚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锦萍出席并参与讨论。

20
2021-06

“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 19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志》综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马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天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成晴、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出席并参与讨论。

21
2021-06

“北大文研讲座”第 214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五代宋元西北地区的回鹘语题记——研究与展望”。文研院邀请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主持。本场讲座为“敦煌学”系列讲座之一。

22
2021-06

“北大文研讲座”第 215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殖民主义”。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荣誉杰出教授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方博评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

文研院第十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吴华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第十期邀请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激萌、孙承晟、吴真、徐永明、余旻、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4
2021-06

文研院组织第十期邀请学者前往京西妙峰山考察。

“北大文研讲座”第 216 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新冠疫情的政治学”。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巴黎大学荣休教授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主讲，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庞亮翻译。本次活动是扎卡教授受邀在文研院发表的第三场演讲。

25
2021-06

文研院举办学术期刊筹备恳谈会，商谈创办学术期刊事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和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谈文研院创办学术期刊的初衷和初步想法。与会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副教授崇明、副教授咎涛、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恣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就创办学术期刊事宜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党支部书记王周谊讲授专题党课，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参加学习。

“北大文研论坛”第 148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书写与帝国记忆”。《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周奇主持，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陈莹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恣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董雨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评议。

29
2021-06

第十期邀请学者总结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期邀请学者、文研院院务会、行政团队参加。

30

2021-06

敦煌文化价值体系研讨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文研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主持。敦煌研究院一行与北大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座谈。

“北大文研讲座”第 217 期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工业的乡缘——一个适配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折晓叶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评议。本次讲座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01

2021-07

文研院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在线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并于会后交流学习心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静到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就举办“百年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筹备事宜进行讨论。

12

2021-07

“北大文研读书”第 31 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匪杖不强：《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读书会”。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罗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出席并参与讨论。

15

2021-07

文研院召开春季学期总结暨工作推进会，全体人员参加，共同讨论五周年相关工作，并就具体事项提出意见。

文研院举办毕业生助理欢送会，院长邓小南颁发证书，六位毕业助理发表工作感言。

17

2021-07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加 2021 年绍兴元培峰会“东亚文明与通识教育的视野”，并以《文研院视野中的近代学术》为题发言。

21

2021-07

“北大中国史”暑期研讨会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09 会议室举行，商谈暑期研讨会内容及日程安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陈苏镇，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会。

23

2021-07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就举办“百年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筹备事宜进行讨论。

7.26-8.01

2021

《邓广铭全集》整理小组在文研院召开学术研讨工作坊，进行整理校订工作。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参加。